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美国汉学史（下册）

熊文华　著

苑出版社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美国汉学史（下册）

熊文华　著

學苑出版社

（十一）以关切和批评为探索中国思想文化动力的墨子刻

1933年墨子刻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祖父是富商，父亲阿诺德·墨子刻（Arnold Metzger）是一位酷爱音乐的哲学家，曾撰文批判纳粹时代文化。因为受到了希特勒政权的迫害，他毅然带领全家移居美国，定居于波士顿。墨子刻从小受到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长大后成了一位大提琴演奏高手，专业上对西方哲学史情有独钟。

20世纪50年代，墨子刻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曾倾心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爱看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The Red Star Over China），并自学中文。1952年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曾在美国陆军乐队服役，后入华盛顿乔治敦大学，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他受到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影响对中国边疆历史很感兴趣，他的硕士论文就是有关中国的蒙民政策研究。

获得硕士学位后墨子刻进入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在导师费正清的指导下，他开始研究陶澍（1779—1839）经世改革、两淮盐法和清代的官僚制度，以《清朝官僚体制的内在组织》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在撰写论文过程中他深入研究了《大清会典》和《处分则例》等史籍，了解到清代的官僚组织其实是一个颇有效率和改革机制的机构，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鼓励下不少官员都做出了成绩。1967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系博士学位。

墨子刻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好感，学习中国文化使他感受到精神上的激励，他认为《论语》比圣经更能打动他的心弦。他在推崇中国文化的同时对乌托邦精神持批判态度。通过中西政治和知识的对比，他对受到西方冲击的中国近代思想体会良多。

1977年墨子刻出版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是他对儒家学说多年研究的成果，涉及了宋明理学、清代官僚制度、当代毛泽东思想和新儒学家学说，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可以揭示宋代以后新儒学与政治发展之间的联系。他发现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变化，除了源自于西方的影响外，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虽然西方的现代技术和意识形态赋予了中国人一种能动力量，但是中国人的自我觉醒和求新变革的长期奋斗精神却更为重要。该书的理论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认为它奠定了作者在中国思想研究领域中的地位。1979

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在洛杉矶召开年会时曾围绕该书的中心论题和研究方法展开了热烈讨论，一致肯定它对推动美国的中国思想研究所做的贡献。

1998 年墨子刻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一书中对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套用西方“市民社会”的概念来考察中国历史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学术交流和借鉴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民社会”，西方的这一理想是否对现代中国政治产生过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传统的型塑，却令人怀疑。他说西方的“市民社会”是指某种非乌托邦的政治秩序，其特征表现在国内事务、经济领域、文化活动和政治互动等方面，个人或群体可以从中协调，但是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在一些中国学者的著述中，这种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定义却被修改了。在他们看来圣贤掌控国家或者获准对社会实行指导可与“市民社会”挂钩。这类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可能导致国际关系复杂化。

1968—1969 年墨子刻曾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汉学讲师一年，后赴台北斯坦福中心进修汉语。1970 年他应聘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由助理教授逐步晋升为教授。1980 年他荣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员协会优秀奖。1990 年他退休后成为该校讲座教授，同时兼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

墨子刻退休后在学术界仍然非常活跃，国内外的活动几乎排满了日程。1982—1985 年他在台湾师范大学任客座教授，1994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为港台大学合作交流项目“钱穆历史文化讲座”授课。1995 年他应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担任客座教授，2000 年任武汉大学客座教授，2001 年秋应聘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客座研究员。2003 年 3 月他在密歇根大学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唐君毅系列讲座”发表了就职演讲；2004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举办的“大厦论坛”发表演讲。他还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举办的有关钱穆（1895—1990）、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和徐复观（1903—1982）讲座发表了基调演说。2004 年他还与北京国际儒学协会签署了为期五年的顾问合同。2005 年他应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客座教授。

墨子刻撰写了许多论文、书评和专著，对中国的官僚组织、儒家传统的

连续性、乌托邦与现代化、新儒家思想的时代意义等课题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不只是学术研究的课题，更是一种学问和智慧。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能回忆起课堂上许多精彩的一瞬间——极富哲理沧桑的幽默。

他的主要著述有：

《清代商界的组织能力》(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Ch'ing State on the Field of Commerce, in W.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年)。

《清朝官僚体制的内在组织：合法性、规范性和融通性面面观》(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 Harvard studies in East Asian law, 1973 年)。

《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年)。

《中国思想的部分古代根源》(Some Ancient Roots of Chinese Thought, in Early China, 1987 年)。

《中国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衔接》(Continuities between Modern and Premodern China, in P.A. Cohen and M. Goldman, eds., Ideas across Culture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年)。

《大中华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互对抗还是彼此尊重》(Greater China and U. S. Foreign Policy: The Choice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Mutual Respect, Co-authored with Ramon Hawley Myer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6 年)。

《超越西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目光和邓小平现代化纲领理据》(Transcending the West: Mao's Vis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Teng Hsao-ping's Modernization Program,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6 年)。

《中国历史语境中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The Western Concept of a Civil Society in the Contetxt of Chinese History, Hoover Press, 1998 年)。

《中国民族主义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ese Nationlism, co-authored with Ramon H. Myers, Hoover Diggest No. 2, 1998 年)。

《飞越太平洋上空的云朵：当今中西政治理论冲突论文集》(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 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年)。

《北京不可思议的事情》(Enigma in Beijing, Hoover Digest No. 2, 2005 年)。

《邻国龙》(The Dragon Next Door, Hoover Digest No. 4, 2006 年)。

(十二)倡导在史学研究中以中国中心观取代种族优越感的柯文

1934 年 6 月 2 日柯文出生于美国纽约。1952—1953 年他就读于康奈尔大学,1955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1957 年他从哈佛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1961 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除了英语外他还精通法语、汉语和日语,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2—1963 年他被密歇根大学聘任为客座讲师,1963—1965 年担任阿默斯特学院助理教授,1965—1971 年任马萨诸塞州韦斯利学院副教授,1971—2000 年任伊迪丝·斯迪克斯·沃瑟曼亚洲研究和历史学教授,2000 年任该校埃默里托斯讲座教授。

柯文在学术界非常活跃,曾兼任许多研究机构的职务。1965 年他担任了哈佛大学费正清汉学中心研究员,1979 年任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研究员,1981—1982 任费正清中心执委,2000—2002 年被聘任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外国顾问,2004 年任香港人文和社会学院顾问团顾问。

柯文早期的研究课题主要聚焦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史。1957 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对传教士在中国采用的不同传教手段(上层路线与基层路线)进行了比较分析。1962 年柯文又在《汉学学会会刊》上发表了《晚清反传教士史料》,系统地整理了清末反基督教运动的历史文献。1963 年他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修改扩充后出版了《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 年间中国的传教运动及排外主义的发展》一书。在史学分期上他认为中国近代史头十年的 1860—1870 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思想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分析这一时期的历史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当时充满内忧外患的晚清社会。基督耶稣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的宗教生活,在反基督教运动的群众和乡绅看来构成了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引起了中西思想文化上的冲突。宣扬“中华归主”和西方近代新文化的神职人员并

非“救世主”的代表，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缺乏全面的了解，遭到抵制只是时间问题。国外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只关注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过程中的某一环节而忽略其他。因此柯文决心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1974年柯文出版的第二部著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讨论了王韬时代的社会改革问题，如：改良与革命、时代与历史变迁、“传统”与“现代性”、物资丰富与价值观念转型等。柯文认为，过去学术界倾向于把传统与现代性绝对分开是一种僵化观点，排斥了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其实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它们完全可以兼容并存。王韬虽然主张对现存体制进行改革，是近代史上一位先知先觉的人物，然而在他思想上却对于传统依依不舍。柯文在该书最后对王韬及其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集体扫描，肯定了当时中国沿海城市在改革大潮中所具有的活力，获得全国多数城市认可后是可以大有大有作为的。

柯文在《中国历史揭秘：有关近代中国的美国史学著述》一书中，通过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史学家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专著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式与方法问题。他认为这一阶段的许多美国历史学家以西方中心观（Western-centric Perspective）来解读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因而产生了诸多曲解和歧见，他们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明确指出美国历史学家曾经错误地纠缠于三个基于偏见的分析框架（biased-based frameworks）：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现代性模式（traditional-modernity model）和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模式无一例外地美化了西方国家在中国历史演变中的作用，夸大了他们的影响。

该书共分为四章，前三章分别讨论了三个框架的实质，第四章具体介绍了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模式”（China-centered/Sino-centric model）。第一章重点探讨中国对西方入侵的回应问题。持“冲击-回应”观点的美国中国历史学家把中国出现的巨大变化看作西方冲击的结果，中国自身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对西方的回应。柯文解释说西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能被解读为中国人民做出反应的导因，因为当时还有大量其他因素存在，比如太平天国造反和“同治中兴”。他坚持认为有些事情即便西方没有介入也可能发生，中国历史依然发展，义和团举事主要发生在没有西方影响的农村地区，就是其中一例。第二章“传统与现代性”谈到了该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处于停滞和封闭的前提下，西方以现代性打破了当时局面。在这个

问题上中国被认为只是与西方的水平不同,相比之下显得很落后。这是一个主观模式,因为历史学家估量重大变化的尺度是按照西方定义的“现代性”。这种认识导致历史学家错误地把中国传统视为前进中的障碍。柯文引用了列文森、芮玛丽(Mary C. Wright,1917—1970)和墨子刻等人的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第三章“帝国主义模式:现实还是神话”讨论了柯文的最后一个问题的框架。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从两个视角建立起这一模式:视角之一是把帝国主义看作中国问题的根源(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不得不面对他们的干预导致灾难性的现实也是其中一个例证),视角之二是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政治上和智力上的正面与负面的变化。柯文觉得帝国主义模式不仅仅是偏见进入历史解读的证据,也是当代事态促使历史学家通过预测因果关系对历史进行的回叙。柯文赞同这样的说法:与其说帝国主义确实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倒不如说是对“打开中国历史万能钥匙”观点的否定。他对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挑战:他们必须指出哪些情形真正与帝国主义有关,然后进一步指出哪些情况如何与帝国主义有关。第四章“迈向以中国中心观编撰的中国史”展示了他对中国历史行动的期待。柯文对美国历史学家的看法是悲观的,因为他觉得要彻底消除史学研究中的种族优越感(ethnocentric bias)几乎不可能。他希望采用“中国中心观”可以减少以“西方中心观”对中国历史的解读。为此他提出了包括四个步骤的解决方案:直接从中国和中国人论题开始研究历史,把中国分成若干个小区,从基层社会向上进行考察,重视从其他学科引进有效研究方法。

《中国历史揭秘:有关近代中国的美国史学著述》是一部反映了史学评估价值观潮流的代表作。柯文开宗明义地谈到了该书的写作源于个人和专业早期的自我评价,促使自己去揭示存在于中国历史解读中的偏见,进而扩大到对其他美国中国历史学家的深度分析,以及深受美国模式影响的其他历史学家的论述。他承认对于持不同观点者的批评范围有限,而且纯属个人的主观见解,出版该书的用意不在于对中国史学做出最终陈述。此外他还就自己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谈到了一些具体意见,主动邀请其他历史学家参与关于中国史学的对话,希望他们也进行自我评估,一起就史学领域的其他问题进行探讨。柯文议题的核心是提供一个超越中美学术界限的平台,可以使全世界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都从中受益。有关在历史中被认为起作用的因素与实际起作用因素的二分法(dichotomy)是历史学家在个人专业中应该重视的专业修养,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倾向性可能体

现在对于历史事件和动因的判断之中。柯文率先打破了20世纪50年代由其恩师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落后,不可能从本国产生新的变革力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反映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后引发的巨大结构性变动,经过多次改革和革命后才形成了现代中国的面貌。柯文提倡的方法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世界史学的研究也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该书的发表结束了费正清模式时代,为西方汉学界指出了一条研究新思路。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先后掀起了“后殖民主义史学”和“新清史研究”的浪潮,以批判西方殖民者的立场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与柯文开拓倡导的方向有密切关系。

柯文的著述和编辑的文稿有:

《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Missionary Approaches: 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 Papers on China, Vol.ll, 1957年)。

《1862年湖南江西反传教士事件》(The Hunan-Kiangsi Antimissionary Incidents of 1862, Papers On China, 12:1-27, 1958年)。

《中国反基督教传统》(The Anti-Christian Tradi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2:169-180, 1961年)。

《晚清反传教士史料》(Some Sources of Anti-missionary Senti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No. 2, 1962年)。

《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年间中国的传教运动及排外主义的发展》(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年)。

《王韬对变化中世界的看法》(Wang T'ao's Perspective on a Changing World, in Albert Feuerwerker, Rhoads Murphery, and Mary C. Wright, eds.,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年)。

《王韬与早期的中国民族主义》(Wang T'ao and Incipient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Asian Stduies, 26. 4:559-574, 1967年)。

《1850—1900年的中西冲突》(Ch'ing Chin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1850—1900,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James B.

Crowley, ed., New York: Harcout, Brace and World, 1970 年)。

《千年追求:千年革命与中世纪的神秘无政府主义者》(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rev. and expanded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年)。

《〈傅沙士〉前言:1895—1905 年美国在华传教团》(Foreword to Sidney A. Forsythe,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 - 1905,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1 年)。

《欧洲东渐》(Europe Goes East, in Arnold Toynbee, ed., Half The Worl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年)。

《19 世纪中国海疆和腹地:"基督教"改革家》(Littoral and Hinterland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Christian' Reformers,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年)。

《讨论》(Discussion, in John Z. Bowers and Elizabeth F. Purcell, eds.,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pp. 75-81, 1974 年)。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年)。

《19 世纪中国的改革》(Reform in 19th-century China, Cohen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年)。

《新沿海改革家》(The New Coastal Reformers, in 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 eds.,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年)。

《美国青年政治领袖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报告》(Report on the Young Ammerican Political Leaders Delega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1977 年)。

《近期中国发展专稿》(Feature Article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hina, Boston Globe, July 31, 1977 年)。

《1900年基督教传教团及其影响》(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年)。

《剑桥中国史第十卷》(The Cambridge History, Vol. 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年)。

《1850—1900年中美关系》(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50—1900, in The Historical Precedents for Our New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D. C.: The Wilson Center, Occasional Paper No. 7, 1980年)。

《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America, Historical Research), No. 2, pp. 85-88, 1980年)。

《近代史》(Modern History, co-authored with Merle Goldman, in Anne F. Thurston and Jason Parker, eds.,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pp. 38-60, 1980年)。

《清末民初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动向》(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o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Fudan journal, No. 6, pp. 73-84, 1981年)。

《汉学太极:迈尔与墨子刻谈美国近代汉学研究现状》(Sinological Shadowboxing: Myers and Metzger on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America, Republican China, 9. 1: 5-10, 1983年)。

《中国历史揭秘:有关近代中国的美国史学著述》(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年)。

《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考察:是通往世界主义世界的铺路石,还是西方地方观念的最后立场?》(The Quest for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Past: Stepping Stone to a Cosmopolitan World or the Last Stand of Western Parochialism? —A Review of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by Wm. Theodore de Bar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5. 3: 305—310, July 1985年)。

《国家控制的中国领域:现实还是幻想?》(State Domination of the China Field: Reality or Fantasy? A Reply to Robert Marks, MODERN CHINA, 11. 4: 510-518, Oct. 1985年)。

《答狄百瑞问》(A Reply to Professor Wm. Theodore de Bary, Philosophy

and West,35. 4:413-417,Oct. 1985 年)。

《谢和耐述评,中国和基督教的影响:一次文化冲突》(Review Essay on Jacques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7. 2:674-683,Dec. 1987 年)。

《中国中心论中的自强:美国史学的演进》(Self-Strengthening in China-Centered Perspective: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Collected papers from the Conference on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Taibei: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I,3-35,1988 年)。

《从历史学视角看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ust 1988 年)。

《以中国历史学家的身份表示我们的关切:答高慕轲问》(Our Proper Concerns as Historians of China: A Reply to Michael Gasster,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6. 1:1-24,Spring 1988 年)。

《社会演变中的环境和体制因素·导言之回应》(Response to Introduction: Situational versus Systemic Factors in Societal Evolution, in Ramon Myers,ed.,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pp.xlvii-liv,1990 年)。

《跨文化思想:纪念史华慈中国思想论文集》(Ideas Across Culture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nmin I.Schwartz,edited by Paul A.Cohen and Merle Goldm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年)。

《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The Contested Past:The Boxers as History and Myth,collected articl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Boxer Movement and Modern Chinese Society,1992 年)。

《纪念费正清文集》(Fairbank Remembered,edited by Paul A.Cohen and Merle Goldma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年)。

《费正清:1907—1991》(John King Fairbank, 24 May 1907—14 September 1991,Biographical Memoir,June 1993 年)。

《中国文化:一些问题的界定》(Cultural China: Some Definitional Issues,Philosophical East and West 43. 3:557-563,July 1993 年)。

《我的学术生涯》(My Scholarly Career,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261-63,March 1994 年)。

《我的老师费正清》(My Teacher John King Fairbank,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y,72-75,71,May 1994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教于中国(吉克利)·前言》(Foreword to Edward V.Gulick,Teaching In Wartime China:A Photo-Memoir,1937—1939,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 年)。

《历史三解:义和团之事件、经历与神话》(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年)。

《想象红灯照》(Imagining the Red Lanterns.Berliner China-Hefte 12,May 1997 年)。

《从人类学视角看义和团》(New Perspective on the Boxers:The View From Anthropology,21 Century N0.45,1998 年)。

《理解过去的三条途径: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的义和团》(Three Pathways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Past: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World Sinology,122-132,May 1998 年)。

《20 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Knowledge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Wenshizhe,4:21-29,June 1998 年)。

《时间、文化与基督教末世学:2000 年的西方和世界》(Time,Culture,and Christian Eschatology:The Year 2000 in the West and the World,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4.5:1615-1628,December 1999 年)。

《引言:政治、神话 与真实的过去》(Introduction:Politics,Myth,and the Real Past,Twentieth-Century China,26.2:1-15,April 2001 年)。

《20 世纪中西之间的不对称知识关系》(The Asymmetry in Intellectu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Zhang Qi xiong,ed.,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elected Essays,Taibei: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1:61-93,2001 年)。

《义和团、基督徒和神:被视为宗教战争的 1900 年义和团冲突》(Boxers,Christians,and the Gods:The Boxer Conflict of 1900 Seen as a Religious War,History Studies,1:17-28,February 2001 年)。

《关于 21 条件的记忆与遗忘:控制国人记忆的个案研究》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Twenty-One Demands: A Case Study in Manipulation of National Memory, Measuring Historical Heat: Event, Performance, and Impact in China and the West, November 2001 年);

《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Transcript of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aul A.Cohen, SHILIN, 4:32-42, Nov. 2002 年)。

《关于分界日期的沉思:中国历史中 1949 年分界》(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sion in Chinese History,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年)。

《中国的中世纪过渡期:1946—1955 年大陆与台湾的延续与变革》(China's Mid-Century Transiti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6—1955.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年)。

《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ERSHIYI SHIJI 78:34-49, August 2003 年)。

《中美之间:宋美龄夫人的事业》(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e Career of Madame Chiang Kai-shek, WELLESLEY 88. 2:34-38, Winter 2004 年)。

《史学研究的专断标签》(The Tyranny of Labels in Historical Studies, ERSHIYI SHIJI 87:118-119, February 2005 年)。

《拳民人性化》(Humanizing the Boxers, in Robert Bickers and R. G. Tiedemann, eds., The Boxers, China, and the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p. 179-197, 2007 年)。

《文化的固有特性:新中国老故事》(The Tenacity of Culture: Old Stories in the New China, in Conference Volume Generated by Fairbank Center Conference on the PRC at 60, May 2009 年)。

《往事述怀:20 世纪中国的越王勾践传说》(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年)。

《传说与历史:蒋介石、国民党政策与越王勾践的传说》(Story and History: Chiang Kai-shek, Nationalist Policy, and the Saga of King Goujian, in

Conference Volume Generated by " Re - assessing Chiang Kai - shek: 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Ontario, Canada, August 2009 年)。

《义和团起义》(Boxer Uprising, in David Pong, editor in chief, Encyclopedia of Modern China, Farmington Hills, MI: Charles Scribner's Sons/ Gale Cengage Learning, pp. 146-148, 2009 年)。

《2010 年再版序:中国历史研究中国中心观再思考》(Introduction to the 2010 Reissue: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China - Centered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i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xxxix-lxv, 2010 年)。

(十三)促进中国史学在西方英语世界传播的史景迁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　)出生于英国伦敦,曾就读于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获得了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59 年他得到了克莱尔-梅隆奖学金资助,以交换生身份到美国耶鲁大学师从史学家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他上的第一堂讨论课就使他开始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决定攻读中国史学位课程。他拿到硕士学位后又继续学习中国历史博士课程。芮玛丽推荐他去澳大利亚师从房兆楹教授夫妇继续深造,他的博士论文《康熙与曹寅》因为造诣很高被授予约翰·艾迪生奖。1965 年他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后破例被聘任留在耶鲁大学执教,1970 年芮玛丽去世后史景迁接替了她的教职。他曾给该校本科生上过多年的"1600—2007 年中国现代史"课程,每次听课学生都多达 500 多人,得到了广泛好评。1993—2008 年他担任耶鲁大学的史特林历史学讲座教授(Sterling Professor),2000 年他加入了美国籍。

史景迁是一位多产汉学家和评论家。他编写过有关中国历史的专著 12 部,还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主要学术兴趣是通过传记题材来演绎中国文化史。他相信人们是通过形象而不是定义来了解历史的,但是概念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也能起到理性化启发作用。他还长期关注中西学者在促进中国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并试图分析他们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他的文笔流畅、叙事性强,深入浅出,视觉独特,其中一些已经成为畅销读物,对於中国历史知识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4年史景迁出版的《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历史的作品。他用文学手法描写了康熙如何操练骑术,结伴狩猎,勤政一生。平日与身边的嫔妃、大臣、王公、太监共享荣华富贵之余,也有自己的烦恼、感叹和内疚。对葛尔丹(1644—1697)的征讨,对三藩之乱的平叛,对西洋文化冲击的担忧,使他食不甘味。他感叹时光易逝,眼看年迈宠臣先后告老还乡,皇位继承尚无对策。这里有史学论著中罕见的形像描写、内心独白、想象驰骋和怨天忧人。因为毕竟作者是外国学者,虽然饱读汉籍,想当然的情节偶尔也现诸笔端。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写的是历史而不是小说,因此故意虚构的文字基本没有。在42页的注释中都是中规中矩的引述和说明。这种介于文学和历史之间的撰史笔法显然有别于叙事史学,大概是史景迁个人的独创,见仁见智的评论层出不穷尽在意料之中。

史景迁1987年出版的《胡约翰的疑问》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却有所不同,是一部以西方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为历史背景虚构出来的故事,没有太多真实的微观史料价值。1622年神甫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奉命回国述职,因为需要中国助手帮助抄写和翻译文稿,就聘任广州圣心会门房胡约翰(John Hu)为随行秘书。但是离开大唐中土之后,胡约翰不但不信守合约旅行职责,却动辄索要银子,把体面行装赠给路人,而且竟然偷享他人的坐骑,还扬言要到乡下去做行脚僧。他在巴黎大街上对妇女指手画脚,敲锣打鼓,用汉语宣传孔孟之学。他的古怪言行引起了路人的反感,又因不懂法语无法跟人交流,被认为得了神经病,必须送精神病院医治。胡约翰在当地精神病院两年半中受尽了折磨,几乎到了崩溃边缘。虽然史景迁引用了大量巴黎、伦敦和罗马教廷的档案和史料,证明自己讲述的事情不是凭空虚构的,但是多数读者还是无法判断该书是历史还是小说。历史上的罗马耶稣会士中确有傅圣泽其人,有趣的是文献记载神甫出生于1663年,与史景迁设定傅圣泽携带大批汉籍前往法国的1622年整整提前了41年!据英国和美国书商销售此书广告所引用的读者述评,多数人对史景迁的这部文稿并不认可。难怪钱钟书访问美国与作者见面时戏称他为"失败的小说家"。

1981年史景迁出版的《天安门:1895—1980年中国人及其革命》再次展示了他的史学著述的风格和特色。他通过这一历史时期的知名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徐志摩、沈从文、鲁迅、闻一多、瞿秋白、老舍、丁玲和茅盾等人,记述了1885—1980年间中国的革命和包括知

识分子在内的各阶级对改良和革命运动的推进。作者在考察这些人物时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面对波谲云涌刀光剑影的现实都义无反顾地奋勇拼搏,表现出非凡的生命力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作者没有引用长篇资料和烦琐的考据,只以平实的语言把自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新中国诞生和改革开放前的漫长历史画卷展现在"天安门"的主题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安门:1895—1980 年中国人及其革命》是史景迁的史学代表作。

史景迁多次获得美国、中国香港和英国大学颁发的荣誉称号。他曾应邀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和南京大学名誉教授,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伴星曾以他的名字命名。1979 年他荣获古根海姆奖金,1982 年获《洛杉矶时报》历史奖,1983 年获美国科学院和文艺研究所沃瑟尔奖,1985 年被推选美国文理研究院院士,1988 年荣获麦克阿瑟基金会 31 万元巨奖,被吸纳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学者委员会委员。1993 年他入选美国哲学学会,1997 年被聘任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2004—2005 年他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2006 年担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荣誉讲师。2008 年5~6 月他为里斯 60 周年举办的中国史系列讲座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播出。2010 年他获得联邦政府授予的人文学科最高荣誉,在国会图书馆发表杰弗逊年度演说。

2008 年史景迁退休后与妻子金安平在西黑文安度晚年,但是学术研究仍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最大乐趣。

史景迁在 40 多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撰写了 14 本有关中国历史文化专著,其中广为人知的有:

《曹寅与康熙》(Ts'ao Yin & The K'ang Hsi Empero,1965 年)。

《改变中国:1620-1960 年在中国的西方顾问》(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1969 年)。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 Hsi, Alfred A.Knopf,Inc. 1974 年)。

《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 年)。

《天安门:1895—1980 年中国人民及其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1980,1981 年)。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1984 年)。

《胡约翰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John Hu,1987 年)。

《汉语迂回表达法:历史文化论集》(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on

History and Culture,1992 年)。

《中国天子: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1994 年)。

《王道乐土: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1998 年)。

《毛泽东》(Mao Zedong,Penguin Books,1999 年)。

《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 W. Norton, 1999 年)。

《叛国之书》(Treason by the Book,Penguin Book Ltd,2001 年)。

(十四)关注对汉语方言语音层次分析的语言学家罗瑞杰

19 世纪 60 年代之后在知名度较高的美国语言学家中,除了大批华裔学者外,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罗杰瑞也是其中一位代表。他早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师从赵元任和默里·巴恩松·埃默里奥(Murray Barnson Emeriau,1904—2005)。1965 年罗瑞杰与陈方旭(Leo Chen)曾合作撰写《福州方言引论》和《福州方言—英语词汇表》,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做出了成绩,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这一时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聚集了一批不认同高本汉直线式发展史观的汉学家。他们认为汉语的历史必须严格按照比较法的程序从现代汉语各方言比较做起,逐层构拟原始闽语、原始吴语和原始粤语,最后才能有充分理据构拟原始汉语。1966 年普林斯顿大学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的中国语言学历史比较研究学者团体(又称"普林斯顿学派")的桥本万太郎(Hashimoto Mantaro,1932—1987)和余霭芹等成员提出了"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 Hypothesis),主张在构拟原始汉语的研究中必须首先摆脱传统的《切韵》框架。罗杰瑞对原始闽语研究的声誉使他很快被该研究团体所吸纳。

1969 年罗杰瑞把他在台湾居民中调查收集到的闽方言材料进行整理归纳后写成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1970 年以《福建建阳方言》为书名正式发表。该专著把建阳和建瓯方言置于闽方言系统中进行比较,同时在综合考虑了方言适用的地域环境、系统内部分支、使用人数和相互沟通诸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理论分析。音位学部分研究的内容包括对音节结构、声

母、韵母、声调、变调、韵头和韵尾的同现以及连读音变的描写。在语汇部分把近3000个汉字的建阳读音与汉语中古音字典条目进行对照。文本则根据各类短语和语法结构研究需要选样。作者提供了一份带英语说明的语音标注,课文之后还有语法注释、闽方言参考书目和汉字索引。建瓯方言要点附录其后,以便于与建阳方言进行对照。

198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是罗杰瑞的一部呕心沥血代表作,全书304页,正文10章,分别为:第一章导论;第二章汉语历史音韵学;第三章汉字;第四章古代书面语;第五章白话文的兴起和发展;第六章现代普通话(一);第七章现代普通话(二);第八章华北和华中方言;第九章华东和华南方言;第十章语言和社会。作者对汉语的语音、文字、语法、方言、文言、白话、汉语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他从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揭示并解读了汉语的应用问题以及许多与学习、教学和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现象。作者在《前言》中谈到了该书的读者对象定位为外国语言学家,因此每一章节都充分考虑到不同层次的专业理论问题。例如第二章的内容就包含了汉语史的分期、中古汉语的史料、《切韵》、宋代韵图、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构拟方法、早期官话和声调的演变等问题。在第三章他谈到了历史上汉字系统通过变化调整来适应新环境,形声和会意的造字原则支持了数量增长和速度加快的要求。在第四章作者具体介绍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书面语语素、词、词类和句子,以及语法术语、地点与时间短语、名词与动词的修饰成分、名词化和并列结构等问题。该书一问世就受到了普遍关注,成为英语国家许多大学中文系的标准课本,并列入了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中。

罗杰瑞除了研究建阳方言外,还通过对台湾的闽北籍居民的调查获得了大量有关建瓯、定安、邵武和浦城的方言素材,对于各方言点之间的比较也是他关注的重点之一。他展开的调查面之广和材料之多令人钦佩,有力地推动了闽北方言的研究。后来他利用建阳和建瓯的方言材料就构拟原始闽语的声母系统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因为他所构拟出来的原始闽语声母系统与中古音和上古音之间的差距较大,引发了学界旷日持久的争论。

罗杰瑞致力于构拟原始闽语系统,但是持异议者却主要关注原始闽语与中古音或上古音之间的对应变化。他们认为这种对应关系复杂,原始闽

语的构拟与原始闽语和古音之间对应关系的考察原则不能忽略对政治文化统一标志的汉字考量。来自主流批评者的意见认为罗杰瑞对原始闽语的研究意义重大,可惜失误严重,然而他的多项建树在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要影响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他是继高本汉之后开展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有成就的学者,也是第一位关注汉语方言语音层次的语言学家。他认为闽语语音比较目的是构拟原始闽语,而不是给《切韵》的音类拟音;应该注重方言口语中的单音节常用词读音,而不是字典或韵书中的汉字读音;如果存在文白异读的情况则只取口语读音而不取书面语读音;他不赞同用非闽语的材料来解释闽语的语音变化。这些系统见解铸就了罗杰瑞不可动摇的闽方言专家身份。

1971 年罗杰瑞继承李方桂(Fang-Kuei Li,1902—1987)正式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和该校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1983 年罗杰瑞曾应聘在北大中文系讲授福建方言课。他还先后在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8 年他从教授岗位上荣休,2012 年 7 月 7 日因原发性肺叶纤维化恶化辞世。

他的主要著述有:

《福州方言引论》(Introduction to the Foochow Dialect, co-authered with Leo Chen, 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1965 年)。

《福建建阳方言》(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1969 年)。

《闽方言声调的发展》(The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 pp. 222—238, 1973 年)。

《原始闽语的声母》(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pp. 27—36, 1974 年)。

《古代江南的南亚民族:一些词汇证据》(co-authored with Tsu-lin Mei, 1976 年)。

《闽东方言的初步报告》(A Tentative Report on the East Min Dialects, 1977 年)。

《闽语语音中的时间层次》(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Phonology of the Min Dialects, 1978 年)。

《满英简明辞典》(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年)。

《闽方言的时间层次》(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方言》

No . 4, pp. 268—274, 1979 年)。

《永安方言》(The Yong'an Dialect,《书目季刊》14 ~ 2, 113—165 页, 1980 年)。

《原始闽语的韵母》(The Proto-Min Finals,《中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pp. 35—73, 1981 年)。

《上古南方汉语》(1981 年)。

《比较闽方言》(Comparative Min Dialects, 1982 年)。

《闽方言的三个语源》(Three Min Etymologi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13 ~ 2, pp. 175—189, 1984 年)。

《闽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擦塞音》(《中国语文》1: 38 ~ 41, 1986 年)。

《汉语》(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年)。

《福建政和话的支脂之三韵》(《中国语文》1: 40 ~ 43, 1988 年)。

《建阳方言否定词探源》(The Origin of Negatives in Kienyang Dialect,《方言》1: 31-32, 1995 年)。

《汉语历史语言学新探》(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o-authored with South Cobl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 ~ 4, pp. 576—584, 1995 年)。

《以历史眼光考察闽方言》(The Mi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3, edited by William S-Y. Wang, pp. 325—360, 1991 年)。

《镇前方言的声类发展》(Tonal Development in the Jennchyan Dialect,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2, pp. 7—41, 1996 年)。

《方言简报: 连段村方言词表》(A Glossary of the Lianduentsuen Dialect, Short Chinese Dialect Reports (Yuen Ren Society) 1, pp. 339—394, 2002 年)。

《闽方言中的来母字和早期汉语》(Lai Mu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s and the Old Chinese,《民族语文》2005. 4: 1 ~ 5, 2005 年)。

《闽方言中的动物体位词汇》(Min Animal Body Part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 1, pp. 133—143, 2006 年)。

《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与音韵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44 卷第 2 期, 91—94 页, 2007 年)。

(十五)倡导叙事史学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魏斐德

1937年12月12日魏斐德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他的外祖父在密苏里州经营几家面粉厂。外祖母是一位虔诚教徒,每个星期天都要带外孙去教堂。母亲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是一位有加拿大与美国双重国籍的长老会教徒。

魏斐德家族是17世纪下半叶从英国约克郡移民美国的。他的曾祖父做过印度代理商。祖父在神学院接受过教育,被正式按立为牧师前竟然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然后毅然决然到堪萨斯州东部一个煤镇当报刊编辑。父亲弗里德里克·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Sr.)是一位有哥伦比亚大学学历的小说家。魏斐德襁褓之中就随父母移居纽约,父亲服务于一家广告公司。太平洋战争打响后父亲像同龄青年一样被征召去海军服役,魏斐德与母亲暂住外祖父家,直到1944年全家才回到了故城纽约。有一次父亲幸运得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欣喜若狂地宣布要带全家周游世界。魏斐德的少年时代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墨西哥、古巴、百慕大和法国度过的,最后在佛罗里达读完中学,多国的教育学历使他能熟练使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

在魏斐德幼年心目中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启蒙老师,总是要他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文学作品。侨居古巴时在父亲的影响下他竟读起哥伦布传记之类的书籍。1949年年初的一天,父亲把他从寄宿学校接了出来,乘上56英尺长的双桅"夏伦娜"号,沿着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路线漫游。那充满幻想和浪漫的时光永远封存在他的记忆中。魏斐德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在参加越战时死于癌症。

魏斐德在哈佛大学的专业是欧洲历史和文学,但是他却对法国文学和俄语特别感兴趣。他的毕业论文选题是关于法国历史上先贤业绩的陈述和评论。他在大学时代写过三部小说,其中一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17 Royal Palms Drive)脱稿几年后曾以伊万斯·魏克曼(Evans Wakeman)的笔名发表。这充满探索和想象的往事无疑有他父亲遗传基因的影响。

1959年魏斐德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在巴黎政治学院学习苏联历史和政治学,一度对越南和中国民间宗教感到兴趣,读了法国记者蒂博尔·芒特(Tibor Menthe)写的几本有关中国的专著后更增加了这方面的求知

欲。1960年他原本打算返回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从事汉学研究，但是后来却阴差阳错地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当了列文森的博士研究生。按照东亚语言与历史系的课程安排，他开始学习中文和日文。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把魏斐德列入招聘对象名单中。但他不为任何美好的前程许诺所动，决心将来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国家服务，况且汉学研究也是与美国的世界战略关系密切的一个领域。令人难忘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多彩多姿的校园生活使他增长了见识，也使他了解到世界潮流正在发生的变化。美国入侵古巴、参议员富布赖特敦促联邦政府改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以及美军针对越南的敌对行动，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触动他的敏感神经，使他暗暗为美国的政治前途担心。

1965年魏斐德完成了有关1839—1861年间华南动乱研究的博士论文后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经修改后正式出版，他被母校聘任为历史学助理教授。

20世纪60年代魏斐德曾用半年时间撰写了《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一书，对毛泽东思想的中西哲学渊源作了全面分析，以自己的严谨学风向当时美国浮躁的激进潮流挑战，受到广泛的好评，1974年该书曾作为哲学类图书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20世纪60—70年代魏斐德扩大了研究视野，开始关注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1985年他完成了耗时十五载的专著《伟业：17世纪满人重建帝国秩序》，描绘了一幅满汉联手共治神州的历史画卷。此后他的学术研究兴趣逐渐转向民国史，对国民党时期的警察体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魏斐德的《1927—1937年上海警察三部曲》和《1937—1941年的是非之地——上海》都是研究上海社会的专著，另一部《间谍王：戴笠和中国秘密警务》也部分涉及上海的历史。他通过叙述上海社会的变化、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警察的活动，揭示了国民党政府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失败过程和原因。作者的研究表明，警察是现代国家机器的符号，警察形像是透视社会文明等级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市政府曾声称要把上海建成一个模范城市。在整顿治安方面，当时的市公安局曾设法关闭赌场，查禁非法毒品交易。但是因为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他们的努力并未取得长期效果。在建设现代文化方面，1929—1930年近三万市民因为妨碍交通、打架斗殴、伤风败俗或损毁财物等行为而遭拘留、罚款和训斥。但

是后来上海警察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和抗日青年,社会犯罪率继续上升。至于"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无异于以新儒家的繁文缛节来作秀,因此没能得到市民的认可。随着国民政府向日本恶势力妥协、警员与社会流氓勾结、政府机关以暴力手段压制舆论的案例曝光,市民对于政府和警方指导市民生活的权威表示怀疑。《间谍王:戴笠和中国秘密警务》一书是作者对蒋介石、戴笠和国民政权制度演变过程的研究。《1937—1941 年的是非之地——上海》对"孤岛"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暗杀活动做了具体的描述,家常便饭式的监视、绑架、逮捕、拷打、暗杀和渗透之类的行为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如狼似虎的便衣特工肆虐街巷,埋下了天怒人怨的孽种。租界警察和伪政权警察几乎都是恐怖闹剧的导演者和直接参与者。

从魏斐德的著述中不难发现他不赞成社会科学在史学编撰中的泛化,在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on)面临舆论指责时他仍乐此不疲。虽然他具有深厚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学养,但是他仍坚信叙事文体与理论分析在历史著述中的结合是一种最佳选择。在这方面他与史景迁和孔飞力都是所见略同的君子,是"中国中心观"的自觉自愿推动者和参与者,堪称为美国第三代汉学家中的有思想有作为的人物。

1974 年魏斐德初次访华,后来出任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成为卡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学术交流的策划和统筹人物,为发展中美两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长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1986—1989 年被推选为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并在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和亚洲协会等机构任职。他的学术领域并不局限于汉学,1992 年他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还兼任《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中国季刊》等杂志的编委或顾问——这就是他的社会活动家名片。

1998 年秋,在一次手术中魏斐德腰椎内一根神经被医生错切,导致左腿残疾,只能终日以轮椅代步。在那困难的日子里只有秘书和妹妹在身边照料他。不久来自上海的意大利哲学院客座研究员梁禾与他重新组成了家庭。2006 年 9 月 14 日魏斐德因为癌症恶化在俄勒冈州奥斯威戈湖畔家中辞世,就在此前一天他还在撰写一部关于潘汉年的书。

马克·埃利奥特在 2007 年 3 月的《中国季刊》上刊发的《怀念魏斐德》一文中深情地回忆起这位汉学家的卓越贡献。他写道:

在业内人士中对魏斐德的最亲切称呼是'弗雷德'。他是数十年来美国汉学研究中的领军人物，一位不知疲倦的研究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大王，也是诲人不倦的师长。自1966年以来他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培育了数代学子，对汉学领域的学术和建制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70—80年代促进美中两国学者重新建立学术交流所做的努力。1986年他被吸纳为美国文理研究院院士，荣获了古根海姆等多个奖项。他曾出任1986—1989年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1992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90—2001年担任柏克莱东亚研究所所长达11年之久。2006年5月他退休时，加州大学授予他柏克莱荣誉状，对于他的光荣事业作出了最高嘉奖。他的渊博历史知识，入木三分的分析能力，对于复杂问题的思辩才能，以及他的幽默感和超凡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一位备受欢迎的作家、评论家、顾问和演说家。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书写的一页文字，但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如愿以偿。①

魏斐德一生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和多部专著，其中广为人知的有：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华南社会动乱》(St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1966年)。

《现代东亚：文集解读》(Modern East Asia：Essays in Interpretation，New York，1970年)。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1973年)。

《中国帝制的衰亡》(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1975年)。

《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Imperial China，co-edited with Carolyn Gran，1975年)。

《伟业：17世纪满人重建帝国秩序》(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the 17th Century，1985年)。

---

① Mark C.Elliott：*In Memoriam of Frederic Wakeman 1937—2006*，*The China Quarterly*，189，March 2007，pp. 180-186.

《1927—1937 年上海警察三部曲》(Shanghai Trilogy: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1995 年)。

《1937—1941 年的是非之地——上海》(Shanghai Badland,1937—1941,1996 年)。

《间谍王:戴笠和中国秘密警务》(The Spymaster: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2003 年)。

《1942—1952 年:红星高照上海》(The Red Star Over Shanghai,1942—1952)。

(十六)汉魏六朝辞赋和扬雄研究专家康达维

1942 年康达维出生于美国蒙特拿州,中学时就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开始学习中文。1960 年他进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学习,1964 年获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师从海涛玮,1965 年获哈佛大学汉学硕士学位。1967 年受业于华盛顿大学卫德明,并得到萧公权和李方桂等名师指点,1968 年以论文《扬雄生平及其赋的研究》获华盛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1972 年加盟华盛顿大学。现在他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主任。

辞赋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种体裁,在汉魏六朝得到了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欧美研究辞赋的学者很少,主要是因为这种文体的题材古奥,文字艰深,许多学者望而却步,因此往往被排列在欧美汉学主流学科之外。康达维长期致力于汉魏六朝辞赋和扬雄研究,从 1970 年起他便开始翻译《昭明文选》(全集 60 卷),计划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八册。第一册(第 1~6 卷)已于 1982 年出版,第二册(第 7~12 卷)于 1987 年出版,第三册(第 13~19 卷,包括赋的最后部分和诗的第一部分)已于 1996 年出版。康达维对于汉魏六朝辞赋研究的成果独一无二,在美国汉学家中属于为数不多的佼佼者。

《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由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编选,共录先秦至南朝梁代 100 多位作者 700 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主要为诗文辞赋,除了少数赞、论、序、述被认为属于文学范围的作品外,经、史、子等著作皆不录入。所选多为大家之作,以楚辞、汉赋和六朝骈文为主。在唐朝《昭明文选》地位与《五经》(《易经》、《书经》、

《诗经》、《礼记》和《春秋》)并列,到宋代《昭明文选》更被誉为"文章祖宗",以后各朝研究都未中辍。

最早介绍《昭明文选》的美国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他在《〈文选〉与文体理论》一文中综述了中国文学文体的演变历史。把萧统《文选·序》中开列的38种文体与《昭明文选》中列出的37种问题一一进行对比考查。1956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华兹生在《汉魏六朝赋选》中翻译了《昭明文选》中宋玉的《风赋》、贾谊的《鹏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潘岳的《闲居赋》、木华的《海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谢惠连的《雪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庾信的《小园赋》等十余篇。1954年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侯思孟(Donald Holzman,1926—　)也翻译了《昭明文选》中嵇康、曹植和曹丕的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世纪研究辞赋的美国学者成就最高者当属康达维教授,现在研究这门学问的美国学者中多半都是他的门生。他的成果代表了20世纪西方赋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被海内外赋学界誉为"辞赋研究宗师"。

现在康达维是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兼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2006年被推举为美国文理研究院院士。他的夫人张太平是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

康达维的主要著述有:

《扬雄生平及其赋的研究》(Yang Shyong, the Fuh, and Han Rhetoric, 1968年)。

《汉赋研究二种》(Two Studies on the Han Fu,1968年)。

《汉代狂想曲:扬雄赋研究》(The Han Rhapsody, 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53 B.C.E.-A.D. 1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年)。

《汉书·杨雄传》(The Han Shu Biography of Yang Xiong , 53 BC-AD 18.Tempe, Arizona: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2年)。

《〈文选〉译注》(第一册)(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 1, Rhapsodies on Metropolises and Capital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年)。

《〈文选〉译注》(第二册)(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 2, Rhapsodies on Sacrifices, Hunts, Travel, Palaces and Halls, Rivers and Sea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年)。

《谜语为诗:论荀子的〈赋篇〉》(刊于周策纵主编的《文林:中国人文研究》,1989 年)。

《鲍照的〈芜城赋〉:写作的年代与场合》(刊香港中文大学《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1993 年)。

《西京杂记中的赋篇》(刊香港《新亚学术季刊》1994 年第 13 期)。

《〈文选〉译注》(第三册)(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Vol. 3.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年)。

《汉赋研究》(Studies of the Han Fu, with Gong Kechang,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84.New Heaven: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97 年)。

《中国早期宫廷文化与文学》(Court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China. 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2002 年)。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史》(Studies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In Honor of Richard B.Mather and Donald Holzman.with Paul Kroll,Provo,Utah:T'ang Studies Society,2003 年)。

《中国古典文学参考指南》(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Reference Guide,Part One.with Taiping Chang,Leiden:E.J.Brill,2010 年)。

《剑桥中国文学史(东汉至西晋)》(From the Eastern Han through the Western Jin,AD 25~317,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Kang-i Sun Chang,Stephen Owen,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16-198. 2010 年)。

《中国文明史》(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transl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年)。

(十七)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孟德卫

孟德卫(David E.Mungello,1943—)祖籍为意大利日耳曼移民,1973 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博士学位。他曾以洪堡学者和沃芬布托学者身份在德国从事三年博士后研究。他的主要学术兴趣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地位,以及儒学在西方的引介与影响研究。他本人并不是基

督徒，但是却被视为基督教来华传播历史研究的现代权威之一。他曾先后执教于香港岭南学院、布赖尔克利夫学院和艾奥瓦科埃学院。现为得克萨斯州韦科贝勒大学历史与亚洲研究教授，《中西文化关系学刊》(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创办人和编辑。

1977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孟德卫博士论文《莱布尼茨与儒学：寻求相互协调》，正文包括七个部分，分别为：①莱布尼茨同中国的接触；②莱布尼茨的中国解释者；③莱布尼茨和白晋；④论中国哲学(上)；⑤论中国哲学(下)；⑥莱布尼茨哲学的失误；⑦东西方融合的基础：精神修养和道德修养。孟德卫撰写该论文的初衷，首先是把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作为德国最早系统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并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人物来研究。根据莱布尼茨自己的说法，1679年前他就创建了二进制算术，1703年4月1日他收到来华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所寄的中国伏羲八卦图，发现他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为此他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论文《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0和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莱布尼茨在他的二进制中提出通过0与1的不同结合就可以表示所有数字，如：000、001、010、011、100、111等。在《易经》八卦中，通过"阴"和"阳"的不同组合，同样可以表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如果把"阴爻"看作0，把"阳爻"看作1，所有的卦象也可以被理解为0和1的不同组合。比如坤卦就是000000，乾卦就是111111，其余均可依此类推。伏羲图的64个卦象，可以被看作二进制算术从0到63的数字组合。

莱布尼茨的研究广及哲学、数学、法学、理学、光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40多个领域，长期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想十分关注。他曾向时任清廷钦天监监正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1639—1712)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包括养蚕织布、造纸印刷、冶金矿业和天文地理，并将其汇辑成册出版。莱布尼茨在《中国近况》(Novissima Sinica)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此端的欧洲和他端的东方中国……我相信，这是命运的特殊安排。大概是天意要使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地域相隔最为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使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他认为中西之间应当开展学术交流，据传他曾通过耶稣会士向康熙皇帝建议在北京建立科学院。

孟德卫撰写该论文的另一目的是出于当时西方对于非基督教文明的了解和评价的需要。17 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在欧洲宗教界和知识界引发了有关非西方文明重要性的激烈争论,同时也挑战了哲学家和神学家对世界的传统观念和对自身知识系统的质疑。来华耶稣会创始人利玛窦认为中国是一个乌托邦社会,在缺乏宗教教条和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东方道德传统实属奇迹。在他眼中儒学属于一种自然宗教范畴的有神论,应该而且可能与基督教一神论共存。为了在中国争取更多的基督教皈依者,可以采用"适应策略"(accommodation),允许新教徒保持祖先崇拜并践行儒家的礼仪。但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另一派却反对这种将"异教徒礼仪"与基督教兼收并蓄的主张。他们认为儒家实际上是信奉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上帝一无所知。1687 年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书中收录了《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文。他在"前言"中把儒家学说形容为"在没有神的启示情况下,理性从来没有显得如此完善、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16—17 世纪的教派冲突和无休止的宗教战争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去寻找解决冲突的办法,柏应理对儒家学说的解释因此赢得了许多读者的支持,受到了世俗主义者的欢迎。

孟德卫在《莱布尼茨与儒学:寻求相互协调》中,谈到了西方与中国哲学观点一致之处,具体表现在:《易经》八卦理念与莱布尼茨二进制思维之间的一致性;儒家哲学与莱布尼茨哲学有关内在和外在联系的一致性;"理"和"单子"把单独个体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但是自身不能进一步分割的形而上学存在的一致观点;①对于"理"和"单子"的特性、关系和表现形式认识的一致性;②儒家关于"太极"与莱布尼茨的"空间"概念、组成和

---

① "理"是莱布尼茨选自中国宋元理学著述中的一个名词,并把它定义为"第一原理"和"使中西方保持一致的基石"。他说:"中国人把第一原理叫做'理',即整个自然界的原因和实体。世界上没有比'理'更高更完美的东西。它是纯粹、寂静、精致、无体无形的,只能通过理解来感知。"(孟德卫:《莱布尼茨和儒学》(张学智译),第 70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② "单子"是莱布尼茨哲学中的一个常用术语,用于对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的解释,特别是对于理学家的"理"与"气"的关系,以及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解释。"单子"使现象界变化发展而不受其影响,"单子"之间也不相互影响。它的特性由一个概括全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圆满概念"来表示。"单子"的自然变化遵循来自内在的原则,因为外部的因素不能引起"单子"的内部变化。莱布尼茨认为"单子"是单纯实体,1696 年以前他很少使用这个词。灵魂(原动力)和原初物质(原被动力)共同构成了"单子"的两种属性。他有时也用"心灵"或"灵魂"来指代"单子"。(孟德卫:《莱布尼茨和儒学》(张学智译),第 75—76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特性的相似性；中国人的“神”和基督徒“神”的概念部分含义相同；中国人祭祀的礼仪顺序和等级与基督徒的对应观念相同；中国人关于“上帝”、“天”和“理”与基督教的“上帝”概念意义相近；中国文化中的“太极”、“理”和“气”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认识一致；中国人有关死后受赏罚与基督教灵魂不朽和天赋正义的观念一致；中国文化有关无形精神和物质精神与基督教的“灵魂”概念非常接近。

孟德卫在《莱布尼茨与儒学：寻求相互协调》的“结束语：现在的一致”中写道：

> 在寻求中国和西方的相同点当中，第一步是达到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理解。从这些理解出发，我们才能看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同点。但这样的相同点在这两种文化中将不会是同样发展的。很清楚，即使莱布尼茨看到了中国的精神修养和道德修养，他也不能把相当不同的基督教的精神修养性格变为中国人的精神修养性格。两个民族或两种文化之间的调和必须建立在一些共同的基点上，而两种文化借以达到此共同点的观念和信仰可以不同。不过，即使达不到中国那样的程度，认识并发展这些共同点也可以使之扩大，增加调和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士和莱布尼茨没有看到、也没有发扬儒家的精神修养因而削弱了他们在中西方融合点上的成就的原因。①

孟德卫对于儒家学说与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的比较，视角独特，分析深入，极富思辩性和挑战性，超越了此前的任何同类著述。

孟德卫的《1500—1800年中西方的伟大相遇》也是一部系统研究早期中西文化交往历史的专著。该书正文五章，分别为：第一章历史纵览（第1—16页）；第二章中国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第17—52页）；第三章中国所拒绝的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第53—80页）；第四章欧洲所接受的中国文化和儒学（第81—112页）；第五章欧洲所拒绝的中国文化和儒学（第113—150页）。该书的第一版本是1999年出版的，第三版本是2009年出版的，两个版本的内容和风格有很大不同。孟德卫在该书的“序言”

① 孟德卫：《莱布尼茨和儒学》（张学智译），第13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写道：

> 当今世界中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就带动了大量中西历史关系的新研究。本书的第三版打算把一些新内容，特别是人物志、男女关系和性别研究等敏感问题融入第二版的叙事史之中。本书是为历史专业学生和普通读者而编写的。因为目标是为了以最清晰最有意义的方式提供信息和思想，为此减少了那些学术性很强的注释，技术性术语则通过上下文来解释。虽然技术性大大降低了，但是思想性和挑战性却得到了强化。省略了脚注，参考书目也列在每章之后。由于专业性降低了，大部分外文资料也因此从略。书中提到的中文资料都放在段落文字中交代，而不另列参考书目。因为1999年12月20日香港回归，第一版论述到的两个阶段'1500—1800年与1800—1997年'，改为'1500—1800年与1800—2000年'。本书第一版的不足之处是故事缺乏人性化层面。为使知识、宗教和艺术重点得到最佳平衡，作者加入了有关历史周期的经历者的悲与喜、斗争与胜利的叙述，还特别补充了有关妇女、杀婴女犯、女同性恋者、音乐和技术方面的材料，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呈献于读者之前。①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史学界普遍青睐于实证和文本的研究方法，那么他们的北美同行则比较倾向于阐释和叙事历史的研究方法。孟德卫在上述专著中的方法论实践随着版本学思维的变化而变化，印证了欧美史学界研究方法存在差别的论断。

有一种认识论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的变化存在着"周而复始"的规则。佛教徒相信生命轮回，西方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相信历史循环的规则。孟德卫的《1500—1800年中西方的伟大相遇》在结构和观点上都表现出认可历史在广泛意义上重复的倾向，因此揭示变化模式的重复及其意义就是历史研究的课题之一。早期中西交往出现的"中国热"在欧洲一度极富生命力和影响力，启蒙运动的先行者希望借用儒家思想来取代基督教的影响。

---

① David E. 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VIII—XIV, 2009.

但是随着清帝国国力的衰败，在抗击外侮中一再失利，欧洲政界和学术界中的许多人慢慢地改用嘲讽和鄙视的目光来看待中国。同样地，当年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士大夫也曾企望借用西方的科技和富国强兵方略振兴中华。虽然1800年以前基督教义和西方文明在中国受到的排挤远大于欢迎，然而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的双向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过程中，都逐渐改变了自视清高的态度。这种历史变化中出现的相似性显然是一种发展规律，谁也无法改变。

孟德卫在上述专著中用了大段篇幅回顾了利玛窦在华的传教历程。虽然他不是第一位进入中土的耶稣会士，但是至少也是一位可圈可点的人物。他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评价褒中有贬：对于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作物多样、气候调和、人民勤奋、儒学精深等方面心存向往，但是对于中国佛教徒和道教徒的个人品格和性倾向的所谓"道德败坏和恶行"却严辞谴责。基于这一见解，他把传教首选对象定位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认为他们出身名门贵族，知书达理，闻名遐迩，多数人经过科举选拔进入国家各级机构，位尊权重——这就是后来在传教士中实施"适应策略"的思想基础。

为了开展与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大范围的沟通与合作，传教士必须就是非取舍问题作出艰难决策。如果他们接受中国文化中与基督教信仰相抵触的元素，那么他们的适应策略的神学理论和表现一定是无效的。要让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就得面对本土化（inculturation）问题，使基督教在中国不再是一种外国宗教，而是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一种改造中国文化的力量。

部分耶稣会士初到华南时穿起了中国僧人的长袍，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那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主张以儒家学说为适应策略的思想依据，儒生的服饰才是他们的身份标志。他们开始深入士大夫阶层并从他们当中吸收信徒。1601年利玛窦和庞迪我（Jacques de Pantoja，1571—1618）结伴北上，开始在士大夫中实行自上而下的传教，在传播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过程中结识了李之藻（1565—1630）、杨廷筠（1557—1627）和徐光启（1562—1633）等学者。利玛窦除了负责管理在华耶稣会士外，还和中国学者联合翻译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1610年接任利玛窦事业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les Aleni，1582—1649）来华，先后在北京、上海、扬州、陕西、山西、杭州和福州传教，出版了《口铎日钞》（Diary of Oral Admonitions）等有影响的专著。

西方耶稣会士在明末时期实行的“适应策略”大致是成功的，但是随着1644年满族贵族入主中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耶稣会士的传教首选对象从地方士大夫阶层直接上升至中央政府高官，1622年来华的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和1656年来华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是实行新的“适应策略”的代表人物。西方的科技、绘画和音乐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没能阻止17世纪下半叶反基督教的意识在中国的蔓延。孟德卫认为儒家的传统观念是其思想根源，引起了与基督教世界观的相互抗衡。来自于基督教不同教派的传教士的身份和经历也引起清廷统治者对自身政权稳定性的担忧，有关溺婴、祭祖、尊孔和风水等观念的分歧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基层百姓对于洋教的抵触情绪，酝酿着鸦片战争之后的急风暴雨式的反清灭洋的风波的到来。然而，孟德卫认为历史回顾有益于对过去的了解，可以还原西方对中国的更多尊重，这就是他撰写该书的主题和宗旨。

孟德卫的主要著述有：

《莱布尼茨与儒学寻求协调》（Leibniz and Confucianism：The Search for Accord，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7年）。

《神奇的国度：耶稣会士的适应策略和汉学的发端》（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年）。

《被遗忘的杭州基督徒》（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年）。

《中国礼仪之争：历史及其意义》（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Its History and Meaning，Steyler Verlag，1994年）。

《1582—1793年中国与欧洲的首次重要文化接触》（The First Great Cultural Enconte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1582-1793，Rowman & T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年）。

《1650—1785年灵与肉之山东》（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in Shandong，1650-1785，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orporated，2001年）。

《1650年来中国溺杀女婴问题》（Drowning Girls in China：Female Infanticide since 1650，Rowman & Littlefield Pubilishers，Incorporated，2008年）。

《1500—1800年中西方的伟大相遇》（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the third edi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orporated, 2009 年)。

(十八)以中国哲学和宗教研究蜚声美国汉学界的韩禄伯

韩禄伯(Robert G.Henricks)1943 年 12 月 15 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卡塔维萨。1961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威尔克斯学院学习音乐。1963 年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两年后获得了该校的宗教学学士学位。1965—1966 年在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和约瑟夫·北村(Joseph Kitagawa, 1915—1992)指导下攻读中国宗教、哲学和文化课程,后转学到威斯康星大学,师从周策纵(Tse-tsung Chow, 1916—2007),1973 年 5 月获得中国语言与文学硕士学位。1976 年 12 月又获威斯康星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博士学位。

1968—1970 年韩禄伯受聘担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主任助理。从 1973 年起他在威斯康星大学附设课程班讲授中国文学。1974—1976 年他担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讲师,讲授汉语、宗教和其他人文学科课程。1976—1982 年他受聘担任达慕斯大学宗教学助理教授;1982 年被聘任为宗教学副教授;1986—1987 年任达慕斯大学亚洲研究计划执行主席;1988 年升任为宗教学教授。1992—1995 年他担任达慕斯大学宗教系系主任,开设了宗教模式、中国宗教导论、中国佛教、中国民间宗教、道家与道教和儒教等宗教研讨课。

韩禄伯先后参加了亚洲研究学会、美国东方学会、美国古代中国学会、美国宗教学会和美国中国宗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自 1989 年起他担任美国白兰汀图书公司《中国古代典籍》丛书主编。除马王堆帛书《老子》外,他还把安乐哲翻译的银雀山简本《孙子兵法》收入了该丛书。此外,安乐哲翻译的《孙膑兵法》、叶山(Robin D.S.Yates)翻译的帛书《黄帝四书》和夏含夷翻译的帛书《周易》也先后作为丛书出版。

韩禄伯多次访问过中国大陆和台湾:1973 年暑期他为撰写博士论文赴台研究嵇康;1983 年夏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督导 15 名达慕斯大学暑期班学生学习汉语;1986 年他赴台湾大学斯坦福中心研究和翻译寒山的诗。1987 年夏他与妻子率达慕斯大学校友旅行团访问北京、兰州、敦煌、西安、上海、苏州和桂林;1995 年他出席了海南国际汉学会议;1996 年 8 月应邀

参加了北京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了论文《再论〈老子〉分章的问题》。

他曾多次获得各种奖金与资助:1965 年获 PBK 和 PKP 等研究生奖学金和约翰·怀特研究生奖学金;1970—1971 年获华盛顿大学福特奖学金;1971—1974 年获 UWNDEA 奖学金;1979 年获 NEH 暑期研究奖金;1986 年获 IUP CSSC 研究员奖金;1991 年获达慕斯大学资深教师奖金;1995 年获蒋经国基金会访问学者奖助金。

韩禄伯主要从道教和佛教着手研究中国哲学。他因为对于嵇康作品、寒山诗以及马王堆帛书《老子》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卓著,使他蜚声欧美汉学界。

1976 年他完成了关于《嵇康的生平、思想与诗歌》的博士学位论文。1983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世纪中国的哲学与论辩:嵇康的论文》,是他的一部有关嵇康 13 篇论文的英文译注本。

同年夏天他通过阅读寒山诗集发现这位禅僧的许多作品还没有被译成英文。除了沃森(Watson)译翻的 100 首、韦利翻译的 27 首和斯奈德(Gary Snyder)翻译的 24 首外,《全唐诗》中所收录的 311 首寒山诗多半还没有英译。他用了大约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寒山全部诗歌的翻译,1990 年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寒山诗译注全集》是寒山的全部诗歌的唯一的英文译注本。在诗集的"导言"中他开宗明义地谈到韩山诗歌英译的目的是:一、使读者了解寒山诗歌的全貌;二、为中国诗歌、唐诗与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和数据;三、为早期禅宗、韩诗和唐代佛教文献研究提供重要的思想源流。与此同时他还对寒山的生平和诗歌真伪进行了考辩。书后的"附录一"介绍了寒山生活的时代,"附录二"对于已有的英译寒山诗进行了点评。

韩禄伯对《老子》的研究也建立在对于中国哲学与宗教广泛把握的基础之上。他对马王堆汉墓帛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老子》甲乙本,从文献学和哲学角度展开分析和解剖。就文献学角度的研究而言,他的论文涉及了版本、分章、异文、时代与流传诸方面,如:《马王堆帛书〈老子〉考:与王弼本的比较研究》(1979 年)、《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分章问题》(1979 年)、《马王堆帛书〈老子〉及其时代》(1979 年)、《马王堆本〈老子〉的异体字》(1981 年)、《马王堆本〈老子〉异体字全表》(1981 年)、《论〈老子〉的分章》(1982 年)、《马王堆本〈老子〉及其文献流传的线索》(1985 年)。就哲

学角度研究而言，韩禄伯主要关注对原作的理解，包括总体的把握和细部的分析，如：《马王堆本〈老子〉的哲学：一些初步的意见》（1981 年）、《道与域：一个类推法的探讨》（1981 年）以及《〈老子〉五十章："十分之三"还是"十三"》等。在此研究基础上他编撰了《老子〈德道经〉：新出土马王堆本的注译与评论》。1989—1993 年该书在欧美先后再版了六次。

韩禄伯翻译的《老子德道经》按照读者对象的不同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马王堆帛书乙本《老子》的翻译，是与注释、评论和两种帛书原文解读的合辑；第二部分面向专业读者，收录了"总论"和"优秀书目推荐"。"总论"介绍了《老子》和马王堆文书，《老子》的两种帛书告诉读者马王堆的文本与后世流行版本的异同。释文保存了古体汉字和一些在原文中类似标点符号的字符。韩禄伯的《老子》译文，文笔典雅，释义直达，专业性强，在表达上有不少独到之处。对于今文与帛书不同之处他都尽可能在注释中加以说明。韩禄伯将"道"比作宇宙的"子宫"和"处女地"——世间万物萌生之处。"道"滋生养育着万物，如同母亲呵护自己子女的胸怀。

韩禄伯主要著述有：

《道与域：类推法探讨》（The Tao And the Field：Exploring An Analogy，1975 年）。

《第三世纪中国的哲学与论辩：嵇康的文论》（Philosophy and Argumentation in Third Century China：The Essays of Hsi K'a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年）。

《嵇康》（Hsi K'ang，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pp. 410-412，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 年）。

《老子〈德道经〉：新出土马王堆本的注译与评论》（Lao-tzu Te-tao Ching：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tui Texts. Balantine Books，The MacMilan Co. 1989 年）。

《寒山诗注译全集》（The Poetry of Han-shan：A Complete Annotated Translation. Alban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 年）。

（十九）以西方女权主义批评观研究唐代传奇的倪豪士

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Jr. 1943—　）出生于美国，中学时就喜

欢历史,读过很多传记文学作品,对中国特别感兴趣。他上的第一所大学是他父亲为他选择的科技大学,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工程师。他只是奉命学习,所学学科却未曾在他心中燃起激情。1961 年的一天他无意中看到一则美国陆军征兵电视广告,便怀着满腔热情应征入伍,同年 12 月他进入了一所陆军语言学校。一年的中文课程使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他后来选择的汉学研究专业打下了基础。1965 年服役期满后他转入了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专修中国文学,指导教授为柳无忌(Liu Wu-chi,1907—2002)。

他开始广泛涉猎欧洲和日本的汉学研究著作,慢慢地学会了借用参考书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在柳教授的指导下他决定主攻唐代文学,并于 1968 年去德国波恩大学进修。当时波恩大学的唐代文学师资实力雄厚,他在老师的帮助下阅读没有标点符号的原版文献。那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历史空间,需要毅力、耐心和想象,但是充满东方魅力的文思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1969 年他回到印第安纳大学后,柳无忌为他和其他同学开设了柳宗元研究课程。他坚持随时记下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分析思考,时间为他集腋成裘的工程创造了财富,几年后他把自己的读书笔记整理成一部专著《柳宗元》,于 1973 年付梓。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博士论文《〈西京杂记〉中的文学和历史解读》。

1975—1976 年倪豪士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再次去德国汉堡大学学习西方和中国的唐宋散文。这一期间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是《解读韩愈〈毛颖传〉中的讽喻》(发表于 1976 年 12 月的《远东》杂志)和《试析〈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发表于 1977 年 5 月的《亚洲研究季刊》)。

1976 年他返回威斯康星大学继续研究中国唐宋小说和诗歌,两年后除了出版专著《皮日休》外,他还发表了多篇探讨六朝、唐代和明清文言小说的论文。1980—1983 年他担任威斯康星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任职期间他编写了《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以及论文《中国小说的起源》、《〈南柯太守传〉和〈永州八记〉与唐代传记及古文运动的关系》。

1983 年他应邀担任台湾大学外文系客座教授,经常深入同事和同学中了解中国文化和汉学研究的情况,分享他们的心得和快乐。1985 年他又去了台湾大学外文系执教,课余时间在该校斯坦福中心研习相关汉学课程。

从1989年起他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唐传奇研究和《史记》的翻译，研究领域的扩大使他学术上更加成熟。2001年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邀请担任客座研究员。其间他接受了《文学遗产》编辑部的专访，介绍了他个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历、治学方法以及对中国文学翻译的观点。2003年7月他参加了两岸学者在台北淡江大学召开的纪念杜甫诞生12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介绍了美国学者研究杜甫的现状和成果。2009年3月他出席了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哈佛大学东亚系联合举办的"都市繁华：1500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了他的论文《我心中的长安：解读卢照邻〈长安古意〉》，还应邀在该校文史研究院发表《再审〈李娃传〉》的专题讲演。

倪豪士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随波逐流，也不空发议论，而以创见和开拓见长。2009年3月他在《重审〈李娃传〉》演讲中曾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有关白行简（约776—826）创作《李娃传》的年代和《李娃传》中的荥阳公子是否具有影射当时的牛李党争的问题。该作品是唐代传奇的名篇，又名《汧国夫人传》，写天宝中荥阳公子郑生赴京举秀才时恋上歌妓李氏，一年后资财耗尽，被鸨母逐出了院门，沦为唱挽歌的乞丐，又身患重病，幸得路人相救，最后以皆大欢喜结局。倪豪士从作者及其兄长的生活年代、素材源流、争论各方观点的理论依据以及原著中所披露的信息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并根据《旧唐书》、《新唐书》、北宋刘克庄（1187—1269）的《后村诗话》、明代学者薛审的《薛谐孟笔记》和清代硕儒俞正燮（1775—1840）的《癸巳存稿》等著述中的资料和论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 第一，白行简不一定是在一年之内完成《李娃传》的创作。他听《一枝花话》以后，可能向亲戚朋友询问过有关细节。据传他的创作可能长达十几年。第二，如果白行简写《李娃传》是有用心的，在以前学者提出的猜想之外，还可以考虑郑穆和郑亚分别为荥阳公和荥阳公子。如果《李娃传》是影射郑亚的话，白行简写成《李娃传》当在长庆二年或三年前后。①

他的以上结论既涵盖了文献学分析，也出于他对唐代传奇产生的社会

① 《重审〈李娃传〉》，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2009年4月23日文史讲堂。

背景的考察。

倪豪士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从事《史记》研究。考虑到在西方学术界《史记》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理想的译本,便决定与魏伯特(Robert Reynolds)、郑再发、陈照明和吕宗力等组成翻译团队,从1991年起开始翻译,决心要向西方读者奉献一套全译本《史记》。在过去20多年中他们已先后推出了《史记·汉以前的本纪》(1995)、《史记·汉以前的列传》(1995)、《史记·汉本纪》(2002)、《史记·汉以前的世家(上)》(2006)、《史记·汉代的列传(上)》(2008)等五卷,估计译文总数将多达9卷。译本保留了《史记》本纪、世家和列传等的排列顺序,为方便读者参考,译者还专门编写了纪年和度量衡对照表以及缩略语等,脚注包括词义解读、地点和章节说明。《史记》新译是一套极富学术价值的英语版中国文献,可以服务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需要。

倪豪士曾担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多年,现任该校东亚语言文学系讲座教授。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特别贡献还体现在他所主编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之中。因为当时美国大部分汉学刊物都在东海岸出版,而且缺少一份专门探讨中国文学的刊物。1979年他便与欧阳贞一起创办了总部设在中西海岸的中国文学专刊,1979—2010年他出任主编。

倪豪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撰写了论文近百篇,视角独特,手法新颖,令读者耳目一新。1995年台北南天书局出版了倪豪士的《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2007年中华书局获准再版。该书收录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撰写的12篇主要论述唐代文学的论文,包括《略论九世纪末中国古典小说与社会》、《〈南柯太守传〉、〈永州八记〉与唐传奇和古文运动的关系》、《柳宗元的〈逐毕方文〉与西方类似的比较研究》、《〈南柯太守传〉的语言、用典和外延意义》、《略论碑志文、史传文和杂史传记——以欧阳詹的传记为例》和《中国诗、美国诗及其读者》。他的《试析〈文苑英华〉中"传"的结构》按照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将该书中的"传"分为三种类型。[①]又如他的《唐人载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初探》采用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观点对唐人小说及相关文献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比较。作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有针对性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解读,得出的结论

① 倪豪士:《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令人信服。2003 年他荣获洪堡基金(Humboldt Foundation)终身成就奖。

他的主要著述有:

《〈西京杂记〉之文学与历史解读》(An Interpretatopn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the Hsi-ching tsa-chi (Miscelanies of the Western Capital),1972 年)。

《柳宗元》(Liu Tsung-yüan, Co-authored. New York: Twayne's World Authors Series,1972 年)。

《中国文学批评论选》(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e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3 年)。

《皮日休》(P'i Jih-hsiu. Boston: Twayne's World Authors Series, 1976 年)。

《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第一册)(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Editor and Compiler,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

《唐代文学西文论著选目 1~2》(Bibiography of Selected Western Works on T'ang-Dynasty Literature 1-2,1988 年)。

《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太史公记》(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 1 ~ 2,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 年;Vol. 3,1998 年)。

《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第二册)(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 2. Editor and Compiler.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8 年)。

《中国文学:古代与经典》(Chinese Literature, Ancient and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 年)。

《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中华书局,2005 年)。

《唐代传奇选》(Tang Dynasty Tales, A Guided Reader.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2010 年)。

(二十)通过塔克拉玛干考察打开中西文化交流新视窗的梅维恒

梅维恒(Victor Henry Mair,1943—　)年轻时喜欢英国古典文学,1965 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同年加入美国和平队(US Peace Corps),在尼泊

尔服务了两年。回到美国之后他计划申请威尔逊奖学金开展对乔叟的研究。面谈时五位评委听了他有关尼泊尔和平队服务工作感受的叙述之后，认为他最具备研究佛学或东方学的条件。1967 年秋天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学习佛学预科，中文、日文、藏文和梵文都是他的必修课程。后来他得到了马歇尔奖学金便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开始研究佛学和敦煌学。这期间他对组建自己的小家庭有着一种特别的期待，便从亚非学院退学移居台湾结婚成家，每日课余陶醉于温馨的新婚生活。然而对于像他这样有远大人生目标的学子来说卿卿我我的生活毕竟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于是他又申请了另一份奖学金到哈佛大学研究佛学和敦煌经卷。1976 年他完成的博士论文《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不仅展示了他的学术品格，也为他赢得了留校当助理教授的殊荣。

从 1979 年起他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任该校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顾问，还先后短期任教于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

梅维恒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唐宋史和敦煌学，享有“北美敦煌学第一人”之美誉。他的《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影响之研究》、《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及其印度发端》和《敦煌通俗叙事文学》等著述，为中西学界所熟知。近年来他曾在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考查，发现了存在于当地的 2000 B.C.~200 A.D.的文明遗迹，为研究中西交通和欧亚文化交流史打开了新的视窗。

他潜心研究敦煌变文 20 余年，三部专著和多篇论文奠定了他的敦煌学权威地位。1983 年他的博士论文《敦煌通俗叙事文学》经修改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 世纪 80 年代他又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论文。他认为敦煌变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叙事文学革命（Narrative Literature Revolution），值得深入研究。他的观点得到了众多中国唐代文学和敦煌文化学者的肯定，认为从民间文学和口头文学角度来研究唐代佛教文化，从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高度来研究敦煌文学，高瞻远瞩的分析可以加深人们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和意义的理解。他翻译的《老子》和《庄子》在同类译作中位居前列，创意和突破颇多。他殚精竭虑地把《庄子》中的一些韵文翻译成了英文，展示出高品质译作的风范。

20 世纪 80 年代梅维恒第一次来华，除了去拜访季羡林（1911—2009）和周有光（1906—　）等学者名流外，还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国家图书馆查

阅了有关敦煌文书。1988年他率领了一个美国博物馆代表团访问乌鲁木齐,所见所闻对于他后来的学术方向有很大影响。当地博物馆内陈列的各类干尸,仿佛是从遥远历史城乡前来迎接他们的小河人或者古墓沟人,正用吐火罗语向他们讲述尚未为世人所知的故事,带着他们去穿越时空隧道,期待着他们为现代读者写出有声有色的考察报告。梅维恒曾在《史记》和《阅微草堂笔记》等古籍中读到过有关中国西北边陲白种人的记载。他的雄心勃勃计划感动了斯坦福大学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尔扎(Luigi Luca Cavalli-Sforza,1922—　)和新疆考古所所长王炳华,都表示愿全力支持他的研究。在一位意大利学者的配合下他采集了数十具干尸的切片,经化验证实了他们的原先的预测。从此他每年夏天都携不同学科的学科专家去新疆考察。199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他组织了一次由世界各地30多名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报告各自研究新疆干尸的进展。1998年他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青铜器和铁器时代初期中亚和东亚民族之研究》(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他还十分关心2000年新疆考古学家对于小河墓地的考察,并参与后续研究。他把塔里木盆地视为欧亚巨人的眼睛,把新疆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并不辞辛劳地指导拍摄了五部历史遗址纪录片。他还不定期组织出版《中国柏拉图文集》(Sino-Platonic Papers),作为西方学者发表有可能被束之高阁的研究论文的园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梅维恒每年都访问大陆和台湾,谈学问,也谈政治,希望中国和美国政界和学界增加互信,加强合作,希望两国学术界多出一些成果,少一些纷争。

他的主要著述和编撰有:

《敦煌通俗叙事文学》(Popular Narratives from Tun-hua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年)。

《试论庄子》(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 e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年)。

《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及其印度发端》(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年)。

《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和戏剧影响之研究》(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9 年)。

《〈道德经〉: 德与道之经典》(Tao Te Ching: The Classic Book of Integrity and the Way,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0 年)。

《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Asian Class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年)。

《逍遥游: 早期道家故事和庄子寓言》(Wandering on the Way: Early Taoist Tales and Parables of Chuang-Tz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年)。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简史》(The Shorter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年)。

《梅乘〈七发〉与王勃〈滕王阁序〉》(Mei Cheng's Seven Stimuli and Wang Bor's Pavilion of King Terng: Chinese Poems for Princes, The Rdwin Press, 1998 年)。

《塔里木木乃伊》(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co-authored with J.P. Mallory, New York, N.Y.: Thames & Hudson, 2000 年)。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年)。

四、美国具有现代性特色的汉学研究时期(1972 年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汉学研究在内的美国亚洲研究服务于联邦政府内外政策的倾向十分明显,不少专著和论文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种族主义偏见和殖民主义价值观,不仅成为宣传美国意识形态的工具,也对于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68 年,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一些具有强烈反对越战思想的亚洲专业研究生和青年教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尖锐地批评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对美国越战决策保持沉默,导致学术堕落并

间离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主张对亚洲社会的人道理解，保持文化完整，消除贫困和帝国主义压迫，反对在亚洲实施教区文化、为少数人私利而对外扩张的行为。1971 年兰德公司军方分析师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sberg，1931—　）将美国五角大楼有关越战真相的 7000 多页文件，通过《纽约时报》记者向社会曝光，导致了全美范围的反战浪潮，迫使政府结束越南战争。由于越战给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美国财政部门和基金会对汉学研究的拨款逐年减少，一些项目只能从美国国内城市和民族研究渠道寻求资助。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 1979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交，为两国学术界的交流升级创造了条件，专家互访、留学生的交换和各类专业会议轮流在两国召开改变了过去 70 多年中各自封闭甚至相互抵制的状况。汉学专著、期刊、年鉴和会议文件汇编的出版数量逐年递增，汉学选题范围日趋扩大，专业队伍中不同年龄和经历层次的专家相互携手，为打造崭新的美国汉学大厦而联合。随着双边关系的逐渐改善，美国汉学界开始对传统汉学研究模式的反思和批判，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逐渐变得现实化和理性化。

这一阶段美国研究团队已经发展壮大，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对于中国文化和国情发展的一般性解读，都普遍深入到文论或者作品的历史背景、社会意义、普世价值和学科影响等方面的深入探讨，从深层次发掘信息的人文和史学涵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汉学研究中的运用渐成科际整合的综合趋势。此时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无论其广度、深度还是研究成果方面，都呈现出焕然一新的局面。各种新理论和新观念，诸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新文化、新儒家和现代性等，对于拓宽文学批评视野，重构现代文学的中国形象，创建新的史学模式都产生了冲击力。

多科整合为当代汉学研究开创了新思路，美国汉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例如：费正清所倡导的汉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联姻，白鲁恂把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运用于国际关系的分析，不仅扩大了研究人员的视野，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理论层次。美国新道家把传统道家的自然人文主义与现代性结合，体现了人文关怀中的科学精神，帮助人们审视各种现存的价值和秩序，在生命延续中实现超越功利至上的追求，给力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和谐与发展。波士顿儒学和夏威夷儒学把现象学、逻辑经验论、语言分析、过程哲学、实用主义以及社会批判等理论结合起来，

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新的解读,实现了人文精神与科技精神互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兼容,促进了儒学的国际化和多元化发展。经济学家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式进行实证性研究,通过理论假设、模式构建、数据验证和定性定量分析对中国的经济现状进行了有效的探讨。人类学家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国史综合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以上各学科的长足进步为70年代以后美国汉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现代美国汉学的发展云蒸霞蔚,盛况空前,气象万千。

美国学界通过长期的努力,把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介绍到美国,帮助美国人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认识和了解,扩大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中美两国文化、经贸和科技的发展,使部分中国概念和思维提升到美国的主流意识水平。无论从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来看,都是十分重要的贡献。

美国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主流学科定位、实证性微观考察与研究中的应用比较,到田野调查、定性定量分析、科际整合的宏观研究。随着新的世界秩序取代了超级大国的两极对立,全球化和地域化观念就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思潮在当代美国汉学研究中的表现,首先是平等学术对话的提倡和人文学科现代性的自由发挥,其次是从世纪高度来考察现实,在应用前提下实现数码技巧与研究方法的更新。

然而,在全球一体化和学术成果商品化的语境中美国汉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强势学术团体对于非强势学术团体的排挤,不同学科和学派之间彼此争夺话语权,对于学术成果的实用性、预警性和功利性的过分强调导致某些基础研究和教学遭遇冷落,基金会的慷慨注资一旦出现偏差就可能推高某些负面影响。目前美国部分大学东亚系研究中国社会学科的人数越来越多,无形中形成了对专攻古典文学的研究生就业的压力。另外,学者们还抱怨一些美国汉学研究项目太专业化,他们觉得只有更多了解其他领域和其他文明才能更好地认知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与其他古代文明领域的研究人员之间开展合作将是大势所趋。从西方甚至国际汉学的高度来看,主流工作语言对于非主流文本学术地位和应用范围的长期抑制,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似乎难以完全消除,必须加以协调。凡此种种,无一不给美国汉学研究带来自耗和损伤,只有多方呼

吁才能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

（一）敢于对翻译创造性和精准度挑战的葛浩文

葛浩文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曾就读于南加州长滩州立学院。年少时轻狂，沉溺于喝酒跳舞游逛，虽然每门功课都勉强及格，但是对亚洲历史却不感兴趣。毕业后就业无门，只好当兵。1961 年他进入了海军学校不久就被派到台湾驻军中当一名通讯兵。后来调往日本，上了一艘开往越南的驱逐舰，经过多次恳求才返回台湾省，拜一位东北人为师学习中文。退伍后他留在台湾师范大学继续进修，直到得知父亲病危才结束留学生活。

回到美国后他进入旧金山州立大学就读，首次接触到萧军和萧红的史料，并认真读了第一本中国小说《八月的乡村》。1971 年他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图书馆借到了萧红的《呼兰河传》，一看就不忍释手，五年后把它译成了英文，从此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在旧金山大学硕士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后来进入了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指导教授是旅美散文家柳无忌。他开始学习元杂剧、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萧红研究，1979 年以《萧红评传》为书名在香港正式出版。

葛浩文在台湾期间曾经翻译过作家黄春明（1935—　）和王祯和（1940—1990）的作品，但真正吸引他走上专业翻译道路的是由翻译家戴乃迭建议翻译的张洁小说《沉重的翅膀》。在一次访京期间他去拜访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当时戴乃迭正在翻译该书，宾主谈起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都很投机，她便对葛浩文说文革和牢狱之灾使她与外部世界脱节多年，若由她完成该书翻译，恐怕会译成 20 世纪 50 年代那种老派英文。她相信由葛浩文来译文字会更有时代感，能更好地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葛浩文欣然接过了翻译该书的任务。1989 年他的译本在美国出版后获得了广泛好评。葛浩文此次对杨宪益夫妇的拜访，不仅在专业上得到中国翻译专家的指点，也为他在中国出版译作提供了方便。后来他翻译的《萧红短篇小说选》、《红夜》、《朦胧的期待》和《鱼钓》，都先后由中国文学出版社作为“熊猫丛书”系列出版，他因此逐渐成为翻译界的知名人物。①

---

① 何琳：《翻译家葛浩文与〈中国文学〉》，载《时代文学》2011 年第 2 期。

在过去的40多年中，葛浩文先后翻译了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莫言、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和姜戎等20多位作家的40多部作品。其中有五六部是他和太太林丽君合译的。他的译文结构严谨，用词讲究，技巧娴熟，文风时尚而不落俗套，章法变化而不浮华。为了准确翻译姜戎的小说《狼图腾》中的大量蒙语词汇，葛浩文专门聘请了一位内蒙古大学的学生为他提供咨询，足见他对待翻译的态度是多么一丝不苟。2007年11月姜戎凭借《狼图腾》英译本在香港国际文学节上获得了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2007年、2009年和2010年曼氏亚洲文学奖得主之作品均为葛浩文译作。2009年他又获古根海姆研究奖。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葛浩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风格。他说："我天生就爱翻译，翻译是我的爱好。对我而言，翻译就像空气一样，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关于译者的身份和立场问题，他认为原著作者是为本国读者服务的，而外语译者则首先要着眼于海外读者群体；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以原著为中心"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关于自严复以来翻译界长期讨论探究的"信"、"达"、"雅"问题，他的观点是："信"、"达"、"雅"三者缺一不可，因为译文不是给作者看的，也不是给译者看的，而是给读者看的，读者的需要才是最终目标。做到了"信"和"达"，最关键也是最难的是"雅"——让读者读懂作品，能够发现其精髓，不要因为语言产生障碍。做翻译不能只为钱，企鹅出版社的《狼图腾》获奖了，但是他拿到的报酬只是基本稿费。关于翻译技巧的应用问题，他认为翻译从来就没有约定之规。他说："我翻译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针'，我只能跟着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来翻译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否则《河岸》里面的人物说的话翻译出来，就跟《狼图腾》里面的主人公说的话一样了，那是要不得的！"翻译中常常碰到原著中的语言或者知识错误问题，他觉得既理解又无奈。如果保留错误，会很对不起读者，如果纠正错误，又觉得对不起作者。不过，只要可能就应该尽量与原著者沟通，但是对读者负责是一种译德，应该牢记。①

2002年4月葛浩文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写作生涯》一文中说：

① 河西：《葛浩文与他的汉译之旅》，载《新民周刊》2008年4月17日。

有时我被人问起，既然在很多人看来翻译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业，你为什么还搞翻译？他们问我，既然你的日子（他们认为）还过得有滋有味，现在也该知道小说是怎么一回事，你为什么不写自己的小说呢？我只能说并不是所有的译者都可以成为闭门造车的小说家，我不认为翻译是低人一等的艺术，而应该是出精品的艺术。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简要回答是：因为我喜欢翻译，我爱看中文，也爱用英文写作，我喜欢这样的挑战，喜欢这样充满歧见和不确定因素的事业。我就喜欢游离于创造性和精准度之间的紧张，甚至还有不可避免妥协的感受，而且偶尔我还能找到被激情所驱使用英语表达令人兴奋的工作。换言之，为了活着我必须翻译。满足于知道自己忠诚地为两个“选区”的民众服务，使我乐于把那些优秀的、拙劣的和不算高明的中文，译成可读的、可感触到的，甚至可以推向市场的英语书籍。①

大凡从事翻译工作或者喜欢阅读翻译作品的人，都觉得这是经验之谈。懂得翻译原理的人，最善于发现历史的价值，最能捕捉生活的精彩画面，最会体验学科和谐互动之快乐。

1981 年葛浩文第一次来北京访问，见到了萧军、舒群、罗烽、冯牧和萧乾等作家使他十分感动，这么多年读了他们的作品，终于跟他们见面了。在中国作协的帮助下，他还访问了萧红的家乡和呼兰河镇。后来又得到中国和美国政府的资助，对伪满时期的中国文学进行了专项研究。

葛浩文是当代英文世界知名度很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目前为美国圣母大学讲座教授。

葛浩文撰写、翻译或者与他人合译以及编辑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

《萧红评传》（Hsao Hung，Twayne Publishers，1976 年）。

《萧红短篇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Xiao Hong，1982 年）。

《朦胧的期待》（Vague Expectation，1982 年）。

《鱼钓》（Fishing，1987 年）。

《红夜》（Red Night，1988 年）。

《沉重的翅膀》（Heavy Wings，Grove Press，1989 年）。

---

① Howard Goldblatt：*The Writing Life*，*The Washington Post*，Page BW10，April 28，2002.

《红高粱》(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 New York: Viking, 1993 年)。

《屠夫的灵媒娇妻》(The Butcher's Wife and Other Stories, Cheng & Tsui Company, 1995 年)。

《天堂蒜薹之歌》(Garlic Ballads. Penguin USA, July 1996 年)。

《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集》(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Joseph S. M. Lau and Howard Goldblat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年)。

《灵肉》(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 Grove Press, June 1996 年)。

《玩的就是心跳》(Playing For Thrills, Penguin Books, 1998 年)。

《荒人手记》(Notes of a Desolate Man, co-translated with Sylvia Li-chun Lin, 2000 年)。

《酒国》(The Republic of Wine. Arcade Publishing, 2000 年)。

《千万别把我当人》(Please Don't Call Me Human, Hyperion East, 2000 年)。

《师父越来越幽默》(*Shifu*, 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1 年)。

《尹县长及其他文革故事》(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co-translated with Nancy 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年)。

《丰乳肥臀》(Big Breasts & Wide Hips,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Incorporated, 2005 年)。

《闹腾的麻雀》(Loud Sparrows edited by Aili Mu, Julie Chiu, 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年)。

《狼图腾》(Wolf Totem, Penguin, 2007 年)。

《青衣》(The Moon Opera, co-translated with Sylvia Li-chun Lin. Telegram Books, 2007 年)。

《河岸》(The Boat to Redemption, 2009 年)。

《玉米》(Three Sisters, co-translated with Sylvia Li-chun Lin, 2010 年)。

《生死场》(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Cheng & Tsui Company, 2002 年)。

《饥饿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River, Cheng & Tsui Company, 2002年)。

《呼兰河传》(Tales of Hulan River, Cheng & Tsui Company, 2002年)。

《北京娃娃》(Beijing Doll, Riverhead Books, 2004年)。

《我的帝王生涯》(My Life as Emperor, Hyperion East, 2005年)。

《浮躁》(Turbulence: A Novel, Grove Press, 2003年)。

《古都》(The Old Capital, 2007年)。

《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Arcade Publishing, 2008年)。

《魔咒钢琴》(A Jewish Piano, co-translated with Sylvia Li-chun Lin, 2011年)。

(二)运用结构主义理论来考察分析历史问题的艾兰

艾兰(Sarah Allan, 1945—　)出生于美国,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柏克莱分校学习中文,197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197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夏天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教授。她的研究领域广及甲骨文、青铜器、简帛和中国古代史。她在亚非学院长期教授中国古代哲学,熟悉先秦文献、考古、中华思想和文化,善于从哲学史角度探索和解读学术问题。

1982年艾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李学勤和齐文心合作对英国所藏甲骨进行考察,共得英国11个单位所藏的3000片甲骨拓片。经过认真辨伪分析,排除了拟伪和字迹不清的残片后共选用2674块甲骨拓片编成《英国所藏甲骨集》一书,按照上编(图版)和下编(释文和附录)体例编排,分别于1985年和199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不仅收录了浸礼会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g, 1859—1922)、北长老会教士方法敛(Frank Herring Chalfant, 1862—1914)和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 1854—1952)等人的旧藏甲骨墨拓,而且还收入了不少过去未曾著录的甲骨刻辞,2674片所谓的"家谱刻辞"以及正反两面彩色照片,弥足珍贵。艾兰在考古方面的另一贡献是采用了新的甲骨鉴别技术和手段。通过摄像机和显微镜结合拍摄甲骨单字或局部,以便放大刻道轨迹,便于判断刀工刻划的次数和笔顺,为真字和伪刻字的比较和删选提供了科学鉴定的依

据，一些疑难问题因此得到了充分验证和解决。

1997年8月，艾兰在北京举办的一次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获悉在郭店楚简中有一部与今本《老子》很不一样的竹简本《老子》，她如获至宝，为此开始筹划举办郭店版《老子》学术讨论会。1998年5月22~26日研讨会在达特茅斯学院举行，来自中国海峡两岸、加拿大、美国、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分别从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哲学以及宗教等角度对郭店楚简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艾兰的想法是从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的不同学科，请来既有深厚学养又熟悉出土文物业务的专家一起阅读这些在地下长眠2000余年的文献，为后续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会后艾兰主编了《老子国际研讨会纪要》，作为"古代中国研究专刊"在美国出版。

艾兰对中国青铜器也有深入研究，曾与李学勤合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一书。在该书"附论"中，她就欧美汉学界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历史进行了回顾，权衡得失褒贬，颇具启发性。1992年她主编了《中国早期青铜礼器的释义问题》一书，并撰写了专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青铜器》，论述了欧美学术界研究中国青铜器和中国早期文明中的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的历史和倾向，对于青铜器的史学和文物价值提出了新颖的见解。

在《太一、水与〈老子〉：郭店新启迪》一文中，艾兰把"宇宙之最"与《老子》的"道"和"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的深奥概念联系在一起。《孔子家语·礼运》中说："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道"的哲理源于自然之水，有水就有生命，就可养育世间万物。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太一"就是"道"的别称，就是"元气"，就是代表"天命"的中宫天极星。了解这些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就能领会"阴阳五行"的比喻含义，脱离混沌。

艾兰的《世袭与禅让》是1970年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撰写的博士论文，其思路源于她在早先的硕士论文中对周初太公望传说的研究，是借鉴西方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理论来探讨中国史前史的一种尝试。20世纪下半叶西方流行的结构主义认为事物和现象包含深层和表层结构，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是透过其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来实现的。法国人类学和民族志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是一位早期的结构主义实践者，他

把这一理论用来分析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制作等文化现象。后来结构主义理论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语言、文化、文学和社会学。美国学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曾因在句子分析中使用深层和浅层理论而闻名于语言学界。艾兰在《世袭与禅让》中大胆运用了结构主义理论来考察历史学问题。她指出中国古代史的记录方法随着史官哲学观点的改变而改变。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既有禅让也有篡位之分,史家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解读。传说中的中国历史先贤没有个人私利,因此能以德治国,举贤任能。但是当物质丰富阶级关系复杂化之后,皇族唯恐失去既得利益,就必然采取皇位世袭制度。艾兰论证了国家制度的变化与上下内外关系的变化相联系的规律。李学勤写道:

> 她(艾兰——引者注)1969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周汉文献所见太公望》,发表在1972—1973年的《华裔学志》第30卷,是她涉足中国古代研究的肇端;1974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世袭与禅让》,吸取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古史传说研究中别开生面,极有创新性,受到汉学界的广泛注意。①

艾兰在《龟之谜:中国古代神话、艺术和宇宙观》的"导论"中提出:要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不能孤立地去理解它,而必须联系与神话有关的因素,研究祭祀、占卜、艺术和宇宙观,只有在这整个体系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含义。她认为"十日并出"的神话表明商代人把自己与太阳和火联系在一起。根据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观念,夏人自然就与月亮和水相联系。这样就能较合理地解释神话中夏朝洪水和商朝旱灾的发生,以及商即将诞生的预兆。她批评那些根据欧美神话概念断言"中国无神话"的观点。她强调利用传说和史料来加深对神话的了解。她把中国古代文献中缺少神话归因于中国宗教的本质,因为在中国神、祖先和鬼魂三者都是灵魂,所以神和人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②

2008年11月5日,艾兰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邀请作了题为《饕餮纹的发展及其意义》的学术报告。她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

---

① 李学勤:《〈艾兰文集〉总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② 中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家资源库·汉学家·艾兰》。

西方学者对中国商代以前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历史，认为古代中国青铜器的艺术价值和纹饰系列以及变化规律，是引起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第一因素。高本汉是对纹饰作了类型学的统计分类的早期西方学者之一，分析了饕餮纹等纹饰如何经历了由写实向抽象几何图形发展的过程。罗樾（Max Loehr，1903—1988）等学者提出了殷商青铜器纹饰五种型式彼此承接的构想，与新石器彩陶抽象的几何图案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不具有任何象征性的宗教、宇宙论和神话学意义。从艺术上看，饕餮纹复杂多变，并非某种特定动物或神灵的表现。白克礼（Robert Bagley）等人也认为商代青铜器的纹饰是纯粹的图案艺术，各个母题并无特殊的象征性。艾兰本人曾经在《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一书中谈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她认为神话符号的特征在于能够有意突破自然现实世界的界限，达到超现实世界的彼岸。而原始艺术则需要通过某种语言才能与另一世界沟通，其纹饰母题可以直接出自宗教信仰的结构，无须描绘。青铜器上的纹饰把不同动物的特征组合在一起，随意放大缩小，或方或圆，这正是其原始艺术的特征表现。艾兰介绍了大卫·莱维斯·威廉斯（David Lewis-Williams）与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合著的《新石器时代的心理：意识、宇宙与神域》（Inside the Neolithic Mind：Consciousness，Cosmos，and the Realm of the Gods）如何利用人类学和脑神经学理论对原始宗教和艺术所作的解释，探讨了萨满教（Shamanism）等原始宗教借用酒或者幻药让人产生幻觉，以实现人类世界与超自然世界的沟通。原始艺术孕育于原始宗教，通过图形或者隧道与漩涡上天入地，将不同动物的躯体组合成半人半兽的生命体。这些也许是萨满巫师能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方式。艾兰认为，文献记载可能有历史依据，但饕餮纹描述的是一种幻觉经验，不一定与文献的记载相符。这就是她对饕餮纹产生方式所提出与众不同的解读和思考。

艾兰的主要编撰和著述有：

《周代太公望的身份与文学》（The Identities of Taigong Wang in Zhou and Literature，Monumenta Serica XXX，pp. 57-99.1972—1973 年）。

《中国四千年历史》（Four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New Community III（Summer），pp. 280—285.1974 年）。

《引言·中国的传说、学问与宗教》（Introduction，in Legend，Lore and Religion in China，Sarah Allan and Alvin P.Cohen，ed.，pp.i—xii.1979 年）。

《中国的传说、学问与宗教：现代中国民间宗教的商代基础》(Shang Found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Folk Religion, in Legend, Lore and Religion in China, Sarah Allan and Alvin P.Cohen, ed., pp. 1—21.1979 年)。

《中国》(China, with C.Barnett, Cassells, London, 1980 年)。

《天子：中国古代的神话和图腾崇拜》(Sons of Suns: Myth and Totemism in Ancient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LIV, pt.1, pp. 290—326.1981 年)。

《世袭与禅让：中国古代朝代更迭传说》(The Heir and the Sage: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 CMC, San Francisco.1981 年)。

《夏朝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Xia Dynast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4, no. 2, pp. 242—256.1984 年)。

《〈尚书〉失传的文本所载旱灾、人祭与天命》(Drought, Human Sacrifice and the Mandate of Heaven in a Lost text from the Shang shu, B.S.O.A.S., XLVII, pt. 3, pp. 523—539.1984 年)。

《英国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 vol.I, 1985 年)。

《神话与商代青铜器纹饰含义》(Myth and Meaning in Shang Bronze Motifs, Early China XI~XII, pp. 283—289.1985—1987 年)。

《尧和舜》(Yao and Shun,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MacMillan, New York.1987 年)。

《谈殷代的宇宙观与占卜》(On Yin Dynasty Cosomology and Divination, YInxu Bowuguan Congkan , pp.189—198.1989 年)。

《英藏敦煌手稿前言(三)》(Preface III,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British Collections: Chinese Texts other than Buddhist Scriptures I, Sarah Allan and others, ed., pp.19—22.1990 年)。

《鲜簋的初步研究》(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Xian Gui, 22 February 1990 年)。

《饕餮纹及其含义》(The Taotie Motif and its Meaning, 1990 年)。

《针刻纹三角援戈及相关问题》(A Triangualar Bladed Ge-halberd with Incised Decoration and Related Problems, 1990 年)。

《亚形与殷人的宇宙观》(The Cross-shape and the Cosmology of the Yin People, 1991 年)。

《龟之谜：中国古代神话、艺术和宇宙观》(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1 年)。

《英国所藏甲骨集》(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 Vol. II, 1991 年)。

《中国古代祭祀青铜器艺术及其意义》(Art and Meaning, in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XV, Roderick Whitifield, ed.,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pp. 9—33, 1993 年)。

《失落在伦敦的东汉大铜马》(A Large Eastern Han Bronze Horse which has slipped away to London), with Lu Liancheng, 1993 年)。

《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水》(Water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1993 年)。

《马王堆出土老子〈道德经〉英译·引言》(Introduction, Lao Tzu Tao Te Ching: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Ma Wang Tui Manuscripts, D.C. Lau, trans., S. Allan, ed., Everyman's Library, Alfred Knopf, London. 1994 年)。

《最近出现的秦公户》(The Duke of Qin *hu* that has recently appeared, 1994 年)。

《关于夏的神话》(On the Myth of the Xia, 1995 年)。

《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Chinese Bronzes: A Selection from European Collections, 1995 年)。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本喻》(The Root Metaphor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1996 年)。

《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本喻》(The Way of Water and Sprouts of Virtue: Root Metaphor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7 年)。

《虎、南方与罗樾》(The Tiger, the South, and Loehr, Style III,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inese Archaeology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d., Science Press, Beijing, pp. 149—180. 1998 年)。

《西方美术史学者眼中的中国青铜器》(Chinese Bronzes in the Eyes of

Western Art Historians, in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Rong Geng, Guangdong Yanhuang Wenhua Yanjiuhui, and others, ed., Guangdong People Press, Beijing, pp. 399—416, 1998 年)。

《中国早期哲学思想中的本喻》(The Root Metaphors of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Sarah Allan, Tao Wang and Fan Yuzhou, ed. 1998 年)。

《西方人为什么要研究古代中国》(Why Should Westerners Study Ancient China, In China Reading Weekly, May 20, 1998 年)。

《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Early Chinese History, Thought, and Culture Collected Article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ang Min, 1999 年)。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甲骨文字》(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Sweden, 1999 年)。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青铜器》(Chinese Bronzes Through Western Eyes in Roderick Whitfield and Wang Tao, ed., Exploring China's Past: New Discoveries and Studies in Art and Archaeology, Saffron Books, London, 2000, pp. 63—76. 2000 年)。

《太一,水与郭店版〈老子〉》(Tai Yi, Water and the Guodian Laozi, in Wuha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yuan, ed.,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24—533. 2000 年)。

《韦利译〈论语〉·引言》(Introduction to Arthur Waley, trans., Confucius: The Analects, Everyman's Library, Alfred Knopf, New York, 2000, pp.xi—xxix. 2000 年)。

《郭店新出土老子楚简与中国古代宇宙观》(The Newly Discovered Chu Bamboo-slip Laozi from Guodian and Ancient Chinese Cosmology, in Sarah Allan and Xing Wen, ed., 2000 年)。

《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史》(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y of Thought, Fudan University Press, Shanghai, pp. 128—140. 2002 年)。

《太一、水与〈老子〉:郭店新启迪》(The Great One, Water, and the Laozi: New Light from Guodian, T'oung Pao, Vol. 89, 4 ~ 5, December 2003 年)。

《引言(一):中华文明的形成》(Introduction: Part I,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Sarah Allan, 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pp. 1—6. 2005 年)。

(三)把西方叙事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浦安迪

浦安迪是一位犹太人,1945 年 2 月生于美国纽约。他从小就对语言学习感兴趣,上中学时开始学习俄语,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学习汉语。19 岁那年他去台湾大学深造,研修汉语和中国文学课程。除了英语、汉语、俄语和希伯来语外,他还通晓日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台湾大学的课堂教学丰富了他的中国文化知识,加深了他对《红楼梦》等中国文学名著的理解。

获得普林斯顿博士学位后浦安迪受聘留校任教,为学生开设了《红楼梦》研讨课。据说他所使用的脂批线装《红楼梦》原是胡适送给普林斯顿东亚系创办者牟复礼教授的。教授退休前又将该书作为传家宝转到了浦安迪手中,其中深情厚意只有这几代学者才最能心领神会。

浦安迪知道,从传统的文学批评观点看,《红楼梦》不仅仅描写了宝哥哥和林妹妹的亲情和爱情,也是一部反映晚清社会人生百态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儒、道、佛哲理,也有官场的明争暗斗和闺房的私怨情伤,与西方文学名著相比较却又都是通过叙事形式演绎社会和人生主题的一种体裁。他尝试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红楼梦》,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所倡导的人文学科研究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主张,是把作品中的各类相关元素钩勾连起来构成一个语境场,以便从宏观和微观角度透视人物和现象,使多科综合手段得到充分发挥,成为更新更有成效的文学分析手法。

20 世纪 80 年代浦安迪应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虽然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大陆,但是他在台湾留学和生活的经历帮助他消除了陌生感,他先后结识了钱钟书、吴晓铃和周汝昌等学者名流,私交甚笃。

浦安迪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其中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和叙事学都是他的强项。后来他的学术兴趣转到了世界各国文学渊源的研究与比较,他的文章不断见诸报刊。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浦安迪按照华盛顿大学教研部门的计划承担着重译部分中国古典名著的重任。几位来自哈佛大学、爱尔兰大学和加利

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教授，分工负责把《诗经》、《尚书》、《左传》、《韩非子》和《论衡》等经典文献翻译成英文，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出版。他个人翻译的《左传》已先期完成。

1989年春浦安迪应邀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为研究生和年青教师开设了“中国古典文学与叙事文学理论”课。授课内容受到欢迎，20多位学子有时就在他的寓所上课。他主要是从比较文学理论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并且进一步阐明中国小说与世界其他各国叙事文学之间的关系。

他的学术演讲《中国叙事学》经过修订后于199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探讨，所用案例和语料主要选自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和清代小说《红楼梦》，视角独特，手法新颖，分析别开生面。全书正文共七章，分别为：第一章导言（第3—33页）；第二章中国叙事传统中的神话与原型（第34—54页）；第三章奇书文体结构诸型（第55—97页）；第四章中国奇书修辞形态研究（第98—124页）；第五章奇书文体中的寓意问题（第125—166页）；第六章奇书文体与明清思想史通观（第167—188页）；第七章不是结论的结论（第189—199页）；附录：高友功（Yu-kung Kao）著《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抒情境界》（第200—219页）。浦安迪认为，文学中的“叙事”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传递给读者，与“抒情诗”和“戏剧”共同构成了文学创作中的三大体裁。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叙事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1986—1992年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西方叙事理论著作先后在中国翻译出版。中国本土化的叙事研究借鉴西方叙事理论，以中国所特有的文学资源和话语形式，展开了对古典文学和现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推动了中国叙事学的繁荣，给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带来了影响，使之发展成为一场叙事革命。

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对于中国叙事文学做了以下的简要回顾：

> 中国叙事文学可以追溯到《尚书》，至少可以说大盛于《左传》，但是如果我们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虚构性叙事文体（亦即英文中的fiction）之上，则今天看得到的中国最古的小说，大概是六朝志怪，然后中经变文与唐人传奇，发展到宋元之际开始分岔，其中一支沿着文言小说的路线发展，另一支演化成白话小说。前者

从《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等清代文言小说为新的高峰，后者则以明代四大奇书和清代《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代表之作。明代是中国长篇章回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文人开始关心小说的滥觞期。在明清小说批评的领域里，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文言小说研究的特点是寓批评于分类，主要由胡应麟和纪昀这样的史评家来措手；而白话小说的研究则是寓分类于批评，基本由金圣叹、李卓吾这样的才子文人来进行。①

浦安迪在书中还提出了"叙述人的口吻"、"奇书文体"和"文人小说"等概念问题，很具启迪性，尤其在界定这些术语和叙事区分标准时很有必要。至于汉语的"小说"和"神话"与英语的"novel"和"myth"的语义和语用差别问题，对于跨文化跨时代的比较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环节，但是从翻译学和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却显得过分较真，有悖于语言发展的实际。在汉语和英语这样历史悠久使用范围很广的语言中，"旧瓶装新酒"的现象太普遍了，例如现在我们常说的"跳槽"、"小资"、"传奇"和"搭车"等都碰到扩义和转义的情况，无法按照旧章程辨析。英语的"drama"与"play"原本也有分工，但是普通读者混用的情况却屡见不鲜。严格地说，"饺子"与"dumpling"并不等值，准确地翻译只能音译。问题是：如果对于意义不等值的词统统加以音译，译文就会失去其可读性，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在谈到浦安迪的专著《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时说：

我很喜欢他思考的深邃，视野的开阔和掌握资料的丰富翔实；甚至可以并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对比较文学的兴趣，推动了我走向比较文学研究之路。

乐黛云对于他的课堂教学的评价是：

①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浦安迪教授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轻易不苟言笑，但却平易可亲，你会处处感到他的热心和真诚。他给我们研究所带来了新的教学法，也带来了新的风气，他很能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带动学生思考，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①

2006年8月10日他应邀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社科院外文所、文学所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从事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进行了交流与座谈。

浦安迪现在已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荣休，但是还兼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

浦安迪的主要著述有：

《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年)。

《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 Universffy Press，1977年)。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年)。

《中国叙事学》(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Toratha－gadol Jerusalem：Mosad Bialik，1997年)。

《大学与中庸》(The Highest Order of Cultivation an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Mean，London：Penguin Classics，2003年)。

《红楼梦批语偏全》(编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四)反对世界诗歌成为他国现代主义翻版的宇文所安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1959年全家移居巴尔的摩。14岁那年他在巴尔的摩市图书馆第一次读到一本书名为《白驹》的英文版中国诗集，其中收录了从东周到民国时期的诗歌。从此他开始喜欢上了中国诗，几乎每个星期都去那儿浏览他所能找到的中国文学书籍。他的父亲是一位物理学家，常告诫他“聪明不值钱。世界上

① 乐黛云：《中国叙事学·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聪明的人很多,但最终靠聪明成就大业的人却极少。"他的父亲还担心他将来以研究中国诗为职业无法谋生,这一告诫激励着他不断勤奋工作。

1968 年宇文所安在耶鲁大学获中国语言和文学学士学位。1970—1971 年他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到日本京都大学进修。1972 年他获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孟郊与韩愈的诗》,1972—1973 年他开始执教于母校;1973—1980 年升任为助理教授。1980—1984 年他被聘任为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84—1994 年担任该校中国比较文学教授,1994—1997 年他任哈佛大学欧文·巴比特比较文学教授兼中文教授。

宇文所安除了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外,也阅读其他中国文学作品和现代诗歌。他说他个人兴趣广泛,但主要兴趣是诗,不分国别与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写过《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是一篇有关北岛诗英译的书评,引起了不少读者误解,认为他是以一个中国古典文学学者的身份来批评现代汉诗。后来他在多次访谈中回忆说,其实他那篇文章主要谈到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问题,认为两者属于国家文化和国际文化之间的关系;新诗属于国际文化,是中国作家和其他国家作家平等交流的一种方式。虽然他的态度很客观,很诚恳,但是一些有话语霸权倾向的人仍然对他加以指责。他文章中有这样的两段文字:

> 诺贝尔文学奖在塑造"世界诗歌"方面,尤其在第三世界诗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有趣的角色。诺贝尔奖的光环有时可以是巨大的:它标志着"国际"(也就是西方)的认同,这种认同给获奖者的国家带来荣耀,并且让原本受到很少关注的地方文学暂时成为全球注意力的中心。奖项前面排起长队,人们设想各个国家应该轮流得奖,其逻辑是文学才能应该像联合国的席位一样平均分摊。不过,要说诺贝尔文学奖最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它颁发的对象通常是翻译的作品。当一个诗人得到诺贝尔奖,他的诗的成功翻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获奖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
> 这种希望自己的作品在翻译以后能得到认可的期待,导致了在诗歌写作上使用可替换的字词的压力。传统上,诗的文字依赖于在其特定语言中的使用历史,诗里的每个字应该是不能被别的字替换的。可是,使用"错误的语言"写作的诗人(即便是用像中

文这样有大量人口使用的语言）不仅必须想象他们的诗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求达到其广大程度令诗人感到满意的读者群，而且，他们还必须参与一项奇特的活动：想象出一种世界诗歌，并把自己放置在里面。按道理，“世界诗歌”应该游离于任何地区性的文学史之外，可结果是，它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至于具体到某个国家中产生的“世界诗歌”是哪种现代主义的翻版，要看是哪种殖民文化浪潮率先冲击了当地的知识分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它体现了文化霸权的精髓：一个在本质上是地方性（英—欧）的传统，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有普遍性的传统。①

宇文所安认为“欣赏另一种文化中的传统诗歌需要艰苦的努力”。早在耶鲁大学教授比较文学时他就开始编写《中国文论》（200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由王柏华和陶庆梅翻译的中文版书名为《中国文论：英译与批评》）。此前美国已出版的同类著作有刘若愚（James J. Y. Liu，1926—1986）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y of Literature）和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的《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但是他没有看好他们的编撰形式。他打算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介绍给希望了解非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西方文学学者和初学中国传统文学的学生，为他们在流行的研究方法之外提供一个补充选择。当时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以“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为主流，从参考文献的摘要或节选中提取观念，然后从历史角度考察这些观念的产生和变化。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在“五四”时期已经开始系统整理，作为研究方法导读的“观念史”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特征。读者通过阅读这些原始文献，可能改变对某一部作品的欣赏和接受。宇文所安主张最好从局外人的角度把特定的文学和文化史整合起来，用批评文献的观点来分析作品，看哪些理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为什么出版，为谁出版。“观念史”隐含着一种发展主题，可能在某一情况下发挥作用，因此应该把批评立场放到文化史的大语境中来加以审视。②

---

① 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洪越译，载《新诗评论》总第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批评·中译本序》（王柏华、陶庆梅译），第1—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社，2002年。

《中国文论:英译和批评》是宇文所安为美国大学研究生讲授中国文论时所使用的教材。全书除“导言”外包括正文 11 章,分别为:导言(第 1—16 页);第一章早期文本(第 17—37 页);第二章《诗大序》(第 38—59 页);第三章曹丕《典论·论文》(第 60—76 页);第四章陆机《文赋》(第 77—186 页);第五章刘勰《文心雕龙》(第 187—330 页);第六章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第 331—394 页);第七章诗话(第 395—429 页);第八章严羽《沧浪诗话》(第 430—465 页);第九章通俗诗学:南宋和元(第 466—502 页);第十章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与《诗绎》(第 503—546 页);第十一章叶燮《原诗》(第 547—652 页)。宇文所安的编排方式是一段原文,一段英译,然后对原文进行逐字解读,并对涉及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评述。这样,既扫清了文字障碍,又能深入文本的精彩内容。从以上目录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诗学和代表性文艺批评名著已囊括其中,是一份汉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如果欧美学生用西方的本体论、认识论、审美价值观、意象功能、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英步与韵律规则以及其他表现技巧来解读中国古典诗词是远远不够的。中西文论的研究都是为了充分揭示相关文学作品的潜在价值,因为观察对象、视角和观点不同,结论也可能不同,导致读者的接受或不接受。但是中西文论的共性都是为了消除异质文化的盲点,从这一点来看,最具启迪性和冲击力。

德国汉学家顾彬对宇文所安的印象特别好,他认为在美国汉学家中“宇文所安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①

1982 年,宇文所安应聘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和比较文学系主任。他现在是美国人文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会员,麦伦基金会杰出成就奖获得者。1997 年他任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学院教授,以其汉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获此殊荣。

宇文所安的妻子田晓菲曾任教于柯盖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2000 年应聘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至今。他们都觉得彼此的结合是找到了知音,唯一不同的是,丈夫喜欢唐诗,而妻子却喜欢研究梁朝宫廷文化。

---

① 王寅:《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载《南方周末》2007 年 8 月 14 日。

宇文所安的主要著述和译作有：

《孟郊与韩愈的诗》(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New Haven：Yale，1975 年)。

《枯木》(Deadwood：The Barren Tree from Yu Hsin to Han Yu.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Volume 1，pp. 157-179，No. 2，1979 年)。

《透明度：读田园唐诗》(Transparencies：Reading The T'ang Lyric.HJAS，Volume 39，No. 2，pp. 231—251，1979 年)。

《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年)。

《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经历》(Remembrances：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年)。

《败业：文学史和乐园诗》(Ruined Estates：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Poetry of Eden.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Volume 10，No. 1/2，pp. 21—41，1988 年)。

《地：金陵怀古》(Place：Meditation on the Past at Chin-ling，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50/2，pp. 417—457，December 1990 年)。

《中国文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年)。

《中国文学作品选集：从远古至 1911 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Earliest Times to 1911.New York：W.W.Norton，1996 年)。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hinese'Middle Ages'：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年)。

《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年)。

《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年)。

《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i-lou：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May 1989 年)。

《世界诗歌——评北岛的〈八月夜游人〉》(World Poetry，A Review of Bei Dao's The August Sleepwalker，translated by Bonnie McDougall in New Republic，November 1990 年)。

《情投字合:宋词传统真实的价值》(Meaning the Words:The Genuine as a Value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Song Lyric, in Pauline Yu, ed.,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年)。

《唐代别业诗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Tang Estate Po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55, No. 1, pp. 39—59, 1995 年)。

《诗歌经典的再创造》(Reproduction in the Classic of Poetry. HJAS, Volume 61, No. 2, pp. 287—315, 2001 年)。

《他山的石头记》(Borrowed Stone: Selected Essays of Stephen Owen, Translated by Tian Xiaofei. Nanjing: Jiangsurenmin chubanshe, 2002 年)。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Cambridge:Harvard Asia Center,2006 年)。

《晚唐诗》(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eth Century (827—860).Cambridge:Harvard Asia Center,2006 年)。

《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edited with Kang-yi Sun Chang et al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年)。

(五)为常州今文经学派揭开历史面纱的艾尔曼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1946 年生于德国,襁褓中随父母移居美国。1966—1967 年他就读于夏威夷大学东西方文化中心,1968 年获哈密尔顿学院学士学位。同年夏天他在菲律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流行病学培训后赴泰国,为当地根除疟疾和泰缅边境地区的公共卫生计划服务至 1971 年。1972 年他返美担任纽约州奥农多加的公共卫生官员。据他本人后来的回忆,当时他出国和仕途选择是因为不愿服兵役。1973—1974 年他赴台湾斯坦福汉语中心学习,1976—1977 年转学日本斯坦福日语中心学习。1980 年他师从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东方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科举史和清史。

冷战时期艾尔曼参与了美国对中国国情的调研。1982—1983 年他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助以研究学者身份访问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3—1984 年和 1990—1991 年他获美国富布赖特计划资助在台湾进修,并结婚成家。1983 年和 1994 年他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1991 年冬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

助在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担任研究员。1994 年 9 月他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担任外国客座研究员，2000 年 1 月担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客座研究学者。

1991 年秋艾尔曼获台湾科学委员会资助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教授。1999—2001 年他作为梅隆访问教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院访问教授，2002 年他正式出任该校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1992—1997 年他被聘任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副主任，1997—1999 年任该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92—1999 年他应聘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和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杂志编辑。

艾尔曼的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思想文化史(1000—1900)、中国教育史(1600—1900)、中国科学史(1600—1930)以及中日文化史(1600—1850)。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来华访问的观感和研究经历对于他的中国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剑桥中国史》的编撰思路和美国汉学界部分学者的中国史观。

艾尔曼的研究被称为新文史观的“语境化”手法，是将思想文化史置于相应社会背景中来分析和解读，为的是更充分地理解并揭示其现实价值。他说，一旦思想史的研究与政治史或社会史结合起来，主题就会变得更为丰满，结论会更使人信服。在他看来，过去西方有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几乎都是中国哲学史的同义词，这一局面必须打破。他的研究广及晚清文化、思想、教育和科技史，但是在他的实际操作中，这几个领域却是相互贯通的。

艾尔曼对江苏常州刘庄家族的学术兴趣源于他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他在探讨康梁维新变法的过程中接触到魏源(1794—1857)、龚自珍(1792—1841)及其恩师刘逢禄(1776—1829)和宋翔凤(1779—1860)的资料，于是又联系到清代大学者庄存与(1719—1788)。庄存与是清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倡发挥《公羊传》，宣扬《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但又秉六经为宗，不守门户，唯求致用，动摇了考据学在中国经学传承中的地位，影响到后世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常州学派”(公羊派)。

20 世纪 80 年代初艾尔曼曾经三次到常州进行专访和田野考察，但是收获甚微，原因是宗族和家谱在当时还属于“封建糟粕”。他的《古典主

义、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后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对常州今文经学派的产生和兴盛因素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用当代观点来解读17—18世纪儒学要义实属本末倒置。正确的历史叙事必须遵循两汉经学——宋元理学——乾嘉汉学的脉络。常州学术在乾嘉时代声名远播应该归功于庄存与的奉献,他的思想地位不应该低于魏源和龚自珍。至于为何庄存与及其外孙刘逢禄被遗忘在陈陈相因的故纸堆中,主要是因为庄存与在担任大学士的后期与臭名昭著的宫廷侍卫和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这一时期他撰写的经文流露出对权贵和朝廷的失望。常州庄氏家族、大学者庄存与及其创立的今文经学派,曾经无数次地出现在艾尔曼各个时期的演讲、授课、访谈和论文之中。有些学者认为,如果不是他重笔浓墨地旧事重提,刘庄家族的荣耀将永远被打入冷宫。据说近年来刘庄家族已经重修族谱,特邀远在美洲的艾尔曼为其作序,算是当今汉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2000年艾尔曼出版的《中华帝国后期科举文化史》是一部关于中国文员考试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特点为资料翔实,征引广泛,分析具体,观念前卫,被认为是西方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力作。该书共847页,正文11章,分别为:第一章帝国后期文员考试历史缘由的再思考(第1—65页);第二章帝国权力、文化政治与明初文员考试(第66—124页);第三章帝国后期文员考试的建制动力与精英动员(第125—172页);第四章考场与各朝权力局限(第173—238页);第五章帝国后期文员考试的经典文献与社会层面(第239—294页);第六章情感焦虑、中举梦想与举子生活(第295—370页);第七章文员考试的文化范围与精英的八股文(第371—420页);第八章考官的标准、学人的解读与明清知识控制的局限(第421—460页);第九章文员考试中的自然、历史和汉文化知识(第460—520页);第十章1800年以前清朝统治下的课程改革提速(第521—568页);第十一章非正统化与非经典化:帝国后期文员考试改革的陷阱(第569—627)。艾尔曼利用搜集到的1000多条明和清科举文档揭示1400—1900年间科举制度的利害得失。它牵动着从京师、行省到道府的帝国利益,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明清时期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进学堂成为参加科举的必由之路,对于培育人才,举贤任能发挥了一定作用。虽然乡试和会试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学生答题必须按照八股文格式,严重束缚了士人的思想,但是艾尔曼仍然看到了这种考试制度的积极方面。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通过认真查阅近15年开放的主要科举资料，拙著意在论证中国科举制度并非前现代的时代错误，亦非反现代的巨柱石。传统考试在支持帝国后期的社会结构，使精英士人和商家集团部分通过考试级别证书定位的同时，也满足了明清官僚有效地在文化、社会、政治和教育建设方面的需要。另外，道学（通称"新儒家"——原文如此，下同，译者注）作为公元1300年后举子正统古典文献课程，在帝国后期文化的重建中保证了1905年前精英知识生涯中的宋代道学的长期优势地位。①

艾尔曼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教授，同时兼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教授。近年他主要从事有关晚清科学文化史和18世纪东亚文化交流史（包括中国经典儒学、医学和格致学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的研究。

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

《从哲学到语文学：中华帝国后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年）。

《常州今文经学初探》（The Ch'ang-chou New Text School: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1984年）。

《古典主义、政治和亲属：中华帝国后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年）。

《中华帝国后期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年）。

《1550—1900中国对本国科学的描述》（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年）。

《1600—1900年明清的教育与社会》（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Co-authored with Alexander Woodside, University

① Benjamin A. Elman: *Preface to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xix-xx,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年)。

《儒学再思考:中国、日本、韩国与越南的过去和现在》(Rethinking Confucianism: Past and Present in China,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co-authored with John B. Duncan and Herman Oo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年)。

(六)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对话新途径的安乐哲

1947 年 12 月安乐哲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他父亲是一位侦探小说家,哥哥是英国文学教师。安乐哲曾慕名前往美国南加州雷德兰斯大学学习西方哲学,1966 年以交换生身份到香港新亚书院研修儒家学说,为中国哲学"修身"、"弘道"、"平天下"的思想宏愿所感动。他听过哲学家唐君毅和牟宗三的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那年夏末他又转学至沙田的崇基书院,师从劳思光(Sze-Kwang Lao,1927—)钻研《孟子》。第二年夏季他从香港回到了加拿大。

他在雷德兰斯共用了 13 年时间读完博士学位课程,因为当时西方没有开设中国哲学学位课程的高校。为了能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哲学,1970—1972 年他先去台湾大学学习汉语和哲学学士学位课程,然后才回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读研究生专业。1973—1975 年他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东京教育大学进修,后转学到伦敦大学师从中国哲学翻译大师刘殿爵(Din Cheuk Lau,1921—2010)攻读博士学位。导师对阅读原始文献的要求为安乐哲的中国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如期获得了博士学位。葛瑞汉曾在伦敦大学和夏威夷大学为他授过课,让他学到了很多知识。1978 年他完成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业后,在恩师刘殿爵的推荐下他得到了西方唯一授予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教职。

安乐哲到夏威夷大学后不久就开始了与郝大维合作,前后共翻译和撰写了六部学术专著。他们力图将汉学技巧和方法运用到中国传统哲学的诠释性研究以及哲学经典的翻译中。过去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了解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对《论语》、《中庸》、《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等文献的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解读时常加上西方式的假设,许多译词的选用也不准确。早先中国哲学文献经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才为西方读者所熟知,后来又被置于诗化、神秘化和超自然化(supernaturalization)的模

式之中。20世纪末中国考古发现了一些已失传的哲学文献。在过去几十年中安乐哲和同事们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重译了数种中国经典文献,根据自己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理解和对当代中国发展方向的预测,纠正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思想的错误解读,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对话的新途径。

2006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安乐哲著、彭国翔翻译的《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汇集了他个人有关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许多精彩论述。全书长达665页,正文七章,分别为:第一章导论(第1—164页);第二章认知(第165—252页);第三章自我(第253—431页);第四章性别与身体(第432—491页);第五章社群与政治(第492—571页);第六章古典儒家的死亡观(第572—592页);第七章古典儒家非神论的宗教性(第593—617页)。安乐哲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儒学和道家与西方哲学体系中相同和不同的观点。该书涵盖了道与德、形与体、生与死、本体与超越、伦理与实践等重要论题,深入探讨了如何在社区内外、精神内外、政治内外、宗教内外以及宇宙的不同区域中成就自我的问题。这些不仅是可供西方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儒家和道家长期探索的选题,其最终成果都可以成为人类世界的重要精神财富。该书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多元化的美好世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政治观和宗教信仰背景的人们没有理由不尊重彼此的差异,应该致力于在已有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建设现代社会。各国人民若要构筑一个共生和谐文化的世界,除了彼此交流相互学习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关于该书的选编过程、内容和意义,安乐哲在"序言"中写道:

> 在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中,关于宇宙论,存在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另一种微妙复杂的过程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能够加入到对于超越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一直在进行的内在批判之中,而超越主义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哲学学科之中仍然发生着作用。简言之,随着当前对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尤其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日增,随着在其哲学文化自身内部的成熟,这种新的自然形成的过程哲学的西方版本能够从中国的传统中吸取资源和批评。从其有记载的历史的开端以来,中国的传统就信奉各种形式的过程哲学。
>
> 本书所选编的文字,完成于我学术生涯中不同的时期,为的

是使西方学术界能够了解古典儒家和道家的过程性思维方式的深刻。①

1978年至今安乐哲担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1983—1984年他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1986—1987年任剑桥大学克莱尔·霍尔研究员,199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余东旋杰出客座教授,2001—2002年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第五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教授和第四届蔡元培学术讲座教授,2006年2~7月以富布赖特(Fulbright)学者身份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学。

1990年至今安乐哲应聘担任夏威夷大学和美国东西方中心主任,1991—1999年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92年至今他任《东西方哲学》和《国际中国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主编。此外,他还兼任《亚洲哲学》、《中国哲学学报》、《圣彼得堡东方研究学报》、《道:比较哲学学报》、《国际汉学》和《中国学术》的编委或学术委员。

除了英语外,安乐哲还通晓汉语、法语和日语。他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包括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经典翻译等方面,秦汉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他翻译或与同事合译的中国哲学经典有:《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经》和《中庸》等,曾获得1990—1991年度里真特教学优秀奖和国家人文科学天才奖。基於对中西文化和经典文献的深刻了解,他在翻译用词方面往往采用与通行的译法不同的选择。许多译者对于儒家学说中常用术语的翻译如:"仁"(benevolence/humanity)、"义"(righteousness)、"礼"(ritual/ceremony)、"儒"(Confucianism)、"道"(way)、"无为"(no action)、"无知"(no knowledge)和"无欲"(no disire),在安乐哲的论文中却分别译为"consummate person/conduct"、"appropriateness"、"li"、"ru"、"dao"、"noncoercive action"、"unprincipled knowing"和"objectless desire"。他对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使中国经典的深刻含义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理解。

安乐哲撰写、编辑和翻译了30多部书,在各类学刊发表了许多专著的

① 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彭国翔译),第9—1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章节和论文。他曾任劳特里奇哲学百科全书(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哲学词条编辑。他个人或与他人合作撰写、翻译和编辑的主要作品有:

《孔子哲学思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co-authored with David L.Hal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年)。

《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fare of the Classic Chinese Work of Pilosophy and Strategy, New York: Del Ray, 1993 年)。

《孙膑兵法》(*Sun Pin: The Art of Warfare—A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Chinese Work of Philosophy and Strategy*, co-translated with D.C.Lau, New York, Ballantine, 1996 年)。

《治国之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1994 年)。

《对汉哲学的自我、真理及其在中西文化中超越的思考》(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co-authored with David L.Hal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年)。

《对中国的期待:通过中西文化叙述来思考》(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co-authored with David L.Hal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年)。

《原道》(Tracing Dao to Its Source, co-authored with D.C.Lau, New York: Ballantine, 1998 年)。

《逍遥游》(*Wandering at Ease in the Zhuangzi*, co-edited with David L. Hal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8 年)。

《论语:基于定州手稿的翻译》(*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Dingzhou Manuscripts*, co-translated with Henry Rosemont, Jr., Ballantine Books,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New York, 1998 年)。

《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国民主之希望》(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o-authored with David L.Hall,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年)。

《中庸》(*Focusing the Familiar: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 co-authored with David L.Hall,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年)。

《道德经》(*Dao De Jing: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co-translated with David L.Hall,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2003 年)。

《自我道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

《孝经》(*The Chinese Classic of Family Reverence: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of the Xiaojing,co-translated with Henry Rosemont Jr.,2009 年)。

《儒学的伦理作用:钱穆系列讲座词汇》(*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Ch'ien Mu Lectures Series,2011 年)。

(七)主张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纪文学史宏大叙事的金介甫

金介甫 1969 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地理专业;1971 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77 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和东亚语言博士学位。

1979—1980 年金介甫任哈佛大学历史讲师,1979 年任圣约翰大学助理教授,1986 年升任为副教授,1993 年晋升为教授。他曾先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台湾中研院访问学者、湖南吉首大学荣誉访问教授。他为大学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世界史、东亚史、中华文明史、中美关系史和东亚文学英译;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现代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后儒家世界现代化模式等。

1972 年一位哈佛大学学者向金介甫推荐了沈从文 1943 年创作的小说《边城》。当时他正准备参加一个《从文学资料看中国近代现代史》的研讨会,根据沈从文的文学资料、湘西军阀史料和西方传教士的回忆录,他把沈从文创作的背景与民国史联系起来,被这位中国作家的不平凡经历所感动。后来他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时,就以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道路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

金介甫从资料中了解到沈从文 1924 年开始文学创作,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他是京派小说作家代表,他的小说文字优美,刻画细腻,田园式的描写极富魅力,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影响很大。许多中国作家,像古华、韩少功、贾平凹、阿城和汪曾祺都是他 20 世纪 40 年代的学生。他是中国最早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的少数作家之一,也尝试过将现代派意识流手法用于人物描写。他的一生经历充

满着成功和挫折的故事，1948 年因为与左翼文化界一些位高权重人物的私人恩怨，长期受到歪曲和误解。金介甫经过几年的资料搜集，对沈从文在海外的学生和亲友的访谈和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分析，在数百张资料卡片的基础上，1977 年他顺利完成了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并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79 年金介甫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并把论文目录寄给了他，希望有机会能跟他见面，不久就收到了他的热情回信。1980 年金介甫得到古根海姆研究资助来到北京，得悉沈从文已经调到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正潜心撰写一部题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巨著。金介甫先后与沈从文面对面长谈了 12 次，根据自己带去的 600 多张资料卡片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向他请教。他还访问了卞之琳、冯至、袁可嘉、施蛰存、李健吾、朱光潜、汪曾祺等学者，深化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启示。离开北京后他又到沈从文的故乡湖南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凤凰县考察，走访了当地的居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年沈从文到美国探亲讲学，他们又在耶鲁大学相聚畅谈多时。1981 年夏天金介甫携妻子来中国度蜜月，再次见到了沈从文，文学创作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话题。1986 年时任中国作协主席的王蒙举办了一次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金介甫应邀参加，见到了病中的沈从文。他不知道那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但是彼此的心情都格外沉重。

金介甫用后续研究资料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写成了一部专著，1990 年由北京时事出版社以《沈从文传》为书名出版（符家钦译）。后来多家出版社又先后推出了不同版本的沈从文传记，其中包括：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书名《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邵华强等译，1994）、台湾幼狮出版社（书名《沈从文史诗》，1995）、友谊出版公司（书名《凤凰之子：沈从文传》，2000）、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年）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年），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普遍欢迎。

金介甫认为，沈从文的作品最大的特色是乡土气息和现代主义手法。他在《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中有这样的两段叙述：

> 沈从文的早期作品，除了注意写当代都市生活的痛楚外，还喜欢写他最钟爱的题材——他的故乡。二十年代末期，他已开始

写出一批生动的乡土文学作品。几年之后,他又通过湘西风土人情来表现诸如生与死、爱与欲、永恒与变化等普遍性的问题。最后,他在写乡下人物的喜怒哀乐中,展示了现代中国道德情操的一个侧面。他凭借自己的抒情笔法,使现代中国的白话文扩展了应用范围,担负起文学语言的新任务。

沈从文心目中的现代派,当然是指一种总的倾向,他生长在技术落后的社会,因而从未担心过科学会对人的生存引起坏的效果。他是个泛世界主义者,当然欢迎一切外来的技术,不管这种技术是否已经成为"传统",他要消化这些技术,而现代派却要叫它超越、净化,最后摒弃这种技术。他喜欢自然,反对做作。而且,虽然他意识到是为未来一代人写作,但他并不想通过自己的文艺作品来毁灭历史。他要抓住历史,把历史看成不屈不挠的力量。跟美国南方的现代派人主张一样。如果现代派的本质是用新的语言、新的词汇和语调来理解对象,进行创作(弗雷德里克·卡尔),那么,沈从文写作的意图正是如此。①

金介甫对于中国文学和学术思想发展倾向的关注还体现在他的《中国文学(1949—1999)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一文中。20 世纪 80 年代末,有些西方学者开始把研究中国的重心转向对中国非官方、非专业、非正式、非主流和非传统的出版物和学术倾向的关注,在翻译、介绍、评价和读者导向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心态。这大概是金介甫这一时期把研究焦点定位于中国法制文学和非官方与非主流文学的背景有关。

金介甫在该出版述评中,就以下几个方面纵论了从新中国建立到新千年来临之际海内外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和研究动向,既代表了这一时期他的中国文学发展观,也是一份极具学术价值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地图。现将该述评要点综述如下:

因为新中国被认为已经找到了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途径,毛泽东时代的文学深为北美和欧洲的中国研究者所重视。西方学者除了白之和杜博

① 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符家钦译),第 187—189 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年。

妮(Bonnie McDougall)等人之外并非都严肃对待新中国文学,许多人只是把英译中国文学作为了解中国革命和社会的文献来阅读。蔡梅曦(Meishi Tsai)编辑的文献目录《当代中国长篇和短篇小说(1949—1974)》(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1949—1974)和许芥昱(Kai yu Hsu)与丁望(Ting Wang)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都对新中国文学做了最好的概述。

以短篇小说体裁为主的"伤痕文学"描写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人幸存下来的遭遇,其悲剧基调是前所未有的,此后许多青年作家争相发表作品表达自己对于这一历史阶段一些重要政治问题的不同见解。香港的《七十年代》(后更名为《九十年代》)转载了一些地方刊物上发表的暴露文学引起了国际关注,让西方人感到中国新时期文学关心社会批评远甚于文学价值。北美大学的中国研究学者都能读到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反思文学),也特别关注重返文坛的老一辈作家(如巴金)以及红卫兵出身的作家。金介甫本人编辑的《毛泽东去世后之1978—1981年的中国文学与社会》专章论述了类型小说(浪漫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不同政见与艺术之间的冲突以及官方和民间文学的社会地位。

北岛是朦胧诗诗人的代表。宋祺和闵福德(John Minford)以英汉对照的形式编辑出版的《山上的树》(Trees on the Mountain),主要收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和台湾探索诗人的诗歌,是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和散文的导读。葛里格利·李(Gregory Lee)和约翰·加利(John Cayley)以细腻的语言翻译了多多的超现实主义的诗歌。这类诗歌虽然形式新颖,但西方读者觉得比意象诗更难懂。朦胧诗越是回避对政治的直接评论,越是被指责为孤芳自赏。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中国长篇小说被译成英文,或者拍成电影,受到美国读者和受众的关注。夏威夷大学出版了由翻译家葛浩文编辑的"现代中国小说"丛书;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译丛》推出了不少高质量的英译中国小说;199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出版台湾小说的翻译与研究丛书。北京外文出版社相继出版了《1978—1979年获奖短篇小说》(Prize-winning Stories from China,1978—1979)、《1980—1981年获奖短篇小说》(Prize-wining Stories from China,1980—1981)、《当代七位女作家》(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1949—1989年中国短篇小说》(Best Chinese Stories,1949—1989)、《王蒙选集》(Selected

Works of Wang Meng）以及《时机并未成熟：中国当代优秀作家及其小说》（The Time Is Not Yet Ripe：Contemporary China's Best Writers and Their Stories）。"熊猫丛书"为一些中国作家赢得了国际声誉，如古华、高晓声、茹志鹃、陆文夫、冯骥才、铁凝和张承志。旧金山的中国书刊公司与"熊猫丛书"合作，出版了不少质量上乘的译作。这一时期弗朗西丝·伍德（Frances Wood）翻译的戴厚英小说《石墙》（Stones of the Wall）是后毛泽东时代较早的现代主义小说。张洁是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的《邂逅中国作家》（Encounters with Chinese Writers）一书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她的早期短篇小说表现了对曾处于主流地位的社会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挑战。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小城之恋》（Love in a Small Town）、《荒山之恋》（Love on a Barren Mountain）和《锦绣谷之恋》（Brocade Valley）是中国大陆现代文学中最早触及性描写的作品。张贤亮的创作在性爱、试验和自我升华方面也引人注目。此外，还有韩少功的存在主义和"民族寓言"的寻根小说，莫言通过自然世界怪异化来映衬超现实的作品，以及音乐家作家刘索拉在人物刻画中运用西方式内省的故事。被称为"先锋派"（the Avant-garde）的中国作家，因为作品的实验性常常使人难以卒读，有些作品在知识性和社会性方面都不太符合"先锋"的概念。中国新潮小说好像既逆反于高潮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又抗衡于寻根派，但不乏地方色彩、自然主义、浪漫和喜剧效果，甚至荒诞魅力。

冷战背景曾导致美国汉学家和美籍华人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看成为相互竞争的作品，海峡两岸的普通读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能读到对方作家的作品。侨居美国的中国学人激发出的竞争能量推动了台湾文学作品的创作。刘绍铭编辑的《香火相传：台湾小说选集》（The Unbroken Chain：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继承了原有的文集风格，因精良选材和精湛翻译而引人瞩目。齐邦媛和王秋桂编辑的《玉米田之死》（Death in a Cornfield），收录了本土和移民北美的中国台湾作家的短篇小说。颇受好评的台湾文学英译文集，如多卷本的《当代中国文学：台湾（1949—1974）》（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Taiwan：1949—1974），所收录的大部分是1949年前迁台的大陆作家的作品。美国出版的台湾优秀小说早于大陆作家的作品，台湾文学一度是西方文艺评论家的关注点。由傅静宜（Jeannette Faurot）编辑的《台湾小说》（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很有影响。白先勇是最好的中文小说作家之一，他的小说集《台北人》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Waking from a Dream)以高超的技巧赢得了文学声誉。陈映真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大家,卢西安·米勒(Lucien Miller)翻译的小说集《在家流亡》(Exiles at Home)很好地再现了陈映真的文学成就。从张系国的《棋王》(Chess King)可以看出台湾通俗文学的魅力。20世纪60年代后期台湾"本土主义者"用台湾方言创作了反民族主义的乡土和普罗小说。英译台湾的诗歌对西方的一般读者的影响甚微。帕兰德里(Agela C.Y.Jung Palandri)和贝瑟福(Robert J.Bertholf)翻译的《台湾现代诗歌选集》(Modern Verse from Taiwan)主要收录了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译文优美。后来出版的《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The Isle Full of Noises: Modern Chinese Poetry from Taiwan)由张错(Dominic Cheung)编辑,译文非常流畅。奚密编辑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同时收录了中国大陆和台湾诗人作品。《禁忌的游戏与录影诗》(Forbidden Games & Video Poems)译自台湾诗人杨牧和罗青的诗歌,有些属于后现代主题。年长的文学编辑商禽专写表现超越人、鬼、兽樊篱的超现实主义散文诗。

大多数学者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与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文学相比更接近"五四"文学。萧凤霞的著作《犁沟》重点研究左翼作家,勾勒了从"五四"到毛泽东时代,再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发展路线。由艾伦·魏德默(Ellen Widmer)和王德威编辑的研讨会论文集《20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收录了对中国新小说和新电影的大量精彩评论。奚密的《中国现代诗歌:1917年后的理论与实践》(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受到理论界好评。

金介甫本人在《中国的正义与小说:当代中国的法制与文学》(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 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中,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法制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而不仅仅看成是通俗小说的一种形式。他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文本与法律文本在结构和语体上有类似之处,并且以侦探小说情节为例,比较了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类型建构。美国比较文学已经全面扩大了研究范围,将最新的中国文学也纳入研究视野。张英进编的论文集《多元中心世界中的中国:中国比较文学论集》(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就是一例。近期出版的一批著作探索性更强,更具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色彩,通过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特定主题,与包括晚清文学和"五

四”文学在内的创作联系起来考察。近期出版的对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分析的专著有:耿德华的《改写中文》(Rewriting Chinese)考察了整个20世纪语言的变化,对当代大陆和台湾尤为关注;埃里·哈吉纳(Elly Hagenaar)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识流与自由间接话语》(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揭示了张洁和王蒙等中国作家运用了意识流技巧;刘易斯·斯图尔特·鲁宾逊(Lewis Stewart Robinson)的专著《双刃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Double Edged Sword:Christianity and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论述了“五四”基督教主题和台湾文学。最近一个热点是对“旧体”通俗小说的研究,通过传奇和武侠故事将19—20世纪末的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大陆评论家非常关注当代妇女的社会问题,但最能打动美国读者的可能是关于中国旧家庭体系的作品。虽然离婚和寡居所反映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妇女的健康问题很重要,但职业女性在工作和浪漫的世界里重新界定自我的现代问题的作品却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金介甫还谈到,20世纪从中国大陆、台湾和世界各地移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在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方面冲破了不同流派和学科的藩篱,重新审视了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倡导新的叙事方式和研究方法,对北美学者产生了不可低估对影响。

金介甫的论述全面客观,资料翔实,在综述不同的代表性意见的同时不回避个人的观点和评价,既不刻意通过夸张取悦某些有争议的群体,又很负责任地从历史高度解读容易被曲解的学术现象。他注意到,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华文圈里,当代中国文学都没有像20世纪80年代以前那样重要了。直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出现反映本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宏大文学,正如台湾省没有描写犯罪的小说、香港没有后殖民主义小说一样令人不可理解。但西方将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范围之外的游离成分看成边缘的推进力,是与中华民族精神相背离的。这种倾向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表现,就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扩大的全球叙事。把20世纪末中国独特的文学纳入到一个世纪来的中国文学的宏大叙事肯定是翘首以待之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术界的“区域研究”和人文科学因为被割裂而可能式微,有识之士因此担心文化研究会使他们错失理解中国和美国

自身的机会。①

金介甫1993年曾获圣约翰大学校长杰出成就奖章。2006年他率团参加了在山西太原召开的第十一届中美教育研讨会;2008年率团参加在亨特学院召开的第十二届中美教育研讨。1991—1994年他被聘担任《亚洲研究学刊》助理编辑,2010—2011年他是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研究学者。

金介甫个人或合作撰写、编辑和翻译的主要作品有:

《毛泽东去世后之1978—1981年的中国文学和社会》(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5年)。

《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年)。

《中国现代作家自画像》(Modern Chinese Writers: Self Portrayals. Co-edited with Helmut Martin, M.E.Sharpe, 1992年)。

《不带地图的游客》(Traveller Without a Map. Trans. Hsiao Ch'ien. London: Hutchinson (Random House), 1990年)。

《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Shen Congwen's Vis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lation of Ph.D.thesis, opening chapters abridged,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4年)。

《非至善乐土:沈从文小说集》(Imperfect Paradise: Stories by Shen Congwen. Ed.& main tran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年)。

《〈边城〉译注》(Border Town by Shen Congwen. Trans.& annot. Harper Collins, 2009年)。

《中国刑侦小说:现代中国法制与文学》(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 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符家钦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年)。

---

① 金介甫:《中国文学(1949—1999)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A Bibliographic Survey of Publication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from 1949-1999),查明建译,刊《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4期。原著收入齐邦媛和王德威编辑的《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述评》(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 Bloomin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中国社会主义后期的腐败与现实主义——政治小说的回归》(Corruption and Realism in Late Socialist China: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Nove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年)。

(八)研究北宋士人文化和美学思想的艾朗诺

1966 年艾朗诺(Ronald Egan, 1948—)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学习英国文学,出于好奇偶尔旁听过白先勇讲授的中文课,被深深地吸引。这是他学术生涯中一个至今难忘的片段,他第一次读到的中国古诗竟是唐代诗人王维(701—761)的《鹿柴》。后来白先勇送给他一本《唐诗三百首》,第二年夏天带他到台湾参加暑期班学习时还特别邀请三位台大助教轮流给他上课,从此他与汉语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1971 年他进入哈佛大学专门研修中国文学,导师是大名鼎鼎的海陶玮和方志彤,接受了他们严格的古典文学训练。

1976 年艾朗诺以论文《〈左传〉及先秦叙述形式》(Narritives in Tso Chuan)获得了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博士学位。他的学术领域宽广,多年来一直研究苏轼(1037—1101)与欧阳修(1007—1072)生平及作品、苏轼和黄庭坚的题画诗、宋徽宗和李清照的词、北宋书法理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与士人文化,还有《红楼梦》与《文心雕龙》一类的名著。

1977—1983 年艾朗诺任教于哈佛大学韦斯利学院,兼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执行主编。1987—2005 年他接替白先勇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兼教授,还常常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授课。他曾两次获得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研究资助。

1979 年 4—5 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团访美,他的恩师方志彤与钱钟书原是清华大学的同级同学,就把艾朗诺介绍给了随团参访的钱钟书。那年《管锥编》中文版已经出版,方志彤劝艾朗诺认真读一读,将来有机会不妨把它翻译出来。1993—1998 年艾朗诺除了给学生上课以外,其他时间主要用于研究和翻译钱钟书的《管锥编》,想把这位一生致力于融通中西文化的作者及其著作介绍给西方的英语读者。

《管锥编》是一部用现代观念来审视古典文学、用西方文艺理论来探讨中国文学,然后提出自己见解的专著。翻译时艾朗诺首先选择英语读者

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尽量再现原作所涉论题的广度和深度，保持作者原有的行文风格，并完整翻译所选条目。全书总共有1400多条，艾朗诺选译了其中的65条，但是篇幅上却占到了总量的五分之一。他按照内容把条目分为美学与批评，隐喻、意象与感知心理学，语义学与文学风格学，老子、道教与神秘主义，神与魔，社会与思想等六大类，为的是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好地接受它。

对于艾朗诺来说翻译《管锥编》的困难主要是如何正确体会原作者的写作动机和背景，把握一词一句的真实含义；其次是一丝不苟地对待原作所涉及的宽广知识面，准确转换那些冷僻的典故，疏通那些罕用的独例和孤证；第三是不厌其烦地从陈陈相因的故纸堆中查对引文。原著的体例是随笔、札记和读书笔记，作者大气磅礴，时而上天入地，时而翻江倒海，除了有意回避政治风险外，其他全凭自己丰富知识的金箍棒开路，任由胆小或者大意的读者去揣摩。艾朗诺认为这种文风表现了作者处处绕开曾经遭受过的内心创伤，但是西方委实没有类似的传统或者文本，美国的普通学者更愿意读长篇论文。艾朗诺指出，钱钟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得体地将西方术语、典故、案例和名言以比较文学意识运用于对中国文学的评介之中，把貌合神离或似是而非的文案和纠缠不清的官司轻松了断，最后提出一个皆大欢喜的解读。

1998年艾朗诺翻译的《管锥编》终于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得悉当时钱钟书正病重住院，就马上寄了一本给钱夫人请她转呈致意。他在《管锥编》选译本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位当代中国杰出学者有关文学与思想的随笔，论述精辟独到，但是仅仅在中国国内得到认可，此前非汉语读者尚无缘分享。”

艾朗诺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是是北宋文学。25年来他在研究11世纪两位中国文化巨人欧阳修和苏轼方面作出了成绩。1984年他的《欧阳修的文学作品》按照体裁分类研究，几年后他又对欧阳修的书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撰写的有关苏轼专著《苏轼的一生：言论、形像与行为》内容更全面，从作家、政治活动家、文化理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高度来介绍苏轼，并辟专章分析其书法和绘画。近年来艾朗诺在自己的新作中以“美学转型”的概念和实践来解读北宋的士人文化(literati culture)。

2006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的问题：北宋的美学思想与追求》也是艾朗诺的一部代表作。全书432页，除“引言”和“结论”外正文共六

章,分别为:引言(第1—6页);第一章往事寻踪:欧阳修论碑文(第7—59页);第二章谈诗词的创作(第60—108页);第三章牡丹的魅力:植物题材与花卉之美(第109—161页);第四章苏轼、王诜和米芾一生中的艺术收藏与不足(第162—236页);第五章宋词(一):苦恋(第237—294页);第六章宋词(二):再评——新男性之心声(第295—348页);结论:社会阶级、市场与性别之美学(第349—384页)。

该书是一部有关北宋士人文化和美学思想的文集,聚焦于11世纪中国的全新美学追求:拓片的版本记录(colophons)、以"诗话"(remarks on poetry)形式展开的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牡丹及其他花卉的栽培与鉴赏、艺术品收藏、作为美学和浪漫表达手段的宋词(Song lyric),从欧阳修领导的北宋文学革新运动开始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记述每一时期的进展。各章都可以独立成篇:对文学批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读前三章,对于艺术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则可以选读后三章。

第一章聚焦于欧阳修《集古录》中有关书法鉴赏的论述,但是艾朗诺在书中侧重介绍了欧阳修的碑拓,并具体分析了历史学家、古董商、道学家、鉴赏家、艺术批评家、哲学家和词人的不同观点和态度。道学家喜欢高水准的书法,但是对于从寺庙或道观临摹的拓片却心存疑虑;而欧阳修对于有美学价值碑拓的感情却是复杂的,只强调"不为无益"的收藏。

第二章涉及的《六一诗话》是汉语"诗话"一词的最早出处。该书共收录了21个词条,再现了当时诗评的主导形式,到北宋末期已经先后出现了20~30部诗话。《六一诗话》既谈创作,又谈鉴赏,诸如选词、对偶、押韵和用典,并多次引用了范温的《潜溪诗眼》。艾朗诺认为北宋诗话的盛行原因在于批评家可以不拘泥于孰好孰坏的诗歌评价标准。

第三章涉及花草入诗的美学价值问题。中国古人用竹子、梅花和菊花比喻人的高雅品格,却回避使用过于妖艳的牡丹。欧阳修奉派供职洛阳时深为当地人的牡丹狂热所感动,撰文列出24类牡丹的名称以及相关的当地习俗,深知牡丹种类繁多声名远播不是出于天然而是人工干预的结果。他赞美那些聪明能干的北宋洛阳园艺家深谙嫁接技艺,掌握开辟选种基地、改良土壤,及时浇灌剪枝,消除虫害,最终培育出色彩艳丽的多瓣新品种技术。艾朗诺还注意到周师厚有关洛阳花卉的专论、司马光有关洛阳独乐园的描述、李格非(约1045—1105)在《洛阳名园记》中有关数千奇花异草的记载。

艾朗诺在该书第四章谈到苏轼所记述的王诜(1036—1093)书画收藏室。苏轼曾经告诫王诜不要太专注那些藏品,然而他本人却难以从诗画中自拔。他曾经写过数百篇诗词、题记、信函和专论,谈到了画与诗的关系,以及士人创作的画。苏轼还热衷于在文人雅士中交流艺术品,买入绘画和书法作品,然后又转让出去;他请友人为他作画,后来又将它馈赠他人。他非常不满书画作品的高昂价格,以及富人可以随意购买珍稀书画的特权。他希望直接鉴赏书画作品的精妙独到之处又不为其不必要的情感附加物所累。

艾朗诺然后把笔锋转至同时代艺术评论家米芾(1051—1107)。在著名的《画史》中米芾就艺术价值提出了自己激进的观点:世上的壮举远不如诗画和书法那样流传千古。人们往往淡忘古代英雄,却怀念有作品流传下来的艺术家。在米芾的著述中找不到欧阳修和苏轼在谈及他们收藏时那种"得来恨晚"的怨言。而米芾却往往吹嘘自己如何不遗余力地去收藏佳作,自夸独具慧眼。他声称自己可以从苏轼所怀疑的某公藏品中分辨出无落款的诗画。在其他方面米芾和苏轼的观点却基本相同。艾朗诺认为,对于苏轼来说艺术品的风险不在于是否有教育意义,或者能否净化心灵,而在于有没有以其美学价值使人心驰神往的魅力。

艾朗诺在最后两章谈到宋词的创作和美学价值。欧阳修和苏轼都是宋词大家,宋词是表达爱情、浪漫和情欲的一种文学形式,通过男性作者可以传达女性的美和温情。宋词因晏几道(1030—1106)和周邦彦(1056—1121)等杰出词人的作品而名闻天下,使之成为美学世界对美探索的一种手段。欧阳修本人很好古,他主要用美学语汇进行作品分析。

该书的"引言"篇幅不长,能把各章联成一体的主要依靠"结论"部分艾朗诺所引用的秦观(1049—1100)的观点:智慧与美没有阶级分野,它不可预测地存在于所有社会群体中。这一开放式观点适用于被士人阶层认为"太低俗"无法诉诸笔端的通俗文化和现象的了解。在收藏无名书法家的拓片作品中欧阳修比早先的评论家和理论家更"来者不拒"。他还坚信与牡丹有关的都是通俗文化。宋词被视为大众娱乐的产物,越来越多人只以批判性的眼光来接受它。其中道理可以从"雅俗"中的"俗"字含义的调

节，或者通过对两者界限的模糊或者淡化理解得到印证。①

艾朗诺的夫人陈毓贤女士（Susan Chan Egan），1978—1980年受业于洪业，专攻历史学，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

艾朗诺的主要著述有：

《〈左传〉及先秦叙述形式》（Narritives in Tso Chuan，Harvard Journal of Asitic Studies，Vol. 37 No. 2，pp. 323-352，Dec. 1977年）。

《欧阳修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1007—1072），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年）。

《苏轼的一生：言论、形像与行为》（Word，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年）。

《钱钟书的文论与书信》（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年）。

《美的问题：北宋的美学思想与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年）。

（九）致力于古代中医出土文献的研究和翻译的夏德安

夏德安（Donald John Harper）1950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70—1982年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先后获中文学士、古汉语硕士和博士学位。1983—198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后在科罗拉多大学执教。1990—1999年他加盟亚利桑那大学，1999年起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他教授的课程有：中国的传统人体科学、中国文选阅读、敦煌文书、中国占卜、道教传统和中国古典文献。

他曾任古代中国研究学会主席和《古代中国》（第21～27卷）编辑，现

① Ronald Egan：*The Problem of Beauty：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Ha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September 2006.

任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顾立雅中国古文字研究中心成员。

他的主要学术兴趣为中国古籍研究，尤其关注与古代中医有关的出土文献研究。他在古文献和古文字学方面学养有素，除英语和汉语外，他还精通德文、法文和日文，这有利于他从欧洲及日本汉学中汲取营养。近年他与马克·卡利诺夫斯基（Marc Kalinowski）合作从事“早期中国占卦学”（Comparative Research on Early Chinese Divination Science）项目的比较研究。

1978年夏德安的硕士论文以《淮南子第十篇的翻译和导论》为题，充分表现出他对先秦哲学的兴趣。《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A.D. 180～A.D. 123年）招募宾客集体撰写而成。据考，该书原著21内篇论道，33外篇杂说，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学说融为一体，但主旨却倾向于道家。今本《淮南子》所存21篇系内篇遗稿。第十篇“缪称训”讲的是为君为民的道理。全文41780字，大意是：“道”至高无上，至深无底，所以体道者能进入不衰不乐不喜不怒的境界。如果君主治国合民心，办事顺民意，就能做到君民同德同心。“道”乃万物之先导，“德”系人性之充实，“仁”为恩德的见证，“义”实属迎合众望之大举。圣贤体道而不德，君子非仁义无以德，小人失嗜欲无以活。慈父爱子不图恩报，圣人养民是尽天职。五帝说：没有百姓的拥戴天下哪能太平？世间功成名就者皆得益于天命，循理受顺无不靠民心；言行无常是小人，善于度量人才者方为圣人。把中国古人深奥的治国哲理转换成现代语汇，无论在东方西方都极具教育意义，这大概是夏德安以此撰写自己的硕士论文的原因所在。

夏德安的博士论文题是《五十二病方的翻译和导论》，特显他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医书的学术关注。1974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现的《五十二病方》共计14700字，写在宽达24厘米的半幅帛上，是治疗52种疾病的283种临床医方。该书的成书年代无明确记载，通过对书中复音词（包括音节与语缀）和小篆形制的比较，专家认为可能是战国末期的医方。该书正文中每种病名下分别记载不同的方剂和疗法，从1～30方不等，涉及常见的跌伤、咬伤、伤痉、痈疽、溃烂、肿瘤和肛肠病等外科疾病，癫痫、疟疾、癃病、痉病和淋病等内科疾病，以及儿科、产科、妇科、眼科和五官科病，显示了中国古人对某些病症的认识和治疗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书中记载的240余种药物中有草、谷、菜、木、根、果和花等植物药，

也有兽、禽、鱼和虫部位或干体等动物药，还有雄黄、白矾和水银等矿物药，并记载了有关药物的采集、收藏、炮制和提炼方法，反映了西汉以前中药学的水平。

《五十二病方》所记载的方剂大多是由两味以上药物组成的复方，比起早期人类社会用单种药物治病是一大进步。医者根据疾病的不同类型，调整主药的剂量，体现了早期的辨证论治思想。据对书中283医方的药物配伍、剂型、方剂用法的分析，说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剂学体系已初步形成。根据病人的病情和体质，分别使用丸、饼、曲、酒、汤、散、油膏和药浆等多种剂型，并对草药的煎煮和服用时间、次数、禁忌都作出了说明，看来当时的医疗水准已经远远超越了经验型阶段。

研究并翻译这样一册最古老的中医方书，无论文字、中国历史、文化和医药知识来说都要求很高，对于一位美国学者来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夏德安的专著《古代中国医学文献：马王堆帛书医书研究》是他二十多年来潜心研究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献的成果。该书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183页为"导论"，后半部254页是对出土医方文献的翻译和详细注释。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马王堆医书；马王堆方书和文稿目录；与医学有关的出土文献；出处与释经问题。

第二部分：中药；医书；医生；处方、技术、计算、艺术；读者群与传播。

第三部分：医疗思想与实践；疾病；生理学；治疗；药品。

第四部分：长寿养生；思想背景；灵与肉；技术；哲学与长寿养生。

第五部分：巫术；神方；各种巫术。

翻译部分：《11脉灸经》、《经络图》、《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谷食气》、《引导图题记》、《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符箓》、《天下至道谈》。

夏德安根据1985年北京出版的马王堆帛书医书影印本进行英译，是各类外语译本中最全、注释最详尽的版本。他还对于原书转写文本进行了认真校订，"引论"高屋建瓴，译文简洁清晰，非汉学读者都可以读懂。

学术界认为中医中药体系成型于以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为标志的医药文献。夏德安把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医书的研究与近几十年来从张家山、云梦、武威和包山等地出土的文献结合起来，揭示中医在其发展初期阶段与巫术神秘主义的关系。但是中国早期的医治观念出

现在针灸应用之前，也不存在周易阴阳五行理论的痕迹，更有别于《黄帝内经》式的理性分析。

夏德安是一位学养有素的美国汉学家，他的博士论文《五十二病方的翻译与导论》曾涉及药剂、外科和驱邪等治疗手段，此后他又研究养生和《黄帝内经》中的问卜，帮助读者了解传统中医中有关“经脉”和“气”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古代中国医学文献：马王堆帛书医书研究》撰写非常得心应手的原因。他翻译和注释先秦出土文献牵涉到中国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植物学、神话学、生物学、生理学和药物学等领域的知识，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和语言学养是无法胜任这样艰难的翻译工作的。

他的代表著述有：

《淮南子第十篇的翻译和导论》(Huai Nan Tzu Chapter10: Translation and Prolegome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8 年)。

《五十二病方的翻译和导论》(The Wu Shih Erh Ping Fang: Translation and Prolegomena,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1982 年)。

《古代中国医学文献：马王堆帛书医书研究》(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7 年)。

(十)先秦文化史、考古学和经学专家夏含夷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 1952 年生于宾夕法尼亚赛维克利。1970 年进入圣母大学主修神学。1974 年毕业以后曾在台湾进修三年，拜爱新觉罗·毓鋆为师，学习《老子》、《庄子》和《周易》。1978 年返美后入斯坦福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修东亚语言。1980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倪德卫教授指导下研修中国古代文化。他原计划以《周易》为选题撰写博士论文，但是导师对《周易》没有兴趣，却对甲骨文情有独钟。他便开始研究甲骨卜辞，慢慢地认识到历史和语言问题比哲学更有吸引力。1983 年他获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周易〉的编纂》，是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国古籍的一篇论文。

1985 年夏含夷受聘为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助理教授，1997 年升任为顾立雅中国古史名誉教授。他现在担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顾立雅讲座教授,兼任期刊《古代中国》(Early China)主编。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时期。湖南长沙马王堆考古新发现推动了各类学术会议的召开,中国改革开放扩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规模,改变了长期封锁闭塞的状况。参加断代工程的讨论,以及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接待参加大都会青铜器展览研讨会的中国学者代表团,对于夏含夷和他的同事们来说都是重要的学术活动。2000年他与北京大学李零等学者一起研读郭店《缁衣》,引起了他对古书篇章结构的兴趣。

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史异观》是夏含夷各个时期撰写的论文自选集,共收录文章29篇,其中15篇讨论甲骨文和金文,另13篇主要论述《周易》、《诗经》、《尚书》和《竹书纪年》,以及与王家台《归藏》和阜阳《周易》有关的古文字资料问题。这反映了在过去30年中他研究中国文化和典籍的轨迹,不但在选题上受到导师爱新觉罗·毓鋆和倪德卫的影响,而且在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上也深得导师真传。

《古史异观》中有多篇论文涉及中国上古年代的推定和考证。如:《殷虚卜辞的微细断代法:以武丁时代的一次战役为例》(第19—39页)、《商王武丁的末期:中国上古年代学的重构实验》(第40—81页)、《西周朝代的绝对年代》(第131—190页)、《父不父,子不子:试论西周中期询簋和师酉簋的断代》(第201—204页)、《测定多友鼎的年代》(第221—225页)、《此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年代考》(第226—245页)、《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第246—257页)、《上博新获大祝追鼎对西周断代研究的意义》(第258—262页)、《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两件吴逑鼎的年代》(第263—269页)、《略论今文〈尚书〉周书各篇的著作年代》(第320—326页)、《〈竹书纪年〉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第378—394页)。夏含夷根据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参照现代天文学和其他文献的信息,进行对比、互证和判定。是否科学无误,是否能得到多数专家认可,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作为一家之言有其独到之处。

1985年夏含夷在阅读《竹书纪年》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错简,引起了他的兴趣,写了《也谈周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一文。① 2000年他研究郭店《缁衣》时,也发现战国写本与流传的《礼记》本《缁衣》的次序不同,再次引起他对古书篇章结构的兴趣,后来便提出了

① 夏含夷:《古史异观》,第3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的想法。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黄晓峰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向他求证中国历史学家李学勤所提倡的"重写中国学术"与他所倡导的"重写中国古代文献"有何不同时,他回答说:"李先生所说的重写是广义的,就是要重新考虑、重新改写中国古代学术。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的证据、资料,可以重新写作一段历史。我所说的'重写中国古代文献',是直接的意义,就是重新写一遍、写两遍。"①

夏含夷在美国研究中国竹帛、甲骨文、铭文和古籍的学者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学养有素,治学严谨,思想活跃。虽然他的一些观点与中国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否有政治背景和学术道德问题,但因为他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而得到尊重。他对于当前中西方学术交流中的一些现象曾经诚恳地提出过批评,值得深思。例如他在一次学术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

> 这种偏见纠缠不休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我们的中国同行,他们离其研究领域太近,在里面陷得太深,也太沙文主义,以至无法保持学术上的客观。但学术可以有不同目标,这是理所当然,客观性并不是唯一标准,对谁都适用。虽然这些不同的目标,相关的推论和运用的方法,全都可争可议,但我们最好还是达成默契,即争论决不应激化到剑拔弩张或堕落为相互攻击。
>
> 我发现,有些西方汉学家,很多西方汉学家,他们中的有些人有一种态度,就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只是一堆有待开发的原始材料,就是认为我们的中国同行没法解释它。除去懒惰无为或语言不灵,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在中国研究的很多领域,为什么汉学家总是不提中国学者对材料的进一步研究(诸位凡是读过《哈佛亚洲学报》书评栏的人恐怕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注脚和书目中,你们几曾见过它们引用的都是中文原作,而不是用西文写成的重新分析过的作品,或者偶尔引用的日文研究成果?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说。我想说的仅仅是,如果我们成心跟我们的中国同行过不去,不管他们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都

① 黄晓峰:《夏含夷谈中国历史研究》,载《东方早报》2009年7月19日。

不会使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有光，也不会使我们的学术界脸上有光。我们要想让我们的研究和观点立于不败之地，就一定得相互学习，取长补短。①

在与《东方早报》记者黄晓峰的一次访谈中夏含夷语重心长地说：

这三十年来，中西方的交流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很多分歧和误解。应当说，中国学者的爱国和民族主义，这是很自然的事，是不能避免的。现在很多中国学者都到国外去，对国外的学说和文物都有兴趣，经常到国外去参观博物馆，跟国外的学者交流。我觉得三十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怪中国学者，因为他们那时是被封闭的。当然，西方汉学家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是国际人物，所以没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所以很客观，这其实是另一种偏见。他们有时欺负或鄙视中国学者的民族情绪。我希望双方能越来越接近、了解，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②

关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中西学者在史学交流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因为观点和角度不同，笔墨官司经常现诸笔端。对此，夏含夷就自己的体会，归纳出五点参照标准：第一，中外对比的史料要从同期史实中采集，对号入座，不能拿晚期的史料讲早期的历史；第二，进行中外史学对比时要在地理上对“中国”的概念进行严格界定，因为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疆域和组成成分存在变化的情况；第三，中国史前时期的传说须经考古学的验证，不能把传说当史证；第四，后期中国文献的有效性大于早期文献，早期文献属于考古学者的天下；第五，考古不应该受历史文献的束缚，研究者的眼光应高于文本。③

夏含夷的学术研究范围为西周和战国文化史、古文字学、经学和《周易》，主要著作有：

---

① 夏含夷：《知之好之乐之》（李零译），载《中国学术》2000年第2期。

② 黄晓峰：《夏含夷谈中国历史研究》，载《东方早报》2009年7月19日。

③ 李梓童、胡艳阳：《何谓“中中学问”，中国何时变成“中国”》，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论坛学术之窗，2011年11月21日。

《小屯南地甲骨文索引》(A Concordance of the Xiaotun Nandi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with Cai Fangpei and James F.Shaughnessy.Jr., Early China Special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One, Chicago, July 1988 年)。

《礼仪与敬仰: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画廊的中国艺术》(Ritual and Reverence: Chinese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mart Gallery, 1989 年)。

《西周史料:青铜器铭文》(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年)。

《易经:马王堆帛书〈易经〉第一英文译本》(I Ching: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Second Century B. C. Mawangdui Manuscript. New York: Ballantine Press, 1997 年)。

《中国古代史新史料:铭文和手稿导读》(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97 年)。

《孔子之前:中国经典创建之研究》(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年)。

《剑桥中国古代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o-edited with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年)。

《中国:帝国与文明》(China: Empire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年)。

《中国:天龙之国》,(China: the Land of Heavenly Dragon, London: Duncan Baird, 2000 年)。

《古代中国:生活、神话和艺术》(Ancient China: Life, Myth and Art. London: Duncan Baird Publishers 2005 年)。

《重写中国古代文本》(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年)。

《中国智慧: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大师的哲学远见》(Chinese Wisdom: Philosophical Insights from Confucius, Mencius, Laozi, Zhuangzi and Other Masters. London: Duncan Baird Publishers, 2010 年)。

《〈周易〉"元亨利贞"新解——兼论周代习贞习惯与〈周易〉卦爻辞的形成》(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Phrase "Yuan heng li zhen" in the Zhou Changes: Together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Practice of Repeat Divination in the

Zhou Period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Hexagram and Line Statements of the Zhou Changes, in Studies of the Zhou Changes. 5:3-15. 2010 年)。

《由眉县单氏家族铜器再论膳夫克铜器的年代:附带再论晋侯苏编钟的年代》(A New Discussion of the Dates of the Shanfuke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ixian Shan Family Bronzes: With an Appended Renewed Discussion of the Date of the Jin Hou Su Bell Set, in Collected Paper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Ancient Chinese Bronze Vessels edited by Shanghai Musium and the Museum of Hong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p. 165—78. 2010 年)。

《中国最早的书写符号》(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in China, in Visible Language: Inventions of Writing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 and Beyond,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2010, pp. 215—24. 2010 年)。

《再说〈系辞〉干专直坤翕辟》(Once again on the Appended Statements' Qian's being curled and straight, Kun's being closed and open, Wenshi 91, pp. 273—75. 2010 年)。

《呼之欲出的形像:卜诗与诗卜》(Arousing Images: The Poetry of Divination and the Divination of Poetry, in Div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igns in the Ancient World, ed. Amar Annus. Oriental Institute Seminars 6,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p. 61—75. 2010 年)。

《从出土文字数据看〈周易〉的编纂》(Looking a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 Changes on the Basis of Excavated Written Materials, in 2009 New Hermeneutics on the Zhou Changes Classic and Commentary Texts, ed. Zheng Jixiong, Taipe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34—49. 2010 年)。

《"兴"与"象":简论占卜和诗歌的关系及其对〈诗经〉和〈周易〉的形成之影响》("Arousal" and "Image": A Simpl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ination and Song and of its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 and the Zhou Changes, Luojia Forum 6, 71—89. 2011 年)。

《阜阳汉简〈周易〉简册形制及书写格式之蠡测》(Estimating the Nature and Written Form of the Fuyang Zhou Changes Bamboo-Strips, Bamboo and Silk 6, 2011 年)。

《从作册吴盉再看周穆王在位年数及年代问题》(From the Zuoce Wu he Looking Once again at the Length of Reign and Dates of King Mu of

Zhou, in Zhu Fenghan ed., Newly Appearing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Western Zhou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pp. 71—78. 2011 年)。

《中国历史与铭刻》(History and Inscriptions, China,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ume 1: Beginnings to AD 600, General Editor Daniel Woolf, Volume Editors Andrew Feldherr and Grant Har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71—393. 2011 年)。

《谜底揭示:竹书纪年,古代年代学》(Of Riddles and Recoveries: The Bamboo Annals, Ancient Chronology, and the Work of David Niviso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2: 269~290. 2011 年)。

(十一)潜心研究中国史学和古典文学的史嘉柏

史嘉柏(David Copley Schaberg, 1964—　)1984 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去台湾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1996 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历史学基础:〈左传〉和〈国语〉中的文学性表现》,通过研究汉籍探讨有关中国史学问题。

多年来他潜心研究中国史学和古典文学,希望把更多中国典籍介绍给美国读者。他先后出版过多部著作,还与他人合作翻译《尚书》、《春秋》和《国语》,因此荣获中国古代史研究最佳图书奖。2003 年他以《左传》和《国语》为例研究《模式化的过去:中国古代史的形式与思想》,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列文森大奖。该书对《左传》和《国语》的修辞和叙述方式及其思想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求对这两部著作所记载的公元前四世纪的历史事实的准确了解。

关于中国史学的文学性问题,史嘉柏在一次接受美国《侨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史学文献非常强调作者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例如东晋后期诗人陶渊明虽然已经辞官归隐山林,但在他的作品中依然表现出与山野农夫之间思想感情的息息相通。相比之下,西方史学文学自古以来更多强调个人活动,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女诗人迪金森(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1830—1886),在与世隔绝的生活空间中却能创作出极富想象力的诗歌作品。①

① 徐燕:《中国印象系列(12):访史嘉柏》,载美国《侨报》2006 年 1 月"南加焦点"版。

2005年史嘉柏接替了包瑞嘉(Richard Baum)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所担任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一职。

史嘉柏的主要著述有:

《中国历史学基础:〈左传〉和〈国语〉中的文学性表现》(Foundation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in Zuo zhuan and Guoyu, Harvard University, 1996年)。

《模式化的过去:中国古代史的形式与思想》(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年)。

(十二)研究科技对中国妇女性别规则与角色塑造的白馥兰

白馥兰(Francesca Bray)197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汉学系,1976年获硕士学位,1986年获剑桥大学人类社会学博士学位。

她最初的学术兴趣是中国农业、科技和医疗卫生史,曾在马来西亚吉兰丹进行了一年的民族文化学田野调查,向当地农民了解如何应对绿色革命技术的挑战。近几年她的学术兴趣转向日常技术的宏观和微观对策(包括粮食、住房、交通和卫生),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发展研究和科技社会专家开展项目合作。

1973—1982年她任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研究助理,1982—1984年任李约瑟研究所利弗修姆研究员,1985—1987年任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86年曾以人类学家身份访问了韩国,1988—1993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1994—1996年任曼彻斯特大学韦尔柯姆医学史高级研究员,1993年应聘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教授。2005年她加盟爱丁堡大学,其间还到中国大陆和台湾、马来西亚以及加利福尼亚开展田野调查和查阅档案资料。

白馥兰在《技术与性别:中华帝国后期的权力结构》一书中明确提出:1800年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亚洲国家的经济技术日渐落后,但是在1600年以前有些亚洲国家比欧洲先进得多,中国就是其中之一。白馥兰通过考察中国妇女在宋代至清代技术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说明中国妇女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纺纱织布和生儿育女的角色,也是技术发展、经济变革、文化创造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她反对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

会和经济发展，认为她们不应该成为君权、父权和夫权的牺牲品。她把妇女写进了科技史，就中国妇女作为遭受家长制压迫受害者的问题，以及中华帝国后期妇女的工作和养育子女的角色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女性技术”(gynotechnics)的概念，以此开创一个探讨社会如何把道德和社交原则转化为物质形式和身体力行的网络。该书曾获1999年科技史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德克斯特奖。

一位名为李德·泰勒的读者在一篇书评中写道：

> 白馥兰在《技术与性别：中华帝国后期的权力结构》的“引论”中浓笔重墨地对自己的研究加以归纳。她谈到参观博物馆的人因为不许触摸所看到的古代工具和家具而感到十分沮丧。如果他们能把玩片刻，必定在接触那些家庭用品时对于古代生活方式会产生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
>
> 这里说的正是白馥兰所写的历史。她通过对当时较为时新的技术向我们演示了生活在那个时期(1000—1800)的感觉。这类安排和创造生存技艺的定义较为宽泛。她赋予了日常的纺织、农耕、生儿育女(当时人们的实际生活)的观念和工具明确无误的价值。该书的第三部分“母亲身份的意义：生育科技及其功用”包含了许多细节和非结论性要点，聚焦于妇德和妇道。当年的医疗、道德和经济思想，以别开生面的方式与她在开篇叙述的枯燥乏味的事实形成有趣的补充和对照。
>
> 该书不像王先生或者波梅兰兹近期出版的经济史。虽然王与波两位的著作属于宏观对比史(comparative macro-history)，而白馥兰的著作却是一部奇妙无比的微观汉学史(Sinological micro-history)。她的结构说明、工具以及织布机示意图细节，为像我这样的读者提供了一种在看到该书之前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忽视把图示与人的平视细节联系起来的能力。①

白馥兰迪主要著述有：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农业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① Read Taylor: *History As People Lived It, Not Just A Stage For The Elite*, November 30, 2000.

Volume VI Part 2: Agriculture, p. 74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年)。

《稻作经济:亚洲社会的技术与发展》(The Rice Economies: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 p. 250,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6 年)。

《技术与性别:中华帝国后期的权力结构》(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41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年)。

《明代的技术与社会》(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 p. 87,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Society and Culture, pamphlet series no. 1, AHA, Washington D.C., 2000 年)。

《中华帝国后期的工艺学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 Essay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Osiris 13, 11-33, 2000 年)。

《转基因商品对我们有益吗? 人类学家能为这场辩论做些什么?》(Are GMOs Good For Us? What Anthropologists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bate, General Anthropology 8, 2001 年)。

《中国科学(卷 2)》(Karine Chemla, Francesca Bray, Fu Daiwie, Huang Yi-Long and Georges Métailié (eds), Le scienze in Cina, vol. II in Sandro Petruccioli (ed), Enciclopedia della historia della scienza, Roma, Istituto Treccani, 2001 年)。

第六章
华人学者对美国汉学发展的持久贡献

史载早在1820年就有一位华人移居美国，但是大批华人移民美国却是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由于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Gold Rush）和贯穿美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的建设急需技术人才和劳力，1868年美国和清政府签订了《中美通商条约》，为他们来华招聘人才提供了法律依据。华人移民序幕的开启，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人才、文化和技术交流高潮的到来。

1877年美国经济进入低谷后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排华浪潮，导致了国会《排华法案》的通过。20世纪50年代美国排华移民法解禁之后，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留学定居的人数有所增加。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夏威夷、马萨诸塞、马里兰、新泽西、得克萨斯、伊利诺伊和华盛顿等州，都有许多华人。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休斯敦、西雅图和波特兰等城市的繁华唐人街，不仅是当地华人购买生活用品和食品的去处，更是他们学习中华文化、参加汉语培训和文娱活动，展示他们生命品质的橱窗。汉语在美国已成为除英语和西班牙语之外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据统计，2011年全美已经有5000多所大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生人数超过了20万。

总体来说，美国华人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个族群。华人华侨的历史存在和美国人文环境中的中华文化传播，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不仅拓展了美国社会和学术领域的文化架构，丰富了人文学科环境，还为美国各个时期的汉学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学术资源，为美国汉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美国汉学发展史上有一支庞大的华裔学者队伍，与东亚和西欧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一起加盟美国汉学家的行列。1879年戈鲲化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此后便不断有华人学者在美国从事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陈绶颐、赵元任、洪业、林语堂、萧公权、陈荣捷、李方

桂、杜联喆、邓嗣禹、柳无忌、房兆楹、杨联陞、何炳棣、柳存仁、黄仁宇、余英时、张光直、梅祖麟、钱存训等,都是华人学者中的佼佼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更多中国人文学科学者相继在不同高校执教或在研究机构著书立说,向美国学子传授中国史学、文学、语言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知识,推动美国汉学研究的发展。例如艾朗诺的启蒙老师白先勇(1937—),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海陶玮,曾任教于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宋史专家刘子健(James T.C.Liu,1919—1993)和方志彤,都是这一时期为美国汉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做过重要贡献的中国学者。在哈佛大学等高校深造的徐中约、余英时和周策纵等学者也师从美国汉学家攻读学位课程,是二战以后从港台到美国汉学界发展的代表人物。

由于语言、社会背景、专业素养和对象定位的不同,多数美国学者习惯于从美国角度去考察问题,按照西方的学术思路去解读汉学史料,因此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既可能有别于中国学者的见解,也可能偏离汉籍文本所传递的真实信息。许多华人学者饱读汉籍,又掌握了现代学术研究方法,长期参与美国各项课题研究或者课堂教学,注重联系实际的学科领域的拓展。他们中有些人在汉学文献的编译中担当了重要角色,有些人同美国同事一起致力于汉学教学所需的教材和工具书的编写,有些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和所在学校的学术优势建议设置特色课程,更多华人学者则在重大汉学工程中帮助学术把关和方向定位,纠正理解和表达方面的失误。一些中国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家,根据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案的要求,帮助美国各大图书馆采购近现代中国的报刊、文献和出版物,在中国图书市场搜集古籍善本,扩大特藏。他们在研究中所揭示出来的问题,有助于激发同事的新思路,对美国汉学研究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批中国大陆学者加入了美国汉学研究团队,从世界各地前往美国的华裔学者人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过去的30年中他们为美国的汉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美籍华裔专业人士返回中国,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中国学子到美国深造,"来来往往"成为人才流动的一种模式。2010年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PI)根据当年社会调查和国土安全部的统计推算,美国华人总数已达430万。华人学者的加盟进一步改善了美国汉学的研究和教学生态。

一般来说,参与汉学研究必须具备的基本专业条件是:一、能熟练掌握汉语和母语或第二种语言,最好还熟悉一种或多种中国方言以及少民族语

言；二、较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习俗和传统，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三、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对比知识和文化交流知识。第三代以后的美籍华人学者知识层次普遍比较高，也更专业化，为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第五代华人移民中具有大陆背景者越来越多。他们长期生活在中西文化生态之中，深谙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和思想系统，多数人在投入汉学研究过程中能超越语言、政治或者文化障碍，娴熟地调动专业理论，运用一种或多种研究、考察、对比、分析和解读手段，并专业地运用评价参照系统。这就是他们当中许多人能取得高水准的研究成果的有利条件。

一、考据学、文本研究和中古音韵学专家赵元任

赵元任字宣仲、宣重，1892 年 11 月 3 日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人家，祖籍江苏。1900 年他回到老家常州青果巷上家塾二中，14 岁时就读于常州溪山小学。1907 年他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学习，成绩优异。

1909 年他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1910 年以清华游美学务处选送的第二批留学生身份进入了康奈尔大学研习数学，1914 年获理学学士学位。1915 年他进入哈佛大学研修哲学，经常向音乐教授希尔（E.B.Hill）和斯帕尔丁（W.R.Spaulding）求教。1918 年他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深造。1919 年他回到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 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教师，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来华讲学担任翻译。在清华期间，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1921 年赵元任携夫人赴美，在哈佛大学研修语言学，之后应聘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和中文教授。三年后他返回清华任教于国学院，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集工作。

1954 年赵元任加入了美国籍，开始任教于耶鲁大学，同时兼授夏威夷大学的中国音乐课。五年后他又回哈佛大学任外国语言特训班中文部主任，参加哈佛—燕京学社《汉英大辞典》的编辑工作，兼任密歇根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1945 年他被聘任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46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发电报邀请赵元任回国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以

“一心只想做好自己所承担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学工作”为由婉拒了国内邀请。1952年他荣任阿加细东方语言教授(Agassiz Professsor of Oriental Langueges)。1959年他曾到台湾大学讲学,第二年被推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65年他退休后任讲座教授。

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建树使他闻名于国内外教育界。1934年他发表了《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一文,曾获得广泛的好评。后来他在另一篇论文《一套标调的字母》中提出了“五度标调法”,被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于标识汉语声调。除了汉语和英语外,他还通晓德语、法语、日语、俄语和30多种汉语方言,并能认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对于音位学、音韵学、汉语方言和语法都有独到的研究。他在语音学方面的造诣使他能从物理学、生物学和声学的角度分析语音形成的科学原理和生理机制,便于学习者的理解和接受。这种语音学解读手段不仅可以应用于教学,也适用于录音、电话、电脑和媒体语音设置的构建和调试。

大约在1915年他就曾写过《中西星名考》和《生物界物质与能力代谢之比较》等极具独立见解的论文。1925年6月他应聘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先后讲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与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29年6月他接受中研院的邀请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为清华中国文学系讲授音韵学等课程。他的门生遍布世界各地,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1900—1986)、朱德熙(1920—1992)和吕叔湘(1904—1998)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音乐创作和研究是赵元任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父母皆通音律,他自幼受到音乐熏陶,在南京上中学时就开始学钢琴。他调查方言时曾接触许多民歌民谣和其他民间音乐。1915年他发表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后来陆续谱写了约100多首作品,分别以《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1934)、《晓庄歌曲集》(1936)、《民众教育歌曲》(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结集出版。他还给新诗谱曲,为中国音乐开辟了发展新方向。他的不少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和民主倾向,他的歌曲《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听雨》、《呜呼三月一十八》、《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以及合唱《海韵》等都体现了艺术上的创新。他善于吸收民族音乐的营养,也能

把西洋音乐的元素与中国传统风格结合起来，因此他的许多作品既有典型的中国风格，又符合时代的潮流。他一生共创作了歌曲 132 首歌曲，钢琴曲 100 余首。

1973 年 5 月，赵元任夫妇携女婿迈克和外孙女昭波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宾主畅谈了文字改革等共同关心的问题。郭沫若（1892—1978）、刘西尧（1916—　）、吴有训（1897—1977）、竺可桢（1890—1974）和黎锦熙（1890—1978）等部门首长和旧友也参加了会见。1981 年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邀请，携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回国访问，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1904—1997）的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胡适（1891—1962）对于赵元任曾经有这样的评价："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此君……治哲学、物理、算学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此人好学深思，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待，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①

赵元任的主要语言学著作有：

《国语新诗韵》（1923 年）。

《现代吴语的研究》（Wu Dialects，1926 年）。

《新诗歌集·序》（1928 年）。

《粤语入门》（Cantonese Primer，1947 年）。

《简明中国话辞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Co-edited with Yang Lien-sha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年）。

《中国话的读物》（Mandarin Primer：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年）。

《语言问题》（1959 年）。

《中国话的文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年）。

《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Aspects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1976 年）。

《通字方案》（General Chinese，1979 年）。

---

① 胡适：《胡适日记》（1916 年 1 月 26 日），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年。

二、以中国史学和文献研究蜚声海内外的洪业

洪业，号煨莲，谱名正继，字鹿芩，祖籍福建侯官。年幼时勤奋好学，曾寄读福州南郊外祖林氏家塾，学习《四书》、《五经》和《尔雅》等经文。1904年他跟随为官的父亲移居山东，读过不少诗词文赋。1908年他考入山东师范附属中学，数、理、化和英语各科成绩均优。青年时代他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决心报效国家。1909年他乘船到上海报考海军，因为误了船期失去了应试机会，便投靠父亲的好友高梦旦。高先生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室，劝他学习洋务。

1910年洪业就读于鹤龄英华书院，皈依了基督教。因学业成绩优异，1915年他获得书院董事克劳弗德（Hanford Crawford，1839—1860）的资助赴美深造，191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0年他在该校协和神学院完成了神学学士学业。1920—1922年他应几家演说团体的邀请，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说，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获得了美国许多友好人士的同情与声援，一些地方报刊都以醒目版面作了报导。

1922年燕京大学校长赴美，邀请洪业回国执教，他欣然应允。这一期间他利用从美国募集来的款项扩大校园建设，从原来位于北京城东南的旧校址迁移到城西郊的新校址，使燕京大学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因为他在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造诣，曾先后担任过燕京大学文理科学院教务长、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还创办了《燕京学报》。1924年洪业以燕大代表身份成功地与美方校董商洽创办哈佛—燕京学社，以扩大中国和远东文化的研究。

1928年洪业受聘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1930年回国后他在燕京大学主持文科研究所，同时创办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从1930年秋开始，仅凭十余人的努力，先后编纂并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类古籍引得，包括正刊41种，特刊23种，合计64种81册。他曾创制一种图书号码排检法（中国字庋撷法），为此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本部的专项拨款。此外，他还制定了《引得编纂手续纲要》，具体规定从选题到出书的十个环节：选书、选本、钩标、抄片、校片、编号、稿本、格式、校印、撰序。实践证明该程序行之有效。他曾为引得作序十余篇，其中多数属于专门论述，或者说是以“引得序言”的形式发表的专论，如：《读史年表附引得序》、《白虎通引得

序》、《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序》、《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礼记引得序》长达数万言，是一篇学养深厚的两汉礼学源流考，1937 年荣获巴黎铭文学院儒莲奖。

洪业在燕京大学任图书馆馆长期间，大力整顿加强了图书馆工作，制定了图书馆管理细则，增编并刊印了查书目录，采购国内外新出版的书刊以及明、清史志等善本图书，将一个仅有 20 万册藏书的图书馆扩大为藏书 60 万册的大馆，形成了适合全校文、理、法各专业的文献库，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没有电脑检索的年代，引得作为图书馆的工具书为历届师生查找资料、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方便。

1941 年他遭日军关押，但不失民族气节，敢于据理抗争。1942 年获释后仍然受到监视，直至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才得以返校任职。1946 年他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讲学，任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内战爆发后他继续留居美国。1948—1968 年他指导过许多博士研究生，但直至退休他也未能获得教授资格。1980 年 12 月 22 日他在美国去世。

洪业是国际史学专家和教育家，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和中美学术交流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在图书馆管理、工具书编写和索引研究等方面享誉国内外。他治学有方，文思敏捷，笔耕不辍，撰论著述 70 多部（篇），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在学术上他深受胡适和顾颉刚（1893—1980）等学者的影响，力求充分利用史料，以严谨学风进行专题考证，开拓了宽广的学术阵地。鉴于洪业的学术造诣，1933 年美国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1940 年又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他的主要著述有：

《引得说》（Indexing to Chinese Books，1930 年）。

《勺园图录考》（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 年）。

《清画传辑佚三种》（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 年）。

《考利玛窦之世界地图》（载《禹贡》第五卷第三、四合期，1936 年）。

《礼记引得序》（载《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三期，1936 年）。

《春秋经传引得序》（载《引得特刊》第 12 号，1937 年）。

《杜诗引得序》（1940 年）。

《〈蒙古秘史〉源流考》（载《哈佛亚洲学志》第十四卷第三、四期合刊，1951 年）。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 年）。

《破斧》(台湾《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56年)。

《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等。

三、长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林语堂

林语堂乳名和乐,大名玉堂,1895年10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坂仔村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1901年他就读于坂仔教会办的铭新小学,1905年转学到厦门鼓浪屿小学,1908年入厦门寻源书院,1912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四年后他以全级第二名成绩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之后在北京清华学校担任中等科英文教员。1919年夏他与厦门豫丰钱庄老板的千金廖翠凤结婚,同年秋天携妻子赴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深造。一年后因为奖学金被停发,他不得已前往法国教华工读书写字。1921年他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

1923年林语堂回国,先后被聘任为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以后他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1927年他担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任武汉民国外交部秘书,1929年任上海东吴大学英文教授,1932年他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又创办《宇宙风》半月刊。

林语堂的研究领域为文学和语言学,毕生从事著书立说,中英文并用,古今中外无不涉及。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编写的《开明英文》就成为全国各地的通用教材。1935年他在美国用英文撰写《吾国与吾民》(又译《中国人》),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艺术和民族性格,成为畅销书,四个月内连续再版七次。1936年应赛珍珠夫妇的邀请,林语堂一家移居美国。1937年他用英文撰写的《生活的艺术》受到读者普遍欢迎。

1944年他到重庆短期讲学。1947年他被聘任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部主任。1948年他返回美国重开写作生涯,1952年与人合办《天风》杂志。1954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他受聘担任首任校长,但后来由于经费等问题,与南洋大学董事会意见不合离职。

林语堂生活的时代中文检字技术尚不发达,知识界不满意繁琐的《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他决心研制一种新的检索体系。在先后尝试了"索引检字"、"号码索引"、"国音新韵检字"、"末笔检字"和"上下形检字"等方法后,他终于1947年发明了一种较为理想的中文检索方法用于打字机,

1952 年他的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

林语堂系统学习过传统的中国文化，又接受过正规的英语教育，长期生活在美国。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西方人地角度来观察中国文化和社会，审视儒家和道家学说。他还一度游离于学政之间，但是本质上他还是一位中国学者。1966 年他定居台湾省，1967 年以“落叶归根”的情怀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的聘任。虽然他没能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但是也为生活在距离漳州不算远太远的城市而感到庆幸。林语堂的普通话和英语都很好，与人口笔语交流从来没有什么不便，然而在台北每当听到闽南话时总觉得很亲切。1963 年他创作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在书中使用的闽南话和对闽南风俗的描写，就是这种故乡情结的表现。有一次他在香港逛街买回了许多用不着的铁线和铁钉，原因就是店老板用闽南话跟他交谈，使他高兴得忘乎所以。

林语堂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和对中英两种语言的把握使他翻译起来得心应手。他用英文撰写了十多部专著，还创作和翻译了许多小说、散文、诗词、传记和文论。他的译论有《对译名划一的一个紧要提议》、《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论译诗》、《译乐隐词》、《英译黛玉葬花诗》、《尼姑思凡英译》等。1933 年他为吴曙天编著的《翻译论》所写的近万言《论翻译》，对于翻译核心问题系统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鉴定译文质量的标准应该包括忠实、通顺和美三个方面；其中“忠实”又可进一步分为“直译”、“死译”、“意译”和“胡译”四等。他强调译者应该有对本国读者的责任心。

> 译者一方面对原著负责任，然既为本国人译出，当然亦有对本国读者之责任，此则翻译与著述相同之点。或以诘屈聱牙之文饷读者，而谓读者看惯了此种文便不觉得，这实在是不明译者对读者之责任。①

他还提出了“字译”、“句译”、“句为本位”、“中文心理”、“内外体裁”等专业概念，明确无误地告诉初学翻译的人不要照抄字典、“忠实”并非逐字对译、艺术论文不可译、译学无成规等翻译理论问题。但是他不是对羽

① 林语堂：《论翻译》，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 42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

毛未丰的译者泼冷水,而是以自己的经验鼓励他们认真对待每一篇译文,唯有如此,才能胜券在握:

> 译事虽难,却有基本条件。中文译英,则中文要看通,而英文要非常好;英文华译,要英文精通,而中文亦应非常好。不然,虽知其原文本意,而笔力不到,达不出来。两样条件都有了,须有闲情逸致,才可译诗。所谓好不好,都是比较的话。凡看见译文不好的,或者是未真懂原文,所以以直译为借口,生吞活剥;或者虽然原文深解了,而找不到确当的字以译之,又麻烦了。所以说要用字精炼恰当。我曾译柳宗元《愚溪诗序》(见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其中愚溪、愚山、愚亭、愚池很多。怎么想,用 foolish, crazy, stupid,都不妥,后来心血来潮,想到 follies 一字,问题遂解决了。①

1975 年林语堂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2 年和 1973 年他曾被国际笔会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76 年 3 月 26 日他在香港逝世,同年 4 月葬于台北阳明山林语堂故居后园中。林语堂有三位女儿,分别为林相如、林太乙和林如斯。

林语堂在美国生活了 30 年,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著述在学术界、翻译界和教育界广为人知,其中主要的著述有:

《翦拂集》(上海北新书局,1928 年);

《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and Wartime Essays,上海开明书店,1930 年)。

《语言学论丛》(开明出版社,1932 年)。

《大荒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 年)。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Inc., 1935 年)。

《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T'ien-hsia Monthly, 1935—1936 年)。

---

① 林语堂:《论翻译》,刘靖之主编《翻译论集》,第 218 页,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年。

《我的话》(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1936 年)。

《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上海别发洋行,1936 年)。

《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Reynal & Hitchcock, Inc., 1937 年)。

《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 Random House, 1938 年)。

《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39 年)。

《讽颂集》(With Love & Irony,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0 年)。

《风声鹤唳》(Leaf in the Storm,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0 年)。

《语堂文存》(第一册,上海林氏出版社,1941 年)。

《中国文化精神》(上海国风书店,1941 年)。

《中印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Random House, 1942 年)。

《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 Laughter,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3 年)。

《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Nation,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4 年)。

《中国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Michael Joseph, London, 1944 年)。

《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1947 年)。

《唐人街》(Chinatown Family,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848 年)。

《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 Random House, 1948 年)。

《美国的智慧》(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0 年)。

《寡妇,尼姑与名妓:英译重编传奇小说》(Widow, Nun and Courtesan: Three Novelettes From the Chinese Translated and Adapted,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1 年)。

《英译重编传奇小说》(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Retold by Lin Yutang, 1952 年)。

《朱门》(The Vermilion Gate,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3 年)。

《远景》(Looking Beyond Prentice Hall, 1955 年)。

《武则天传》(Lady Wu,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7 年)。

《匿名》(The Secret Name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8 年)。

《中国的生活》(The Chinese Way of Lif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9 年)。

《信仰之旅》(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9 年)。

《帝国京华: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Imperial Peking: Seven Centuries of China, Crown Publishers, 1960 年)。

《理解的意义:中国古文小品选译》(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The World Publishing Co, 1960 年)。

《红牡丹》(The Red Peony,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1 年)。

《不羁》(The Pleasure of a Nonconformist,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年)。

《赖柏英》(Juniper Loa,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3 年)。

《逃向自由城》(The Flight of Innocents, G.P.Putnam's Sons, 1964 年)。

《平心论高鄂》(文星书局, 1966 年)。

《中国艺术理论》(The Chinese Theory of Art: Translation from the Masters of Chinese Art, G.P.Putnam's Sons, William Heinemann, 1967 年)。

《爱国者和实用主义者孔子》(Confucius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70 年)。

《当代汉英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 香港中文大学, 1973 年)。

四、学贯中西的政治思想史专家萧公权

萧公权原名笃平,字恭甫,号迹园,笔名巴人、石沤、君衡,1897 年出生于江西省南安县(今大庾县),襁褓中丧母,寄养姑母家。祖父和父亲去世后,他由大伯抚养。

萧公权幼年就读于重庆私塾,学习经文诗词。1916 年考入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1919 年夏毕业后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三年级(庚申级)。"五四"时期他与同学创办《晨钟》日报,立志日后学习新闻专业。

1921 年清华学校毕业后他赴美求学,先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后转入哲学系,在萨拜因(George H.Sabine, 1880—1961)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课程。获得硕士学位后萧公权转入康奈尔大学哲学系,主任导师是唯心论哲学家狄理(Frank Thilly, 1889—1935)教授。1927 年他获得博士学

位，论文选题为《政治多元论》。

萧公权回国后经堂兄萧蘧向南开大学推荐，接替辞职的徐谟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以后他又在东北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授这门课。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定居成都，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光华大学、燕京大学任教，与陈寅恪、吴宓（1894—1978）和李方桂并称为“成都燕大四大名旦”，同时还兼任国立编译馆的工作。

1940年他完成了讲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写工作，1945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按历史背景分为封建时期、专制时期和近代三大部分，从秦始皇统一华夏到帝制终结，共五编25章，分别为：第一编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创造时期；第二编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因袭时期；第三编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上）；第四编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下）；第五编近代国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时期。萧公权用历史学的方法，以朝代为经，以思想流派为纬，梳理200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思想，分析历朝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其历史作用，寻求可作当代借鉴的主流信息。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错综复杂，君贵民轻振振有词，德礼政刑高调服众，大同世界众望所归，通过他的宏观立论入微剖析可以得出客观判断。1979年他的弟子牟复礼把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卷英译出版，成为西方高校的一种通用教材。

1948年秋萧公权赴台，任台湾大学教授，同年当选为第一届中研院院士。1949年9月他被聘任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语言文学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

萧公权初到华盛顿大学执教时，远东研究所的同事建议他研究19世纪中国乡村问题。思考再三，他决定首先考察19世纪中国乡村的情况，然后考证清政府在乡村实行的制度和措施，最后探讨清政府对农村政策的影响和农民的反应。1950—1953年他查阅了近千种的中西文书刊，做了多达千张的文摘和卡片资料。每写完一章他都送交“中国近代史讨论会”（Modern Chinese History Colloquium）的同人，征求他们的意见。1955年秋《19世纪中国乡村的政治控制》脱稿，全书共约35万字，196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内容包括：清朝统治者对中国农村所实施的社会控制，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决定因素，农民的反应和方式。全书内容包括：第一部分对农村、市集、城镇以及保甲与里甲的描述；第二部分对保甲、税收、救助

和教化的控制体系介绍;第三部分对中国乡村社会和宗族控制功能的探讨。萧公权认为:晚清在农村实行的政策和制度对于稳定清朝政体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完全满意的事实从未有过。

《19世纪中国乡村的政治控制》是萧公权的又一部代表作,出版后好评如潮,对美国的汉学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曾以第三届人文学术卓著成就奖一万美元授予萧公权。权威人士建议将该书列为亚洲研究课程必读参考书。萧公权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孔飞力和邓尔麟(Jerry P.Dennerline)等年青学者的响应,并将中国乡村主题进一步深化发挥。

1968年5月31日,萧公权在华盛顿大学讲完中国政治思想最后一堂课,随即向学生发表了简短的告别演说:

> 56年前的一个春天,哲学家兼诗人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正在哈佛大学授课,一只知更鸟飞到了窗台上。他看了看鸟回过头来对学生说:"我与阳春有约!",于是宣布下课,然后向校方提交了辞呈,退隐著书。那时他还不满50岁,竟已从心所欲,悠然而逝。我没有资格学他,但我知道一个他所不知道的秘密。按照11世纪北宋哲学家邵雍(1011—1077)计算,世界上的事物在129600年后都会轮回再现。现在我与你们约定,129600年后我们在这个教室再聚首吧!①

萧公权是一位政治思想史专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哲人和诗人。退休后他任华盛顿大学名誉教授,1981年11月4日病逝于美国。

萧公权的遗著辑成《萧公权全集》,共九册。他的主要著述有:

《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1927)。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58-1927. Seattle,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5年)。

《宪政与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

① 谭伯牛:《思想在思想史家足下》,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5月8日。

《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黄山书社,2008年)

《中国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2 vols,1945—1949.Chongqing:Shangwu Yinshuguan)。

《19世纪中国乡村的政治控制》(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年)。

《萧公权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Mr. Hsiao Kung-chüan,9 volumes.Taipei:Lianjing Chubanshe. 1982年)。

五、西方朱熹思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陈荣捷

陈荣捷1901年8月18日出生于广东台山开平,11岁已能熟读"四书"、《诗经》、《书经》和《易经》,15岁由香港拔萃书院(Diocesan House)进入广州岭南学堂(Lingnan Christian College in Canton)。曾与梁宗岱(1903—1983)等9人组成文学研究会,发行《文学旬刊》,还参与编辑校园刊物《南风》学报。

1924年他在岭南学堂毕业后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因为当时该校没有为外国留学生设立奖学金,他只好到餐馆打工挣学费。获硕士学位后他停学一年,继续在餐馆打工挣钱准备攻读博士学位。1929年他以《庄子哲学》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与中国文化博士学位。

同年陈荣捷学成回国,接受母校岭南大学(1927年在岭南学堂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聘请担任秘书,负责筹划哲学课程设置。1930年他晋升为教务长,管理全校学生事务、扩大图书馆、建立博物馆以及组织与广州各大学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与合作。

1935年陈荣捷接受夏威夷大学的邀请去做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代替因人事关系离职的教授李绍昌(Shao-chang Lee,1891—1977)。1937年夏威夷大学增设了哲学系,陈荣捷同时在该校东方研究所和哲学系任教,与同事摩尔(Charles Moore)志趣相投,不久决定合作编写一部世界哲学资料,由他负责中国、佛教和日本部分,摩尔负责印度和伊斯兰教部分。1939年他与哲学界同事在檀香山召开第一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获得很大成功。1940年夏威夷大学东方研究所被取消,陈荣捷专职担任哲学系主任一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夏威夷大学被迫停课,他决定到新罕布尔什州

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那时在美国的大学哲学不是热门的专业,在人文教育领域内长期存在着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因此他被告知转入比较文学系。达特茅斯学院开设了宗教系后他就在该系开设了历史课。

1942年起陈荣捷在达特茅斯学院任中国哲学和文化教授。与此同时,他也兼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并在奥伦诺达学院(Orenota College)暑期班授课。后来他还在匹茨堡大学和匹茨堡神学院开设了两门课。1948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世界宗教系列讲座,1951年起担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方哲学》编辑和《中国哲学研究》顾问,参加过八次东西方哲学家会议。1965—1967年他还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思想课。

1966年陈荣捷退休后应宾夕法尼亚查塔姆学院(Chatham College)的邀请担任吉利斯皮哲学教授(Anna R.D.Gillespi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兼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教授,讲授中国新儒学。1978年他被推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1980年他被达特茅斯学院授予人文荣誉哲学博士称号,并担任美国亚洲研究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1982年他在檀香山组织召开了国际朱熹研究学术会议,引起高度关注,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国际汉学界的声誉。1983年为了更好地研究朱子的生平和哲学,他回到国内,先后赴江西、湖南和福建等地进行实地考察。1984年11月他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邀请参加了一个学术讲座,主讲"朱子之生平与思想",同时举办他的著作展览。1986年他被推选为北美华裔学者协会副会长。

陈荣捷长期从事宋明理学的研究,是朱熹哲学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他认为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的中国哲学,人文主义为其最强大的动力,不仅确立了"正名"、"中庸"、"道"、"天"等核心概念,也使"仁"成为中国哲学的中心议题。孔子主张"德治"就是宣扬一个建立在仁政与和谐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善"的标准就是"义"。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把毕生精力献给教育事业的先贤。陈荣捷还认为朱熹对中国思想领域的影响仅次于孔子,是他所处时代的儒家学说权威,他的思想影响广及整个东亚。陈荣捷对于宋明理学的主要贡献就是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传播儒家思想,因此享有"北美儒家开拓者"的美誉。

陈荣捷在国内外研究并讲授中国哲学数十余年,成果卓著。20世纪40—50年代他的著述侧重于中国哲学和宗教。20世纪60年代后他的学术兴趣聚焦于朱熹研究。这一时期他的成就体现在1982年出版的两部中

文著作《朱子门人》和《朱学论集》之中。前者对朱子门人、地理关系、社会背景及其学术贡献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分析，位居世界汉学研究同类著述之前列；后者收录了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朱子论文，推进了朱熹思想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确立了他在这一领域的领军地位。1992 年亚洲研究协会授予他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

陈荣捷是朱熹哲学研究的国际性权威。他的著作等身，其中包括对中国经典哲学的英译。他有英文专著 14 种、中文专著 3 种，论文 140 多篇，还担任过《大英百科全书》有关中国哲学条目的主编。他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被欧美学术界视为研究东方哲学思想的案头必备之书。

陈荣捷的主要著述有：

《庄子哲学》(Philosophy of Chuang Tzu, Cambridge, 1929)。

《评吴经熊和初大告的〈道德经〉译本》(Review of Wu's Lao Tzu's The Tao and its virtue and Chu Ta Kao's Tao Te Ch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49 年)。

《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年)。

《中国哲学纲要与注释书目》(An Outline and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Philosophy, Yale University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1959 年)。

《中国传统之本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Burton Watson, Mei Yibao,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年)。

《老子之道》(The Way of Lao Tzu,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 Inc.,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1963 年)。

《王阳明〈知行录〉及其他》(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年)。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年)。

《近事追忆》(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siand Lü Tsu-Ch'ie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年)。

《智慧之路：中国哲学与宗教》(The Path to Wisdom: Chines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Chapter in Half the Worl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Japan,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73 年)。

《朱熹对老子的评价》(Chu Hsi's Appraisal of Lao Tzu,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75 年)。

《佛教哲学要义》(The Essentials of Buddhist Philosophy co-edited with Charles Moors,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T. 1976 年)。

《王弼〈老子注〉》(Wang Pi's Commentary on Lao Tzu, co-edited with Arrienne Rump,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9 年)。

《朱熹与新儒家》(Chu His and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1985 年)。

六、对非汉语语言学研究有杰出学术贡献的李方桂

李方桂原籍山西省昔阳县,1902 年 8 月 20 日生于广州,1921 年考入清华学堂医学预科,1924 年毕业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医科,后改读语言学。1927 年获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28 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

1929 年李方桂回国后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开始研究汉语音韵学,并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对上古汉语和古藏文进行了深入研究,还走遍南方对傣语和壮语进行调研。1933 年他到泰国曼谷学习泰语。1934 年以后他深入调查广西的台语,后来又调查云南、贵州的台语方言,发表了《龙州土语》和《武鸣土语》等专著,并参与翻译《中国音韵学研究》。

李方桂除了精通英语、德语和法语,还师从印欧语言学大师 C.B.博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比较文法,以及古代波斯文、保加利亚文、立陶宛文、哥特文、冰岛文、挪威文。为了扩大语言学研究范围,又师从 W.E.克拉尔克教授学习梵文,师从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学日耳曼语和描写语言学理论。在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的指导下,他掌握了无文字语言的调查技巧,实地调查了印第安语的几个语支。

1955 年李方桂还调查了台湾省高山族的邵语,1956 年与陈奇禄和唐美君合著《邵语记略》。1937 年他在英文《中国年鉴》发表的《语言和方言》一文中提出了中国语言系属分类意见,至今为大多数中外学者所认同。

他的语言学著作丰富,还培养了大批人才。

1948 年李方桂当选为中研院第一届院士,1949 年以后先后担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语言学教授,20 世纪 50 年代初当选美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曾回台湾讲学,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1971 年发表《上古音研究》一文,1972 年获密歇根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退休。1973 年回台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曾任台大客座教授和《中国语言学报》副主编。1976 年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77 年他发表的《台语比较手册》是他 40 多年的研究成果结晶。1980 年他被聘任为台湾"国际汉学会议"秘书长。1985 年获泰国国立朱拉隆功大学荣誉奖牌。

李方桂的学术成就主要是运用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不同系属的语言,其中包括美洲印第安语言、汉藏语系和傣语支语言。这些语言结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但是他认为印欧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原则也适用于这些语言的研究。

关于印第安语言研究:李方桂在第一次田野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了的印地安语语支——马朵尔,对于拟构阿塔巴斯堪语的原始特征具有重要作用。除了 1930 年发表的《马朵尔—— 一种阿塔巴斯堪语》和《萨尔西语的动词词干研究》外,李方桂还出版了另外 8 种有关印第安语的论著,其中 4 种是调查赤坡岩语的成果。这些论著至今仍为研究印第安语言的重要文献。

关于侗台(壮侗)语族研究:1930—1942 年李方桂调查了云南、广西和贵州属侗台语族的壮、布依、傣、侗、水、佯僙、莫等 20 种语言和方言,又到泰国调查了泰语。他把台语划分为北支、中支和西南支,其成果反映在他先后出版的 5 本专著中:《龙州土语》(1940)、《莫话记略》(1943)、《武鸣土语》(1956)、《佯僙语》以及《水语研究》(1977 年)。此外他还发表了几十篇相关论文,如:《原始台语中系列先喉塞辅音的拟测》(1943 年)、《水语中声母和声调的分布》(1948 年)、《台语的复辅音》(1954 年)、《台语声母和声调的关系》(1962 年)、《台与侗水语言》(1965 年)等。1962 年李方桂在《台语系声母和声调的关系》中,根据台语各方言间声母和声调的关系,推断出古台语的声调分成清浊两类,而且从四声演变为八调。1970 年,他在《台语中声调的不规则演变》一文中,从声调不规则的变化推断出台语中也有四声和清浊别义的现象,这一发现对于汉语和台语是否有亲属关系的判断提供了依据。他的《台语比较手册》(1977 年)构拟了原始傣语

的声调系统、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是他40多年来深入调查的结晶，对侗傣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和研究人才等培养，起到推动作用。

关于汉藏语系研究：1929年李方桂回国后开始研究汉语音韵学。1931年发表了《切韵的来源》，提出高本汉所拟的"切韵是从上古音的演变来的"论证。1932年又发表《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他认为中古的"东"、"屋"、"冬"、"沃"源自上古音uong、uonk、iuong、iuok。1971年他在《上古音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新的上古音系统。

1933年他发表了《藏文的前缀音对词根声母的某些影响》，1956年又发表了《唐蕃会盟碑的研究》复原了碑文残字，提出了100多条与前人不同的考证。1963年他发表的《敦煌汉藏词汇》，是他对敦煌发现的《藏汉词汇》的研究，并根据藏文字母的次序编出了索引。

1987年8月21日李方桂病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他的主要著述有：

《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52 ,1930年)。

《沙尔西语动词语干的研究》(A Study of Sarcee Verb 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6:3-27,1930年)。

《广西凌云瑶语》(The Yao Dialect of Ling-yun,1930年)。

《切韵a的来源》(The Sources of Ancient Chinese Vowel a,1931年)。

《切韵东冬屋沃在上古音中的读法》(Ancient Chinese-ung,-uk,-uoug,-uok,etc.in Archaic Chinese,1932年)。

《赤坡岩语语干录》(A List of Chipewyan 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7:122~151,1932年)。

《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1933年)。

《赤坡岩语的声母》(Chipewyan Consonants,《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pp. 429—467,1933年)。

《藏文的前缀音对词根声母的某些影响》(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 2:135~157. 1933年)。

《原始台语中带喉塞音声母的假设》(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1934年)。

《上古音中的 *-iwn、*-iwk、and *-iw》(Archaic Chinese *-iwn, *-iwk, and *-iw, 1935 年)。

《1936—1937 汉语与方言年鉴》Languages and Dialects, The Chinese Year Book 121~128, 1936—1937 年)。

《龙州土语》(The Tai Dialect of Lungchow, Text, Translations, and Glossary, 290 页。1940 年)。

《中国音韵学研究》(A Translation of B. Karlgren's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co-translated with Yuen-ren Chao and Luo Changpei, 731 页,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40 年)。

《莫话记略》(Notes on the Mak Language, 112 页, 1943 年)。

《台语中的复辅音》(Consonant Cluster in Tai, 1954 年)。

《武鸣土语》(The Tai Dialect of Wu-ming (Text, Translations, and Glossary, 301 页, 1956 年)。

《唐蕃会盟碑的研究》(The Inscriptions of the Han-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T'oung p'ao 44: 1~99. 1956 年)。

《马重英考》(On Ma Chung-Ying. Bulleti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7: 1~8. 1956 年)。

《台语中声调的不规则演变》(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 1970 年)。

《上古音研究》(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IX1~2: 1~61, translated by Gilbert L. Mattos (1974—1975) as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Monumenta Serica 31: 219~287. 1971 年)。

《汉语及其方言》(Language and Dialects in China. Free China Review XXII, No. 5. 1972 年)。

《印地安语赤波岩故事集》(Chipewyan Texts, co-authored with Ronald Scollon, 450 页, 1976 年)。

《水话研究》(A Study of the Sui Language: Texts and Translations (I), 285 页, 1977 年)。

《比较台语手册》(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389 页, 1977 年)。

《藏语辅音群与汉语的转换》(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Tibetan Consonant Cluster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0:231~240. 1979 年)。

《唐蕃会盟碑中的问题》(A Problem in the Han-Tibetan Treaty Inscription.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34:121~124. 1980 年)。

《藏文旧碑文的研究》(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Special Publications 91. Weldon South Cobli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7 年)。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486 页, 1987 年)。

七、明清史和文献学知名专家房兆楹和杜联喆夫妇

房兆楹出生于天津,祖籍山东泰安(一说江苏阜宁)。1928 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士学位,与该校历史系校友杜联喆(1902—1994)结为伉俪。1929 年秋房兆楹入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学习,1930 年毕业后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当时杜联喆正为哈佛—燕京学社购置中国古籍,房兆楹便加入了他们的购书工作。

20 世纪 30 年代初房兆楹夫妇应邀赴美,加盟"清人传记写作计划"。1933—1934 年他们定居于马萨诸塞州,一边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一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进修。1933 年暑假他们回国探亲,见到了久别亲友分外高兴,一个月后为生计又匆匆返回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住在华盛顿特区,曾协助国会图书馆恒慕义编写《清代名人传略》。该书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撰稿人除了 50 多名研究生外,费正清等知名学者也参加了编写工作。1943 年该书由华盛顿政府出版社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房兆楹受聘参与陆军部组织的美国军人汉语培训计划。他和美国学者合作编写了两册汉语口语教材,列入了美国《陆军部教育手册》(Spoken Chinese, Two Books by Charles F. Hockett & Chaoying Fang, War Department Education Manual),于 1944—1945 年在华盛顿出版。1949 年他们住在纽约市,1952 年迁居到加州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任职于斯坦福大学的战争、革命与和平胡佛图书馆(Hoover Library of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Stanford University)。

1948 年房兆楹在美国撰写《清初满洲家庭里的分家子和未分家子》一文,收入《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50 年他还在《哈佛亚洲

学报》上发表了有关早期满族的军事化问题。他曾一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工作，参加华盛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的“中国历史研究项目”(Chinese History Project)。1954 年邓嗣禹、费正清、孙任以都(E-Tu Zen Su)、房兆楹等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论，1839—1923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7 年他们迁居柏克莱，供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同年加入了美国籍。1961—1963 年他们在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所远东史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三年后返回美国。

1962 年房兆楹编辑的《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以“史料丛刊”系列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63 年 9 月房兆楹夫妻由台湾返回美国，1965 年房兆楹参加了由美国亚洲研究会组织的“明代传记历史计划”(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1966 年杜联喆在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组织的“明代思想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明朝之梦”的报告。

1967—1971 年包华德(Howard L.Boorman)主编的四卷本《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房兆楹为该书撰写了相关条目。1969 年他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阿萨密朝鲜文献图书馆编写的《注记目录》(The Asami Library, A Descriptive Catalogue)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馆收藏了大约 1000 卷 16—20 世纪的朝鲜文献。房兆楹编写的这部《注记目录》与一般的图书目录不同的是，他以丰富准确的文献学和历史学知识对各类书籍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因此被视为优秀的朝鲜史学史著作。1976 年由富路德和房兆楹主编的两卷本《明代名人录》(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大约有 120 位学者参与了该项学术工程，房兆楹夫妇忘寝废食全力以赴，撰写的稿件多达总数的一半。1987 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秦家懿(Julia Ching)与房兆楹合作完成的《明儒学案选译》是房兆楹的一部遗著。

房兆楹和杜联喆夫妇曾先后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图书馆工作，精通文献学理论。晚年他们把收藏多年的大量图书陆续捐赠给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房兆楹夫妇还指导美国学生进行明清史研究。芮玛丽、史景迁和倪德卫等国际知名的明清史学者均出其门下。房兆楹长期治中国史，知识渊博，观点独到，曾参与撰写明清著名历史人物的英文传记多部，在国际汉学界影响深远。1976 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房兆楹夫妇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们在文献学

领域的贡献。

房兆楹的主要著述有：

《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年)。

《清初满洲家庭里的分家子和未分家子》(Printed in Papers On Occas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1948 年)。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论，1839—1923 年》(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年)。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Taiwan: Elite Press, 1962 年)。

《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4 Vols,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1 年)。

《明代名人录》(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L. Carrington Goodrich, Editor; Chao - ying Fang, Associate Edito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年)。

《清代西人见闻录》(Beijing: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1985 年)。

《明儒学案选译》(The Records of Ming Scholars by Huang Tsung-Hi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年)。

八、美国著名国际华裔历史学家邓嗣禹

邓嗣禹，字持宇，祖籍湖南常宁。1932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考入该校历史研究所。1935 年他获硕士学位，留母校任讲师。1937 年他应邀赴美参加国会图书馆编纂《清代名人传记》，担任助理编纂。1938 年他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汉学家费正清，1942 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一度代理芝加哥大学汉学院院长，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1943 年升任为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邓嗣禹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邀请任该校历史系教授。第二年再次去美国，历任哈佛大学讲师、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美国亚洲研究会董事、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尼克松首次访华代表团资深顾问等职。1976 年他荣休，1986 年被聘任为印第安纳大学讲座教授。

五四运动中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曾被当做糟粕批判，认为八股之害不亚于“焚书坑儒”。然而许多西方学者却认为中国的科举是人才选拔的最好方法，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文官考试制度值得称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1943 年 9 月，邓嗣禹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用英文发表了长达三万余言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通过大量史料生动地展示了科举制度在中国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文中有对各朝考试制度的详尽分析，也有历史沿革的描述以及对历代科举制度得失的评判，让读者认识到与中国知识分子人生命运和悲欢离合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在文章的“结论”部分作者提出“中国的科举是西欧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的见解。这篇经典性的论文被认为对改变西方人才选拔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被先后收入了多种文集。1953 年 7 月，邓嗣禹又以《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为书名在台湾省出版了中译单行本。

1974 年 5 月邓嗣禹在《明报月刊》总第 101 期发表的《南中国海诸岛屿的主权问题》是一篇重要文章，对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地理位置、分布和历史沿革详加陈述。他从三个方面谈到了中国对上述诸岛的主权依据：

甲、法显早在 414 年就发现并记载了七洲洋（即今之西沙群岛），12—13 世纪赵汝适《诸蕃志》“南海”条中有关“万里石塘”（即今之中沙群岛）记载，元朝远征军以及 15 世纪初郑和七次下西洋对南海中沙群岛和群礁的考察和命名，证明中国早已视之为固有，历史证据充分。

乙、从国际条约与惯例上来看，上述诸岛屿也是属于中国的：1887 年 6 月 26 日《中法续议界务专条》说明子午线 105°43′以东之岛屿，属于中国。1946 年 12 月中国派四条军舰从日本手中接收南沙群岛。根据 1951 年 9 月 8 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第二条，日本业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之一切权利与要求。

丙、据美国权威学术机构编纂的《哥伦比亚利平科特世界地名大辞典》（The Columbia Lippincott Gazetteer of the World）中有关条目说明：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国。

邓嗣禹是著名的国际历史学家，曾先后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燕京大学司徒登研究奖、美国哲学研究会研究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评论

会研究奖、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研究奖、联邦政府卫生、教育与福利部之人文科学基金研究奖。

邓嗣禹在国内外出版了多部专著，还发表了100多篇专论，有些论著已成为欧美各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必备的参考书。其中主要著述有：

《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燕京大学《史学年鉴》2卷1册，1934年）。

《〈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

《中国参考书选目解题》（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 co-authored with Knight Biggerstaf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年）。

《清代文献的种类与使用》（On The Types and Uses of Ching Documents, co-edited with John King Fairbank,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 pp. 1-71, 1940年）。

《中国科举制度西传考》（《哈佛亚州研究学刊》第7卷第四期，1943年）。

《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与重要性》（《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2月7~日）。

《最近五十年的中国史学》（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8, No. 2. pp. 131—157, 1949年）。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年）。

《清代行政机构研究三种》（Ching Administration: Three Studies, co-authored with John King Fairbank,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tudies No. 19, 1960年）。

《译注颜之推〈颜氏家训〉》（The 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en Clan by Yen Chih-tui, Leiden: E. J. Brill, Monographies du Toung Pao, volume 4, 1968年）。

《南中国海诸岛屿的主权问题》（《明报月刊》总第101期，1974年5月7日）。

《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湾食货出版社，1980年）。

《中国考试制度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九、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培养人才的柳无忌

柳无忌是著名诗人柳亚子(1887—1958)之子,原名柳锡礽,笔名啸霞、萧亚、无忌,祖籍江苏吴江。1920—1923年他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因坚持爱国立场受阻而中辍了学业。他曾学习两年化学专业课程,后插班到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7年他到美国劳伦斯大学学习本科四年级课程,获学士学位。1928年他攻读耶鲁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与罗皑岚(1906—1983)、罗念生(1904—1990)、陈麟瑞(1905—1969)等人在纽约创办《文学杂志》,发表新诗和诗论多篇。同年柳无忌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论文获耶鲁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

1932年他回到国内,先后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1935年他与罗皑岚在南开大学发起"人生与文学社",编辑期刊《人生与文学》和天津《益世报》文艺副刊。1941—1945年他受聘担任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外文教授兼任师范学院教授,并代理系主任一职。

1946年他再度赴美,先后任劳伦斯大学和耶鲁大学英文和中国文化客座教授。他原来打算在大学找一个教英文的职业,后来获得研究中国文学的奖助金,在耶鲁大学学习了三年,读了数百部中英文的中国文学、哲学和历史书籍,最后决定改行研究中国文学。但是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中文课程,直到50年代末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国防教育法案",鼓励美国青年学习中、俄、东欧和远近东以及非洲的语言,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为了发挥自己的文学专长,他先后在耶鲁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或者从事研究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创办了东亚语文系并担任系主任。在长达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所培养的学生遍布各界各地。翻译家葛浩文就是柳无忌当年的博士研究生,在他的指导下葛浩文完成了《萧红评传》的研究和撰写工作,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1972年柳无忌加入了美国国籍,在政治上很活跃,曾经是福特、里根和乔治·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24—　)三位总统的积极支持者。

柳无忌对于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均有深入研究。他曾紧随父亲柳亚子参加南社和新南社的各项活动,对苏曼殊(1884—1918)和柳亚子等

南社人物均有独到研究。在诗歌方面他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的影响。柳无忌在国内讲授西方文学,在美国则讲授中国文学,为中西文学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1976 年他退休后筹建国际南社学会,被推为会长,主编《国际南社学会从刊》和"南社丛书",热心资助有关南社研究著作的出版。

1976 年柳无忌退休,两年后他举家迁居加利福尼亚州,所居孟乐公寓的住户大都是学者教授或文化界荣休老人,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爱好。柳无忌笔耕不辍,乐在其中。1978 年他主要研究南社和柳亚子,1989 年国际南社学会(International Southern Society)在香港成立,学术活动频繁,各类著作源源出版。2002 年 10 月他病逝于旧金山,享年 95 岁。

柳无忌是中西比较文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英文教育家,曾被世界数学大师陈省身(Shiing-Shen Chern,1911—2004)誉为"教授、学者和诗人"。他先后出版了中文书籍 14 种,英文书籍 9 种,英译中书籍 5 种,编选书刊 14 种,以及散见于各种报刊的英文文章百余篇。2002 年柳无忌女儿柳光南(Shirley Liu Clayton)把他书房物品 500 多公斤海运到中国,赠予柳亚子纪念馆。文稿包括苏俄戏剧、法国中世纪戏剧、印度文学、十九世纪英国浪漫诗歌、西洋戏剧发展史、西洋文学研究、现代英国文学研究等内容。

柳无忌长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人才。他撰写并出版了《中国文学导论》、《西洋文学研究》、《中西古典戏剧比较研究》和《关汉卿的戏剧艺术》等中英文著作。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同时又把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名篇译成英文,为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他的研究领域广泛,著述涵盖古代的孔子、杨朱、董仲舒、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关汉卿、王实甫,到现当代的毛泽东、曹禺、沈雁冰、朱自清、鲁迅、胡适和梁宗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教授和文学理论家。

柳无忌的主要论著和译著有: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An English Romanticist Poet, Yale University, 1931 年)。

《英国文学史》(莫迪·勒樊脱著,国立编译馆出版,1947 年)。

《莎士比亚时代抒情诗》(上海大时代书局,1947 年)。

《赵氏孤儿》(The Original Orphan of China, Antiquarian Booksell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ume V, No. 3, 1953 年)。

《孔子的生平与时代》(Confucius, His Life and Time, Philosophy library, 1955 年)。

《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读注释》(Notes To Readings in Contemparary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1: Plays and Poems, Mirror Series C No. 10, Co-edited with Tien-yi Li and Grace W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57 年)。

《中国文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 年)。

《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选》(Readi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Vol.One: Plays and Poems, New Haven, Connecticut: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1968 年)。

《曼殊评传》(Su Man-shu, Twayne, 1972 年)。

《亚洲文学译丛》(A Repository of Asian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Wu-chi, Liu, et al.ed.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年)。

《葵晔集·三千年中国诗选》(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New York: 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75 年)。

《西洋文学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1985 年)。

《我们的父亲柳亚子》(1989 年)

《中国文学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十、毕生致力于图书馆学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钱存训

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 1909—　)出生于江苏泰县,幼年就读于私塾。中学时代积极参加"五卅"爱国运动。1926 年他毕业于淮东中学,1928 年进入金陵大学攻读历史,曾选修刘国钧(1899—1980)主讲的《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分类法》,以及李小缘(1897—1959)的《图书馆学》等课程,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兼职。

1932 年他获得了文学士学位,由校方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担任副馆长,很快就熟悉了图书管理技术。五年后他接受了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1895—1965)的聘请,担任北平图书馆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

1937 年日军侵华战祸蔓延全国,北平图书馆决定将 6 万多册善本图书运到上海租界保存,无奈上海形势危如累卵,馆长袁同礼通过中国驻美

大使胡适商请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代为保存宋元明清善本古籍2720种三万余册，装成102个木箱运美。钱存训在上海海关的友人协助下，冒着极大风险，在珍珠港事件前通过美国商船将古籍善本安全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1965年这批善本书转运台北中央图书馆保存。这则中国学者在战火中挽救价值连城的中华文化遗产的往事，在几代中美图书出版界成为佳话流传。

1947年他作为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深造。他与夫人许文锦将1936年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0多万册中文藏书加以整理和编目，为该校远东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2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硕士学位，论文为《西方通过翻译对中国的影响》。1957年他以论文《中国印刷术发明前的文字记录：早期中国图书和刻印发展之研究》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博士学位。1962年该论文以《竹帛书：汉籍和刻印的起源考》为书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47—1978年起他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同时他还兼任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主讲《中国目录学》和《中国史学方法》。1964—1978年他先后培养了30多名图书馆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78年退休后他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国家图书馆顾问。2004年华盛顿的美中政策基金会（U.S.-China Policy Foundation）在芝加哥海亚特酒店为钱存训颁发了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他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以及学术研究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

中国造纸和印刷术历史是钱存训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选题之一。他在《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①一书中提出了纸张在东方和西方的功能相似但影响却不完全一样的新观点。他认为纸张在中国的价值高于西方，古代帝王以纸张赏赐学者和官员被视为最高的荣誉。纸、笔、墨和砚在中国被称为“文房四宝”，始终与学术紧密联系着，受到了普遍的尊重。纸张的应用促进了思想的传播，使各种公私事务得以顺利进行，中国文化传统得到维系。在中国和西方，印刷术主要用于书籍出版，但是其规模和形式却有所

①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原文收入李约瑟编辑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五卷一分册，198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分别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科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

不同。相似之处是:印刷术使书籍的成本减低,产量增加,形式统一、流传广远。但在西方印刷工具较早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而在中国印刷术发明后的1000多年中却始终保持一种传统的手工业方式,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活字印刷术反哺中国,情况才有所改善。西方的印刷术促进了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发展,支持了民族主义和新型国家的建立。中国印刷术保证了书写文字的连续性和普遍性,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来说至为重要,起到了保持文化和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留存的书籍浩如烟海是历史的需要和技术发展的必然。而在黑暗时代终结时西方文明仅保存极少数的文献遗产。中国的印刷业一般由政府机构或私人经营,营利并非主要目的;而欧洲的印刷业则多为谋利经营,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出版工业。①

196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竹帛书:汉籍和刻印之起源考》是钱存训撰写的一部经典性专著,稿本在1957年完成,英文初版印行于1962年,经过多次增补修订,先后又推出了中文、日文和韩文版本。他充分运用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物资料,展示了汉籍和刻印如何从甲骨文、金文、陶文、玉石刻辞、竹简、木牍、帛书到纸卷的演变历程,涉及了卜辞、祭文、官书和档案等私家著述和官家收藏等形式。它不仅演绎了中国古代书籍如何产生和变化,而且还凸显了汉字的历史发展和作用,揭示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书的内容包含着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和继承的信息,为研究中国文化史、科技史、考古史和对外交往史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钱存训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毕生致力于图书馆学、历史学、印刷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工作,通过50多年的努力把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建成为美国第一流的图书馆。他出版专著和论文100多种,1968年曾应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之邀请参加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有关造纸制墨和印刷术历史的撰写。1982年他出版的《纸和印刷》一书成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五卷第一分册。他的主要著述有:

《西方通过翻译对中国的影响》(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年)。

《竹帛书:汉籍和刻印之起源考》(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① 钱存训:《关于中国纸和印刷史研究的新结论》,载《北京日报》2005年2月8日。

1962 年)。

《区域研究与图书馆》(Area Studies and the Library,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Thirtie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May 20~22, 1965. Co-edited with Howard W. Wing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年)。

《汉学研究参考资料指南(初稿)》(A Guide to Reference and Source Materials for Chinese Studies: Preliminary Draf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年)。

《1974—1975 年美国图书馆的东亚藏书现状》(Current Status of East Asian Collections in American libraries, 1974—1975, Washington: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6 年)。

《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Ancient China: 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 co-authored with David T. Ro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年)。

《中国书目解题汇编》(China: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Bibliographies, Boston: G.K. Hall,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年)。

《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Chinese Paper and Printing: a Cultural History, 1985 年)。

《纸和印刷》(上海古籍出版社,科学出版社,1990 年)。

《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年)。

《中国文化史文集》(Collected Writings o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年)。

《中国图书文史论集》(钱存训主编,北京:现代出版社,1992 年)。

《中美书缘》(台北:文华图书管理资讯有限公司,1998 年)。

十一、以中国经济史和制度史研究闻名于学界的杨联陞

杨联陞,字莲生,出生于河北清苑(今保定),祖籍浙江绍兴。曾过继给任盐务官的伯父。

他少年时聪慧勤勉,在保定上初中,成绩优异,高中时转学到北京师大附中。1933 年他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经济系,后遵照

父训就读于清华经济系，但是对文史学科的兴趣始终未减。他博学多能，诗画皆通，曾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在清华他受业于陈寅恪，曾在《清华学报》和《食货》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1937 年他以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获硕士学位。日伪时期北大秘书长钱稻孙（1887—1966）曾聘请他担任北大助教遭拒，次日又给他送去副教授聘书，他仍然婉言谢绝。

1940 年秋，美国中国史学家嘉德纳邀请杨联陞赴美帮他翻译日文史料，从此他与嘉德纳交谊日深。赵元任一度聘任他到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授中文并编纂辞典。他因此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金资助，在嘉德纳指导下攻读哈佛大学学位课程。1946 年他完成了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1947 年他被聘任为哈佛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后改称为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1958 年晋升为教授，1959 年他被推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1961 年入美国籍。1962 年他应邀到巴黎法兰西学院和日本京都大学讲学，1965 年他荣任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1977 年以后他一家移居马萨诸塞州的阿灵顿。

1949 年秋，杨联陞为了在哈佛大学开设《中国古代经济史》，对中国古代货币和信贷史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吸收当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对中国古代货币和信贷历史进行了概括性回顾，时间跨度从宋元到民初。作为该课程的一部分工作，他还列出了与中国货币和银行史有关的 300 个专业术语，要求学生学完有关章节之后就其中某些术语做进一步的研究并写出学术报告。1952 年，他得到哈佛高等研究基金会（Harvard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ady and Research）的资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将他的讲义以《中国货币与信贷》为书名正式出版发行，受到了广泛的好评。1971 年该书再版时他对原书的一些错误作了订正，并推出了中文版。中文版正文共十章，分别为：第一章历史回顾；第二章形形色色的货币；第三章宋元至晚清的圆形硬币；第四章圆形硬币的普遍性问题；第五章金银通货；第六章宋末的交子；第七章元朝至清朝的纸币；第八章传统的信贷机构；第九章钱庄与银行；第十章借款与利息。《中国货币与信贷》是杨联陞多年教学和科研的成果，系统研究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货币形式、功能、变化和信贷机构的情况。在介绍各种形式的货币时，他主要聚焦于圆形硬币、金银通货和纸币；在信贷的部分他重点分析了从当铺到银行的作用，以及贷款和利率的关系。他把货币流通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考虑，极具启发性，结论让人信服。

《中国制度史》是杨联陞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的一篇有关中国制度和经济历史的系列论文集，也是他多年的学术结晶。全书文字流畅，深入浅出，极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

杨联陞与胡适的深厚交情长达20年，彼此长期以师生相待。1998年3月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印的文集《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共收录他们从1943年10月至1962年2月之间的往来书信205封，其中胡适致杨联陞信函87封。在很长一段世间他们的中心话题是《水经注》，此外也涉及了思想史中的“报”、南宋的会子、王莽新朝的“新”、六朝人名中的“之”、词尾助词之类的问题。当时已卸任驻美大使职务的胡适和晚辈杨联陞的笔谈，彼此莫逆于心，了无牵挂，纵论学问成为他们忘却世间纷争的最高境界和精神寄托，如此维系着师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后世读者无不为之心往神驰。难怪胡适预立遗嘱时，指定杨联陞为其英文著作的整理人。

杨联陞文风谨严，笔锋犀利，素以学术批评著称，在美国学界被戏称为“汉学警察”。1970—1976年他先后荣获华盛顿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1974年又获法国铭刻与文学学院德卢恩奖。他还担任过《哈佛亚洲学报》编委和新竹《清华学报》主编。1965年他担任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历史讲座教授，1980年以哈佛大学名誉教授身份荣休。

1985年之后杨联陞得了抑郁症，患病时烦躁不安，精神备受折磨，周期最长可达一年。最后几年他又不幸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全仗太太悉心照顾。1990年11月16日他在阿灵顿寓所辞世。

杨联陞专攻中国经济史，写过数百篇论文和书评。收录在他的《汉学论评集》中的40余篇文章，内容广及科技、地理、考古、文学、哲学、书画和戏曲。他的主要著述有：

《晋书·食货志译注》(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1946年)。

《国语字典》(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co-authored with Yuen Ren Cha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年)。

《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年)。

《中国货币与信贷》(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1952年)。

《文白对照中文诗选》(Selected Chinese Texts in the Classical and

Colloquial Sty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年)。

《中国制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年)。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艺术馆收藏的中国绘画和墨宝》(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From the Collection of John M. Crawford Jr. at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17 June to 1 August 1965, Arts Council, London, 1965 年)。

《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年)。

《国史探微》(中译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年)。

《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印,1998 年)。

十二、在经济史和社会思想史研究中贡献卓著的何炳棣

何炳棣(Ho Ping-ti, 1917—2012)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金华。少年时代受到父母和外祖母的良好教育,就读于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和南开中学。他父亲曾任浙江宁波的检察官,堂兄何炳松(1890—1946)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和暨南大学校长,他们对于何炳棣的性格形成和治学倾向都有重要影响。

就读清华大学化学系一年级时,何炳棣选修了刘崇鋐(1897—1990)的西洋通史课程。1934 年他由清华化学系转入历史系,按照系主任蒋廷黻(1895—1965)的建议主修近代外交史,同时自修西洋史。在浓郁的校园学术氛围中,他以社会科学方法和人文通识课程为自己出国留学做好铺垫。1938 年大学毕业后他前往云南,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

1944 年他考取了第六届庚款留美生资格,获西洋史学科第一名,第二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1948 年他为了谋生前往加拿大任教,1952 年他以《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1914)》为题的论文,获得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62 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任为中国史教授,1965 年担任该校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66 年他获选为中研院院士。

1975—1976年他被推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28届年会会长，1977—1980年担任美籍华人协会副主席。1979年他获选为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先后获得香港中文大学（1975）、劳伦斯大学（1978）和丹尼森大学（1988）颁发的荣誉法学或人文科学博士学位。

1986年他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后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同年他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鄂宛分校访问教授直至1990年。1997年他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

因为工作环境的关系，何炳棣的早期著述主要用英文撰写。20世纪中期他致力于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社会结构和会馆制度研究，他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和《明清社会史论》均属于典范之作。1966年出版的《中国会馆史论》是他的第一部中文专著。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的兴趣转向了中国古代史和中华文化研究。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和1975年出版的《东方的摇篮——公元前5000—1000年中国新石器和早期技术和思想的起源研究》，对于中华文化的特征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解释。退休后他主要以中文撰稿，对象定位于专业和国内读者。晚年他的学术兴趣仍然很广泛，但是涉及最多的是古代思想史领域，同时也忙中抽空撰写回忆录，有意让毕生精神财富惠及后人。因此他的笔触经常游走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之起源、农耕技术的发展、城乡社会阶层的变迁等问题，文献学和考古学手段联用，微观考证与宏观通论并举，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钦佩。

他研究中国人口时综合考察了各个时期的土地、农业、移民、政治和财政等方面等因素，从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各类资料，并充分利用3000多种方志、数千种善本书籍和几百种微缩胶片的数据，才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西方研究者长期对中国农业和农村人口有很多偏见和误解，何炳棣的研究向西方学术界表明：16世纪中国的耕作技术不但不落后，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农业的革命推动了农业生产，粮食产量足以维持人口的增长。1969年他的《黄土与中国农业起源》作为《美国人类学家》第一篇刊载，按照他当时副教授的资历，完全是因为他的论文水平和数据的详尽准确，并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196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何炳棣英文专著《明清社会史论》主要研究明清两朝社会各阶级的变化，取材于包括近百种的进士登科录、子孙三代履历和同年齿录等历史档案。进士组共分析了15000个案

例，举人贡生组的分析案例更多达25000个。该书正文共七章，分别为：第一章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阶层（第1—52页）；第二章地位流动体系（第53—91页）；第三章上行流动：进入官场（第92—125页）；第四章下行流动（第126—167页）；第五章影响社会流动之因素（第168—221页）；第六章社会学成果和流动与地区差异（第222—254页）；第七章概述与结论（第255—266页）。

何炳棣发现明代平民出身的进士约占总数的50%，到清代却减至37.2%；祖孙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明代占总数的50%，到清代升至62.8%，平民上行流动机会渐减的情况远远超过18世纪的英国。这可能是晚清加强捐纳制度，使平民社会地位上升困难的结果。

何炳棣沿用了柯睿格（Edward A.Kracke Jr. 1908—1976）1947年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明清社会关系的变化。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1932—1996）指出南宋地方乡绅曾利用家族、经济和官府的势力帮助中举学子进入官场，但是何炳棣在分析明清社会阶级变化时却只看祖父和父亲的优势，而没有研究叔伯等延伸家族成员对于举子的影响，因此才会推断出这么高的变化比例。郝若贝还认为，何炳棣的分析方法与施坚雅用于描述从晚唐至南宋的中国社会变化的区域理论如出一辙。

客观地说，何炳棣是运用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与同年齿录等科举史料进行量化分析的第一位美籍学者，他的资料数量和涵盖面都超越了前人，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还深入揭示了下行流动的导因，并注意到社会变动的地域差异。

《明清社会史论》是美国学术联合会向学界推荐的最佳750部历史著作之一。1960年夏天何炳棣曾以加拿大学者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5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并宣读了根据《明清社会史论》的统计数字写成的论文《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他的著作影响广及中西方学术界。

1962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马丁·威尔伯（C.Martin Wilbur）在《明清社会史论·前言》中写道：

> 何炳棣教授热衷于社会现实研究。他确信中国法律文件不一定都能准确反映社会现状。为此他对相关时期的多种文本进行了检索。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家谱、讣告和纪念文集等非同

寻常却又几乎无人问津的收藏，正是他所考查的资源。

虽然他的研究围绕着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主题展开，但是对于建制历史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在何教授致力探讨的许多选题中，此项研究对于明朝家庭地位的登录系统、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明代科举和学术等级体系、社区学馆和私塾的运作，以及补助可能中举的应试学子（candidate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盘缠的社区金库都进行了考查。

这些探讨基本上都建立在方志和地方资料的基础之上，并从中获得了从国家文献中无法得到的信息。

何教授收集了500多年的大宗数据，可能会使欧洲史学者感到吃惊，因为19世纪以前欧洲的任何学会都没有保存同类数量和质量的数据。①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2004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何炳棣自传体回忆录，全书正文包括国内篇11章和海外篇9章，分别为：第一章家世与父教；第二章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第三章南开中学；第五、六、七章清华大学；第八章两年彷徨：光华与燕京；第九和十章西南联大；第十一章师友丛忆；第十二和十三章纽约和哥大；第十四、十五和十六章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第十七、十八和十九章芝加哥大学；第二十章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

何炳棣从童年家教、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的艰辛求学过程，始终胸怀大志，求知若渴，又得益于名师教导和益友指点，练就一身好本领。从业后从西南联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到芝加哥大学一路走来，目光远大，拒绝做第二手文章，带着民族感情研究重要课题，临终前还在病榻上校阅文稿。他得到的不仅仅是鲜花、称号和奖励，更多的是积累了为人为师为友的诚信待人和勇攀高峰的宝贵经验。书中还附有私人信函和学术评估密件，反映出早年留学海外的中华热血青年在融合中西文化中的企求和探索，足以传世后人。

许多在西方功成名就的学者年迈时经常表现出自视清高，避谈政治，

①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冷眼旁观世界的态度。通读《读史阅世六十年》就会发现何炳棣并非以载誉荣归自居的老人。他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在选校、留学考试、论文答辩、故友聚会和个人得失恩怨的往事过程中，显得无比睿智、包容和亲切。他融会贯通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兼收并蓄，扬长弃短，论文经常发表于第一流学科刊物。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典范！他的人生故事和治学之道无疑值得有志于学术追求的青年一代借鉴和仿效。

何炳棣不仅在经济史领域成就卓著，在考古学、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也有杰出贡献。他曾在汉学、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报刊先后发表英文和中文的学术论文30多篇。去世前几年还以中文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宗教和制度史的论文和回忆录。其中主要著述有：

《翁同和与百日维新》(Weng T'ung-ho and the "One Hundred Days of Reform",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0, No. 2, February 1951年)。

《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1914)》(1952年)。

《扬州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 1954年)。

《中国史上的早熟稻》(Early 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9, December 1956年)。

《美洲作物移入中国考》(American Food Plants in China, Plant Science Bulletin, Botanical Society of America, Vol. 2, No.I, January 1956年)。

《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年)。

《中国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co-authored with Vernon K. Dibb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 No. 3, April 1961年)。

《商代文化与建制的若干问题》(Some Problems of Shan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A Review Article,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3, Fall 1961年)。

《中华帝国成功之梯：1368—1911中国社会流动面面观》(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年)。

《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

《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ruary 1967 年)。

《危机中之中国》(China in Crisis, Vol. 1: 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in two book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年)。

《黄土与中国农业之起源》(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6, No.I, October 1969 年)。

《东方的摇篮——公元前 5000—1000 年中国新石器和早期技术与思想起源研究》(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 C., Hong Kong, 1975 年)。

《悠久中华文明之起源——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就职演说》(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 Search for the Roots of Its Longevity, the AAS Presidential Addres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5, No. 4, August 1976 年)。

《评论:古代华北的作物环境》(The Paleoenvironment of North China—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LIV, No. 4, August 1984 年)。

《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

《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 年)。

《关于中国化——对罗斯基想象中清人之抗辩》(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年)。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

《有关〈孙子〉和〈老子〉的三篇考证》(中研院近史所,2002 年)。

《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从〈庄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关怀》(台大文史学报,2007 年)。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中研院演讲题,2008 年)。

十三、提倡以大历史观解读中国历史的黄仁宇

黄仁宇(Ray Huang,1918—20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父亲黄震白曾经是同盟会会员,希望儿子好好学习,长大后有机会上大学,当工程师,体面赚钱,不当政客或军人。

黄仁宇在初中阶段就开始给《湖南日报》副刊投稿,每次发表的世界名人传记都配有他自己绘制的人物肖像。1936—1938年他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决定辍学救国,因父亲反对他才未离开课堂。1937年七七事变后,教育部要求南开、北大和清华三所北方大学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黄仁宇随学校师生南下长沙。在等待开学期间他毛遂自荐到《抗日战报》社任职,结识了田汉、廖沫沙和范长江等知名学人。

《抗日战报》停刊后黄仁宇考入了国民党成都中央军官学校,成为第14期步兵科学员。

1940年毕业后他先后担任过陆军第十四师少尉排长和中尉代理连长。1943年他任新一军上尉参谋,随一支远征军进驻缅甸,在前线担任观察员,有时把所见所闻写成文章刊登在《大公报》上。1944年5月8日中国驻印军队在缅北密支那地区对日军第十八师团发起进攻战,击毙日军2000余人,俘虏70多人。黄仁宇撰写了一篇关于该战斗的12000字长篇报道,连载4天,挣得稿费300卢比,备受鼓舞。此后他经常冒险进入无人区观察,一次负了伤,回到军营后受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后他晋升为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进入了东北。

1946年他考取了留学资格,获保送入美国雷文沃思堡指挥参谋学院受训。多年后回顾往事时,他庆幸自己没有参与内战保得一身清白。1947年他毕业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不久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被怀疑通共遭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了军政界,再次赴美深造。他凭当年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取录,攻读新闻专业,1954年获学士学位,1957年获硕士学位。其间因为囊中羞涩,曾在餐馆洗过碗碟,在栈房做过小工。后来他转入历史系,于1964年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明代的漕运》。此后他曾在南伊利诺大学执教,196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70年

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68—1979 年被聘任为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教授。

在哈佛大学期间黄仁宇打算撰写一部专著《16 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原想以财政为主线，涵盖上至洪武永乐下至天启崇祯，分析明朝由兴盛而衰败的原因，但向该校权威费正清教授请教后被告知如此写法涉及面太宽，内容必定庞杂，最后将选题定位于 16 世纪。黄仁宇写完第一章后请他过目，费正清表示满意，但是认为历史论文的撰写重在分析，不宜过多描述。到第二章时，两人的观点发生了严重分歧，费正清表示不能再给他提什么意见了。1970 年黄仁宇完成了全部书稿送交费正清审核，但是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1971 年夏季，黄仁宇将文稿副本寄给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25—，又译“杜希德”），询问是否可能在剑桥出版。邮件发出后黄仁宇接到了费正清的答复，说可以把他的部分文稿在哈佛大学刊物上发表。但是黄仁宇不愿将书稿拆分，便婉拒了。1974 年《16 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付梓。

早在 1967 年 7 月黄仁宇就接到李约瑟博士邀请他加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编研计划。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72 年 8 月，黄仁宇终于携妻子和孩子到达剑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出了 200 多页的书稿，又从中提取 10000 字摘要，由黄仁宇和李约瑟共同署名刊登在香港、罗马和旧金山的专业期刊上。363 天后，为了按照美国移民局的规定时间申请加入美国国籍，黄仁宇携夫人与幼子匆匆从英国返回了美国。此后他的知名度进一步得到提高，曾先后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瓦萨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做专题演讲，还获得密歇根大学和古根汉姆基金会的研究经费，普林斯顿大学的《剑桥中国史》编辑部也邀请他为明代部分撰稿。

1979 年黄仁宇因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以“压缩编制”为由遭到解聘，知情人了解到主要是因为人事关系和学术歧见所致，几位华人同事为他奔走呼号也无济于事。他曾到当地的社会福利局去查询，得到的答复是：像他这样的情况 62 岁退休每月可能得到大约 400 美元的社会福利金，加上其他收入总共只有 600 美元，这还不到他一家每个月基本生活费用的一半。与此同时他的专著《万历十五年》出版也碰到了困难，虽然牟复礼和崔瑞德都一致肯定他书稿的学术价值，但是因为不是严格按照传统的学

术论著格式撰写，审稿人无法予以通过。后来黄仁宇把书稿译成汉语，托友人带到大陆，不久之后才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虽然黄仁宇在美国连续居住了19年，并且已经入籍，但是因为学术观点和思维习惯等原因使他长期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史学界和汉学界累累受到批评，使他无处倾诉。于是他决定将心中恩怨诉之笔端，开始撰写回忆录《黄河青山》。他不按时间地点顺序，灵感所至挥笔疾书，天马行空任由驰骋。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在他眼前出现的是故国的山河，印缅荒原与日寇厮杀的情景，在学术会议和访谈时的唇枪舌剑，是一番何等壮丽的景象！他以自己的历史观去审视过去和现在，自己和他人，中国与世界，听到不同的声音确实在所难免的。他在卷首语中赫然写道："为了独排众议，黄仁宇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英文稿《黄河青山》于1980—1983年写成，经过多次修改之后束之高阁，私下里曾向家人和友人表示必须等他百年之后才予发表。2000年黄仁宇驾鹤西归，物是人非，黄夫人将其手稿寄给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才得与读者见面。

这一阶段他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等专著，享誉华人学术界。他提出了"历史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和"数字化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主张以实证主义方式从技术角度来审视历史，以免引起意识形态纷争。所谓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包涵着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与西方历史学家通常说的"微观史学"并不是一组对立的概念。黄仁宇强调把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通过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才能解读历史。这样的历史不是普通编年体，也不是仅仅记录大事件的历史，个案分析可以并行不悖。不过，他告诫说：要明白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也不能凭个人的聪明才智就可以领悟获得的。①

他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不专门揭示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而是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的社会框架中来研究，实际上是淡化了社会矛盾和对人物与事件的本质分析。"大历史观"理论还认为，时代走向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只相当于戏剧中的角色，没有是非和责任。他的见解在史学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有许多学者质疑或批判他的观点，甚至说他是半途出家的历史学家，客观一点的说法是"学术性的历史著作不

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附录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是这么写的”。何炳棣也批评他“对历史不忠实”。①

黄仁宇入美国籍前娶格尔(Gayle)为妻,育有一子名杰弗逊(Jefferson)。2000年1月8日他在一场音乐会开场掌声中因心脏病发作,倒在在妻子怀中,经医院抢救无效辞世,享年83岁。同年11月20日他的妻子格尔也不幸去世。

黄仁宇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以及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和撰稿工作。他还写过两部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和《汴京残梦》,虽然是历史传闻,却立足于现实,写得中规中矩。他的著作在海峡两岸受到欢迎,主要作品有:

《缅北之战》(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

《明代的漕运》(The Grand Canal during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Ph.D Thesi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4年)。

《明代的国库管理》(Fis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9年)。

《16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年)。

《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年)。

《放宽历史的视界》(Broadening the Horizons of Chinese History. Armonk,New York:M.E.Sharpe,1987年)。

《中国大历史》(China:A Macro History.Armonk,New York:M.E.Sharpe,1988年)。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

《长沙白茉莉》(White Jasmin of Changsha,作者署名李尉昂,宋碧云译,台北:时报,1990年)。

《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

《资本主义与21世纪》(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

《现代中国的历程》(与劳思光、金耀基、戴国辉、高希均等合著,台北:华视,1992年)。

---

① 胡国洪:《何炳棣院士采访录》,载《金华日报》2008年5月25日。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

《近代中国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

《汴京残梦》(小说,作者署名李尉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

《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台北:商务印书馆,1998年)。

《关系千万重》(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张逸安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

《大历史不会萎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

《黄仁宇书信集》(北京:新星,2006年)。

十四、享誉美国学术界的口传历史学家唐德刚

唐德刚(Tong Tekong,1920—2009)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的唐老圩,在当地接受私塾和小学教育后上了合肥中学,少年时就圈点过《资治通鉴》。1939年秋他考进了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历史系,每当谈起郭廷以(1904—1975)、向达(1900—1966)、白寿彝(1909—2000)和韩儒林(1903—1983)等历史学家常为自己学校的名流感到自豪。1943年他完成了中央大学的课程,获得了学士学位,到大别山区的岳西中学当了一年的历史教员。1944年他还应聘在安徽学院史地系教授《西洋通史》,首次体验到为人师表之甘苦。

1946年他官费留学美国,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但是随着国内政局的动荡,他生活上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经济来源。1949年初春他只剩下七美元,还有一周房租未付,靠慈善机构的帮助才渡过难关。考虑到回国就业可能面临的窘境,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曾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专业。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大约有800名中国留学生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允许半工半读但不能回国。他曾给安徽学院的一位前系主任写信询问回国之事,但是却没有接到对方的回函,便开始考虑如何在北美安身立命。1952年他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1959年获得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1844—1860年美国对华外交》。

因为情治信息的需要,第二次大战后不少美国学者特别关注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但是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障碍他们的研究急需中国学者加盟。唐德刚根据当时的情况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开设了《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和《西洋文化史》等课程,并兼任该大学中文图书馆管理员七年。

关于唐德刚的教学生涯,他在《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中有这样一段概述:

> 作为一个以历史为专业的教师,我个人生涯中,十、九是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去了。在哥大自24岁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此已40余年。在哥大研究院专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书车'史料'进课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40年。前20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20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作专任。其中12年则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并负责设计和教授各种课目。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40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20种之多。作为一个'课目设计'(course proposal)的负责人,你纵不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其彻底的掌握。加以纽约市大的学生和家长们都来自世界各地,种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万般复杂。作为一个历史课目的教师,尤其是设计人,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得面面顾到。日久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也没一项知得太多的大杂家。荒时废业,莫此为甚。①

随着学术地位的提高,唐德刚以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和红学家的知名度享誉美国学术界。他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还与民国政要张学良、顾维

① 唐德刚:《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晚清七十年》第1—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

钧、李宗仁和陈立夫等人交往甚密。唐德刚与郭廷以都是中国近代史专家，特别关心美国华人史的研究。

唐德刚把中国4000多年的政治社会制度划分为“封建”、“帝制”和“民治”三大阶段。他认为中国从“封建”到“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过渡历时300年；从“帝制”转为“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在西方强权政治影响下发生了第二次转型，大约需要200年时间。如果不出现重大变故，到公元2040年中国历史可望走完第二个阶段，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所谓“历史三峡观”，是解读他的历史专著的一把钥匙。

历史研究使唐德刚体会到整理和抢救史料的重要性。恰巧此时他的老师阿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有意开展一项“口述历史计划”（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当时美国对很多国家都有兴趣，政府和基金会也有一笔基金为此目的服务。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The 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正式成立，韦慕庭为项目负责人之一。

唐德刚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助理，便利用自己的汉语和史学特长参与此项计划。他是现代中国口述史学会（The Society of O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的奠基人，呼吁把侨居海外有影响中国人士的经历通过口述方式记录下来，经整理或翻译后出版。根据唐德刚的估计，国民政府流亡海外的党政军官员至少有数百人，其中很多人都乐于参加口述历史工程为后代读者留言留影，这无疑是一个庞大艰巨但又功德无量的系统工程。当时胡适正闲居美国，唐德刚便以“安徽同乡”的身份前往拜访，又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名义与他商谈，拟订出了《自述大纲》工作程序。征得他的同意后，每次用半天或一天时间跟他交谈，在帮助他回忆自己政治和学术生涯中的重大事件过程中进行记录和同步录音。访谈结束后整理出一份《胡适口述自传》英文稿，由胡适本人审订。1958年4月胡适返台出任中研院院长，他的口述自传由编辑人员进行后期制作。1972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胡适口述自传》，1979年唐德刚参照原录音和胡适修订的初稿，将自传译成了中文。《胡适杂忆》是唐德刚专为《胡适口述自传》撰写的《序言》，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具体说明和分析。

1958年夏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柯克博士（Dr.Grayson Kirk，1903—1997）致函客居美国的李宗仁（Li Tsung-jen，1891—1969），询问他是否同意做一

项有关他本人的口述自传，如获允许，校方愿意提供资助和相关支持。不久李宗仁函复乐观其成，唐德刚便被安排前往李公馆按胡适模式落实计划。唐德刚和李宗仁相见甚欢，不知疲倦地一次又一次谈了3年，对于这样一位当年叱诧风云的老人而言，这既是对他人格的信任也是对历史的尊重。经过无数次的撰写和修改，7年后终于完成了一部煌煌巨著《李宗仁回忆录》，详尽地记录了他从广西边陲省份的童年到南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坎坷历程。原稿用中文记录，定稿后译为英文，约60万字。

此后唐德刚还为顾维钧和张学良等人安排了传记口述，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留下了一笔珍贵财富。据《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学刊》的记载，从1958—1980年共有17位国民时期的政要和学者参与"口述历史"的项目：①

1.蔡增基	(Choy Jun-ke,1892—?)	1970年录制
2.陈光甫	(Chen Kung-fu,1881—1976)	1961年录制
3.陈立夫	(Chen Li-fu,1900—2001)	1959年录制
4.顾维钧	(koo Vi Kyuin Wellington,1888—1985)	1958—1975年录制
5.何廉	(Ho Franklin L. 1895—1975)	1966年录制
6.胡适	(Hu Shih,1891—1962)	1958年录制
7.蒋廷黻	(Tsiang Ting-fu,Fuller,1895—1965)	1965年录制
8.孔祥熙	(K'ung Hsiang-hsi,1880—1967)	1958年录制
9.李汉魂	(Li Han-hun,1895—1987)	1962年录制
10.李璜	(Li Huang,1895—1991)	195? 年录制
11.李书华	(Li Shu-hua,1890—1979)	1961年录制
12.李宗仁	(Li Tsung-jen,1891—1969)	1961年录制
13.沈亦云	(Shen I-yun,1894—1971)	1962年录制
14.吴国桢	(Wu Kuo-cheng,1903—1984)	1962年录制
15.张发奎	(Chang Fa-k'uei,1896—1980)	1970—1980年录制
16.左舜生	(Tso Shun-sheng,1893—1969)	1961年录制

① Table 1, Chinese Oral Project Collection of Reminiscence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No. 140, P. 72, Oct. 2006.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升温，两国之间人员互访逐渐增加。唐德刚通过各种渠道得悉80岁的老母依然翘首期盼与他相聚，使他兴奋多日，夜不能寐。他绕道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询问回国探亲的可能性，并及时办妥了相关手续。当航班飞临故国上空时他竟然老泪纵横，无法自已。阔别25年的母亲依然精神矍铄，笑迎海外归来的骨肉，是何等的喜悦和幸运。

1972年唐德刚因人事关系受到排挤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后受聘为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兼任系主任长达12年之久。1981年唐德刚以交换教授身份再度回国，先后访问了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所、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除了座谈、授课、观光和叙旧之外，他还参加了林则徐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1986年6月他再次回国参加在哈尔滨举办的国际《红楼梦》学术讨论会。

1987年后他回国参加的学术活动更多，日程表上所列的有：周秦汉唐史学术研讨会、胡适学术讨论会、纪念台儿庄大战5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安徽近代人物国际学术讨论会。

唐德刚除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还担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和旅居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徽同乡会会长。他组织会员通讯录的编印，安排各类学术会议、节日聚会、结伴出游以及接待国内访问团，还为华人子弟入托、入学、建幼儿园和医院而奔忙。

1991年唐德刚荣休。他和太太在美国40多年中，生活一向节俭，但是为华人的慈善机构捐钱却很慷慨。他还积极投入人道主义运动，参加各种集会、演讲和游行，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要求侵略者为其暴行谢罪和赔款。他发动同事声援保钓运动，曾代表纽约地区华人起草了一份《保钓宣言》，直接送往日本驻纽约和华盛顿使领馆。2002年，他与杨振宁等学者发起全球征集一亿人的签名运动，抗议日本右派分子非法登钓鱼岛，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平民战争伤亡和财产损失赔偿。

唐德刚将自己全部藏书共计124箱捐给了安徽大学。2002年唐德刚老家的地方政府将曾被征用的唐氏祖屋发还给他。为此他专程回国，将祖屋转交给家乡改建为希望小学，还捐赠了5000美元发展基金。

唐德刚不仅仅是史学家，也是独树一帜的散文家，创作过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所写的剧本、题跋和诗词已为多个版本的专辑所收录。

唐德刚的夫人吴昭文是中国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夫妇多年甘苦与共，举案齐眉。唐德刚晚年肾病缠身，严重时必须定期到医院透析。2009年10月26日他在旧金山家中辞世，享年89岁。

唐德刚的主要著述有：

《1844—1860年美国对华外交》(U.S.Diplomacy in China, 1844-186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年)。

《顾维钧回忆录》(The Memoirs of V.K.Wellington Koo. Published in Microfiche by the New York Times Inc., 1977年)。

《胡适回忆录》(The Memoirs of Hu Shih. Published in Microfiche by the New York Times Inc., 1977年)。

《李宗仁回忆录》(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9; Dawson Folkstone, England, 1979年)。

《胡适口述自传》(An Autobiography: As Told by Hu Shih (Chinese), Taipei: Chuan-chi Wen-Hsueh, 1981;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isty Press, 1980年)。

《胡适杂忆》(中文版1979年, Random Memories of Hu Shih (Chinese), Taipei: Chuan-chi Wen-Hsueh, 1985年)。

《第三种美国人》(The Third Americans: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n Asians in America with Annotations. Oak Park, Illinois: CHCUS, Inc. 1980年)。

《美国历史讲座》(Lectures on American History (Chinese), History Department of Shangtong University, 1982年)。

《战争与爱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书缘与人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梅兰芳传稿》(收入《五十年代的尘埃》，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

十五、以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文学评论家地位的夏志清

夏志清(Hsia chi-tsing) 1921年出生于上海浦东，祖籍江苏吴县。父亲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但是后来却在银行谋得了一个职员的差事。1942年夏志清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读过许多中国文学名著，喜欢西方

古典文学，研究过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 Blake Archive）。毕业后曾到台湾教了一学年的英文，1946 年 9 月由其兄长夏济安（1916—1965）推荐到所执教的北京大学教英文写作课。

1947 年湘籍旅美华侨李国钦（1892—?）捐赠北京大学文、法、理三科留美名额各一名，校方决定通过考试从年青教员中选拔留学人员，命题作文为《出洋留学两回事》，要求必须用英文完成，外加近期撰写的英文论文一篇，夏志清以 88 分的优秀成绩名列榜首。公榜后有人不服，校长胡适虽然并不看重毕业于教会学校的应试人员，但他还是批准了对夏志清的录取。

1951 年夏志清在耶鲁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1952 年又获耶鲁大学英文博士学位，此后曾协助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1905—1985）编写供美军军官培训使用的《中国手册》（China：An Area Manual）。1952—1955 年夏志清在编制上属于耶鲁大学研究员。1955 年他离开了纽黑文，在密歇根大学任访问讲师一年，教中国思想史等课程。此后他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 4000 美元的资助编写《中国当代小说史》，1961 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正文共三编：第一编初期（1917—1927 年，第 1—96 页），讨论了鲁迅、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许地山、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第二编成长的十年（1928—1937 年，第 97—250 页），讨论了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和吴组缃等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第三编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1937—1957 年，第 251—436 页），讨论并分析了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的创作思想和作品。①

这部专著在写法上有别于当时流行的正统文学史，对曾经被冷落的作家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夏志清把钱钟书评价为吴敬梓之后最有才华的讽刺小说家；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一部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中篇小说，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推崇备至；称赞张天翼为近十年出现的最富潜力的短篇小说家。1975 年夏志清获悉钱钟书已经过世，特地写了一篇《追悼钱钟书先生》的长文刊登在台北《中国时报》上。若干年后钱钟书依然健在，随团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使夏志清深感愧疚。夏志清还运用了中西方学界熟悉的语汇尽力提携余光中、陈世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Ⅲ—Ⅳ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年。

骧、卢飞白、于梨华和陈若曦等一批实力派作家。因此《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不久就被尊崇为文艺批评的典范之作，奠定了他的评论家地位。1962年夏志清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正教授。

王德威在《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中说：

> 夏志清教授的第一本英文专书《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西方学院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该专著综论1917年文学革命至1957年反右运动的半世纪间中国小说的流变与传承。全书体制恢宏，见解独到，对任何有志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该书所展现的批评视野，使夏志清得以跻身欧美著名评论家之列。在该书出版近40年后的今天，它仍与当代的批评议题息息相干。世纪末的学者治现代中国文学时，也许会碰到许多夏教授当年无从预见的理论和材料，但要另写一本同类专著不参照不辩难不反思他的观点是很难下笔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论述，使学界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来者必须充分吸收或辩驳他的观点才能推陈出新。①

夏志清在东西方冷战对峙时期参考资料极度匮乏的况下研究中国文学，对于中国大陆文艺现状和研究成果不甚了了，因此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分析和判断有时难免自说自话，缺乏令人信服的论据。出于意识形态的敏感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冷淡了鲁迅和萧红等文坛巨匠。他批评《阿Q正传》的“结构很机械，格调近似插科打诨”，“为时代所摆布，显然受到过誉”，引起了中西方文艺批评界有识之士的质疑。他在书中谈到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共产小说时，多次使用了“粗俗”和“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甚至还说“中共的小说，既然都是千篇一律，对于个别作者的讨论也是多余的”。（第405页）在论及丁玲的创作道路时，他说：“可是自1931年开始创作无产阶级小说后，（对性开放描写）这一点微带虚无主义色彩的坦诚态度也丧失了。剩下来的，只是宣传的滥调。”（第230页）涉及作家与政治关系时，夏志清说：“中共政权费尽心机去制造各式各样的敌人——美国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XI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帝国主义、蒋介石、地主、富翁以及一切反共的阴谋分子——来引导作家及人民的仇恨。"(第402页)读者的印象是,夏志清所使用的抗战前后国统区书肆和地摊文学的语汇,无疑降低了自己的身份。20世纪末中国留学生在欧美的一些中小城市偶尔还能遇到一些当年从叱咤风云的政界或学界退居下来的中国老人,对于世易时移的外部缤纷世界竟然一无所知,令人心情特别沉重。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有些学者把政治口号当作在海外安身立命的表态和通行证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认可这种选择的人将会越来越少。多元文化毕竟是充满希望倾向的开端。

20世纪60年代初捷克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在《通报》上发表了一篇逻辑严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直截了当地指出夏志清的研究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绝大部分内容旨在满足外在政治标准,因此对一些中国作家的评价和结论与史实不符。普实克并非等闲之辈,他是国际汉学界布拉格学派的代表,兼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著有《关于中国文学和学问》(1947)、《鲁迅:中国最伟大的作家》(1951)、《茅盾的文学道路》(1957)、《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性主义》(1957)和《中国现代文学简介》(1964)等专著。夏志清为此写了两篇长文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杂志《东方文案》(Archiv Orientalni)上发表,有意澄清事实,说明情况。1963年8月5日夏志清在写给捷克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Marian Galik)的一封信中说:"普实克教授几个月前曾来纽约——尽管他曾经对我的书写了一篇不友善的评论文章,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也很让人钦佩。"①

1986年唐德刚为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撰写了一篇《海外读红楼》,发表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杂志上。文中写道:

> 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

---

① 马立安·高利克:《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阎纯德和吴志良主编,第16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2009年。

唐德刚的中心议题是:文化冲突不限于满汉两族,古今皆然,中外亦同;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其实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夏志清读后心中愤愤不平,在台北《联合报》和《传记文学》以及美国《世界日报》上发表了长文《谏友篇——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全文共九节,分别为:"极右派的罪证"、"狄更斯改姓成孤儿"、"胆大心粗读导论"、"删削译文改原意"、"恶意类比,毫无道理"、"多少脚,昨晚梦魂中"、"评断小说非易事"、"林黛玉与梅兰芳"、"批夏之政治用意"。①

唐德刚回敬夏志清的文章《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刊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文章各节的小标题分别为:"夏教授的'大字报'"、"自骂和自捧"、"疯气要改改"、"学问倒不妨谈谈"、"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学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崇洋自卑的心态"、"对'文学传统'的违心之论"、"社会科学上的常识"、"从宏观论'左翼作家'"、"宏观下之'右翼'与'极右'"、"也谈:《块肉余生录》"、"'好莱坞'电影算不得学问"、"红学会议的资格问题"、"红学会的性质和意义"、"为林娘喊话"、"为梅郎除垢"、"做人总应有点良知"。从这些小标题可以看出当年对垒双方剑拔弩张,上纲上线互不相让,到了政治化和白热化的地步。

唐德刚和夏志清都是学养有素的海外华人学者。这次彼此论战,终于1986年10月10日在纽约文艺协会欢迎萧乾夫妇宴会的欢快气氛中平息,双方在闪光灯中握手言和。但是关心海外华人学术的读者认为,夏志清有时对于涉及大陆的文学评论表现出过于的敏感,往往因小见大,发挥过当。就《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言,他对大陆文学史中受到关注的作家以西方标准重新排了座次,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倾向太张扬了,更主要的是缺乏事实和依据,因此失诸公允。不管史家是否可以做到内修上善若水,外修至美如纯,"客观论道,公正传经"毕竟是传统美德。评论家的大度和包容是消除辩论中不必要火药味的良方,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以理服人才是交流上策。

1991年夏志清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2006年7月被推选

① 刘梦溪:《第十七次论争:唐德刚与夏志清之间》,《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91—39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下同。

为中研究院院士。他喜欢听评书,看京剧、电影和歌剧,2013 年 12 月 29 日逝世于纽约,享年 92 岁。他的主要著述有:

《1917—1957 年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With an appendix on Taiwa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中国古典小说导论》(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 年)。

《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 年)。

《20 世纪中国小说》(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 edited by C.T. Hsia,with the assistance of Joseph S.M.La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年)。

《文学的前途》(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 年)。

《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 年)。

《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 年)。

《1919—1949 年中国现代小说选》(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e,1919—1949,edited by Joseph S.M.Lau,C.T.Hsia,and Leo Ou-Fan Le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年)。

《印象的组合》(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1983 年)。

《鸡窗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84 年)。

《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 年)。

《先夏志清论中国文学》(C.T.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年)。

《夏志清序跋》(古吴轩出版社,2004 年)。

《谈文艺 忆师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

十六、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徐中约

徐中约 1923 年出生于上海,1946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专业。该校师资实力雄厚,方法上注重实证和考证,使他得以接受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训练。20 世纪 50 年代他从香港到美国深造,师从费正清、杨联陞、赖肖尔、兰格和叶理绥等学者,在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实践中他的史学研究水平很快就有所提升。1954 年他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此后曾执教于美国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任系主任多年。1971 年他被聘任为研究讲座教授（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1998 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教授。改革开放初期他曾回国探亲，感受到故国情怀。

《中国近代史》是徐中约的一部力作，1970 年出版，1971 年获加利福尼亚州“共有财富奖”（Commonwealth Prize）。该书重点探讨了 1600—2000 年间中国的内政外交的发展历程，叙述了中国如何从古老的儒家帝国转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在 17—20 世纪的 400 多年之间，中国历史发展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冲击，迫使中国作出被动回应开始，慢慢地进入到半殖民地模式的局面。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家根据所谓的“挑战与回应”理论分析了自汉唐以还封建统治者所执行的朝贡制度，并叙述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变化，从宏观的政治、外交、文化、社会和经济角度审视了清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作者不赞同以欧洲为中心的中国历史观，但是却有保留地接受了费正清学派的“冲击与回应”理论，因此被称为“折衷的历史观”。

编写一部中国通史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复杂人文工程，不如写地区史、行业史和断代史来得顺手，其中意识形态往往是最难突破的固有观念拘囿。研究中国史有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史学界对于基本的理论框架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共识应该得到尊重。徐中约通过对于史料和史实的解读、评价和分析，提出了中华文化与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之间只有相互通达取长补短才有可能发展的观点，这既体现了他个人的深厚学术功底，又验证了该领域多数学者深信不疑的信念。

学者们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分期有不同的看法。作为一部为西方高校编写的教材，《中国近代史》把明清时期作为近代史的起始点有助于读者对中国完整历史的理解，是一种成熟的思路，在教学的安排上这种切分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全书的内容丰富充实，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比较实事求是。当然是否合理还有待读者和受众的进一步验证，但是至少在美国史学界目前已获好评。这部中国历史的编写，体现了作者对美国汉学界迄今尚存争议问题所做的修正价值和意义。

徐中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有：

《中国现代的崛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年）。

《清代学术概论》（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梁启超专著

翻译,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年)。

《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 年》(China's Entry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Diplomatic Phase,1858-188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年)。

《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 年》(The Ili Crisis:A Study of Sino-Russian Diplomacy,1871—188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年)。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寻找世界新秩序》(China Without Mao: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年)。

《1866—1905 年晚清对外关系》(Chapter on Late Ch'ing Foreign Relations,1866—190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1:Late Ch'ing,1800—1911,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and Kwang-Ching Liu,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十七、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精神的余英时

余英时(Xu Ying-shih)1930 年 1 月 22 日出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其父余协中(1898—1983),名谊爽,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美国卡拉格大学和哈佛大学,曾任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天津南开大学和安徽大学教授,担任过民国政府官员、国立编译馆编辑和昆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后以外交联络员身份随中国远征军赴缅甸。1937—1946 余协中一家为避战祸暂住安徽乡下,20 世纪 40 年代末移居香港,1957 年定居美国。他共育两子,余英时为其长子。

1949 年余英时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50 年为与家人团聚他转学到香港新亚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师从中国传统哲学名家钱穆,成为首届新亚学院毕业生。1955 年由于钱穆的推荐他进入了哈佛大学历史系深造,师从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家杨联陞,1962 年获得博士学位。

余英时曾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讲授,1991—1992 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2001 年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和新加坡儒家伦理委员会海外顾问等职,培养了许多史学研究人才。他是少数能执教于常春藤联合会(Ivy League)院校的教授之一。1973 年他加入了美国籍,同年返回母校新亚学院任院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后来他重返哈佛大学执教,1977

年转入耶鲁大学,1987 年加盟普林斯顿大学,2001 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

余英时曾获多项名誉称号和奖励。1974 年他被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1977 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84 年任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92 年任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 年 11 月他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 Rewards Lifetime Achievement)。

余英时的个人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思想史领域,曾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士”。儒家学说认为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士”为己任。子贡曾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孟子也说过:“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从这一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学说,原典儒学就是关于“士”的修身道德规范和从政原则。孔子以中国价值维护者的高标准来要求“士”,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汉末的李膺(110—169)、陈藩、范滂(137—169),北宋的范仲淹(989—1052),晚明东林党人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曾经风里雨里为这一目标奋斗过。198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英时专著《士与中国文化》,对上述见解有所阐述。

余英时运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考察了宋明理学与两汉经学的关系,认为先秦儒学演变到乾嘉汉学是一种学术进步。他指出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与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对立倾向长期存在于儒家、道家和法家等先秦诸家之间,道家和法家对于知识和智慧一向表现出轻视甚至反对的态度。儒家虽然承认学习他人是成功的条件,如孔子所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至今仍有现实教育意义,但孔子也说过“仁者安乐,智者利仁”(论语·里仁),“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他显然把“智者”与“仁者”截然区分开来。西汉大儒扬雄(前 53—18)的重智思想被认为是缔造圣贤的一种修养,而明代全能大儒王阳明(1472—1529)的心学却明显地存在着反智识主义的倾向,可见儒家内部也有重智和反智两派。正如余英时所说:在对待知识和智慧问题上先秦各家学说中始终存在着对立派别。

中外学术界都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与现代民主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余英时从宏观角度研究传统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和思想具有内倾特征,与

现代生活并不抵触，只要对传统观念略作修正就可作为现代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余英时被学界视为新儒学的倡导者之一，但是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英时1974—1975年撰写的一部代表作，1976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刊行。全书分"内篇"八章（第1—182页）和"外篇"录·六章（第183—356页）。1985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章学诚遗书》，公布了一些此前未曾披露的重要资料，因此作者特撰《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作为"内篇"的补正，2000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增订本。余英时在该书《增订本自序》中写道：

> 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因此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所投射的影响，本书全未论及。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内在理路"说来取代"外缘影响"论。在历史因果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多元论者。历史上任何一方面的重大变动，其造因都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迄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个整齐系统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此即所谓"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必须指出，这种"自主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术思想的动向随时随地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之所以强调"内在理路"，是因为它是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determinism）的迷信，如"存在决定意识"之类。"内在理路"的有效性是受到严格限定的，它只能相对于一个特定的研究传统或学者社群而成立。①

戴震和章学诚的研究是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巅峰，显示出儒家学术思想如何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转变过程中兴起了智识主义的。余英时认为，仅仅从"满人入主中原"之类的外部因素，不足以揭示清代考据学兴起的原因，还应该分析其"内在理路"。作者同时运用了史学与心理学

①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第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0年。

诠释的方法对戴震和章学诚的研究进行了分析,以发现更多转型中的个人因素。有关章学诚的文史理论和清代思想史的解读,增加了结论的可信性。

余英时的研究表现出对历史上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他从通观历史的角度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如:顾颉刚、陈独秀、郭沫若、鲁迅、钱钟书和梁漱溟,大都辨析精当,入木三分。他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说:现在中国正在为建设一个强大国家而努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比什么时候都重要。

1973 年秋天余英时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执教,为建院十周年做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讲座,1974 年他的讲稿被译为英文在香港中文大学期刊《译丛》上发表,1978 年又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中文增订版。

"两个世界"是该书的中心议题,余英时认为《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一是曹雪芹经历过的历史世界,另一个是他在创作中所虚构的艺术世界。他还认为,不但小说《红楼梦》中有两个世界,《红楼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两个世界。他是从思想史和考据学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的,支持他的解读和研究方法的重要一点是他认为《红楼梦》属于一种"自传体"小说,大观园的兴衰史就是曹氏家族由显赫兴旺的皇族,因子孙贪图淫乐,分朋树党,终于到了罢官封产家败人亡的地步。考据学的工作就是对于有关典籍和史料与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描写进行验证和比照,找出史实与虚构的关系和程度。1978 年 11 月余英时在与俞平伯的一次会见中彼此讨论过《红楼梦》是否属于"自传体"小说的问题,俞平伯说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他就放弃了原来的观点,但是由于脂砚斋评语的公诸于世,他已经无力改变"自传体"观点的扩散了。

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书中说:

> 《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是分不开的,红学研究中的两个世界也同样无法截然划分。所以本书中有几篇讨论曹雪芹生平和所谓"脂批"的文字正是属于传统红学考证的范围。这些考证文字都是为"两个世界论"服务的,因为它们同样具有"自传说"的作用。自传派的红学考证从来就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它是在"自传说"的大前提的指导之下搜罗所谓"证据"。因此有时不免

曲解证据，甚至把完全不相干的历史资料当作“证据”来运用。在“自传说”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以考证破考证是一个必要的步骤。①

一般来说，作家创作中使用的素材，一是源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普遍参与、体验和观察；二是从自己记忆数据库中对个人阅历的调取。小说的素材可以构筑艺术的真实，但是它并不等于生活或者历史的真实，否则在跨越体裁的创作过程中就会受到太多的限制。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的残酷刑法体系中，一旦有人对号入座（传抄的文字也不例外），认为某部作品是对当朝重臣或者“明主”的影射，那么，轻则公堂之上鞭刑伺候，重则问斩灭族。昔日“皇恩浩荡”，瞬间化作似虎如狼。所以曹雪芹借托千年古石幻化，一道一僧唱着《好了歌》在开场和终场对风流公案作一交待，奉劝衮衮看官诸公即便心中有多少疑惑或者恩怨，事关性命前途，姑且搁置争议为好。另外他在《红楼梦》中对诸多敏感的人名、地名、朝代、服饰、官职和习俗，都尽可能作了泛化或者虚化处理（一言以蔽之“失落无考”）。如果以上观点成立，那么《红楼梦》研究中的史料考据似乎没有太大必要。难怪新红学派学者俞平伯最早觉悟，不再拿“自传体”来做《红楼梦》的文章；新红学派干将胡适自当驻美大使和中研院院长后也忙于应酬没有时间过问“自传体”的官司，在美国当寓公时心情纠葛，更无暇顾及此事。余英时说“自传派的红学考证从来就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是有感而发的。至于“以考证破考证”的托辞，与其说是作者“自嘲”，不如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余英时继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核心理念，治学中西合璧，古今贯通，儒家思想与道统文化（orthodoxy culture）的现代诠释兼顾。传承中有创新，吸收前先批判。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主要有：

《东汉生死观》（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62 年）。

《汉代的生命与不朽观念》（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5, 1964-1965 年）。

---

①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 2—3 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

《评崔瑞德对唐代财政管理的论述》(A Review Article on D. C. 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4. 1, 1964 年)。

《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的研究》,(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年)。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The Two Worlds of Hung-lou Meng, translated by Diana Yu, The Renditions—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 2, Spring 1974 年)。

《清代儒家智识主义兴起之刍议》(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XI. 1/2, December 1975 年)。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6 年)。

《关于 17 世纪中国智识转换的解读》(Towar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0. 2, 1980 年)。

《古代中国有关来世观念新证》(New Evidence on the Early Chinese Conception of Afterlif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I. 1 November 198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古代史研究》(Early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or and principal author, Seattl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年)。

《中国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George Kao, 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ngs Past,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pp. 7—26, 1982 年)。

《戴震与朱熹传统》(Tai Chen and the Chu Hsi Tradition, in Chan Ping-leung, ed.,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Studies in Chinese Librarianship, Literature, Language, History and Ar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376—392, 1982 年)。

《个人主义与魏晋时期的新道家运动》(Individualism and Neo-Taoist Movement in Wei-Chin China, in Donald Munro,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121—155, 1985 年)。

《桐城派》(T'ung-ch'eng School,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itor and compiler,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837—840, 1986 年)。

《道德与朱熹哲学体系中的知识》(Morality and Knowledge in Chu Hsi's Philosophical System, in Wing-tsit Chan, ed., 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228—254, 1986 年)。

《汉代对外关系》(Han Foreign Relations, in 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 C. ~ A. D. 2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77—462, 1986 年)。

《魂兮归来:前佛教中国有关灵魂和来世观念变化研究》(O Soul, Come Back!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t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 2　363 ~ 395, December 1987 年)。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居于哲学与语文学之间的戴震》(Tai Chen's Choi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2. 1, 79 ~ 108, 1989 年)。

《孙文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Sun Yat-sen's Doctr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Chu-yuan Cheng, ed., Sun Yat-sen's Doctrine and the Modern World. Boulder & London: Westview Press, pp. 79—102, 1989 年)。

《匈奴》(The Hsiung-nu, in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8—150, 1990 年)。

《新文化拐点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国际亚洲历史学家协会第 12 次会议基调演说》(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 A Keynote Address to the 12th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pp. 10—30, 1991 年)。

《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

《现代编年体传记与史学概念》(Modern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and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hinese Historians 6.1: 31 ~ 43, Spring 1993 年)。

《唐宋过渡的智力突破》(Intellectual Breakthroughs in the T'ang-Sung Transition, in Willard J.Peterson, Andrew H.Plaks and Ying-shih Yu, eds., The Power of Cultur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pp. 158—171, 1994 年)。

《文化的威力:中国文化史研究》(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Co-editor with Willard J. Peterson and Andrew H. Plak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4 年)。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观念变化》(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onnroth, Karl Molin, Ragnar Bjo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78.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pp. 155—174, 1994 年)。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与革命拜物教》(Modernization versus Fetishism of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c Wu and Yun-han Chu, eds.,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Taipei: 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 pp. 59—74, 1995 年)。

《章学诚与戴震:18 世纪中国的智识挑战与回应研究》(Zhang Xuecheng versus Dai Zhen: A Study in Intellectual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Philip J.Ivanhoe, ed., Chinese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Nivison and His Critics. Chicago and La Salle: Open Court, pp. 121—154, 1996 年)。

《民主观念与现代中国精英文化之曙光》(The Idea of Democracy and the Twilight of the Elite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in Ron Bontekoe and Marietta Stepaniants, eds., Justice and Democracy: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 199—215, 1997 年)。

《中国民族主义新浪潮》(China's New Wave of Nationalism, in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Yun-han Chu, and Hung-mao Tien,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257—264, 1997 年)。

《商贸文化与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商人文化演变之研究》(Business Cul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s—Toward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Merchant Culture in Chinese History, in Wang Gungwu and Wong Siu-lun, eds., Dynamic Hong Kong: Its Business and Cultur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1—84, 1997 年)。

《中国知识分子论》(康正果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儒家伦理学与资本主义》(Confucian Ethics and Capitalism, in The Challenge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Response of Eastern Ethics. Asa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eoul, South Korea, pp. 57—77, 1998 年)。

《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增订版)。

《民主、人权与儒家文化》(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onfucian Culture, The Fifth Huang Hsing Foundation Hsueh Chun-tu Distinguished Lecture in Asian Studies, Asian Studies Centre, St. Antony's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 pp. 1—22, 2000 年)。

《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何俊 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史学研究经验谈》(邵东方 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年)。

《中国文化史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

《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 年)。

《朱熹的历史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上海三联书店,2012 年)。

《余英时访谈录》(陈致 访谈,中华书局,2012 年)。

《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十八、基于语言与文学的中国人文研究开拓者周策纵

周策纵 1916 年出生于湖南祁阳(今祁东县),字幼琴。父亲周耿琴(1887—1951)光绪三十年(1904)秀才,曾参加同盟会,并在长沙组建反清武装。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指挥新军五十标(团)参加长沙光复战役和武汉战役,后肩负主持武汉《江声报》、《自由日报》、《新民国日报》和《洞庭波》笔政的重任。1913 年讨袁之役失败后他亡命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求学,翌年回国任《新民国日报》主编。1921 年湖南开始联省自治,他受聘为省宪审查委员和首届省议员,兼任长沙《大中国日报》和《大公报》副刊主

编。1925 年他因不满官场黑暗退归故里,创办大营市小学,1939 年又创办祁阳达孝中学,任校长长达 23 年之久。他擅长诗文和甲骨文研究,重视以传统文化教育子女。

周策纵 9 岁入新武小学读书,后入衡阳五中和岳云中学,受到有革新思想教师的影响。作为校刊《长高学生》主编,他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在国文、历史、地理、写作和书法方面与众不同的才能。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金陵大学农学院,但是后来却转学到重庆中央政治大学攻读行政学位课程。1942 年毕业后他曾主编《新认识月刊》、《市政月刊》和《新批评》,一度供职于重庆市政府。1945 年他升迁至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与陈布雷(1890—1948)、陶希圣(1899—1988)和徐复观共事。1947 年他看不惯政界党派纷争,为实现个人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他决定自费留学美国。

1948 年周策纵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课程。1954 年他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54—1962 年他供职于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1960 年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扩写成一部 55 万字的专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正文包括:第一章导言(第 1—20 页);第一部分五四运动的展开(第一至十章,第 21—371 页);第二部分主要思潮的分析(第十一至十四章,372—506 页)①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先后再版了 7 次。

周策纵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思想和过程进行了分析,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作用加以探讨,使之成为海内外研究五四运动的经典著作。过去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主要聚焦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等方面。周策纵强调此次学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科学和人权的先声。在他看来,"五四"精神不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的革命;是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结合,旨在通过思想解放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公正。他认为"五四"学潮可以定位于 1917—1921 年之间:1919 年之前在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开始传播变革思想,1919 年之后激进学生把思想武器对准了旧体制及其官僚。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之后又一个历史里程碑。中国知识分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

子通过暴风雨的洗礼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就必须跟旧思想旧制度决裂，确认人权和民族独立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前提，使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领域进入革命阶段。所以，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思想革命，从而推动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

在该书第十四章第六节“对‘五四’功过的再评价”中，周策纵写道：

> 大致地说，五四运动的倾向几乎决定了以后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在这场思想骚动中开始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和民族意识一直长盛不衰。“五四”以后，新知识分子继续和更强烈地要求现代“科学文化”，要求有一个有效力的政府以保证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各民族的独立平等。历史标明，那些违逆这股潮流而动的政治领导人和派系招致了自身的垮台，而那些“弄潮儿”尽管有种种曲折和闪避，但最终占取了上风。争取个人解放、宣扬民主和独立思考的不懈努力，虽然后来遭到来自强调服从组织活动思潮的阻挡，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所种下的破除偶像的种子已不是轻易可以除去的。民主在人们心目中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自此以后，甚至那些极力反对民主的人也只能采取迂回对抗的手法。任何专制主义都将感到，忠实地记述这场运动是对它自身的一个威胁。
>
> 如果说这些是“五四”时期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那么这里也不妨举出它一些一般的缺陷。改革者们在对中国旧传统进行批判时，很少有人对之作过公平的或怀有同情心的考察。他们认为几千年的社会停滞不前，给进步和改革之途留下无数障碍，为了清除这些障碍，对于整个传统过火的攻击和对其价值的低估是难免的。这使得儒家学说和民族遗产中的许多精华遭到忽视或避而不提。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改革者们的批判在一些方面是肤浅的、缺乏分辨的和过于简单化的。但这在当时整个民族充满惰性的状况下也许是必要的。
>
>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从外国输入的新思想又过于轻信。虽然他们也声称要进行批判的研究，但在实践中却做得很不够。他们往往大谈空泛的“主义”，而对其内容却没

有做认真细致的考察。结果,尽管有一些要防止不清晰的思想的告诫,但他们对于西方思想仍是常常含混不清地要么大力提倡,要么全盘否定。这或许是任何一个群众性思想转变过程初期的一种自然现象。①

1963年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后,周策纵的汉学研究从中国近代史的费正清模式转向语言、文字与文学领域的中国人文研究方向。他的研究范围广及文学、历史、政治、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其中对《红楼梦》的研究是他在文学方面的一大成就。令人难以想象等是,在他"弃园"寓所林林总总的藏书中,各个时期出版的《红楼梦》、红学著述以及红学书刊就多达数千册。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红楼梦》考证、文论撰写和疑难释读,但是策划国内外红学研讨会所占用时间却无法具体量化。1980年6月他在威斯康星成功地主持了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其后又相继促成了第二、三、四、五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扬州、台北和北京召开,其中苦乐和付出只有他自己知道。最能代表他的红学研究成就的论文有:《论关于凤姐的"一从二令三人木"》(1961)、《〈红楼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1971)、《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1972)、《〈红楼梦〉"本旨"试说》(1980)、《〈红楼梦〉与〈西游补〉》(1980)、《玉玺·婚姻·红楼梦——曹雪芹家世政治关系溯源》(1982)、《有关曹雪芹的一件切身世——胖瘦辨》(1986)、《天命与大义·分与情——〈红楼梦〉里的一个思想问题及其背景》(1986)、《红楼梦大观》(1987)、《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得失》(1997)和《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2000)。

1978年周策纵为筹备第一届国际红学研讨会返回大陆,在北京华侨大厦与周汝昌见面。这两位饮誉海内外的红学大家过去没有机会接触,此次相见执手言欢,畅谈多时,从此书信不断。1980年夏第一届国际红学大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周汝昌应邀率团出席,会上会下,言无不尽。周策纵热情邀请周汝昌再游北美,不久促成他以访问教授身份又一次赴威斯康星,为尽地主之谊他自己开车伴游。周策纵为参加胡适百年诞辰赴台,周汝昌应邀代课,深受学子欢迎。1991年门生为庆祝周策纵75大寿编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第497—49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辑纪念文集向周汝昌索稿,周汝昌用诗句表达了彼此宏愿:“欲结奇盟动天地,直齐宇宙筑红楼!”1998 年 11 月,中国 13 家文化教育单位联合为周汝昌举办八秩寿诞庆典,特别推出了《周汝昌红学精品集》。主办者曾函邀周策纵莅临仪式,他因故未能参加,但是寄去了贺诗表达深情。

几十年来周策纵以不同方式向美国学界介绍了中国文化。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先后开设了中国文化史、佛学史和哲学史课程,创办了“五四”研究班、书法培训班和《易经》讲习班,帮助学子深入体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他以威斯康星大学为基地,1963—1994 年长达 31 年的教学与研究中,开拓了基于语言与文学的中国人文研究,其特色有别于基于近现代历史思想的哈佛大学汉学研究。

1981 年以后周策纵多次到大陆和台湾讲学,不遗余力地扩大中外学术界之间的交流。在个人电脑还未普及的年代,他就率先在威斯康星大学指导学生采用电脑数据分析对《红楼梦》后 40 回是否为高鹗续书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是最早运用电脑研究《红楼梦》的汉学家之一。

周策纵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方语言和历史系终身教授,曾先后获美国福特基金会学术奖、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学术奖、美国古根汉姆学术奖和美国科学院学术奖。他被推选为国际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主席。

周策纵博学多才、学风严谨,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与汉学研究相结合,开拓了人文研究的新领域,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汉学大师。周策纵也是一位有实际创作经验的作家与艺术家,对东西方古今文学理论与作品有深入研究。2007 年 5 月他病逝于美国旧金山阿巴尼家中。

他的主要著述有:

《论儒、释、道三教之交互影响》(On the Mutual Influence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National Heritage, Changsha, 1936 年)。

《荀子礼乐论发微》(An Exploration of Xunzi's Philosophy on Music and Rites, Academic World Monthly, Shanghai, Vol. 34, No. 2, January 16, 1937 年)。

《汉晋诗歌中所表现的妇女生活及婚姻问题》(Women's Life and Marital Problem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from the Han and Jin Periods, Reading and Study Monthly, Vol. 1, Nos. 4 & 5, August 1940 年)。

《进化的人性论与革命民权说》(The Evolutionist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ary Civil Rights, New Political Science

Monthly, Chongqing, Vol. 5, No. 2, December 1940 年)。

《政治与冲动:罗素政治思想研究之政治目的论》(Politics and Impulse: the Purpose of Politics, a Study of Bertrand Russell's Political Thought, New Understanding, Vol. 5, No. 6, August 15, 1942 年)。

《"五四运动"意义的新估价》(A New Evalu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eping Daily, May 4, 1947 年)。

《依新装,评旧制——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特征(Measure Old Practices by New Standards: The Signific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L'Impartial, Shanghai, May 4, 1947 年)。

《论"五四运动"》(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entral Daily, May 6, 1947 年)。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年)。

《从〈哀郢〉论屈原的放逐》(On the Banishment of Qu Yuan, Based on Qu's Poem, -A Lament for The World Forum, Vol. 1, No. 2, February 1, 1960 年)。

《〈哀郢〉译记及〈哀郢〉新译》(A Vernacular Translation of-Ai Ying, with Notes on the Translation, The World Forum, Vol. 1, No. 2, February 1, 1960 年)。

《论有关凤姐的"一从二令三人木"——《红楼梦》考之一》(The Solution to Lady Phoenix's Riddle,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World Forum, Vol. 2, No. 11, November 1, 1961 年)。

《论王国维〈人间词〉》(On Wang Guowei's Ci Poetry Collection, In the Human World, The World Forum, Vol. 3, No. 2, February 1, 1962 年)。

《"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achut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97 pp. 1963 年)。

《墨家起源新说》(A New Theory on the Origins of Mohism—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XV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Ann Arbor, Michigan, August 17, 1967 年)。

《文林:中国人文研究》(Wen-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Vol. 1. Edited.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325 pp. 1968 年)。

《中文单字连写区分刍议》(That Chinese Compound Words Should Be Written and Printed As a Unit, a Preliminary Suggestion, Singapore, New Year's Day Special Issue, 1968 年)。

《"五四运动"的本质和评价》(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ts Nature and An Evaluation), trans. Peiqiong, Pangu, no. 24, May 25, 1969 年)。

《〈破斧〉新诂:诗经研究之一》(A New Study of-The Broken Axes from the Book of Poetry. Singapore: Island Society, 1969. 70 pp. First published as an article in 1968 年)。

《文道探原》(Ancient Chinese View on Literature, the Tao, and Their Relationship—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t. Croix, Virgin Islands, December 6-10, 1970 年)。

《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tudying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Ming Pao Monthly, Vol. 7, No. 5, serial No. 77, May 1972 年)。

《关于屈原与杜甫——答徐复观教授》(About Qu Yuan and Du Fu—further discussions on These Poets in Reply to Professor Xu Fuguan, Ming Pao Monthly, Vol. 8, no. 7, serial No. 9, July 1973 年)。

《论诗小札——与叶嘉莹教授论杜甫〈秋兴八首〉书》(Letters on Poetry [4]: A Letter to Professor Chia-ying Yeh Discussing Du Fu's-Autumn Thoughts, Eight Poems, Dalu zazhi, Vol. 50, No. 6, June 15, 1975 年)。

《关于中国文学和现代诗的谈话:访问记》(My View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odern Poetry—An Interview, Youth Monthly, Taiwan, Vol. 42, No. 5, serial No. 275, November 1, 1975 年)。

《论词体的通名与个性——金云鹏著〈唐宋词评论书目〉小序》(On *Ci* as a Poetic Genre, a Foreword to Stanley M. Ginsberg, A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 on T'ang and Sung Tz'u Poet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hina Series, No. 3, December 1975 年)。

《我对中国文学及思想史的看法——访问记》(My View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An interview, China Times Weekly, No. 250, June 7, 1976 年)。

《周策纵教授谈汉学研究》(中英对照访问记)(Professor Chow Tse-tsung on Chinese Stud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U.S.A.]) (An Interview, text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nterflow, a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ly 1977 年)。

《与周策纵教授谈为学方法》(胡菊人访问)(Professor Chow Tse-tsung on Research Methods: An Interview by Hu Juren on July 9, 1977, Ming Pao Monthly, Vol. 12, No. 9, serial No. 141, September 1977 年)。

《漫谈欧美汉学的新趋向》(访问记)(New Trends in Sinology in the U. S. and Europe—An Interview, Nanyang shangbao (Kuala Lumpur, Malaysia), March 27, 1979 年)。

《"五四"与中国》(May Fourth and China. Co-authored; edited by Zhou Yangshan. Taipei: Shi Bao Wenhua Chuban Gongsi, 1979 年)。

《新文学六十岁》(New Literature Turns Sixty: An Interview, Eight Views of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no. 1, September 1, 1979 年)。

《中国古代的巫医与祭祀、历史、乐舞、及诗的关系》(Ancient Chinese Wu Shaman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acrifices, History, Dance-Music, and Poetry,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ol. 12, Nos. 1-2, December 1979 年)。

《〈红楼梦〉是世界文学——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开幕词》(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a Masterpiece of World Literature: Opening Remarks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Zhong Bao Yuekan, Hong Kong, No. 8, September 1980 年)。

《〈红楼梦〉"本旨"试说》(1980 年 6 月 18 日在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所提论文)(An Exploration of the Authorial Intent Behi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June 18, 1980 年)。

《和巴金的谈话》(钟玲与刘晓梅据录音整理)(Conversations with Ba Jin, edited by Chung Ling and Liu Xiaomei from a recording, Ming Pao Daily News, December 19-28, 1981 年)。

《中国诗与中国语言:1982 年 3 月 13 日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讲演》(Chinese Poetry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A Speech Given a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March 13, 1982 年)。

《如何从古文字与经典探索古代社会与思想史》(在 1983 年 9 月 5~9 日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之中国古文字研讨会上所提论文)(How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Ancient Society and Thought Using Paleography and Classical Texts—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Paleograph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ptember 5-9, 1983, Ming pao Monthly, Vol. 18, No. 12, serial No. 216, December 1983 年)。

《甲骨文巫字初义探源》(O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Graph Wu from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at Yinxu, Anyang, October 16, 1984 年)。

《谈诗》(访问记),(On Poetry—An Interview, Harbin Daily, June 17, 1986 年)。

《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Ancient Chinese Wu Shamanistic Medicine and Poetry: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China's Romantic Literature. Taipei: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pp. 364, 1986 年)。

《红楼梦大观》(A Grand View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o-authored and Prefaced. Hong Kong: Baixing Banyuekan Chubanbu, p. 326, 1987 年)。

《苏轼〈念奴娇〉赤壁词格律与原文试考》(Su Shi's Ci Poem on the Red Cliff—Nian nu jiao: A Study of the Poem's Standard Metrical Pattern and Original Text, Zhongguo Yuwen Tongxun, No. 20, May 1992 年)。

《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陶文考释》(Testimony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istory Four Millenniums Ago: A Study of the Pottery Inscription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Unearthed at Dinggong Village, Zouping County (I), Ming Pao Monthly, Vol. 28, No. 12, serial No. 336, December 1993 年)。

《〈易经〉里的针灸医术纪录考释》(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Records in the I Ching—A Proposed New Discovery, Sino Humanita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naugural issue, April 1995 年)。

《"五四"思潮对汉学的影响及其检讨——1991 年 6 月 18~21 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国际汉学会议上宣读论文》(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 Movement: A Study and Evaluation of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A Paper Give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held by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June 18-21, 1991, Beijing: Zhonghua Shuju, September 1995 年)。

十九、对中国考古学和台湾史前史研究贡献杰出的张光直

张光直(Chang Kwang-chi)1931年4月15日出生于北京,祖籍台湾台北县板桥。父亲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先锋人物、哥哥张光正青少年时期就到苏区参加革命,他和弟弟张光诚与父母生活在一起。1943—1946年张光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每天上下学走过高高的城墙,街头叫卖的烧饼、麻花、炸油饼,热闹的厂甸,12岁那年花一块大洋买到的宋拓王羲之字体的《大唐圣教序》——故都浓郁文化氛围给少年张光直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返台,他转学到台北市建国中学,在左派校长陈文彬和国文教师罗铁鹰的影响下,接受了许多新事物,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有一天他在街头购得一本考古学专家裴文中(1904—1982)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一年台湾大学开设了考古人类学专业,他便以第一志愿通过了录取考试。在攻读专业期间他师从我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1896—1979),学习了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为目的、以欧洲考古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方法的中国考古人类学,并广泛吸取了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营养,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先进手段进行科际协同研究。

1949年4月6日,台湾军警对要求提高公费待遇的台湾大学和台湾师大学生进行弹压,抓捕学生100余名,张光直不幸受到牵连,通过一年多的交涉才获释。此事对于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1954年张光直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毕业后,便到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研。196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开始执教于耶鲁大学人类学系,长达16年之久。1977年他回到母校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81—1984年被聘任为人类学系系主任。

早在20世纪50年代,聚落考古学就已作为一门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在美国悄然兴起,开始了美国考古学的新阶段。张光直在哈佛大学的导师戈登·伦道夫·威利(Gordon Randolph Willey,1913—2002),是一位通过对秘鲁的比鲁河谷(Viru)研究确立了聚落形态研究法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他的启迪下开展了对聚落形态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发表了数篇有关美洲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的论文,为他后来撰写《古代中国考古

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是由威利指导的成果,也是将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史前史研究的经典案例。在哈佛大学张光直还跟研究旧石器时代的专家哈勒姆·伦纳德·莫维斯(Hallam Leonard Movius,1907—1987)学习了欧洲传统考古学的田野考查法。

张光直在哈佛大学读研时积极投入了新考古学的讨论和实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他深知科学方法和理论的重要,但是又不能忽视文化传统对个人行为的指导作用。他不盲从任何一个学派的主张,而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实践自己的准则。他以人类学的观点研究中国考古学,以世界性的眼光观察中国问题,把中国考古学纳入了世界的学术体系内。他珍视中西考古学的传承,但在具体研究中却处处联系中国的现实情况,通过对比揭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起源和特征上的异同。他在美国接触到多种学派和学说,广泛涉猎了有关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著作,正确定位自己的职责和任务。他把学到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后来开展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勇敢地承担起促进中西考古学界交流的责任,从文明起源与扩散的高度努力探索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历史联系。他为中外学术交流所做的杰出贡献,得到了国际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肯定。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在海内外学术界曾经有"西方中心说"、"东西方二元对立说"和"多元说"三种见解。张光直最初赞同20世纪50年代后期盛行的中华文明是单一继承的观点,认为中华文化由商周文化、龙山文化到仰韶文化的脉络发展而来,这种见解实际上是对"西方中心说"的一种批驳。1959年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一文中还提出了"龙山形成期"的理论,认为在历史上中原文化一直处于向四周扩散的优势地位。

张光直在《古代世界的商文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陈述:

> 在《东方的摇篮》一书里,何炳棣做了这样的探讨,他的结论是"输入中国的所有文化因子,不仅数量少,就质量和年代上说,无论对任何主要的中国文化因素的起源或者整个中国文化的形成,都没有多少关系"。
>
> 何炳棣的研究有充分的事实为依据,但是我们很难把它看作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定论。威廉·麦克内尔(William H.

McNeill)在为何氏一书撰写的序言里讲道,他对何氏论辩的力量深为折服,他说他发现"很难想象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够推翻或者根本改变这项研究的总的结论"。

在对何著持批评态度的另一书评里,吉德纬(David Keightley)向何氏发出挑战,而且罗列了几种他认为可以重创何著的证据。我不想充当他们的裁判,但是我得说,尽管何炳棣的著作不是最后的定论,但在将来相反的可靠的证据出现以前,我们必须接受(就我所知吉德纬也同意)何氏的总的结论。

不过,现在的真正问题不是中国文明的本土性问题,目前的大量证据已经证明了它的本土性。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本土发展,是否足以关系到利用中国的材料为人类一般演进模式的研究做出贡献。对此,麦克内尔的回答显然是相当肯定的:"(中国文明的本土观)要求西方人放弃他们旧有的人类全体根本沿同一途径走向文明的观点,——这种观点,凑巧珍藏在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等等的社会发展普遍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里"。①

随着考古新发现公诸社会,"西方中心说"受到了无情的挑战。1986年张光直在第四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了中华文化"七个相互作用圈"的新观点,强调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在文化上相互交流影响的可能性,说明中华文明是由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文化的源流在古中国所形成的。红山文化和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掘证明了他的论断的正确。随着世界考古技术的发展,出土文物数量增加,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又提出了人类文明传播的"连续与断裂"模式。张光直在他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论文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解读。考古学是一门跨越时空的学科,涉及遗迹遗物研究、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文献学和文字学等多个学科,需要研究人员深厚的学养,敏锐的目光,科学的论断和修正观点的勇气。张光直正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

张光直毕生从事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研究,他的最大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其远见卓识在哈佛大学创建了中国考古学专业,这在西方高校中也

① 张光直:《古代世界的商文明》(陈星灿译),载《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属先例;二是经过他的努力促成了台湾历史研究所的成立,以及开展由他主持的"台湾史前史研究"和"台湾浊水大肚两溪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研究计划"两个重大田野考古项目。这些都是他对考古学发展所做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发表的有关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和南岛语系关系的论述,对于东西方史前史的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4—1965 年他主持的台北的大坌坑、园山和高雄凤鼻头的考古发掘,以及 1972—1976 年对于台湾浊水与大肚流域的考查报告,进一步揭示了福建和广东大陆东南沿海省份与台湾大坌坑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

张光直对于中国青铜时代、聚落形态、商王庙号、青铜纹饰和台湾史前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在研究机构的创建、田野考古的实施、中外学术交流以及两岸学术互动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的晚年学术兴趣转向了宗教信仰和艺术。

1974 年他获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1979 年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 年获选为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1987 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5—1988 年他被推选为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兼任哈佛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1994—1996 年他出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1996 年亚洲研究学会授予他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

张光直一生笔耕勤奋,兴趣广泛,学风严谨。他在中国史前史研究方面的许多论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培养了多位英才,出版专著十余本,论文一百多篇。但是他患帕金森症多年,默默地地忍受痛苦,为的是争取更多著述和参与活动的时间。1996 年由于健康原因辞职,回美休养,2001 年 1 月 3 日病逝于马萨诸塞州,享年 70 岁。

他的代表作品有:

《古代中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1963 年)。

《商王庙号新考》(台湾:《民族学研究所季刊》第 15 期,1963 年)。

《考古学再思》(Rethinking Archaeology,1967 年)。

《聚落考古学》(Settlement Archaeology,1968 年)。

《凤鼻头、大坌坑与台湾史前史》(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Vol.No. 73, 1969 年)。

《中国古代文明:人类学展望》(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1976 年)。

《中国饮食文化:考古历史展望》(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1977 年)。

《商代文明》(Shang Civilization,1980 年)。

《美术、神话与祭祀:中国古代掌权之道》(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1983 年)。

《蕃薯人的故事》(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

《青铜挥麈》(张光直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

《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2002 年)。

二十、从比较视野中探索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陈启云

陈启云(Chi-yun Chen)1933 年出生于广州,祖籍广东省电白县。他上幼稚园时日军就侵入了广州,为了避难一家逃往法租界的广州湾。他父亲在那儿办了一家《岭南日报》报馆,因为刊登了有关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负面新闻,一度被捕入狱。父亲被营救出来后举家迁往乡下,后来又辗转到了香港和台湾。抗战胜利前半年他母亲去世。

1956 年他毕业于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后在香港新亚学院读硕士学位课程,师从国学大师钱穆。他的硕士论文选题《两晋三省制度之渊源、特色及其演变》,重点研究中国制度史。1958—1960 年他留校从事研究工作,完成了《元明胥吏》和《蒙古人统治下中国南方经济势力之发展与朱明建国之关系》两部书稿。1960 年由恩师推荐,他以香港新亚学院助理研究员身份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的资助,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导师为汉学家杨联陞。陈启云用了三年时间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后来到马来亚大学一边教中国历史和思想史,一边赶写自己的博士论文,1967 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陈启云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执教 27 年。其间,1973—1975 年兼任哈佛大学客座副教授,1980—1981 年任香港中文大学莫庆锵讲座教授,1991—1993 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他还先后应聘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

国研究中心的博士学位校外评审。1994 年他任加利福尼亚大学终身荣誉教授,并兼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1996 年他荣任人才发展基金会的杰出人才讲座教授;2002 年被提升为新竹清华大学终身荣誉教授和新竹商银荣誉讲座教授。2005 年他受聘为天津南开大学陈省身讲座教授,2006 年受聘为吉林大学名誉教授。头衔多意味着肩负的责任重大,他凡事都认真负责,努力为学子们开拓学科新领域。

陈启云研究中国古代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定位,早期他偏重于政治制度的考证,后来较多关注相关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被聘任为讲座教授前后多聚焦于思想文化史研究。他认为按照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说法,中国的思想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思想传统缺乏对"认识论"的关注;二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明确的"真理"观念。① 他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理论建树是多方面的,从近年来的著作和访谈看,他围绕历史认识论谈到了如何正确理解"历史"的定义、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2008)的"文明冲突论"的危害性、"国学"、"汉学"和"中国学"的本质差异、反理性思潮对史学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批判、学术界对于贺德太(Rechard Holstadter, 1916—1970)"反智识主义"的误读,以及研究方法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等问题。

40 多年来陈启云对古前期中国史(汉、魏、晋、南北朝)和古代思想史领域的研究硕果累累,享有很高的知名度。197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了各国史学精英编写《人类科学文化史》,历时 19 年完成了该项工程,于 1994—1997 出版了《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陈启云是参编的三位华人历史学家之一,分工负责《秦帝国》和《汉帝国》部分的撰写。

陈启云关心时局,关心社会,常在美国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美国的一些负面决策。2002 年年底美国扬言要攻打伊拉克,他便为报纸撰写社论,反对这一动议。2003 年 2 月初加利福尼亚大学学术评议会以 90% 以上的票数通过了委员代表起草的《反对入侵伊拉克的公开宣言》,他与同事一起出席了那次会议并投了一票。为了缅怀母亲,他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专门捐资设立了基金会,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为"陈邵博贞纪念基

① 吕庙军:《在中西比较视野下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艰辛探索——陈启云教授访谈录》,《史学集刊》2009 年第二期。

金”,奖励优秀学子发奋上进。他把仁爱之心化作学术研究的责任心:想着他人,为了他人。

陈启云的主要中英文学术著作有:

《荀悦的著作:〈汉纪〉与〈申鉴〉》(Preblems of Hsun Yueh's Writing: Han-chih and Shen-chien, Monumenta Serica 24, 1968 年)。

《荀悦(148—209 年):一位中世纪早期儒士的生平与反思》(Hsun Yueh A.D. 148-209: The Life and Reflections of An Early Medieval Confuci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年)。

《荀悦与东汉思潮——〈申鉴〉译注与引言》(Hsun Yueh and the Mind of Late Han China: A Translation of the Shen-chien with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年)。

《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Han Dynasty China: Economy, Society, and State Power, T'ung Pao, 1984 年)。

《东汉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Confucian, Legalist, and Taoist thought in Later H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年)。

《从东西文化、学术、思想看〈易学〉的意义和特色》(中国哲学史, 1994 年)。

《秦汉帝国》(The Qin and Han Empires in UNESCO, History of Humanity, Vol. III, Ch. 26. Paris, and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 年)。

《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Han, Chin, and Six Dynasties Culture,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Researches o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Taipei: Hsin-wen feng Publishing Co., 1997 年)。

《荀悦与中世儒学》(Hsun Yueh and Medieval Confucianism,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年)。

《从亨廷顿的“文明意识”论孔学前景》(船山学刊, 2000 年)。

《从历史比较角度看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Ancient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From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03 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003 年)。

《关于思想文化史研究》(开放时代, 2003 年)。

《钱穆与中西思想文化比较——“历史主义”论释》(中国文化,2004年)。

《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史学集刊,2005年)。

《跨学科与超领域的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史学集刊,2006年)。

《钱穆的儒学观念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学术月刊,2007年)。

《地理与人文动态互应考析之一:中西地理环境的比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

《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史学集刊,2007年)。

《治史体悟——陈启云文集(一)》(Journey Through Historiography: Collected Works of Chi-yun Chen, 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年)。

《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二)》(Confucianism and and Culture-making In Han Dynasty China: Collected Works of Chi-yun Chen, I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7年)。

《中西方传统中的先验思想》(Transcendental Thought in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West, Academics Mothly, 2009年)。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Issues in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Social Sciences Frontiers, 2009年)。

《中西文化传统与“超越”哲思》(学术月刊,2009年)。

《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史学集刊,2009年)。

《历史“认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皇权与中华文化传统》(西江月,2010年)。

《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河北学刊,2010年)。

《社会名望与权力平衡:解读王敦之乱》(史学月刊,2010年)。

《中国传统社会领导层的建构和演变》(历史教学(高校版),2010年)。

二十一、汉藏语言比较、汉语语法史和方言史专家梅祖麟

梅祖麟(Mei,Tsu-lin)1933年生于北京,是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之子,北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侄子。

1952年梅祖麟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数学系,1954年获学士学位,1956获哈佛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62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62—1964他担任耶鲁大学哲学讲师。1964年任哈佛大学亚洲研究系助理教授,教了7年汉语。1967—1968年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汉语语言学访问学者。1969—1971年被哈佛大学聘任为副教授。1972—1994年他升任为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1972—1977年任系主任。1983年他应邀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了一学期的客座教授,开设了"汉语语法史选题研究"课程。1989年他到新竹清华大学当了一学期客座教授。

1992年梅祖麟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94年被推选为中研院院士,1997年任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通信研究员,2000年任康乃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名誉教授。

据梅祖麟本人回忆,他的专业道路、学术兴趣和研究课题的选择先后受到董同和(1911—1963)、勃劳克(Bernard Bloch,1907—1965)和罗杰瑞等三位学者的影响。①

梅祖麟在大学本科原来学习数学专业,慢慢地发现那不是自己的主攻方向。读哲学博士课程时他觉得哲学家争论的一些问题都是不可能解决的伪问题,因此总想找机会改学其他专业。在一次中国学者聚会时他与董同和偶然相遇。董同和专攻中国音韵学,40岁就出版了《中国音韵史》专著。他学问做得深,治学严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在哈佛旁听机器翻译和印欧语言史课。他关心学生,在学术研究话语权问题上主张师生平

① 梅祖麟:《我的学思历程》,载《中国语文研究》2001年第一期(总第十二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等,这一切使他对董同和的学识和为人感到钦佩。梅祖麟曾把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寄给他,向他请教,得到了他的回信,夸奖那是一篇"学人的文章,不是文人的文章"。"1955—1956 年间跟董先生的接触影响了我一生,在 60 年代使我走向汉语语言学的路,"梅祖麟回忆说。①

勃劳克是在语言学方面对梅祖麟影响最大的第二位学者。1956 年梅祖麟在耶鲁大学学习哲学的主要兴趣是语言哲学,觉得学点语言学可以扩大知识面,对于他兼任汉语教学也有帮助。1958 年他结束了博士研究生资格预考后就去听勃劳克为语言学系研究生开的语言学导论和语言结构两门课。为了赚钱谋生,梅祖麟一连几个夏天都在耶鲁大学当汉语"操练教师"(drill instructor),为此他也去旁听别的教员的语法课。当他第一次听到教员分析汉语的"动补结构"时,发现其中语法规则很有讲究,被深深地吸引了。教了几个夏天的中文后他对现代汉语语法系统已经有所了解。后来他读到几位英国哲学家讨论"主语"和"谓语"以及"尝试动词"和"成就动词"之间的差别文章时,觉得与语言事实并不相符,就先后撰写了《主语和谓语:语法初阶》和《汉语语法与哲学中的语言学运动》两篇文章,指出汉语语法在这方面跟英语有所不同。他后来撰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那两篇文章基础上扩充而成的。②

1967—1968 年梅祖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一年的汉语语言学访问学者,结识了比自己小三岁的罗杰瑞。那时他刚从台湾省完成了闽语田野调查回美,正在用比较拟构法重建共同闽语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他在上古音、闽语史、汉语音韵史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研究。那时梅祖麟还不熟悉欧洲语言史,跟杰瑞学习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经罗杰瑞的推荐他还读了俄国雅洪托夫(Sergei Yakhontov, 1926—　)、法国奥德里古(André Georges Haudricourt, 1911—1996)和加拿大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1922—)有关上古语音研究的著作。他们谈到了上古汉语中的词头、词尾、上古音和闽语之间的关系。他向罗杰瑞学习了汉语音韵史、借词和同源词的研究和传统训诂学的知识,改变了自己的语言观,认识到语言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词汇意义有分层(substratum)也有

---

① 梅祖麟:《我的学思历程》,载《中国语文研究》2001 年第一期(总第十二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② 梅祖麟:《我的学思历程》,载《中国语文研究》2001 年第一期(总第十二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表层(superstratum)的差异。语言可以观察,但是其结果却随着时间、场合和语言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不少追随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系统的学者都先后改变了观点,他发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①

梅祖麟戏称他 45 岁以前是"玩学问",虽然先后写过有关哲学、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文章,赏试过用新批评(New Criticism)和结构主义诗论(Structural Poetics)分析唐诗,但是合作者如高友功等人的见解居多。至于帮助读者了解并欣赏唐诗宋词和元白诗则主要还是靠名家的论著,渐渐地他觉得自己不适合搞文学批评,1976 年发表了《唐诗中的意义和比喻》一文后就不再写这类评论了。45 岁以后他才"打定主意做学问",认为汉语语法史是他觉得唯一能做出成绩来的领域。那时吕叔湘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太田辰夫(1916—1999)的《中国语历史文法》、王力的《汉语史稿》都是重要的论著,1968—1976 年他认真读了吕叔湘和太田推荐的语法史著述,终于进入状态,做出了成绩。

关于语言学研究中的理论和语料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经常关注的问题,也是专业风格和非专业风格的问题。梅祖麟说在哲学上他是实证派,不喜欢空谈。他也用理论,但是觉得整天谈理论没有什么用。结构主义研究和比较研究都是这样,要看实效。对于汉语语法史研究,文献那么多,得好好地理一下,连最基本的资料整理工作还没有做就谈理论没什么用。他的态度是:不反对用新的理论,也不反对谈理论,但是还是要看实效。②

梅祖麟的主要著述有:

《主语和谓语:语法初阶》(Subject and Predicate: A Grammatical Preliminary, Philosophical Review 52:153-175. 1961 年)。

《汉语语法与哲学中的语言学运动》(Chinese Grammar and the Linguistic Movement in Philosophy, Review of Metaphysic 14:463~492. 1961 年)。

《深层语法逻辑》(The Logic of Depth Grammar,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4:98~109. 1963 年)。

---

① 梅祖麟:《我的学思历程》,载《中国语文研究》2001 年第一期(总第十二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② 赵彤:《梅祖麟教授访谈录》,载《中华读书报》1999 年 3 月 24 日第九版。

《文法与诗中的模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 上:83~124,1969 年)。

《古汉语的数词"陆"》(The Numeral"Six"in Old Chinese,co-authored with Jerry Norman,in Roman Jakobson and Shigeo Kawamoto eds.,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Presented to Shiro Hattor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Tokyo:TEC,pp. 451—458. 1970 年)。

《唐宋汉语的语调和韵律与升调雏形》(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HJAS30. 86~110,1970 年)。

《唐诗的句法、用词与意象》(Syntax, Diction, 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co-authored with Yu-kung Kao,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51~136. 1971 年)。

《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 s-声字》(与罗杰瑞合著,《清华学报》9:96~105,1971 年)。

《王士祯七绝的末句》(Ending lines in Wang Shih-chen's 'ch'i-chueh,co-authored with Yu-kung Kao,in Christian Murck ed.,Artists and Traditions:Uses of the Past in Chinese Cul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 131—144. 1976 年)。

《古代华南的南岛语:部分词语佐证》(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Some Lexical Evidence,co-authored with Jerry Morman,Monumenta Serica 32:274~301. 1976 年)。

《16 世纪官话的声调与连读变调》(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16th Century Mandarin,Journal of Chinese Liguistics 5. 237~260,1977 年)。

《唐诗的意义、比喻和引喻》(Meaning,Metaphor and Allusion in T'ang Poetry,co-authored with Yu-kung Kao,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281~355. 1978 年)。

《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史语所集刊》49. 15~36,1978 年)。

《吴方言中关于"体"标志词源》(The Etymology of the Aspect Marker tsi in the Wu Dialect,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1-14. 1979 年)。

《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中国语文》427~433,1980 年)。

《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1. 65~77,1981 年)。

《明代宁波话的"来"字和现代汉语的"了"字》(《方言》66,1981 年)。

《古代楚方言中“夕([xi])”字的词义和语源》(《方言》215~218,1981年)。

《“之”和“其”的共有词源及其古汉语音位学的相关问题》(A common Etymon for chih 之 and ch'i 其 and Related Problems in Old Chinese Phonology,《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字组》,台北中研院,页185—212,1981年)。

《说“屙”和“恶”》(与张惠英合著,《中国语文》1983.3:219~220,1983年)。

《敦煌变文里的“熠没”和“[ju]举”字》(《中国语文》44~50,1983年)。

《从语言史看几本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北京,《语言学论丛》,1984年)。

《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The 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1: 199~207. 1984年)。

《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读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401~412,1986年)。

《唐、五代“这”、“那”不单用做主语》(《中国语文》205~207,1987年)。

《内部拟构汉语三例》(《中国语文》3.169~181,1988年)。

《杜甫的〈秋兴〉:从语言学角度的评论》(Tu Fu's Autumn Meditations: 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 co-authored with Yu-kung Ka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8:44~80,1998年)。

《上古汉语s-前缀的使役和命名功能》(The Causative and Di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Prefix in Old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ection on Longuistics and Paleograph,33~52,1989年)。

《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3.139~216,1990年)。

《词尾“底”和“的”的来源》(《史语所集刊》59.1:141~172,1991年)。

《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语言学论丛》16辑,1991年)。

《汉藏语的“岁、越”,“还(旋)、圜”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语文》325~

338,1992 年)。

《近代梵语韵律雏形》(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 co-authored with Victor Mai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1. 2:375-470. Then in Bernard Hung-Kay Luk and Barry D. Steben eds., Contacts between Cultures Vol. 3. Lewiston: E. Mellen Press, pp. 220—225. 1992 年)。

《再谈吴方言"体"的标记》(More on the Aspect Marker tsi in Wu Dialects, in Chen, Mathew Y. and Ovid Tzeng eds., In Honor of Wolliam S-Y. Wang, 323~332, 1994 年)。

《古汉语词法概念笔记》(Notes on the Morphology of Ideas in Ancient China, in Willard Peterson et al. eds., The Power of Culture: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37—46. 1994 年)。

《方言本字研究的两种方法》(《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一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页 1—12,1995 年)。

《几个闽语语法成份的时间层次》(与杨秀芳合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 1:1~21,1995 年)。

《汉语七个类型特征的来源》(《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四辑语言类型》,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页 81—103,1997 年)。

《"哥"字的来源补证》(余霭芹、远藤光晓编,《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东京:内山书店,页 97—102,1997 年)。

《台湾闽南话几个常用词的来源》(《训诂论丛》第三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 21—42,1997 年)。

《汉语语法史中几个反复出现的演变方式》(郭锡良主编,《古汉语语法论集:第二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选编》,北京:语文出版社,页 15—30,1998 年)。

《先秦两汉的一种完成貌句式——兼论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的来源》(《中国语文》4:285~294,1999 年)。

《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务馆,2000 年)。

《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中国语文》1:1~15,2001 年)。

《南北是非: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2002 年)。

《比较方法在中国,1926—1998》(《语言研究》,第 23 卷第 1 期 16~

26,2003 年)。

《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中国语文》,323~332,2004 年)。

《苏州话的“唔笃”(你们)和汉代的“若属”》(《方言》第 3 期,2004 年)。

《闽南话“给予”的本字及其语法功能的来源》(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004 年)。

《上古汉语动词浊清别义的来源——再论原始汉藏语 s-前缀的使动化构词功用》(《民族语文》3~19,2008 年)。

《甲骨文里的几个复辅音声母》(《中国语文》195~207,2008 年)。

二十二、中西哲学比较和儒家哲学与本体诠释学专家成中英

成中英(Chung-Ying Cheng)1935 年 11 月 8 日生於南京,祖籍湖北省阳新县。1956 年他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8 年获华盛顿大学哲学与逻辑学硕士学位后转学哈佛大学,1964 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常务理事,以及国际本体阐释学学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主席。自 1983 年起他执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现为该系教授。他还先后兼任耶鲁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客座哲学教授,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成中英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以及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1973 年他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创办了《中国哲学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并任总编辑。1978 年他主持了第一届国际中国哲学研讨会,为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和弘扬中国思想文化创建了一个新平台。他曾创办美国国际东西大学(International East West University)并兼任校董会总监和校长,还担任东西方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高级顾问以及国际环境决策管理咨询委员会环境哲学总顾问。他是国际易经学会、中国哲学高级研究中心、远东高级研究学院的创立者和主席,也是国际中国管理与现代伦理文教基金会的奠基人。他先后获得国家

科学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斯坦福哲学研究所和富布赖特基金会的奖励和资助。1995 年他曾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院名誉博士称号。

多年来成中英往返于夏威夷和中国内地之间，或利用假期与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哲学的同行交流。现在他正潜心于重新翻译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古典文献。

司马南等学者曾就“普世价值”（ecumenical value）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等问题与持不同观点的西方学者进行过争论。对此，成中英也一直在思考西方“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内涵差异问题，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自己更倾向于一种模糊的普遍主义，因为这样有利于相互沟通避免冲突。他解释说：

> 普世价值代表了启蒙时代以来衍生过来的价值观，现在我们谈到所谓的普世价值就会联系到西方人的价值观，然后西方人又倾向于强加于人。普遍主义或者普世价值，首先会被提升为独立于每一个个体、文化、经验的绝对客观存在。这种普遍性，从中国哲学角度来看，我们是反对的，因为这会脱离现实和经验。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宇宙观、生命观和历史观认为，人类是不断发展丰富，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从儒家来说，人是从体验历史经验中提取教训，不断发展，也就是《周易》中说的‘与时俱进’。儒家不把普遍性当作独立不变的价值观。①

成中英和他的同事及其相邻时代的学者都经历或者见证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儒家中心主义的失落和政治与学术对立的危机，曾经思考过儒家的自身重构和与世纪同步发展的问题。从前儒学（Early Confucianism）到后儒学（Neo-Confucianism）的演变便是中国知识分子为适应时世和社会改革而采取的重要对策。

学术界认为前儒学是在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的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心性之学，以封建体制和权贵为服务对象，以 1911 年以前的儒学典籍为圭臬，鼓励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

后儒学又称“新儒学”或者“新儒家”，自称与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之

① 石剑峰：《我是纯粹的哲学家》，《东方早报》2008 年 9 月 15 日。

间有着一脉相承的道统，儒家人文主义可以实现道德精神和思想文化的统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思潮中，部分学者坚信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可以在重建价值系统的基础上吸收西学营养，通过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

学术界认为，1921—1949 年哲学家熊十力（1885—1968）、梁漱溟、张君劢（1887—1969）、冯友兰、钱穆等学者属于新儒家的第一代人物；1950—1979 年哲学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是新儒家第二代的代表；1980 年至今哲学家成中英、刘述先（1934—　）、杜维明和余英时是新儒家第三代的传人。但是成中英并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的代表，认为自己所关心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儒家一派的传统。

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吸纳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等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之长，并借鉴了美国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以此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对道教和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如禅理）也一视同仁地加以肯定。他认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倡导以一种自我修养方式达到个人思想和精神的完善。成中英对宋明理学也有很多精辟见解，综观孔子、二程、朱王的儒家思想分析知识与道德的关系，强调从总体上看经学、理学和汉学都代表了中国哲学的独有智慧，有助于西方摆脱现代精神和文化的困境，使人类文明在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中健康发展。

关于新思潮中提倡的“民主精神”和“文明对话”，成中英说：

> 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儒家并不是不重视民主。中国儒家有一个传统，对“人”的重视，因为人是宇宙所生，每个人都有自主性，他上通于天，天人相通，所以人有独立性尊严，君要尊重这种尊严，要以民为主，或称为民本。中国的民主不是单纯的西方自由主义，是共同之善之下，以人为本的民主精神，兼顾人对共同之善的追求，强调沟通和行为的一致，达到共同的政治生活。
>
> ……
>
> 文明对话的意思就是，国与国、传统与传统、宗教与宗教之间对话解决问题。我认为文明对话需要五个步骤——理性认知，共同知识基础，理解对方要求价值，建立共识，最后合作。但这是否能够做到？我的观点是，对话允许模糊的空间，自由发挥的空间，

允许人们在自由发挥空间里寻求沟通点、创造沟通点，开拓一个多元空间。在这里面，中国的智慧是一方面不否定法律，另一方面强调道德的自我修养和相互信任，从而建立全球化的道德公共空间。①

成中英曾思考如何把中国哲学应用到当代社会。1979 年他尝试把《周易》理论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融哲学、管理和艺术为一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中国化"。1987 年 8 月他发表了《C 理论走出中国管理自己的天空》，创建了以《易经》哲学为主体的 C 理论架构。在他看来，《易经》的哲学精神可为企业管理开辟一个最佳的境界。

所谓的"C 理论"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管理理论，代表了 China（中国）、Change（易经）、Creativity（创造性）、Confucius（孔子）和 Culture（文化）等元素。C 理论的内在含义包括：Centrality（中心）、Control（控制）、Contingency（权变）、Coordination（协调）。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管理至关重要，可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坚定决策的信心和意志，形成新的动力，这就是 C 理论的关怀。

成中英的研究领域为中西哲学比较、儒家哲学与本体诠释学。他的学术魅力直接触及了西方哲学核心，为的是弘扬中国哲学精神并推动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之间的交流，以达到大善大美的境界。他先后撰写了 21 部专著，论文 250 篇。其中主要有：

《皮尔斯归纳有效或然论》（Peirce's Probabilistic Theory of Inductive Validit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Peirce Society, 1967 年）。

《孔夫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 in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 5 No. 5, 1968 年）。

《皮尔斯和刘易斯的归纳理论》（Peirce's and Lewis's Theories of Induc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ing Company,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1969 年）。

《古典儒学中的正名》（Rectifying Names（Cheng-Ming）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 in: Proceedings of the XXV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Orientalists: Essays in Asian Studies, editor Harry Lambly, Honolulu: University

① 石剑峰：《我是纯粹的哲学家》，载《东方早报》2008 年 9 月 15 日。

of Hawaii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s,1969 年)。

《儒家道德和人类玄学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Confucian Morality and Metaphysics of Man:A Historical Analysis,in: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71 年)。

《"一"是儒家道德具体应用的普遍原则》(*Yi* as a Universal Principle of Specific Application in Confucian Morality,in: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72 年)。

《中国哲学与汉语的生成统一》(A Generative Unity:Chinese Philosophy and Chinese Language,in:Journal for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3:1 1973 年)。

《中国哲学中的悟性、思想和个别》(Conscience,Mind and Individual in Chinese Philosophy,in: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2:1 1974 年)。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台北:三民书局,1974 年)。

《身心问题的哲学》(The Philosophical Aspects of the Mind-Body Problem, In English, Editing with Introduction and Article by Myself,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Honolulu,1975 年)。

《知识与价值:和谐,真理与正义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年)。

《从禅宗的"本体论诡论"到欧美佛学研究的现况》(《当代学人谈佛教》,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 年)。

《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传统"与"现代"理性的结合》(台北:三民书局,1988 年)。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 年)。

《世纪之交的抉择》(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 年)。

《文化、伦理与管理》(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

《新儒家哲学》(New Dimensions of Confucian/ Neo-Confucian Philosophy,In English,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Albany,1991 年)。

《权力与奖励的分配:民主与社会正义研究》(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Rewards:Studies in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edited with James Hsiung,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Washington,D.C.,1991 年)。

《中西哲学的会面对话》(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4 年)。

《知识与价值——成中英新儒学论著辑要》(李翔海编,北京: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1996 年)。

《论中西哲学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 年)。

《21 世纪:经济竞争力与文明说服力》(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年)。

《C 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修订本,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

《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年)。

《创造和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年)。

《当代中国哲学》(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edited with Nick Bunnin, with Foreword and Afterword of more than 50 pages, Blackwell Publishers, Boston United States and Oxford, England, 2002 年)。

《中国哲学百科全书 14 主要词条》(14 Major Entries in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edited by Antonio Cua,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年)。

《道与心:成中英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年)。

《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二十三、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李欧梵

李欧梵(Leo Ou-fan Lee)1939 年 10 月 10 日出生于河南太康,父亲李永刚和母亲周瑗都是当时中央大学音乐系毕业的音乐教育家。20 世纪 40 年代末李欧梵随父母迁居台湾省,1957 年就读于新竹中学。少年时代他曾喜欢当童子军,希望将来成为音乐指挥家,艺术和音乐成为他的热切追求。

1961 年他与白先勇和陈若曦一起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同年李欧梵赴美,先在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深造,后转到哈佛大学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1964 年获硕士学位,1970 年获博士学位。

1970—1972 年他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任为助理教授,1972—1976 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1976—1982 年任印第安那大学副教授,1982—1990 年晋升为芝加哥大学教授,1990—1994 年受聘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1994—2004 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2004 年 8

月他加盟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和宗教研究系，获聘为人文学科教授。

李欧梵有关鲁迅的研究以及关于20世纪30—40年代以上海为案例的中国都市文化论述，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长期潜心研究上海的舞厅、街道、影院、餐馆和咖啡馆等娱乐消费场所，以及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新派"作家的小说。在他看来那些作家的作品叙事都有一些现代性的实验，表现的是现代都市生活带给人们身心的冲击，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

《铁屋中的呐喊》是李欧梵研究鲁迅的一部力作，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构思，80年代后期脱稿。该书正文分三大部分共十章，分别为：第一部分：一位作家的产生；第一章家庭和教育（第3—26页）；第二章传统和"抗传统"（第27—54页）；第二部分：鲁迅的创作；第三章短篇小说之一：现代化技巧（第55—79页）；第四章短篇小说之二："独异个人"和"庸众"（第80—100页）；第五章《野草》：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第101—127页）；第六章杂文：对生活和现实的种种观感（第128—154页）；第三部分：关于文学和革命，第七章对文学和革命看法的变化和发展（第155—174页）；第八章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苏联文学（第175—201页）；第九章革命前夜（第202—222页）；第十章结束语：鲁迅的遗产（第223—234页）；附录：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235—262页）。

在该书的第一章中李欧梵写道：

> 鲁迅1936年逝世以后，被全国一致地赋予了民族英雄的地位。任何一位过去的或现在的中国作家，都不曾像这样在整个民族中被神化过。关于他的生平有过那么多的记载，对他的研究是那么细致入微，看来，再写一次传记是无必要的了。但是，正是由于这样大规模的偶像化，使鲁迅生平的某些方面被夸大得失去了分寸。①

李欧梵认为，过去鲁迅被视为新文化的权威，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光环。但是通过吸收包括夏济安和普实克等中西方汉学家对鲁迅研究的成果，以及他本人对鲁迅作品的全面

①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第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9年。

解读，逐渐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和精神世界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他发现鲁迅不仅仅是英勇的斗士，也是一位有着丰富感情的普通人，对中国传统有继承也有叛逆。鲁迅生活在充满冲突和斗争的时代，在经历了许多困惑、挫折和失败之后才悟出了人生真谛，其中有喜剧，也有悲剧。鲁迅晚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译介苏俄文学，积极投入左联文学运动，这些都是他思想中光辉的一面，但是并非全部。他在孤独中抗争，以自我牺牲的代价进行生命复仇的主题是高尚情怀，但是他只属于动荡社会的历史英雄。李欧梵在《鲁迅的现代艺术意识》中谈到了鲁迅思想的一些不为人知的"阴暗面"和艺术鉴赏中的"颓废面"，所以才"自以为发人所未言"。

诚然，对一位有贡献作家的过度神化容易使他的形像远离读者，但是一味追求"揭短"也往往使人难以接受，因此李欧梵的观点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异议和争论。人们尊重他的自由发言，对于他的诚恳和说理态度十分理解，只是担心被卷入阶级斗争年代的那种意识形态论战，或者为了照顾某些读者的接受能力而过分夸大其中一些见仁见智的成分（这就是鲁迅作品长期在台湾省被禁的原因之一），使问题复杂化。其实"神化"通常都不是读者的过错，如果说是舆论导向，倒也有几分道理。

李欧梵的学术兴趣后来转向了晚清文学和文学现代性（modernity）问题的研究。在《铁屋中的呐喊》中他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分析鲁迅的文学作品，认为鲁迅对西方创作技巧的运用是由他作品中的现代性所激发的。什么是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对此李欧梵因为其概念复杂而"故意绕着讲"，但是非专业读者可能把它误解为"时代性"或者"时间差"的问题，于是会联想到近年秋裤型高层建筑的设计者、把自己头发染成斑马纹的便衣、让大头苍蝇爬满自己半边脸的脑残行为艺术家、编排稀奇古怪穿越剧的电视导演、到法国卢浮宫和莫斯科红场跳广场舞的中国大妈，以及拿当代国人的假唱、同性恋、在投资市场以疯狂购金对抗美联储、到巴黎老佛爷百货商场扫货为开涮题材的相声演员。其实，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雕刻、摄影和建筑与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一般认为，现代性在看待历史和现实的观点上有别于古代和中世纪，它与资本主义的缘起关系密切。更具体地说，现代性是一种观察和解读现实世界的观念，一种写人状物的话语和风格，一种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思潮。现代主义文学家不主张用自己作品去真实地再现生活，只鼓励作家从主观心理感受出发去表现社会现实对人性的压迫和扭曲，就像塞万提斯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

李欧梵所关心的主要是现代性对于身为作家的鲁迅在个人世界观和文学角色方面的转换,以及鲁迅的小说、杂文和散文诗中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立场、意象、象征、反讽和叙事方式。当年鲁迅怀着救死扶伤的高尚情怀留学日本,但是有一天从屏幕画面上看到刽子手杀害无辜爱国同胞时,围观的国民竟然无动于衷,不由得对他们国民性中的麻木不仁和愚昧无知感到悲戚,决心弃医从文。对于官僚体制理性化的觉醒,就是鲁迅文学阅历中现代性的表现。

李欧梵在分析鲁迅《狂人日记》时发现,作品中的深沉宏大的叙事风格与练达严密的结构章法的结合,明显受到传奇和志怪小说以及20世纪域外文学的影响,用以抒发个人心中情怀,其清新可人的先锋色彩无疑是对于传统游记和笔记小说套路的反动。"狂人"是在病体康复后才发现世事秘密和人吃人的社会惨剧的,于是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章法的因果颠倒顺序增加了主题思想的可信度,直接从结论中追叙往事也是其现代性手法的另一处表现。李欧梵还总结了鲁迅在小说创作中人物描写与叙事的结合以及描写与简短复述兼用的手法,以此传达某一抽象命题或者刻意包装的说教。这是一种象征和写实技巧在鲁迅作品中的运用,与他的散文诗《野草》的行文风格和信息传递的技巧大体相当。

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第三章中写道:

> 显然,鲁迅的小说并非创作于偶然冲动,而是长期苦闷和反思以后积累起来的创作力的爆发。对后来的读者来说,鲁迅小说最易识别的标志就是感情的成熟。他发表《狂人日记》时已经37岁,心理上已是个中年人,却置身于年龄、思想都是青年一代人的狂热之中。和大多数"五四"早期那种过分浪漫主义、形式松散的作品相比,鲁迅小说严密的结构和富有学识的反讽,在那个时代完全是"非典型"的。和他年轻的同时代人不同,鲁迅在成为一个新文学作者时,已经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承载了许多过去经验的遗产。旧时的种种给予了他一种特殊的沉重悲怆的感情,要为创新而奋斗,要在一个承载着许多前人和种种陈规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来。许多早期"五四"作家响应了文学革命的号召,鲁迅是其中最自觉的实践者。他不是仅仅

喊出反传统的口号，而是积极寻求艺术地对待这传统，改造某些他视为可用的，扫除另一些，又辅以外国文学的榜样，重建自己的文学形式。他的创作确实是现代的，不仅是因为采用了“白话”，还由于它们在观念上、表现上都是全新的。

我着重通过中国传统的根子来寻求鲁迅的“现代性”，甚至不去考虑它的西方来源，是以他的亲身经历为依据的。值得注意的是：当鲁迅作为一位现代作家从事创作时，他同时也在教授着中国传统文学。从1920年起，他就在北京大学、北师大、女师大执教，其后又南下到厦门广州的大学任课。直到1928年到上海后才成为专业作家。学术工作的背景和侧面不仅赋予他的作品以学识的广度（他的许多杂文都是证明），也标志着他和露骨的西方倾向作家如徐志摩等大有区别，后者更直接地依教西方榜样，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洋”味。正是在这意义上，鲁迅才是一位更自觉的“中国现代作家”。①

1985年李欧梵曾获王安研究奖，1986年获古根海姆奖，2001年获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荣誉博士，2002年当选为第24届中研院院士。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李欧梵曾与舞蹈家王晓蓝（Lan-Lan Wang）结婚，后离婚。2000年9月他与李玉莹重组家庭。20世纪80年代初李欧梵第一次来北京，同行的还有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社长，为在美国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做前期准备工作。中国作家协会毕朔望安排了他们跟王蒙、张洁、刘心武和曹禺等作家见面，宾主在座谈会和宴席上的畅谈，为后来中美作家之间的交流做了很好的铺垫。

李欧梵是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著名作家和文化评论员，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化、小说和电影研究，先后出版了20余种中英文著作，长篇小说、散文及评论常刊发于《亚洲周刊》、《信报》、《明报月刊》和《瞄》。他的主要著述有：

《现代中国作家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年）。

---

①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第55—56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9年。

《西潮的彼岸》(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5 年)。

《抒情与叙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The Lyrical and the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年)。

《1919—1949 年现代中国小说》(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e 1919-1949,edited with Joseph Lau,C.T.H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年)。

《浪漫之余》(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 年)。

《中西文学的徊想》(香港:三联书店,1985 年)。

《鲁迅及其遗产》(Lu Xun and His Leg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年)。

《铁屋中的呐喊》(Voice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 年)。

《没有鬼佬的国度:中国人对 19 世纪中叶至今美国的印象》(Land Without Ghosts:Chinese Impressions of America 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David Arkush and Leo O.Le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年)。

《现代上海:1930—1945 年中国新都市文化的繁荣》(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年)。

《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

《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 年)。

《狐狸洞呓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

《范柳原忏情录》(长篇小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

《音乐的遐想》(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年)。

《世纪末的反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

《李欧梵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

《东方猎手》(长篇小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年)。

《中国现代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Merle Goldman and Leo Ou-fan Lee,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年)。

《文化之都预案:中国"五四"工程》(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Oldrich

Kral, and Graham Sanders Ed,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年)。

《过平常日子》(与李玉莹合著,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年)。

《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寻回香港文化》(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 年)。

《都市漫游者:文化观察》(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 年)。

《一起看海的日子》(与李玉莹合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恋恋浮城》(与李玉莹合著,香港:天窗出版社,2007 年)。

《两个世界之间的城市:我的香港》(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年)。

二十四、以多元化发展的目光审视传统儒学的杜维明

杜维明 1940 年 2 月 26 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祖藉广东南海县西樵乡。1945 年他随父母移居上海,在该市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49 年他随全家迁往台湾,就读于台北女师附小。1951 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台北建国中学学习。1954 年初中毕业升入该校高中,曾在老师周文杰指导下开始读四书。1955 年暑假他旁听了牟宗三讲授的中国哲学课。1957 年高中毕业后,他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入了台中东海大学外文系。1958 年他转入了中文系师从徐复观攻读儒学。第二年又师从鲁实先学习《文字学》和《历代文选》。1960 年在孙克宽指导下学习杜诗,在梁容若指导下学习中国文学课程并完成了学位论文。1961 年夏他从东海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开始服兵役,1962 年 8 月在嘉义退伍。

同年 9 月他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哈佛大学留学,1963 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64 年他师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选修宗教社会学,同时选修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 1902—1994)主讲的高级心理学。1965 年为准备博士论文他研读了现代欧洲和美国思想史、西方哲学以及中国思想史等必修课程。1966 年他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同年 6 月他出席了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召开的明代思想研讨会,会后访问了荷兰莱顿大学,顺游奥地利维也纳后返回台湾省,被聘任为东海大学人文学讲师,讲授"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课程。

1968—1971 年杜维明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76 年他加入了美国籍,

1971—1981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1981 年升任为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和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1988 年他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0 年他一度担任夏威夷东西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兼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1995 年他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开办了"国家讲座",从 1996 年起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杜维明在中学时代就受老师周文杰的影响对儒家学说产生了兴趣,东海大学教授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教导使他在研究儒家学说方面进入了更高层次。哈佛大学的比较思想史研究让他领悟到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他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起步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上半叶)他开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的探索,努力诠释儒学传统;第二阶段(1978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潜心解读儒家传统的内在价值并展示儒学的现代生命力,探讨的领域包括"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东亚工业"、"核心价值"和"轴心文明";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他进一步开拓了研究领域,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和"新轴心文明"。①

杜维明站在现代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一直以多元化发展的目光来审视传统儒学,力图通过诠释、传播和竞争,使中国文化朝着世界化的目标发展,提高知名度。他把中国儒学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先秦到汉唐的古典儒学(经学)以强劲势头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但是由于诸子百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佛教大规模传播的影响,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第二时期宋明新儒学(理学)经受了连年战乱和朝代更迭的洗礼,在创新和扩大中对佛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勇敢的挑战,逐渐提升至华夏乃至整个东亚思想和文化的核心地位。

第三时期鸦片战争以后的现代儒学受到西潮的大规模冲击,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日渐式微,为挽狂澜于既倒勇于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

杜维明认为孔子所选择的是一条入世之路。儒家"人为贵"的思想,

① 郭齐勇:《论杜维明学术思想——以新出〈杜维明文集〉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02 年第 4 期,114—119 页。

经过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与“科学”以及个人主义、放纵主义、商业至上和宗教超越思想的交流融合(如淡化了“夷夏之辨”和“儒佛道”的藩篱,与“三人行必有我师”精神协调的企业团队精神),逐步实现了价值转换,成为全球文明对话的一个重要伙伴。

第三时期现代儒学如何发展始终是杜维明所关注的问题。他透过国际视野,从普世关怀的意愿出发,把儒学的发展与东亚和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联系起来,同时扩大世界各国认同儒学的非华人族群范围。在儒家哲学重建的过程中,杜维明回应了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传统的挑战,同时希望儒学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从中找到交汇点,应对弗洛伊德有关存在主义色彩的人性阴暗面之类的理论。

杜维明有关儒学第三时期发展的考虑,是与以美国文化为主流的西方文明以及列文森有关“儒家传统业已死亡”的观点针锋相对的。现代儒学的复兴,还必须涵盖意识形态、学术话语、商业道德、市民社会、企业文化等当今思想文化领域所涉及的层面。

中国在实现“四化”过程中是否能保存儒家的传统?从儒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看,杜维明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新儒家理论应该成为回应西方冲击的正能量,也是对于家庭、公司、集体和国家的更大承诺。儒学将在知识分子自觉反思的基础上,用于直面西方文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挑战。他认为西方学人对儒家学说的关注“基本上是伦理,包括个人的修养问题,还有社会的和谐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儒学的人文精神是很宽广的。西方的人文学和人文主义基本上是反自然和反宗教的,对自然有侵略的倾向,对宗教不闻不问。但儒家所代表的人文学要求人类既要和自然保持和谐,又要与宗教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它的内涵比较宽广。”①

鸦片战争之后儒家的传统地位受到冲击,特别是“五四”以后受到批判,使人感到痛心。杜维明认为虽然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值得我们吸纳,但是理性的价值之外必须有同情,法制的价值之外必须有礼仪,权利的价值之外必须有责任,尊严的价值之外还应该有社会核心。儒学至今仍然活着,表明其历久不衰的金刚身。儒学不发展将是人类文化的遗憾。

杜维明在过去30多年中坚持不懈地探究、注释并推广儒家文化。他

① 唐勇:《访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环球时报》2006年8月27日。

把自己看作“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下来研究，关注如何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接轨的问题，借鉴哲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阐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发展的前景。

近年来，杜维明先后受聘为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旅美社会科学教授协会顾问、香港城市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并担任《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东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人文论丛》、《当代》、《二十一世纪》、《明报月刊》、《亚洲文化》和《人文杂志》等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委。

杜维明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了中英文著作 30 多部，论文数百篇。由于他的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 2001 年和 2002 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李退溪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他的主要著述有：

《传统中国》（Traditional China, co - edited with Liu, James T. C.,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0 年）。

《人文心灵的震荡》（Cultivation of the Heart-and-Mind, Taipei: Shibao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年）。

《行动中的宋明儒家思想：王阳明的青年时代》（Neo - 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 - Ming's Youth.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年）。

《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文集》（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 Boston: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78 年）。

《人性与自我修养》（Humanity and Self - Cultivation,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79 年）。

《今日的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Confucian Ethics Today: The Singapore Challenge. Singapore: Federal Publications, 1984 年）。

《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年）。

《中与庸：论儒学的宗教性》（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onfucian Religiousnes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年）。

《儒学的历史透视》(Confucia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89 年)。

《儒学人文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The Third Epoch of Confucian Humanism, Taipei: Lianjing Press, 1989 年)。

《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Reflection on Confucian Consciousness, Taipei: Lianjing Press, 1990 年)。

《三重和弦:儒家伦理、工业东亚及韦伯》(The Triadic Chord: Confucian Ethics, Industrial East Asia, and Max Weber: Proceedings of the 1987 Singapore Conference on Confucian Ethic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East Asia (edito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1991 年)。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

《儒家世界的透视:当代东亚儒家人文精神的讨论》(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主编, 1992 年)。

《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年)。

《转化中的中国》(China in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年)。

《常青树:今天做中国人的新含义》(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年)。

《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日本和"四小龙"的道德教育与经济文化》(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主编, 1996 年)。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年)。

《儒学与人权》(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Co-edited with De Barry, William Theodo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年)。

《文化中国的认知与关怀》(台北:稻乡出版社, 1999 年)。

《杜维明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

《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杜维明文集》(五卷)(武汉出版社, 2002 年)。

《儒学的精神性》(Confucian spirituality, Vols. 1-2. Co - edited with Tucker, Mary Evelyn, New York: Crossroad, 2003-2004 年)。

《儒学研究》(Confucian Studies, Vols. 1-4. Co - edited with Yao, Xinzhong, London: Routledge, 2010 年)。

第七章
中国通:美国汉学史中的华丽一族

从20世纪40年代起,美国国会、利益集团、传播媒体、政治家和中国通(old China hand)联合形成了一个可以左右对华关系的网络,成为美国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变数。其中的"中国通"又称"中国问题专家",原指19世纪侨居中国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人,后来泛指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文化和国情的外国人。早期的美国中国通多半是精通中国事务并可能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有影响力的外交官、政治家、学者和军人,如:戴维斯、谢伟思、费正清、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1900—1972)、柯乐博和齐文(Raymond P.Ludden,1909—1979)等人,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出身于来华传教士家庭。

1925—1949年来华采访的美国记者人数将近200人,其中不少人毕业于名校,为主流媒体和通讯社特派记者。虽然他们所持立场彼此各异,家庭背景和社会阅历不尽相同,有人追求革命与激进,也有人渴望了解东方文化和习俗,既对中国充满希望和期待,也有自己的猜测和成见,但是大都思维敏捷,对新闻工作满怀热忱。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1907—1997)、白修德(Theodore White,1915—1986)、阿格尼丝·史沫特莱、伊罗生(Harold Robert Lsaacs,1911—1986)、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1885—1970)、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2005)、欧文·拉铁摩尔等人,曾长期深入中国社会采访,向世界报道了当年不为外人所知的中国现状,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传遍了世界。他们都是这一历史时期美国中国通群体中的重要成员。

比起做学问的汉学家来,中国通的政治和官方色彩比较浓厚,其中一些人曾带着个人感情和兴趣涉猎过汉籍。虽然他们有机会为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咨询和服务,敢于就涉华问题发表公正意见,但是在国会听证

会或者著书立说为政府出谋划策时，也都表现出美利坚合众国忠实公民的姿态，在政治和国家利益问题上总是持正面的立场，普遍采取比较宽容的说理方式。

早先部分有从政经历的中国通没有受过正规学术训练，退出官场后往往供职于政策研究智库，或者以自由职业者身份等待签约。其中一些人缘于与中国的特殊历史渊源，善于与中国部门打交道，甚至与中国驻外机构官员或公众人物有过愉快交往，看问题比较客观实际，又有解决具体问题的才干和办法。不过多数中国问题专家都处于政府决策圈外，只能起说客或院外活动家（lobbist）的作用。也有一些人游走于官场和智库之间，随潮流而动。

20 世纪 40—50 年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人数不多，几届入主白宫的总统在对待新中国政府和蒋介石政权之间的态度曾一度表现出摇摆不定的倾向。为换取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牵制日本关东军，美国在与苏联签订的雅尔塔协定中所作的承诺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出动第七舰队介入台海的失衡，暴露出有远见卓识的对华外交人才数量和水平的不足。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官方开始支持组建中国问题专家团队，但是当时美国对新中国了解有限，国际关系分析中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侧重于政策性研究，强调实用价值，缺乏学科品格。他们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在港台对来华过客进行访谈，对中国报刊和广播资料进行剪辑汇编，或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心理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1949 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是纽约地区研究亚洲问题的重要科研机构，培养了约翰·佩顿·戴维斯和黎安友等人才。1955 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创办了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柯伟林（William C.Kirby）、孔飞力、马若德、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罗伯特·罗斯（Robert S.Ross）都是该中心培养出来的中国通。学员中不少人曾到中国港台高校学习过中文，为的是深化自己的专业研究，开阔视野。在哈佛大学，除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外还有燕京学社、亚洲中心、赖肖尔中心、韩国中心、东亚法律研究中心、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等相邻学科研究机构，拥有设备完善的图书馆或者资料库。

美国参议院内部的恩斯克斯坦基金会是根据研究分析中国军事政治决策与部署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机构之一，总部设立在加利福尼亚。目前该会已经组建成有 123 名成员的中国军政问题专家顾问团，其中 28 人是

来自大陆的中国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军事发展中心也是研究中国军事发展的一个机构,其成员霍华德·斯迪文森博士就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主张对华军事关系应该采取对抗与合作相结合的策略。

在中西对峙的冷战时期美国的不少中国通把中国视为苏联模式的极权主义国家,主要聚焦于精英政治和精英文化研究。20 世纪 60—70 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对行为主义反思基础上回归国家学派,力荐多元主义研究模式。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现出由双边争霸到单极独霸的倾向,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悄然退出了学术领域,中国问题研究成为热门。

美国各类智库声称独立于政府之外,但是却总是以不同方式影响并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左右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其中一些涉华研究项目直接受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委托,影响举足轻重。1962 年创立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目前有 80 位研究专家和大约 100 名助理。他们通过邀请决策者和智囊人物一起开展战略分析,然后向政府相关部门转达他们的共识,以此影响官方政策的构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也是经常开展中国问题讨论的美国智库之一,他们邀请观点相左的辩手参与讨论目的是为不同意见提供表达平台。有些辩手在交锋中往往以观点代替事实,因理论应用不当或者先入为主的偏见引发与会人员唇枪舌剑的争辩时有发生。除了专家互访和学者交换外,他们还采用问卷调查、定性定量分析、卫星资源、媒体手段以及出版刊物等方式。经常被评论和引用的出版物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Brookings Review)、尼克松中心的季刊《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以及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Foreign Affairs)双月刊等。

20 世纪 90 年代后出现的中国热浪潮推动了美国中国通人数的几何级增长,中国问题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外交课题。大华盛顿地区的中国研究学者、说客和咨询人员目前至少有 1200 多人。在 K 街和马萨诸塞大道两旁的智库有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和国际经济研究所,周边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和乔治·华盛顿大学都先后设立了中国研究项目或者中国研究中心,人数多、实力强、专业面广为其一大特色,有较强的竞争实力,有些智库还在中国开设了研

究分部。美国主要部委和兵种也都上马了中国研究专项,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中国分析员就有百人之多。

全美现在至少有1000多个成建制的汉学研究机构和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其中很多按照市场化和产业化方式运作。据专家估计,仅K街和马萨诸塞大道智库每年的交易额就高达30多亿美元,其产品的战略含金量待价而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Henry Harley 'Hap' Arnold,1886—1950)提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莫尼卡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兰德公司,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预言美军将败阵于朝鲜战争。也许当时五角大楼过高估计了美国在联合国的人脉和国防实力,也许兰德公司的报价太高,军方竟然不顾一切以联合国名义出兵朝鲜半岛,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在错误地方错误时间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①此事后来成了研究中心和智库教科书上的经典案例。除了反恐战争外,兰德公司现在的研究重点仍是中国问题,与美国国防部的关系至为密切。

新一代的美国中国通多数都懂汉语,重视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对华政策制定的建言。比起老一代中国通来,他们的兴趣更为开放和多元,普遍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探索兴趣。在研究方法上多采取很具体的研究方法,有的还举办学者与官员联席讨论会,选题范围从原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扩大到农村研究、环境保护、市民社会、人权保障、抗议运动、反恐联合、中外合资、对台军售和少数民族等方面。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宏韬伟略》一书中,对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用兵奏折中的"主战派"与"主和派"案例进行了量化统计,然后对照《武经七书》的资料,总结出中国的战略文化数据,很具学术魅力。

近年侨居美国的一些中国大陆研究生和学者的加盟为美国对华智库输入了新生力量。他们的优势是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考察方式,又熟悉西方的政治思维,研究问题的起点高,针对性明确。

中国通是美国汉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既善于通过引经据典在书香

---

① 美国奥马尔·布拉德利五星上将1951年5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武装力量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的发言称:"红色中国还没有实力主宰世界。参谋长联席会议坦率地认为:实施(入侵朝鲜)这一策略将把我们卷入在错误地方错误时间与错误的对手打响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墨海中推演兵法,又身怀绝技问鼎政界,敢于打动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美国政客改变谋略,期待在鲜花美酒香车中凯旋。如果把卫三畏列入前汉学时期的学者,那么费正清就是早期美国汉学史上最知名的领军人物。因为他在美国学术界和政界的影响都举足轻重,所以人们在尊称他为"汉学家"的同时也赋予他"中国通"的美誉,而他本人亦心领神会,乐此不疲。20世纪下半叶,美国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通,其中鲍大可、施乐伯和基辛格等人有较高的知名度。中美国家关系解冻以后,美国出现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何汉理、黎安友、奥克森伯格、李侃如和戴维·蓝普顿(David M. Lampton,1946—　)等人先后闪亮登场。他们是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可圈可点人物,也是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荣誉尽享的客卿。在局外人看来他们的专著和演讲只不过是与每周电视节目预告一样的新品,却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大印在握的白宫首脑对华政策的制定。

由于美国的中国研究队伍庞大,相关的学术机构众多,自由价值取向早已成为风尚,因此很难形成承上启下的美国传统和影响对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研究的统一倾向。中美两国关系,从1997年《中美联合公报》中"战略伙伴"关系的表述,到前国务卿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1937—　)的"战略竞争对手、经济合作伙伴",前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 1953—　)的"利益攸关方",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 1962—　)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再到何汉理的"经济竞争对手和战略合作伙伴"等诸多变化,可以看出美国中国通对于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不同思考和定位。即:中美两国间虽然存在着政策和认知差异,但是在相互利益协调并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过程中,是否单方面要求中国自行调整策略,还是中美两国都应该彼此相向而行,共同承担责任?在这一重大问题立场上,美国历届政要的观点显然是不完全一致的,美国中国通的代沟比任何国家都突出也是不争的事实。

一、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充满热情的罗德里克

罗德里克(John Prescott Roderick,1914—2008)出生于美国缅因州沃特维尔一个清贫家庭,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最小,幼年时父母先后去世。13岁那年他在缅因高尔夫球场当球童时就被中国消息激起了向往之情。

一位刚从上海回国的球员向他讲述了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事情，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要来中国看看。

他的新闻从业经历始于15岁，曾为当地《沃特维尔晨哨》(Waterville Morning Sentinel, Today's The Central Maine Morning Sentinel)写过有关中学活动的报导。1936年他毕业于科尔比学院，第二年通过朋友的介绍，参加了美联社组织的国会新闻采访。1941年美联社总部调他到华盛顿开展业务。当时珍珠港事件刚发生不久，他应征服役后被安排到耶鲁大学学习日文，培养他战后从事翻译工作。但是毕业后他却被派到昆明美国战略服务部(中央情报局前身)任职，准备到日军后方进行侦察谍报活动。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他所在的部队也解散了，但是他希望继续留在中国采访。

1945年11月他以美联社驻重庆记者身份访问了中国共产党圣地延安。当他看到星条旗在被称为"迪克西使团"的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的窑洞前升起时感触良多。在此后4年中他多次会见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及其战友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报道了由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Truman, 1884—1972)派遣的特使乔治·马歇尔上将(General George Marshall)斡旋中共与国民党之间谈判的情况，向美联社发送了有关毛泽东及其战友的事迹。1947年在一次采访毛泽东主席时他曾经流露出对中国未来的担忧，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两年后请到北平来采访我吧。"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未能来华，但是通过美国《生活周刊》(Weekly Life)编辑部委托法国摄影师亨利·卡尔捷·布雷松(Henri Cartier Bresson)所拍摄北平解放前夕市民生活的画面，他了解到中国命运的转折性变化。

不久罗德里克被调往中东。1948年以色列发表建国声明两个星期之后他到达约旦首都安曼，采访了联合国调停人康特·福尔克·贝纳多特(Count Folke Bernadotte)。他在伦敦和巴黎待了一段时间，1954年5月奠边府战役爆发时他被派往报道战况，1956年任美联社香港分社社长。1959年起他担任驻东京记者，花了5000日元(相当于25英镑)在日本东南部城市镰仓购买下了一座18世纪的农舍。

他是1971年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随团记者，见证了中美"乒乓外交"。在三位随团记者中，罗德里克的报道表现出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他注意到：跟1945年的印象比较起来，1971年的上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年的上海是罪恶的渊薮，到处是要饭的叫花子、肮脏的贫民窟、面黄肌瘦的人力

车夫、挣扎在死亡中的穷人,而1971年的上海街头已经看不到叫花子、人力车夫和穷人,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社会和谐,普通市民看上去都显得壮实、健康和自得其乐。他认为1971年的中国是变化中的友善巨人。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代表团时对罗德里克说:"你们已经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掀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史的新篇章。"①关于中美两国的关系问题,周恩来总理请罗德里克向尼克松政府转达: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不是立即从台湾撤军,但是美国政府应该正式发表声明表明不奉行"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政策。罗德里克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力荐美国政府接受这一观点,在后来两国建交的谈判中美国政府代表正式确认了这一原则。②

1978年和1991年,中国政府两次邀请仍然健在的迪克西使团成员及其家属访问延安。1979年3月他再次来华担任美联社北京分社首任社长。从1980年起他作为一名特派记者在亚洲各国采访,发表了许多见证中国变化的文章。

虽然他长期住在日本和夏威夷,但是却始终对于中国文化和政治充满热情。他是一名富有勇气的记者、风度翩翩的作家、故事大王和资深媒体人。在美联社供职近60年中他先后在中国、日本、欧洲和中东一些国家留下了足迹。1977年他获得"美联社特约撰稿人"头衔。从2006年开始他每月撰写一篇有关北京奥运会的系列文章。2008年2月18日他在为美联社的一篇撰稿中写道:"在我的昏花老眼中,中国从流血痛苦中复苏,摆脱了贫困,在极短时间内竟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1984年他正式退休,但是在70岁以前仍然笔耕不辍。他所作的有关中国问题讲座受到了许多西方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的欢迎,还通过电子邮件跟数百位亲友保持着联系。因为年迈失聪,他有时说话难免提高嗓门。在每年都造访的伦敦东方俱乐部,他常常大声谈论往事,品评餐桌上牡蛎的鲜美,或者夸赞某一服务生的漂亮,每每语惊四座。在生命最后几年,他与日裔妻子和养子居住在镰仓的农舍内,完成了自己的一部回忆录。

---

① John Roderick: *Premier Tells US Team Friendship Begins Anew*, *New York Times*, 15 April 1971.

② John Roderick: *Red China Hints Softening Of Position On Tie To US*, *New York Times*, 18 April 1971.

2008年他在檀香山公寓的病榻上,因严重心脏衰竭和肺炎无法正常交谈,只以微笑和点头方式与家人和朋友交流。临终前他除了巧克力冰淇淋什么都不能吃。他对身边的亲友说:"世人皆朋友,一起吃冰淇淋总比相互残杀好。"2008年3月5日他的养子对关心罗德里克的亲友说:"现在老人家身体极度虚弱。他觉得这辈子已经过得很充实,如今去意已决。"12日他以93岁高龄辞世。

罗德里克的主要著述:

《中国进步了,但是仍然贫穷》(John Roderick:China Progresses,But is Still A Have-not,*Washington Post*,19 April 1971年)。

《进步与笑脸迎接访华客人》(John Roderick:Progress and Instant Friendly Grins Greet A Visitor to China,*Washington Post*,19 April 1971年)。

《周恩来总理告诉美国乒乓球队友谊重新开始》(John Roderick:Premier Tells US Team Friendship Begins Anew,*New York Times*,15 April 1971年)。

《红色中国暗示软化对美联系立场》(John Roderick:Red China Hints Softening Of Position On Tie to US,*New York Times*,18 April 1971年)。

《关于中国》(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anuary 1,1972年)。

《中国报导:一名美国记者从中国革命年代到邓小平时代的媒体生涯》(Covering China: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Reporter from Revolutionary Days to the Deng Era October 1,1993年)。

《民家:我在日本的农舍》(Minka:My Farmhouse in Japan,October 4,2007年)

二、具有务实前瞻精神的东亚政治学家施乐伯

1919年10月19日施乐伯出生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斯(Leavenworth)的一个教师家庭。幼年时父亲为生计四处奔波,他一家辗转于堪萨斯和密苏里各地。虽然小学六年级时他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是因为家境清贫他只能就读于圣巴巴拉学院。他学习努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毕业后为攒钱读研究生学位他在母校教了一年书。1941年他结识了学习音乐专业的艾达·美伊

·杰森(Ida Mae Jesson),两情相投,两爱相依,不久便组成了家庭。

1941年9月施乐伯在哈佛大学政府学院读研。最初他打算学习欧洲政治和国际事务专业,但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应征入伍服役。1943年他在科罗拉多海军语言学校经过为期15个月的训练后被指派到夏威夷担任密码破译员。1945年年初他又被派往冲绳,通过阅读文献和与日俘谈话,提高了自己的日语水平,并修完了博士学位课程。

1946年秋天施乐伯返回哈佛大学,开始关注日本战后的民主问题。在他的博士论文《战前日本的民主与政党运动》中他回顾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民主进程因为20世纪30年代军人篡权而受挫,决定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整个亚洲。1947年他担任中国政治学家钱端升(Ch'ien Tuan-sheng)的助教时开始关注中国问题,同时还研修了三年的汉语课程。

1949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任助理教授。1953年他在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后,朝鲜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尽,他便全身心投入了教学和研究之中。在列文森、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罗伯特·贝拉(Robert Beira)和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hurmann)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加利福尼亚大学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亚洲研究中心。1956年施乐伯被晋升为教授。

1959年,他的一位旧友康伦(Richard Conlon)接受委托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起草一份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文件,邀请施乐伯为其中有关东北亚的章节执笔。他经过再三审慎思考,在文件中提出了反对孤立中国的观点,建议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通过谈判逐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消除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障碍。这份被历史学家称为"康伦报告"的出台引起了美国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接触,并拓展了美国学术界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研究。消息传到台湾省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时任国务卿的赫特(Christian Herter)匆忙表态"美国政策没有改变","康伦报告"随后束之高阁。

施乐伯是一位受到学生拥戴的讲师,除了研究中国和日本问题外还热衷于媒体的亚洲事务评论。1967年他撰写了一部专著《1920—1966年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后来又与李钟石(Chong-Sik Lee)合作出版了两卷本的《朝鲜的共产主义》,还与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于子乔(George T.Yu)合撰了《1850—1920年现代中国及其革命过程》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

1965年,施乐伯因为越南战争在校园内的争辩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在研究了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他认为抗击美军入侵的越南人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主张美国必须坚决抵制共产主义在越南的发展。这样他就成了校园反战运动的众矢之的。不但他的授课时常被打断，他和他的家人还遭到了人身威胁。两枚炸弹在他家门前爆炸之后警方为他家提供了半年的监控保护。但是在抗议声中他仍坚持授课，并一如既往地给予所有学生课业指导和帮助。他尽了最大努力维护着从 1962 年以来他所领导的政治学系的正常运转。

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施乐伯始终都是各类亚洲研讨会的热情参与者。1972 年以后他先后访问了中国 63 次。1962—1996 年他担任了《亚洲研究》(Asian Survey)主编，在对杂志社管理和选稿进行指导的过程中加深了自己有关亚洲各国的知识。他就被忽视的一些重要选题主动向学者约稿。在他本人为期刊撰写的文章中不仅谈到了区域内的政治问题，也涉及了亚洲各国与世界的热点，包括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他曾两次被提议担任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但是都被他谢绝了。

作为一位东亚政治学家，施乐伯曾先后兼任亚洲基金会、亚洲学会、大西洋理事会、全美亚洲研究所、外交关系协会和太平洋论坛的主任、顾问或理事。他和同事创建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并担任了第一任主席。该会宗旨为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并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完善。“乒乓外交”(Ping Pang Diplomacy)为该会提供了接待第一个中国访美友好团队的机会。从此以后该会就在接待赴美的中国政要和鼓励美国名流访华方面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他的务实前瞻精神，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1996 年台海危机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每半年都举行一次圆桌会议，邀请美国和海峡两岸学界代表参加，施乐伯每会必到，被视为推动两岸关系“第二轨道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的积极参与者。

1990 年他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岗位荣休。2011 年 11 月 1 日他因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并发症不幸辞世，享年 92 岁。

他先后独立或合作撰写、编辑有关亚洲政治和美国与亚洲政策的专著 39 部，论文 540 篇。1973 年他与李钟石合著的《朝鲜的共产主义》荣获伍德罗·威尔逊基金奖。他的主要著述有：

《战前日本的民主与党的运动》(Democracy and the Party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1953 年)。

《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with George

T.Yu,1961 年)。

《当代日本的党派和政治》(Parties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Japan, with Junnosuke Masumi,1962 年)。

《1920—1966 年的日本共产主义运动》(The Japa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20-1966,1967 年)。

《朝鲜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Korea, with Chong-Sik Lee,197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2 年)。

《亚洲的前进之路》(Asia and the Road Ahead,1975 年)。

《美国与韩国:向前看》(The United States and Korea: Looking Ahead, 1979 年)。

《早期日本的劳工运动》(The Early Japanese Labor Movement,1983 年)。

《发展政治学:20 世纪亚洲观》(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 Century Asia,1989 年)。

《处于十字路口的北朝鲜》(North Korea at a Crossroads,1997 年)。

《从莱文沃斯到拉萨:生活在革命时代》(From Leavenworth to Lhasa: Living in a Revolutionary Era,2008 年)。

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推动和维护者鲍大可

鲍大可 1921 年生于上海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父亲鲍乃德(Eugene Barnett)在 20 世纪初来华传教,创办了基督教青年会,曾担任上海中华基督教男青年会总干事。鲍大可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其兄长罗伯特·巴奈特曾任约翰逊政府助理国务卿,兄弟姊妹其他人均从事教育和对华民间交流事业。

1936 年鲍大可随父母回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耶鲁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并随后在海军陆战队服役,退役后开始研习东亚语言,1942 年获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士学位。1947 年他获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以《芝加哥每日新闻》中国和东南亚事务记者及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再次来华,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报道。他目睹

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记下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对于中国社会的真实了解使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对华积极友善的态度。

20世纪50年代初期鲍大可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官，后以研究员身份在美国大学驻港办事处工作，50年代后期他是福特基金会香港国际训练及研究计划主持人，兼美国国务院外交学会区域研究项目主任。

1960年，他在专著《共产党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中具体谈到了他的对华政策主张。他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决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美国应立足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调整对华政策，改变沿用10年之久的章程；美国对中共施压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要阻止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直面与中国的竞争，这样的结果将决定亚洲的未来。

1961年，鲍大可应聘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律与政治系执教，经常组织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和讲座，告诉学生如何通过历史视野审视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理解中国发生的变化对美国可能产生的影响。

1966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lbright）召开了历时一个月的有关中国政策听证会，邀请鲍大可、费正清、施乐伯、戴德华、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14位中国和国际问题专家出席。鲍大可在听证会上第一个发言。他说：在过去近17年中美国对新中国采取遏制与孤立的政策，虽然有必要但却不明智，从根本上讲也是不成功的。他说，尽管美国正在越南从事一场痛苦的战争，但是对中国实行遏制而不孤立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主张在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基础上与中国寻求建立正常关系。他的观点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激活华盛顿对华政策的新选项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6年，鲍大可与施乐伯、费正清、白鲁恂等中国问题学者联合发起成立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市民有关中美关系的辩论提供了讲坛。1968—1969年鲍大可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1969年3月，他主持召开了一次有2500名学者、官员、议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大型研讨会，就中美关系的发展和走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970年鲍大可还将代表的发言编辑成《未来十年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Next Decad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一书出版。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不久，鲍大可与费正清、赖肖尔、史华慈、傅高义、白鲁恂、汤姆森（James Thomson）、帕金斯、柯恩（Jerome Cohen）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联合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关于中美关系的备忘录，就改善中美关系

及为此采取的步骤与措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1971 年尼克松派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

1982 年鲍大可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聘出任讲座教授,开设了中国研究课程,1989 年从教学职位上退休。1999 年 3 月 17 日他因肺癌和并发性呼吸系统疾病,在华府乔治城医院逝世,享年 77 岁。

鲍大可是一位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推动者,长期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他为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还继续进言献策。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对弟子李侃如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乐观态度。他毕生致力于当代中国研究,出版专著 20 多部,为世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学术遗产。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访问中国西北地区后撰写了《中国西部边陲:四十年之变化》,对西部民族和生态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他的主要著述有:

《共产党的经济战略:大陆中国的崛起》(Communist Economic Strategy: The Rise of Mainland China, 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1959 年)。

《共产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1960 年)。

《共产党接管前夜之中国》(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Frederick A.Praeger Publisher, 1963 年)。

《1949—1955 年的共产中国》(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1955,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4 年)。

《共产中国的干部、官僚与政权》(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1967 年)。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附文献选编》(China after Mao, with Selected Documents, 1967 年)。

《美国对华新政策》(A New U.S. Policy toward China, 1971 年)。

《不确定的航程: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过渡》(Uncertain Passage: China's Transition to the Post-Mao Era, 1974 年)。

《中国政策:老问题与新挑战》(China policy, Old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1977 年)。

《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1977 年)。

《全球视域中的中国经济》(China's Economy in Global Perspective, 1981 年)。

《美国对台军售之纠结》(United States Arms Sales: The China-Taiwan Tangle, 1982 年)。

《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结构与过程》(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Structure and Process, 1985 年)。

《中国西部边陲:四十年之变化》(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1993 年)。

四、中美首脑峰会的铺路者和见证人基辛格

基辛格原名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 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菲尔特市一个犹太人家庭。在 20 世纪 30 年代惨绝人寰的希特勒大屠杀中,基辛格家族的 13 个亲人先后被押送到毒气室。此事对他的思想和性格产生了终生的震撼。像所有经历了苦难、贫困和歧视的年轻人一样,他勤奋学习,独立思考,善解人意,决心做出成绩,过上受人尊重和有安全感的生活。为了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1938 年他随父母移居纽约。望子成龙的父母把他送进了华盛顿一所接纳犹太学生的高级中学读书,但是那时基辛格的最大愿望只是想毕业后做一名普通的会计师。虽然他长期生活在曼哈顿华盛顿高地,但似乎出于恋旧情结,他说英语时始终保留着德语口音。为了维持生活,基辛格白天在一家剃须刷工厂上班,晚上才去乔治·华盛顿高中读书。

1943 年 6 月 19 日基辛格加入了美国籍。1943—1946 年他在美国陆军服役。在军队中他遇到了德裔列兵克雷默尔,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1944 年 9 月基辛格从所在的美军第八十四师被派往欧洲战区,第二年进入了德国。由于克雷默尔的建议,基辛格被调到师部担任德语翻译,军衔也从列兵提升为军士。后来他又从第八十四师调到第九七〇反谍报部队,并被任命为陆军中士参谋。在担任德语翻译期间他非常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权力,避免有任何对德国军人报复心理和行为的表现。1945 年 3 月他被任命为接管被德国占领城市的官员。

第二次大战的炮火硝烟散尽之后基辛格回到了美国。根据美国《士兵权利法案》,1947 年 9 月他获得了一份奖学金就读于哈佛大学政治系。他

的导师威廉·埃利奥特是黑格尔信徒,向他传授了一套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他的权威指导下,1950 年基辛格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和康德的感想》,长达 377 页。

1952 年基辛格获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基辛格曾担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概论的教学工作,还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班,创办了季刊《合流》。1954 年基辛格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世界的重建:1812—1822 年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长达 365 页。该文聚焦于 1815 年维也纳体系(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建立与延伸。他的兴趣似乎不在于评价历史人物,而在于研究梅特涅等人创设的维也纳均势理论。这使基辛格现实主义学派学者的才华含苞待放,最终被授予了夏季奖,但是他后来提出留校任教的愿望却遭到了婉拒。

1955 年基辛格回到纽约,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主任。1957 年他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他的"有限战争"理论受到了对外政策专家的赏识。哈佛大学当局为此向他下达了聘书,并授予他讲师职称。1957—1969 年基辛格历任哈佛大学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等职。

与此同时,基辛格还担任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主任、国际问题中心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兰德公司顾问。作为一个希望在外交界有所作为的共和党人,基辛格成了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追随者。

1969—1973 年基辛格担任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73—1977 年他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他是在少数加入美国籍的非美国出生公民中担任国务卿的第一人,在接受任命前就访问过北京和莫斯科。他既能吃鱼子酱又能喝茅台酒的修养,使他避免因为出身于单一文明可能滋生的文化自大或自卑主义,因而容易了解并亲近不同的文化,并把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同情与理解融入了自己的外交思维中。他对中国充满友好感情,首先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正面理解与推崇。他按照自己的"均势外交"理念,积极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以此建构构稳定的世界和平格局。

1971 年 7 月和 10 月基辛格两度秘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见了周恩来总理,为 1972 年结束两国间 23 年的敌对与隔阂状态的中美峰会铺路,从而完成了美国战略性外交政策的转变。他和周恩来总理就台海问题

进行了多轮会谈。1979 年美国终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

1987 年 3 月基辛格担任了美国—中国协会的美方主席。在 1989 年以后中美关系一度处于危机的时刻,基辛格曾多次访问中国,呼吁保持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担任公职期间的 8 年里,他九次访华。在退出公职后,他也几乎每年都访问中国,迄今已达 50 多次。1977 年 1 月福特总统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

出于某种考虑,基辛格决定退出政坛回哈佛任教,但是当时的哈佛校长博克并没有向他发出聘函。于是他转而接受了乔治城大学的教席,担任乔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并兼任阿彭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1982 年基辛格创建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由他本人担任董事长。1983 年他应聘担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

离开政界以后基辛格仍然继续撰写论文,发表演讲并出版著作,对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均发生过重要影响。多年来他一直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2003 年 10 月他应外交学会邀请访华。2005 年 5 月应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邀请再次来访,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2009 年 1 月他来华出席中美建交 30 周年纪念活动。2011 年 6 月 27 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基辛格。

他的主要著述有:

《核武器与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1957 年)。

《世界复兴:1812—1822 年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A World Restored:Metternich,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1812-1922,1957 年)。

《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The Necessity for Choice: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1 年)

《麻烦的伙伴关系:大西洋联盟再评估》(The Troubled Partnership:A Reappraisal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1965 年)。

《大西洋伙伴关系新章:关于独立执行任务团队的报告》(Renewing the Atlantic Partnership: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1965 年)

《国家战略问题》(Problems of National Strategy,1970 年)。

《美国外交政策的扩展》(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xpanded,1974 年)。

《白宫岁月》(The Wtite House Years,1979 年)。

《纪录在案:1977—1980 文选》(For the Record:Selected Statements 1977—1980,1981 年)。

《动乱年代》(Upheaval,1982 年)。

《演讲和论文集》(Observations:Selected Speeches and Essays 1982—1984. 1985 年)。

《外交》(Diplomacy,1994 年)。

《与北京和莫斯科的绝密会谈》(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co-authored with William Burr,1999 年)。

《论中国》(On China,2011 年)。

五、中国政治和亚洲事务研究资深专家何汉理

何汉理 1946 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1967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公共和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先后于 1969 年和 1974 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70—1971 年何汉理曾任职于斯沃塞摩学院政治系,1971—1983 年执教于斯坦福大学,任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1975 年他荣获斯坦福大学华盛顿沃尔特学者奖。1979—1980 年任职于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83—1994 年任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1995 年 1 月—2005 年 6 月他担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艾略特学院院长,为该院的教学赢得了国际声誉。2005 年 8 月 1 日他加盟全球政治风险咨询的欧亚集团,先后任研究分析主任和中国事务主席。2007 年他返回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在溪谷中心任国际事务教授。2009 年 1 月他辞去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职务,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巴腾领导与公共政策学院。

何汉理是美国的中国政治和外交事务专家,曾任多位美国总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事务顾问。在布什总统第一任期内他把非正式会谈模式带到了戴维营。他还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特别国家安全顾问,也是奥巴马外交智囊团的重要成员。

何汉理长期从事中国问题与亚洲事务研究,他的见解客观深刻,受到广泛重视。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经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经济合作伙伴”。何汉理根据当时中美关系的具体特点提出了与鲍威尔相

反的见解,认为中美两国应该是“经济竞争对手和战略合作伙伴”,两国的政治格局虽然复杂但是可以相互依存。

何汉理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会使一些国家感到有压力,但是这种新的竞争也许不是坏事,为此他建议美国和日本应该把中国崛起视为挑战而不是威胁。

2007 年 4 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会刊刊登了何汉理一篇题为《重新思考中国》的文章,对中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他指出: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走钢丝,经济依靠外资,领导正在高视阔步,军事扩张威胁着全世界。何汉理用事实批驳了西方关于中国的各种无端猜测。他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经济,而是生态环境与疾病传染。空气污染已经影响到了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的生活质量,城市和乡村的水资源短缺现象十分严重。他从正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但是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农村拨款,取消了农业税,并对欺压乡民的官员刑之以法。中国政治正在进一步制度化,领导人越来越务实。尽管银行的巨额呆账已经达到警戒线,然而一般中国民众除了存款别无其他投资途径,况且银行仍然拥有充分的周转能力。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国际市场,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之一,每年大量出口纺织、机械和电器产品,同时也进口技术和石油以及其他燃料。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十年前增加了两倍。不应该夸大所谓的“民族主义”。现在,中国政府强调和平崛起,“和谐社会”的政策无疑会消除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何汉理坚信中国崛起将导致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此。当然,如果国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将会诉之武力。中国正在军事、经济、外交、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对世界的最大挑战不是要进攻哪个国家,而是运用其迅速增长的资源来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使之更加有利于中国。①

何汉理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外交政策、中美和亚太关系。1981 年何汉理的《组织中国:1949—1976 年的官僚问题》被授予大平正芳纪念奖,他的《脆弱的关系:1972 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曾获杰出学术著作奖。他的主要著述有:

《组织中国:1949—1976 年的官僚问题》(Organizing China: The

① 陈有为:《中国面临的危险是什么》,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 年 3 月 27 日。

Problem of Bureaucracy,1949—1976,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年)。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年)。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毛泽东之后的改革》(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Brookings Institution,1987 年)。

《中国和东北亚:政治层面》:(China and Northeast Asia:The Political Dimension,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8 年)。

《1945—1955 年中美关系:对危机 10 年的联合再评估》(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55: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SR Books,1989 年)。

《脆弱的关系:1972 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Brookings Institution,1992 年)。

《中印关系:美国需要了解的情况》(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年)。

六、聚焦于中国政治体系和政策制定程序的奥克森伯格

奥克森伯格 1938 年 10 月 12 日出生于比利时的安德卫普,童年时期生活在佛罗里达。1956 年他读完塔拉哈西列昂中学,1960 年获斯沃塞摩学院政治学学士学位,1963 年和 1969 年先后获高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66—1968 年他担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代课教授,1968—1974 年他加盟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1973—1992 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长达 20 年之久。1992—1995 年他被聘任为兼具智库、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功能的檀香山东西方中心主任,并任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胡佛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在 25 年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他所培育的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人数超过了任何人,为美国学者访问中国积极创造了条件。

奥克森伯格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政治体系和政策制定程序的分析,同时探究中国对于国际条约的行为以及对于中美关系的观点。他不断呼吁美国对亚洲作出具体的承诺,促进与中国建立更多具有能产价值的关系。他说:"就危害人性、环境和健康的问题以及农业生产等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为求地区稳定对于韩国和印度支那等区域的建设性

承诺也非常重要。至于对日本和欧洲的覆盖则并非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所在。”

奥克森伯格是美国资深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长期从事学术和政策研究，曾直接参与并负责联系 1978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多项中美事务。1977—1980 年他离开密歇根大学就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分管中国和东亚事务官员，努力执行改善中美关系的尼克松政策。当时碰到的主要困难是要终止与台湾的协防条约。1977 年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的北京之行并没有取得完满的结果，为加速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他陪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于 1978 年年初访问了北京，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代表伍德科克密切合作，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做进一步的铺垫。1978 年 12 月 15 日美国宣布将于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并结束与台湾省当局的官方关系，但是维持与其非正式往来。

奥克森伯格在 1979 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时参与草拟一份有关信息共享文件。他还就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帮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的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了谈判。他在 2001 年去世之前一直就对华政策问题为此前几任美国总统提供了咨询。他还全力投入创建中美关系国家委员会、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和中美贸易协会的工作。

奥克森伯格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和教学，重视培养新一代中国通。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上头等重要的政治事件，而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使得两国间的战略合作必不可少。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他主张中美在缩小分歧的同时应尽力扩大合作领域。为了给美国学者在中国开辟实习基地，他想方设法与中国有关部门商谈此事，最后确定地点在山东邹平县。这时他已经被检查出罹患癌症，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他去世后，中美两国专门设立了“奥克森伯格—鲍大可”中美关系讲座，以纪念这两位杰出学者型官员的贡献。

他的弟子社会学教授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说：“奥克森伯格是美国最有经验的中国问题高级顾问，在 25 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所培养的当代中国研究学者人数超过了任何人。他对于这一学科的热情无与伦比，可以轻松地转换于学术界和政界之间，并能广泛联系各类受众和对象。”

奥克森伯格除了教学、撰写专著之外，还写过很多文章。他的主要著

述有:

《文化大革命:1967 年回顾》(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67 in Review: Four Essays, Michel Oksenberg et a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8 年)。

《中国的发展经验》(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edite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Praeger, 1973 年)。

《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与未来》(Dragon and Eagle—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Past and Future, co-authored with Robert B. Oxnam, 1978 年)。

《1949-1975〈人民日报〉社论研究指南》(Research Guide to People's Daily Editorials, 1949—1975, co-authored with Gail Henders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年)。

《中国的决策:领导、结构与过程》(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Co-authored with Kenneth Liebertha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年)。

《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关贸组织有利于全球经济秩序稳定》(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co-authored with Harold K. Jacobson, Harold Kar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年)。

《中国现身于相互依存的世界:向三边委员会的报告》(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 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co-authored with Yoichi Funabashi, 1994 年)。

《美中关系的建构:长期战略》(Shaping U.S.-China Relations: A Long-Term Strategy, 1997 年)。

《世纪历程:各大国如何组建当今世界》(A Century's Journey: How the Great Powers Shape the World, 1999 年)。

《中国入世:进步与展望》(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co-edited with Elizabeth Econom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Washington, D.C.: Distributed b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年)。

《对华政策的制定:布什与克林顿两届政府的经验教训》(Making China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Bush and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co-edited

with Ramon H. Myers, and David Shambaugh.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年)。

七、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跨国投资的专家李侃如

1943 年 9 月 9 日李侃如出生于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1965 年他获得达特茅斯学院的文学士学位,1968 年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和东亚学院证书,1972 年又获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

李侃如曾担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以及该校罗斯贸易学院的威廉·戴维森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国和印度跨国投资、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美国外交政策和亚洲安全问题。1998 年 8 月至 2000 年 10 月他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主任,负责美国对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政策事务。今年他任职于奥巴马总统中国顾问团,兼任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的委员。此外,他还被聘任为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和华盛顿非营利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高级研究员。他是当代美国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2004 年曾荣获密歇根大学杰出教学成就奖。

1983—2007 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教授"共产主义中国的发展"课程,还为罗斯学院对华贸易的硕士研究生授课,激发他们对对华投资的兴趣。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经常应邀开设讲座,其中有美国对华贸易公司的资深干事、中国法律、贸易和社会科学学者。

李侃如是石桥国际有限责任公司(Stonebridge International LLC)的高级顾问。他先后参与或者任职的机构、协会和论坛有:全国委员会美中关系中心、东西方研究中心、美中关系基金会、全美亚洲研究所、美国国会顾问理事会有关东亚事务(首尔)、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教育协会中国未来发展中心、哈佛大学亚洲研究访问委员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兼任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治理研究协会的研究员。

20 世纪 80 年代,李侃如和同事在美国商务部的赞助下开展了有关中国政府结构和决策过程的项目研究,1986—1988 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政治机构与能源发展》(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Chinese Energy Development)和《中国的决策过程:领导、结构与进程》(Policy Making in

China:Leaders,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李侃如在2004年出版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论述了经济发展、环境、国家和社会的挑战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历史上每一个社会都经历过转型,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变革速度像中国这么快,转型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他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科学与资源的有效使用,必须调整模式应对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和就业问题。中国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的运用可能效果不错,但是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整。

李侃如的专著《应对中国的挑战: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经营》(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 How to Achieve Corporate Suc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探讨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及其为跨国经营所提供的机遇。该书于2011年5月由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发行。他引用了许多实例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不仅展示了如何在对华贸易中营利,也告诉读者如何避免贸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严重风险。他论述的经营策略意义涉及面宽广,极具指导意义。他对于面临挑战的详尽分析,应对策略的远见卓识介绍,为从业者指明了正确方向,避免重复他人所犯的错误。

李侃如及其同时代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生活在美中关系提升后的改革开放年代,有更多机会直接深入中国社会,因此他的选题范围覆盖面广,观点新颖务实。他撰写和编辑了14部专著,先后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金融时报》和《南华早报》等报刊上发表了70余篇文章。他还任职于多家非官方学术机构、贸易咨询委员会和学刊编辑部,包括:《中国季刊》、《亚洲政策》、《外交政策》、《当代中国》、《中国国际杂志》、《中国经济评论》和《国际商学教育》。2004—2007年他还在美国国防部联合战略评论中心高级评论小组任职。近期他聚焦于美中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开发方式研究。他的主要的著述有:

《中美汽车产业合作之路》(Paths to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the Automotive Sector, with Michael Flynn, et al.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Trade Development Program. 1989年)。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官员、政治和决策》(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Policy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co-edited with David M.Lampton.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年)。

《现代中国观:四周年透视》(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contributor and co-editor. New York City, New York: Myron E.

Sharpe,1991 年)。

《中国建设:文化与经济之相互关系》(Constructing China: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co-edited with Shuen-fu Lin and Ernest Young.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Monograph Series,Vol.No. 78. 1997 年)。

《中国的管理制度及其对环境政策实施的影响》(China's Governing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China Environmental Series, Washington, D. 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1997 年)。

《国内力量与中美关系》(Domestic Forces and Sino-U.S. Relations, in 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ed.Ezra Vogel,pp. 254-276.New York:W.W.Norton,1997 年)。

《帝国法人之终结》(The End of Corporate Imperialism, with C. K. Prahalad,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 年)。

《连接纽带》(The Ties That Bind,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pp. 10—16,1998 年)。

《美国对华政策》(US Policy Toward China,Brookings Policy Brief #72, 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1 年)。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Governing China: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Second revised edition.New York City,New York:W.W.Norton,2004 年)。

《中国对能源安全的需求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China's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with Mikkal Herberg. Washington,D.C.: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06 年)。

《消除气候变化对美中合作的障碍》(Overcoming Obstacles to US-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with David B.Sandalow.Washington,D. C.: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9 年)。

《美国情报团体与对外政策:如何正确分析》(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nd Foreign Policy: Getting Analysis Righ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9 年)。

《中国政治:新资源、方法和田野战略》(Chinese Politics:New Sources, Methods,and Field Strategies,contributor and co-editor.Cambridge,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年)。

《面对中国挑战: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经营》(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How To Achieve Corporate Suc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Press,2011 年)。

八、重视著述中的经验价值和前瞻功能的蓝普顿

蓝普顿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1987—1997 年他曾担任纽约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尼克松中心中国政策研究部主任。他从事中国问题研究近 40 年,研究领域为中国和东亚问题,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部主任、乔治与萨迪·海曼教授和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被聘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资深名誉研究员。他曾在上次美国换届选举期间担任奥巴马的中国政策高级顾问。

据蓝普顿回忆,有两件事促成了他一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一是受他中学中国历史老师的启发使他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二是他深感当年越战的发生源于美国当局对亚洲历史的浅薄见解,使他立志要研究中国。

美国中国通的著作和论文的最大特点是,对于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学科中重大问题的分析和概括时,非常重视其阶段性、历史性和政策性特征、经验价值、预警作用和前瞻功能,力图通过这类选题揭示中国制度的本质和规则,为美国读者提供与中国人交往需要了解的中国社会背景、心理分析和制度理解的知识。20 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中国通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和程序的专著,这一选题和论证方式明显区别于一般美国汉学家的同类著述。

1974 年蓝普顿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大跃进时期的医疗政策》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篇。该文篇幅共 30 页,内容包括:引言;1958—1960 年大跃进时期医疗政策的多元化;中国人举办或参与的医疗卫生会议数;医药分配问题;九人分党委;公社卫生院;卫生部;毛泽东与九人分党委;作为政治舞台的公社;结论。作者在论文的"引言"部分开宗明义地说:"在中国,政策一致性是人所共知的特点。本文要证明至少在公共卫生领域,即便在激进时期(1958—1960)人们也表现出对非统一公共政策的追求。原因是在不同的政治舞台或者机构环境中存在着不同的医疗政策派别。构建一

个舞台的外界压力、直觉和资源未必适用于另一个舞台。”在“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医疗政策的多元化”一节中，蓝普顿继续写道：“医疗政策是一个可供验证的有意思的案例，因为当周期性模式引导我们期待时，它既没有动摇我们的统一意识，也没有改变我们的大众方向。医疗保健至少包括六个方面：医学教育、医学科研、医疗保健服务系统的建设、卫生保健财务、中医和大众保健。也许计划生育、工业生产安全、环境保护和生产巡检也可以包括在内，不过不在此讨论。不管是否使用‘激进或保守’、‘大众或精英’、‘城市或农村’中的任何一组语汇，大跃进时期上述六方面的政策在多元化方向中都发生了动摇。”在“医药分配问题”一节中，作者写道：“卫生部是唯一的大舞台，除非把无法解决的问题交由上级机关或者其他部门处理，否则卫生部就要对所有问题负责。该部权限已经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确定了下来。”最后作者在“结论”中做了这样的概括：“在大跃进时期各个方面的医疗政策都没有所谓的‘激进的’、‘全民的’或者‘大众的方向’。我的用意是提醒读者：不是所有政策都是由相同的机构、相同的领导、出于相同的压力、利用相同的资源制定出来的。就不同的问题由不同的机构处理而言，我探讨了在直接问题分配上可能出现政治上讨价还价或者出现矛盾冲突的情况，并验证了机构所寻求或者为坚守政策职责范围所需的策略。”①

200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蓝普顿专著《中国力量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也是具有鲜明前瞻性和预警性的著述。全书共七章，362页，分别为：第一章关于力量；第二章军力；第三章财力；第四章智力；第五章中国及其邻国；第六章危险的平衡；第七章中国国力对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在今后20年内中美两国将处于“双重冒险”（double gamble）阶段，美国必须就中国领导人对于发展经济或对外扩张与否的问题押上自己的赌注；而中国领导人也必须就美国是否压制中国回归权力和繁荣社会打赌。蓝普顿在书中就中国的军力、财力和智力三方面的问题，应用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进行逐一细致和精辟的分析。他考察了中国影响力增长所涉及的军事、经济和智力领域，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了评估：中国力量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的弱项和不确定性表

① David M. Lampton: *Health Policy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0, Dec. 197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68-698.

现在什么方面,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力量的增长。蓝普顿构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人在过去几千年对待国力兴衰的态度,与此同时也探讨了中国人如何期待本国未来国力的变化。他运用了大量从采访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官员中得到的相关信息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在多次接受中国记者的访谈中曾经表明该书的读者对象设定为美国人,目的是告诉他们中国怎样理解自己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现在中国怎样为提高国力所作出的努力。他指出尽管中国对于军事现代化相当重视,但是中国的策略是只强调经济实力和智力而不强调军力。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美国也必须改革自己的体制。

关于当前中美两国的关系,蓝普顿认为:"在尼克松和基辛格 1972 年去中国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面时,两国的关系可比喻为一种'单腿关系',中美要与苏联抗衡,所以让我们两国走到一起来了,这是一种鉴于安全考虑的关系。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两国的文化和经济关系也开始发展,但'安全'这条腿是最牢固的,因为我们要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而经济和文化这两条腿却比较弱,不稳定。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后,安全的考虑被摆到一边。然后我们开始发展经济和文化合作,被称之为'经济文化两条腿'的关系。但是,自从'9·11 事件'发生后,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两国经济文化关系也越来越牢固,两国关系朝着多方面迅速发展。我认为,现在的中美关系是一种平衡的、多样化的、广泛合作的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①

蓝普顿曾经多次随美国政府官员代表团访问中国,会晤过多位中国国家领导,也组织过中美民间及学术界的互访。2010 年他成为由美国亚洲研究局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颁发的施乐伯奖(Scalapino Prize)的首位获奖者。

蓝普顿撰写或编辑的主要著述有:

《大跃进时期的医疗政策》(Health Policy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0, pp. 668-698, Dec. 1974 年)。

《中国的医疗政治》(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in China, 1977 年)。

《恢复关系》(A Relationship Restored, co-author, 1986 年)。

---

① 黄念:《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会长蓝普顿:我看温家宝》,2003 年 12 月 10 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21 世纪经济报道》。

《权力之路：当代中国精英的流动》(Paths to Power: Elite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86 年)。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政策实施》(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 editor, 1987 年)。

《中国的全球存在》(China's Global Presence, co-editor, 1988 年)。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官员、政治和决策》(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in Post-Mao China, co-editor, 1992 年)。

《改革时代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制定》(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editor, 2001 年)。

《同床异梦：1989—2000 年中美关系的调控》(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2001 年)。

《台湾的选举、直接搏击与中国的沙地路线》(Taiwan's Elections, Direct Fights and China's Line in the Sand, co-author, 2005 年)。

《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 2008 年)。

九、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台湾海峡和平前景的包瑞嘉

包瑞嘉 1962 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63 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学硕士学位，1970 年又获该校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被授予台湾大学校际中文证书。他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学和台湾海峡的和平前景，被视为美国学术界的中国政治研究权威之一。

1966 年，包瑞嘉携妻子卡罗琳(Carolyn)和襁褓中的儿子马修(Mathew)乘跨越太平洋的航班飞到了台湾省，为的是参加一项中文强化训练，并为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收集材料。那时中美尚处于对峙时期，台湾被西方人视为情报搜集站(Intelligence Dragnet)，他一度看到深圳的中国人从境内外来来往往不由心中感慨万千。1975 年他终于有机会陪同一个庞大的美国体育代表团，到广州、上海、北京比赛和参观。那是他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心中充满着好奇和期待。

包瑞嘉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任和美国亚洲协会中国理事会委员。多年的汉学研究使他体会到了解中国政治必须有一种共鸣感，中国和

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情况千差万别,只有深入研究、设身处地地观察和思考,才能掌握中国政治的真谛。他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经济生产人均值不高,但是总量一直持续增长,在国际上中国的观点越来越受到重视,与当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阶段相比,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2008 年年初,包瑞嘉被克林顿·希拉里聘任为她的竞选团队外交政策顾问,几个月内团队与希拉里通过电话交谈了多次,他诚恳地向她建议批评中国不要夸大其词,尤其是中国的人权、美国贸易入超和人民币汇率等敏感问题,但希拉里一心只想拉选票,没有听进他的建议,他不得已辞去了顾问职务。在发给美国媒体的电子邮件中他解释说:"希拉里将美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这是错误的"。他认为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与其指责批评甚至羞辱,倒不如提出一些中国政府能接受的具体意见更能解决问题。

包瑞嘉的《中国兴衰史》是美国教学公司(The Teaching Company)为成人和终身教育编撰发行的一部中国历史讲义。该公司由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劳工与资源首席顾问汤玛斯·罗林斯(Thomas M.Rollins)于 1990 年创建。根据个人自修经验他发现通过录像带学习效果很好,便发起一个为公众制作学习录像带的政府项目,但是由于版权的规定无法付诸实践。直到离任前,他才得以聘请一些知名教授为公众制作讲座录像带。到 2007 年该公司共提供了 260 多门课程的录像带,总时长达 3000 小时,涵盖了 9 门不同学科,包括:历史、文学、英语、哲学、宗教、数学、商务、经济学、艺术与音乐等学科。《中国兴衰史》共包括 48 个讲座,时间跨度由公元 600 年至 2008 年。第一讲为《大哉中华:600—1700 年》(The Splendor That Was China,600—1700),第 48 讲为《中国崛起:沉睡巨人的猛醒》(China's Rise—The Sleeping Giant Stirs)。在讲义的"课程介绍"部分有这样一段叙述:

>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最古老并且发展延续不断的国家,在近代历史的短暂时间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自从 1911 年曾经荣耀的帝国崩溃以来,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进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进入新世纪后以权力主义大国和经济动力站的姿态亮相,成为世界上一支庄严威武的力量。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经济上超过美国,军事

上并驾甚至超越于美国。这一切将怎样发生？我们将如何看待中国的华丽登场及其完全出乎意料的全球崛起？对于我们西方人和人类未来这又将意味着什么？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包瑞嘉教授亲授的《中国兴衰史》，将通过人性竞争的生动画面、巨大的政治动荡和中国惊人速度的现代再生来解读上述重大而又耐人寻味的问题。①

包瑞嘉曾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旅居和任教，以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身份访问过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荷兰莱顿大学、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并长期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在4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任职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联合委员会等多家机构，先后被聘任为白宫、联合国和兰德公司的顾问，还担任过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全国公众广播的评论员，多次接受过《亚洲华尔街日报》和《洛杉矶时报》等报刊的采访，发表了自己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见解。

包瑞嘉先后出版了9部专著，在专业和通俗刊物上发表过100多篇论文，应聘担任过《现代中国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中国季刊》、《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和《亚洲调查》(Asian Survey)等杂志编委。他的主要的著述有：

《四清：1962-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Ssu-Ch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 with Frederick C. Teiwes, U.C.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8年)。

《酝酿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透视》(China in Fer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rentice-Hall, 1972年)。

《革命序幕：毛泽东、党和农民问题》(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196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年)。

《中国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80年)。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改革和反应：通往天安门之路》(Reform and

① *The Fall and Rise of China*, The Teaching Company, DVD Rip, 2010.

Reaction in Post-Mao China:The Road to Tiananmen,Routledge,1991 年)。

《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s,California,1993 年)。

《毛泽东辞世: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Burying Mao: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年)。

《中国兴衰史》(The Fall and Rise of China,The Teaching Company,DVD Rip,2010 年)。

《中国观察家:一位偷窥北京者的忏悔》(China Watcher:Confessions of a Peking Tom,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0 年)。①

十、对中国政治有与众不同见解的谢淑丽

1967 年谢淑丽(Susan Shirk,1945—　)毕业于奥利奥克山学院政治专业,1965—1966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语言专业,1968 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亚洲研究硕士学位,1974 年又获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

谢淑丽从政之前曾加盟美国国防政策理事会、东西方研究中心(夏威夷)理事会、美日基金会理事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及外交关系协会三边委员会。她先后参与研究的项目有:中国区域重点研究项目、朝鲜区域重点研究项目、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学院研究,以及 21 世纪中国研究项目。1997—2000 年她曾担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

谢淑丽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事务研究所研究生院教授,同时兼任全球战略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资深主任,协助客户解决有关东亚关系问题。她的丈夫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L.Popkin)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著名教授。

谢淑丽主要从政治角度来研究中国。作为前美国政府官员,她在自己的著述中总是明确地站在维护美国立场上思考问题。但是由于她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关注中国,她本人不仅与老一代中国领导人有过接触,也多

① "Peking Tom"是作者根据英语固定词组"peeping Tom"(下流的偷窥者)自创的谐音词组,可译为"偷窥北京者",有自嘲的含义。

次受到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她对中国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深刻见解。

1971年中美之间进行乒乓外交时，谢淑丽作为美国研究生代表正在香港调研。趁这个机会她和其他同学相约来到了北京。在一次与周总理长达四个小时见面畅谈尼克松总统访华安排时，周总理像熟悉的朋友一样曾多次叫她的名字，还开玩笑地说："我宁愿见谢淑丽，也不愿见尼克松"。

从此谢淑丽就一直特别关注中国的情况和变化。她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像中国在过去30年那样快地增长。1971年第一次来华时她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和封闭的国家，而现在却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国度。当年她从香港进入内地后，两地之间的巨大差异让她感到惊讶。在上海访问时，她们曾坐着手摇的摆渡木船到浦东农村，而现在的浦东却处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2007年谢淑丽出版了专著《中国：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在该书序言中她写道："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中国越发达繁荣，中国领导人就越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她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份的贫富差距加大，这就逐渐影响了政府的权威和形像。1989年的天安门风波和1996年发生的亚洲经济危机，对中国政府是一个考验。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是中国政府的国内地位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因此一直重视在保持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同时加速经济的繁荣发展。群众的任何不满都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短路。她认为，除非对于国内脆弱的政治思想和担心有正确认识，否则一旦有重大国际事务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纷争。这种前瞻性的分析，尽管属于个人见解，但正是中国通著述的典型表现。

中共第十八届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由中美关系专家参加的研讨会。该中心学术研究主任谢淑丽认为，将中共内部持不同观点者进行简单化划分是很不明智的表现。面对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新领导已经把民生和解决三大差别放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了。

谢淑丽撰写和编辑的主要著述有：

《同志间的竞争：中国的职业刺激与学生策略》(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1981年)。

《中国和日本的挑战：东亚的政治与发展》(The Challenge of China and

Japan: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1985 年)。

《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California Series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Economy,1993 年)。

《中国如何对外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与投资改革中的政治上成功》(How China Opened Its Door: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the PRC'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form,1994 年)。

《实力与繁荣:亚太经济与稳定相结合》(Power and Prosperity:Economic and Security Linkages in the Asia Pacific,co-edited with Christopher P.Twomey,1996 年)。

《政体:北朝鲜的核政治》(The Body Politic:Nuclear Politics in North Korea,2006 年)。

《中国: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Fragile Superpower: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2007 年)。

《变化的媒体,变化的中国》(Changing Media,Changing China,editor,2010 年)。

十一、精通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和亚太关系的柯庆生

柯庆生 1980—1984 年就读于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获历史特优学士学位。1985 年他在康奈尔大学学习了三个月的强化汉语课程。1985—1987 年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1987 年暑假他在中国首都经贸大学进修汉语后回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博,1990—1991 年他再次来华在北京大学进修并撰写博士论文。1993 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读过《孙子兵法》,对于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和国际安全问题有深入研究,近年来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参加学术交流。

2005 年 9 月,柯庆生曾应邀出席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举办的一次听证会。他在作证时表示,如果陈水扁当局试图通过"修宪"造成台湾与大陆在法理上的分裂,中国政府将会不顾美国的反对,坚决对台用兵。他敦促当时的布什政府践行对中国的承诺,不但与陈水扁的"台独"言论保持距离,还要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言论。在对台军售上,柯庆生也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爱国者三型导弹和潜艇等进攻型武器,因为这可能向台湾发出错

误信息,造成区域紧张。

柯庆生曾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政治系任教,后来加盟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政策学院。他的学术领域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亚太关系和国际安全问题,被视为海峡两岸问题专家。早在进入国务院前他就为美国政府做过政策咨询工作,并在2002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杰出公共服务奖"。

2006年7月17日柯庆生被聘任为美国务院分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上任后他经常提醒民主党的对华决策者遇事要说服中国,唯有从正面讲道理才能促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居高临下的外交批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演和虚张声势地强化双边军事同盟都是不可取的。

同年8月3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听证会上,柯庆生做了题为《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吗?》的发言。他指出: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希望推动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中国很有可能朝这一方向发展。美国不应该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也不应遏制中国。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在最大程度上扩大共同利益与相互合作"。

2008年柯庆生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利用学校给他的半年学术休假时间在中国各个国际关系研究部门会见中国朋友。他在普林斯顿主持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提携并资助了众多研究中国问题的青年学术精英。

从2010年至今他任职于布鲁金斯研究所,兼任约翰·索顿中国中心编外高级研究员,2011年至今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政治学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主任,他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理事。近年来他多次到中国大陆和台湾进行学术交流。

柯庆生有不少观点,例如:要求中国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海争端、为藏独和布什总统向达赖喇嘛颁发美国国会金质奖章辩解,以及对中国人权、宗教自由和政治开放的指责,曾饱受媒体的批评,反映出他主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以及他力图从合作和遏制中寻求平衡的原因所在。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许多有关中美两国利害关系问题的态度也是原则分明的。2007年9月11日他曾代表美国国务院以严厉的措辞批评陈水扁当局的所谓"入联公投"。他说:"这一点是明确的:美国毫无疑问反对对台湾的任何强制行为,但是我们也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所谓有利于台湾保

持现状和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的'台湾独立'挑衅性言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①

柯庆生在美国政坛的亮相,为美国国务院客观地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

柯庆生的主要著述有:

《为什么错过机会?美中对峙原因再探》(A Lost Chance for What?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US-PRC Confrontati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4, No. 3, 1995 年)。

《中国强权政治》(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6 年)。

《中国、美日联盟与东亚安全困境》(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年)。

《澄清台湾问题:纠正台海双方的错觉》(Clarity on Taiwan: Correcting Mispercept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Washington Post Op Ed, 2000 年)。

《中国》(China, in Richard Ellings and Aaron Friedberg, eds., Strategic Asia, 2001-2002, Seattle, Washington: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1 年)。

《当代安全困境:消除一次台湾冲突》(The Contemporary Security Dilemma: Deterring a Taiwan Conflic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4, 2002 年)。

《新挑战与台海机遇:美国作用定位》(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Taiwan Strait: Defining America's Role, New York: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200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关系:为何诸事顺遂》(PRC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y Things Are Going So Well,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8, 2003 年)。

《中国是否可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六方会谈、对台军售与中日关系》(Will China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The Six-Party

① Thomas Christensen'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n Taiwan's security established by the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Sept. 11, 2007.

Talks, Taiwan Arms Sale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6, 2005 年)。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审委员会关于中国军事现代化和海峡均势听证会的声明》(A Statement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nd the Cross-Strait Balance, 2005 年)。

《是加强稳定还是制造魔鬼?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东亚政策》(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年)。

《中国崛起中的选择:奥巴马政府近期的教训》(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China: Recent Lesson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9 年)。

《中美关系中寻求共同利益的必要性》(The Need to Pursue Mutual Interests in U.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2011 年)。

《为何世界需要自信的中国》(Why the World Needs an Assertive China, New York Tim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11 年)。

十二、美国制定对中国政策的核心人物杰弗里·贝德

杰弗里·贝德(Jeffery A. Bader, 1945—)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研究中国问题。他的外交生涯主要和中国事务打交道,1977 年进入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曾经参与中美建交的筹备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被派到美国驻华使馆任职。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主任。此后他在国务院官运亨通,辉煌腾达,从主管中国事务的副主任、主任升迁到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贝德是一名有思想有作为的中国通,曾任奥巴马竞选团队中的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2009—2011 年他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以及亚洲协会成员,被认为是美国制定对亚洲和中国政策的核心人物。平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奥巴马汇报亚洲地区的动态,协调白宫各部门的亚洲政策是他的业务之一。甚至奥巴马在办公室与各国政要通话时都有他在一旁协助。

奥巴马访华期间的每日活动,贝德更是如影随形。

在奥巴马倚重的智库中多数中国通都支持中美两国间发展建设性的关系,认为美中许多经济项目都需要相互合作。2009 年 5 月初在美国华人组织的"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第 18 次年会上贝德谈到了奥巴马政府所奉行的中国政策。他认为鉴于中国已经崛起的客观事实,解决世界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合作。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奥巴马政府只能用成功的实例来证明其中道理。奥巴马看到了美中贸易不平衡的状况,但是他明智地让财长盖特纳(Timothy Franz Geithner,1961—　)出面肯定中国在人民币升值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并放弃把中国列入货币币值操纵国的想法。奥巴马主张推动中美两国军方高层的会谈,还经常与亚洲各主要国家领导人通话。这一切都反映了包括杰弗里·贝德在内的白宫中国通的思路和努力。

2010 年年初,中美关系曾经一度出现这样那样的摩擦,贝德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Braidy Steinberg,1953—　)被适时派遣访华,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

1987 年贝德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2011 年他离开白宫后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约翰·韦特哈德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员以及石桥国际公司高级副总裁。

贝德的主要著述有:

《调控中东的中美能源竞争》(Managing China-U.S.Energy Competition in the Middle East,Washington Quarterly,2005 年)。

《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的中国观》(Chinese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and its Foreign Policy,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Chinese Leadership,Politics,and Policy,2005 年)。

《中国和东亚》(China and East Asia,Washington Asia Forum,American University,2005 年)。

十三、研究美中关系、国际政治和亚太安全的权威沈大伟

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1977 年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1980 年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

硕士学位,后又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1983—1985 年他在北京大学国政系(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学习,一边听课一边撰写博士论文《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对美国的认知》。他还在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深造,研究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2009—2010 年他得到富布赖特项目研究的资助在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此外他还在香港、台湾、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地研究机构做过访问学者。

从 1996 年起沈大伟担任埃略特国际事务学院中国政策研究项目(the China Policy Program in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主任,并兼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th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Program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1976—1977 年他曾担任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局(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的分析员;1977—1978 年供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他还曾于 1987—1988 年间负责担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the Asia Program at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执行主任;他同时还在美国国防部(The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福特基金(The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微软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兰德公司、国会图书馆担任顾问。他不仅供职于多家编辑委员会,而且还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亚太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等许多国际重要机构的成员。他是一位研究当代中国事务、美中关系、国际政治和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权威。在奥巴马总统提名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Jr.1960—)担任驻华大使之前,沈大伟曾一度进入了候选人名单。

1987—1996 年他先后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研究系讲师、高级讲师和教授;1987 年任密歇根大学政治系讲师。1991—1996 年他担任《中国季刊》编辑;1996 年以来他被聘任为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1998 年担任中国政策项目主任。从 1998 年至今他还兼任民主党核心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非编制高级研究员。

沈大伟是国际战略研究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亚洲协会等研究机构和学会会员,曾任《国际

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战略研究杂志》、《当代史》和《神州展望》等杂志的编委。他还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生存》(Survival)、《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远东经济评论》(Eastern Economic Review)、《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章、书评和社论。

在《美丽的帝国主义者》一书中沈大伟指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仍然习惯于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偏重于对人物的社会化评价,因此主观见解略显不足。

2006年他在所主编的《权力转换:中国和亚洲的新动力》一书中指出,亚洲的力量均势正在从东京向北京转移,离华盛顿将越来越远。这一转变目前尚未完成,也不至于引起恐慌。如果美国不把中国视为敌对国家,美国也许还能在亚洲发挥关键作用。

2008年,沈大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是他的一部代表作。全书共八章,分别为:第一章导论:共产主义崩溃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章西方学者论共产主义国家;第三章西方学者论共产主义中国;第四章中国学者论共产主义国家;第五章中国学者论非共产主义国家;第六章中国共产党的重建:思想方面;第七章中国共产党的重建:组织方面;第八章保持活力: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历久弥坚。该书的主要特色是客观陈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预测,并对近2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进行了评价。作者概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局势发生动荡之后,中共对一些国家执政党垮台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剖析了自身所面临的各种国内外挑战。对于那些执政党垮台原因和诱因的探索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引发了长达十几年的反省和争论),但也充满了现实感和紧迫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执政党失去政权的深刻教训中得到启示。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前景的三种预测是崩溃、维持现状或者开始民主化进程。作者断言中国将来将会选择一种中庸之道。中共在思想和组织上所制定的改革措施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出了西方学者的预料,是有效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并保持其政治活力的必需。

关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沈大伟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两国关系已经

进入了相当稳定和成熟阶段,最大的特点是高度建制化、相互依存,以合作为主,竞争在所难免。两国政府部门已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目前已有60多个经常性的对话磋商合作机制,对于减少双方误解,在众多全球和热点问题上形成共识,开展务实合作和发展关系显得至关重要。就社会层面而言,中美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度依存和双向互动。在中国已经取得世界话语权的今天,双方利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广泛的领域相互交织的背景中,中美关系已不仅仅是一个双边或者区域关系,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关系。①

沈大伟曾经多次来华参加学术会议,2008年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同年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发表学术演讲。2009年应中国外交部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参加和现场观看了新中国成立60年周年的阅兵仪式和庆典。《参考消息》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曾对他进行了专访。

他先后撰写或编辑了25本论著、200余篇论文和书评,其中主要有:

《过渡中的中国军事》(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1991年)。

《中国政治家邓小平肖像》(Deng Xiaoping: Portrait of a Chinese Statesman,1995年)。

《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1996年)。

《改革时代的中国读物》(The China Reader: The Reform Era,1998年)。

《面向未来的中国军事》(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1999年)。

《现代中国》(The Modern Chinese State,2000年)。

《中国是否稳定:以事实为据》(Is China Unstable: Assessing the Factors,2000年)。

《美丽的帝国主义者:中国的美国观》(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1993年)。

《现代化中的中国军事:进程、问题与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2003年)。

《权力转移:中国和亚洲的新动力》(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

① 马小宁:《美中关系相当稳定和成熟——访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载《人民日报》2009年1月4日。

Dynamics,2005 年)。

《中国皇家艺术珍宝历险记》(The Odyssey of China's Imperial Art Treasures,2005 年)。

《从欧洲、日本和美国的角度观察中国》(China Watching:Perspectives from Europe,Japan,and the United States,2007 年)。

《中欧关系》(China-Europe Relations,2007 年)。

《亚洲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2008 年)。

《中国共产党:缩减与适应》(China's Communist Party:Atrophy & Adaptation,2008 年)。

《美国和欧洲与中国的关系》(American and European Relations with China,2008 年)。

《中国未来图示:国内和国际的挑战》(Charting China's Future: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2011 年)。

十四、研究军控、软实力以及军事与环境的专家季北慈

季北慈(Bates Gill,1959—　)毕业于美国密歇根阿尔比恩学院,主修政治学和法语,能说一口流利汉语。1991 年他获得了弗吉尼亚大学外交专业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龙之火:中国安全政策中的武器转移》(Fire of the Dragon:Arms Transfers in Chinese Security Policy)。

1992—1993 年季北慈担任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费彝民比较政治学教席。1998—2002 年他应聘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及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2002—2007 年任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讲座主任(Freeman Chair of China Studies i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2 年他应聘为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季北慈曾先后加盟于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美中政策基金(the US - China Policy Foundation)、美国中国研究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美国菲利斯基金会(the Feris Foundation of America)、中国—默克艾滋病联盟(the China-Merck HIV-AI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并兼任美国亚洲研究所(the US-Asia Institute)高级顾问,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会员，还担任《当代中国》（Journal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香港学刊》（the Hong Kong Journal）和《中国安全》（China Security）编委。他阅历丰富，曾长期在法国、瑞典、瑞士和中国居住或从事学术研究。

季北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军备竞赛、军费与武器贸易、化学武器、裁军和军控谈判以及军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2007 年 10 月他担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后，加强了该所对中国的研究，增聘 3~4 名中国问题专家，还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研究选题包括：中国与全球安全、中国在世界维和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在非洲的安全作用等。他曾主持并出版有关世界军备和裁军问题研究的《世界军备与裁军年鉴》、《斯德哥尔摩文件》和《研究报道》等学刊，是国际政界、学界和新闻记者的案头必备参考资料。

2004 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曾以《中国的新安全观——多边主义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为题介绍了中国积极参加地区和全球多边安全举措的情况。该文指出中国对参与敏感地区维和行动采取了积极态度，2000 年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国际维和行动的人数增加了 20 倍。近 10~15 年间中国在军控和防止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出中国为世界和平和安全所作出的贡献。他希望中国能为联合国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维和作出更大贡献。

2003 年 12 月季北慈在美国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中国的地区政治、外交和安全战略已变得越来越主动和自信了，地区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北京已经采取了越来越多的主动对策，设法营造与自身利益一致的安全氛围，目的是为了更加开诚布公地与其邻国实现互利共赢。中国认识到并加大参与地区安全并建立信任机制，最能说明这种变化的两个例子是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和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中国在 2001 年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时发挥的作用，不仅作为一个地区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姿态亮相，而且还在促成这次会议发表一项联合反恐声明时表现出娴熟的外交技巧。对于这三个趋势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中国的自信。①

关于中国如何才能对外提高软实力的问题，季北慈认为主要是在道义

① 季北慈：《中国作为地区经济大国的发展影响及意义》，中新网 2003 年 12 月 19 日。

领导的基础上,或通过提出一个对国际行为有吸引力的模式,使他国政府和国际行为体能更亲近中国,并在事关中国利益的问题上更支持中国。中国的文明和历史成就,或者更广泛地说中国文化,是中国最受世人欣赏的方面,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实力也是最有力的工具,中国政府自然会用它作为提升中国利益的一种途径,但是经济利益、道义领导和政治上具有吸引力的模式或形象的结合才是最有效的软实力。中国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和行为体的接触以及有效地说服并吸引它们的能力。①

季北慈对于艾滋病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有独到研究。2003 年 1 月 13 ~17 日,应当时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邀请,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考察团 18 人来华访问,了解中国在艾滋病毒/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工作以及中美两国在这方面合作的價值与方案。该中心讲座主任季北慈和非洲项目主任史斯蒂芬·莫里逊(J.Stephen Morrison)在《防止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在中国的蔓延》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目前面对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流行的危险,预料在 2010 年以前可能会有 1000 万~2000 万中国人感染艾滋病,将严重影响中国的主流社会及经济发展。中国卫生部了解艾滋病威胁的严重性和复杂性,通过增加资金、增强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扩大培训项目、增强预防教育工作以及扩大国际交流合作等渠道,认真领导防治。美国政府加强了对中国援助的协调,北京的联合国专题工作组也加强了捐赠国之间的合作。中国政府在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方面的预防及治疗经费已增加至每年一亿元人民币,另外还得到了 15 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债券支持,国家的血库安全亦已得到改进。世界健康基金会的约翰·浩维(John Howe)还宣布了与中国卫生部合办 10 个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治疗培训中心的计划。

季北慈撰写和与人合写的专著有:

《中国武器的转移》(*Chinese Arms Transfers*,Praeger Publishers,1992)。

《中国武器的外购:求购'高级秘密武器'(合撰)》(*China's Arms Acquisitions from Abroad: A Quest for 'Superb and Secret Weapons'*, co-authored with Taeho Ki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年)。

《武器、透明度与东南亚安全(合编)》(*Arms, Transparency and Security*

① 褚国飞:《软实力需结合多重因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 月。

in Southeast Asia, co-edited with J.N.Ma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年)。

《临危不惧:台湾及其周边与亚洲金融危机(合编)》(*Weathering the Storm: Taiwan, Its Neighbors an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o-edited with Peter Chow,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年)。

《中国资产负债表:世人所需了解的超级大国如何兴起(合撰)》(*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co-authored with C.Fred Bergsten, Nicholas Lardy, and Derk Mitchell, Public Affairs, 2006 年)。

《崛起之星——中国新安全外交》(*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年)。

《亚洲的新多边主义:合作、竞争与共同体探索(合编)》(*Asia's New Multilateralism: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co-edited with Michael J.Gree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年)。

《弹药的管控:核武器的民控与民主职责(合编)》(*Governing the Bomb: Civilian Control and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of Nuclear Weap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edited with Hans Born and Heiner Hänggi, 2010 年)。

第八章
美国汉学的文化基因与普世意义

“基因”(gene),又译为“遗传因子”,在生命科学中是指带有遗传信息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片段,是两个生命体结合之后父系和母系的遗传密码在下一代生理和心理信息链中的系列存在。早先认为,产生遗传信息传递的生命体结合必须满足“同种同属”的条件,但是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基因芯片、蛋白芯片、酶工程和细胞工程可以为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的嫁接创造条件。科学家根据基因移植理论认为:把北极鱼体内具有防冻功能的基因植入西红柿中,制造出耐寒的新品种并非神话。生理矛盾(差异)越大的生命体之间的结合,其优质传承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因具有先天遗传功能,如果一方基因优于另一方基因,那么处于强势的一方就可能进入更畅通的传播渠道,使其后代接受更多的强势基因密码。当然,基因也可能在后天外部环境中逐步发生异化。

在现代文本学中学者们常借用“基因”一词来描写两个非生物体(例如两种文化、政治或者企业体系)在交流结合之后性质所发生的变化。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相互碰撞和融通,首先有一个相互了解和适应的阶段。通过借鉴互补,人们会发现某些人群(如移民、涉外人员、旅游者和文化比较研究者)在所处的领域(如外交、外贸、旅游、文教和对比史学研究)中,有关两种文化交流的思维和行事方式能得到他们较好的理解和接受。这说明伦理和民族认同可赋予人们研究或理解某一文化问题的特殊能力,或者说这是载体在客观环境中自然习得的结果,其可延续部分一般都具有传承基因特性。

美国是一个多种群多宗教的国家,白种人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其中大部分为欧洲移民的后裔。基督信徒在美国居民中占多数,第二大宗教罗马天主教信徒人数的比例也很高,因此基督教文化(Christian Culture)在

美国理所当然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又因为与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及其诸多教派之间的历史渊源,基督教文化就构成了跨族跨境的基督教文明的主体。基督教早期哲学鼓励教徒对外部世界的探险和征服,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规劝所有人皈依上帝,并实现对自然界的监控和利用。基督教强调精神世界服从上帝,物质世界尊重子民,客观上形成了对世俗社会王权的约束,这就是基督教国家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基督教还提倡世俗社会承担照顾弱者的责任,为此应该建立所需的孤儿院、养老院和医院,这种主张就是宗教社会主义思潮的基础。

早期的欧洲移民把西欧文化带到了美国,亚洲移民进入新大陆之后,美国文化中又增加了东方元素。美国人追求民主与自由,开拓与竞争,凡事讲求理性和实用。他们有强烈的成就崇拜和英雄崇拜倾向,成就感是每一个公民前进的动力。地域和社会流动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两大特点,观念开放和交通便利为美国人从乡村流动到城市,从北方迁徙到南方,从国内走向国外创造了条件。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梦想,美国的多元文化还重视个人利益和享受及其价值的最终实现。这些就是美国基督教具有传承功能的文化基因。

中国和美国都是地大物博文化多元的国家,简短的定义似乎很难概括两国文化的主要内涵和属性。但是在主流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所主宰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人生观而努力,这种心态使主流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

中国的文化基因体现在千百年来超越民族超越疆域的儒家文化之中。以孔子(前551—前479)为代表的儒家,面临春秋战国诸强称霸、礼崩乐坏的局面,与法家、道家、墨家、名家、杂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和小说家,就治国和修身之术提出了同中有异或者针锋相对的主张。孔子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从事教育,收纳弟子3000名,贤者72人,曾周游列国,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发表过充满智慧的见解,有"四书"和"五经"传世。儒家希望国君修己恤民、德政礼让,鼓励"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论语·学而》)各项价值观标准中,"仁"和"礼"为其核心。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当时算是相当前卫的政治思想了。儒家还宣传积极入世的精神,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和"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的人格道德规范,跟今日美国人认同的个人主义、

放纵主义和享乐主义人生观完全不同。

因为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之中，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儒家学说不断进行梳理和调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人们的实践和传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长期被奉为指导意识形态的国学不断发展。

所谓“普世价值”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属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价值标准”（oecumenical value）；二是“适用于普天之下的价值标准”（universal value），前者是宗教界的定义，后者为中性定义。就汉学研究领域而言，学者们倾向于后者，因为儒家典籍并非宗教经文，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血有肉的伟人。

有人说人是有阶级性的，阶级不同利益也不同，所谓“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人口和国土大国的中美两国，都有代表自己国家、民族和时代的主流社会和核心利益，因此也必然有代表多数人的“普世意义”（universal significance）价值观和人生观。时至今日，儒家学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普世价值实现的高度是学科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汉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批判对普世价值的抗衡有利于学术领域现代化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自由、科学和法制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所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接受并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近代历史。承认并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中国和美国学术界都应该承担的任务。美国对于某些意识形态问题的怀疑和敏感态度，影响到两国文化、科技和贸易的交流事件在媒体中常有报道，其中不乏文化理解上的失实权衡。中国公众对于美国一些文学、艺术和学术的观点、内涵、风格和形式的怀疑和不接受，一方面可能源于两国文化传统和美学观点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对于某些文化艺术形式缺乏深入的了解，需要探讨和交流。显然，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尊重普世价值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学界的当务之急是不要把“文化多样性”贬低为文化单一性，更不能以“尊重普世价值”为口实强制“他者”认同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每一位成功的汉学家都应该具备这样的素养和品格。

一、关于“美国特殊论”与“中国特殊论”

“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或“美国特殊性”)是19世纪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创制的一个术语。他认为美国人与众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其无限膨胀的个人主义、工作狂、为挣钱疲于奔命以及收入待遇平等诸方面。“完全的商业习性”赋予了美国另类特色。显然,他描述的美国特殊论,除了“收入待遇平等”以外其他都是负面的。1996年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他的专著《美国特殊论:一把双刃剑》中指出:美国在笃信宗教、个人主义、爱国主义、加入志愿组织、犯罪率、监禁与诉讼以及对工作的投入方面都超越别国,但是在投票、平等、选民资格、休闲时间、社会主义影响以及尊重权威方面却落后于他国。可以用于概括美国意识形态的五个词是: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不干涉主义。美国特殊论是一种双刃剑现象,它的不少积极性恰恰来自于有着负面特征的思想和习惯,因此美国既是一个最好的国家,也是一个最坏的国家。美国以其殊殊论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冷战时期以及苏联崩塌之后还得到了进一步提升。①

所谓“特殊论”或“特殊性”用于描写一个国家、社会、机构或者时段在某些方面的超常规状态时,通常根据以往经验、观念、感知模式和历史比较的结论,行为者可不必按照既定规则判断或做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些国家经济腾飞,有些国家像瑞典那样虽然贸易规模不大但是一直保持着高利润水平,都是“特殊论”(“特殊性”)的种种表现。学术界认为如果过分强调举足轻重的比较,就可能陷入与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错误类比。在由意识形态激发的辩论中,一些人表述“特殊论”立场时可能直接或者不直接使用这一术语。有些人可能因为“特殊论”(“特殊性”)被用来取代常规分析词汇而对它持批判态度,或者因为不恰当的使用使它成为一个错误标志而不悦。从语用功能上讲“exceptionalism”既可用作褒义词(相当于汉语的“独一无二”或“出类拔萃”),也可用作贬义词(相当于汉语的“各

①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pp. 267—292,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6.

别”、“另类”或“离群索居”），其语义因使用者的观点或语境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美国政府拒绝签署一些多数人赞同的人权条约以及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庭，被视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特殊论）的因素在起作用，就像一些人拒绝参与被广泛认可的原则或者实践受到的指责一般。“exceptionalism”还常用来表示一个区域或者团体与他人差异的实际程度和标志。

“中国特殊论”或“中国特殊性”（Chinese exceptionalism）是20世纪末以来许多西方汉学家、中国通、外交家、商业领袖和媒体人谈到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时经常套用的一个术语。西方和海外学者把“特殊论”（“特殊性”）用于描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国情的例子很多，有作为大词小用的，也有作为小词大用的，褒义、贬义和中性用法的都有。下面是一些报刊文论实例：

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特殊地位至关重要。“中国特殊性”是指革命时期的中心地位和国际主义立场，以及建设时期的和平崛起与和谐包容立场。中国把所有国家都看作合作和竞争对象，尊重世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拒绝干涉主义。

许多西方中国通都有一种“中国特殊论”的看法：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有资格解读中国的动机和言行，而普通人对中国投资、人权、外交和军力等问题的担忧均属无知、误解或杞人忧天。

“中国文化特特殊论”是针对研究其他文明的方法和观念可否适用于中华文明研究的问题提出来的。新信古派主张批判殖民主义时期的非中国视角的历史研究，拒绝一切非中国传统模式的阐述方式，同时坚信学习中国古典文献是汉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因此只有中国学者才最得天独厚。而不少西方汉学家却认为，在人文学科中没有哪个重要理论模式是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仅仅是一堆有待开发的原始材料，如果没有西方汉学家的参与和合作中国学者没法充分解释它。

20世纪60年代之前，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美国学者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研究多采用宏观分析的方法，对于中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特殊性一点也不敏感。20世纪70年代后他们开始聚焦于中国各地区和民族的发展变化，于是有关中国穆斯林的研究很快就成为美国汉学的主流学科。新疆和西藏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敏感的历史问题和多民族的社会背景而备受关注。这一“汉学特殊论”的观点相继存在于有关分支学科的研

究中。

1998年,时任一家杂志主编的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曾写过一篇文章称浦东是"上海的经济泡沫",并把上海市建筑的快速发展与战后欧洲的重建相提并论。他后来担任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董事会副董事长时却把浦东的崛起称为"中国特殊论"的样板。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和中国研究教授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在《中国话语:中国特殊论与历史政治学》一文中写道:

> 许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在其新近的著述中对于中国的崛起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虽然早先倾向于认为中国正融入国际社会,但是许多作者宣称中国基於其独一无二的文明将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那些著述从中华帝国的历史中寻找决定中国和世界未来的线索。这种揭示即便不是影响世界至少也将影响亚洲的中华文明实质研究可以称为"中国话语"(Sino-speak)。中国与东亚邻国的关系史不失时机地引导我们对广泛认可的"中国特殊性"的准确分析。……世人皆知:世界力量正从西方向东方发生巨大转移。许多评论家断言,中国因为经济快速增长,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现代化的军事和辉煌文明,不仅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肯定会对21世纪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想了解北京对于未来的计划:中国对于未来的宏大目标是什么?中国强大后要做什么?中国会不会像官方政策所说的那样逆反不满势力的历史潮流在现有国际体制中"和平崛起"?北京在从规则遵守者到规则制定者身份转变过程中将如何重建国际规范和制度?①

就政治、经济和文化而言,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特殊论"就是不接受普世价值,逆反国际政治、经济或外交规律行事。学术界对于中国是否有"特殊论"目前还存在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在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历史发展道路及对外关系经验等方面中国有其特殊话语(exceptionalist

① William A. Callahan: *Sino-Speak: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age 1 of 23, 2012..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2012.

discourse)。但是与西方对应原则"征服与支配"不同的是,"中国特殊论"的基本理念是"和平与包容"。中国把所有国家看做合作伙伴,而不是战争或掠夺的对象;中国尊重世界文明传统的多样性,而不是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霸权;中国也拒绝宗教式的干涉主义,追求仁厚包容的中和主义。①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特殊论",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是:高度现实主义,追求权利和利益,很难发现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第三种看法是历史上中华帝国实行天下主义;"五四"时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中国建立后,提倡社会主义普世主义,不讲例外。②

"中国特殊论"有时被理解为新出现的"东方主义"术语(the emerging dialect for the new orientalism),因为价值观的差异在学者们自己的汉学著作中常有不同理解和表述。有些西方学者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崩溃论"(China Collapse)和"中国威胁论"(China Threat)的论断。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崩溃"和"威胁"是中国呢?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状况进入了正常的发展阶段。如今倒是有很多人愿意用"中国模式"或"奇迹"来概括中国过去30多年的骄人的经济发展。

波奇·特德(Pouch Twitter)在《中非关系的特殊性:从语汇到实质性的差别》一文中写道:

> 中国在非洲的权力道德基础,是一种可以被称为用语言、国家正式关系的框架和实际行动表述和法规化的"特殊性"。其内容为一种求同存异的陈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本质上有别于此前与非洲往来的所有外来势力,这种差异主要建立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基础之上。因此中国的特殊性是一种确保互惠和双赢的大陆与双边的参与形式,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可能不对称,但是就确认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而言(互相尊重和政治上一视同仁)却是平等的。中国政府建构中非关系的久负盛名的模式是建立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领土

① Feng Zhang, 2012. *Chinese Excep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Distinguished Speaker lecture, Murdoch University, also in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 3, 2012.

② 方可成:《中国例外,还是普世价值?》,载《政见》2012年8月16日。

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以及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对于贸易的扩大发挥了作用。时至今日中国做法是成功的，外界反应也表明中国在非洲不存在政治势力或者经济危害。

……

中国特殊性的三个基本特征（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互惠和中国对自己在非洲经验的解读）凸显中国对维护国际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追求，以及在政治平等和经济互补基础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事的强烈愿望。正如2006年1月在其非洲政策（及尔后的相关声明）所阐明的那样，作为持久利益基础的该框架将密切服务于非洲各国的建设需要，为此，决不做任何不利于实现中心目标的事情。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做法是，中国通过重申以相关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为自己的非洲权利表达提供了道德基础，确保彼此关系不会降格为某种宣传。①

美国人认为，“美国特殊论”是一套建立在多数人智慧的民主体系基础上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种想法通常是不会出错的。美国从建国时候起就是一个提倡自由、民主和博爱的特殊国家，两百多年来因为推行了这一模式而一枝独秀。2011年11月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文称：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美国被称为“自由帝国”，“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报道指出，“美国特殊论”认为，美国的价值理念、政治体制和历史是无与伦比的，言下之意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独特的作用是命中注定的，天意赋予了他们这个权利。②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争连任演说中曾经说过：有美国特殊论就像英国人认为有英国特殊论、希腊人认为有希腊特殊论那样，岂不说明美国并无特殊之处？看来他不喜欢美国沦落为政治上和经济上“老二”的地位，不完善的“美国特殊论”需要重新进行定位。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美国的特殊论是普世的，而中国的特殊论却是文化的。中国人认为自己代表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文明；而美国的

① Pouch Twitter: *China's Exceptionalism in Africa: from Rhetorical to Substantive Difference?* 25 August, 2010.

② 斯蒂芬·沃尔特：《“美国例外论”五大错觉》，载《中国日报》2011年12月8日。

特殊论则是一个长远的概念：由于其观念和历史关系美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处于一个特别的地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维护自己权益时常受到“挤对”，但是当前他们都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①

基辛格在他的专著《论中国》一书中对中国特殊论还有专门的论述。他写道：

> 中国版的特殊论与美国的不同，特别是在其如何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面。根据儒家思想，中国拥有一套既普世又世俗的价值观，不过没有必要将它传播到境外。中国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认为没有哪个新世界需要移民，没有什么遥远彼岸的人需要救赎，中国就是福地，中国人已经在此居住。他把中国描述为一个以长远眼光看待历史并且谨慎做事的国家。中国会在某些优势难以察觉而且敌对者尚未意识到与中国之间存在对抗之时，就努力去发现面前对手的优势。②

二、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诠释

几年前，一则来自境外的消息称：美国《新闻周刊》(News Weekly)曾通过国际网民投票，评选出了中国和美国等12个文化大国和代表各自文化的20个符号。经向该刊编辑部求证得到的答复是上述消息纯属虚构。

2010年11月27日，在北京公布的中国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大学生中国文化符号观调查报告》称：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主持的调查吸收了近百名研究人员参与，在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24所高校中发放了近2000份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号”、“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以及“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推广价值的外国文化符号”。在270个备选项目中，我国大学生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前10个中国文化符号(cultural symbols)的统计结果为：汉语(汉字)、孔

---

① Thomas Omestad: *Forme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Kissinger on U. S. Exceptionalism*. News Feature, May 17, 2011.

② Ajit Mohan: *Panorama: Kissinger's China, India's Neighbor*, *Wall Street Daily*, October 24, 2011.

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评选结果显示:就整体而言,受访者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认识普遍趋同,但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符号的标准和选项分歧较大。

文化符号是经过时代洗礼的精神文明和非物质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文化和理念的载体,也是通过客观存在的物质外在特征表现出来的广义观念。这些象征性符号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含义,是人们在社会交流中普遍认可并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代表一种经典、现代和国际化的形像。因此中国文化符号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系统,通过这些符号可以直接使人们感知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存在。

2008 年 6 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符号中国》收录了数千张从从风俗到礼仪、从人物到景观的中国文化符号图片,涵盖了中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历史遗产诸方面的内容。主编冯骥才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对于中国符号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

> 对于一些巨大的事物,比如城市、国家和民族,符号本身是一种公认的结果。对于一个城市或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的、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城市的符号是城市的标记和标志,国家的符号是国家最具特征的细节。最鲜明的符号被认做象征。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
> 然而,能成为国家符号的事物无所不包。其中,有举世闻名的文化遗址与历史建筑,有罕世绝伦的艺术珍品,有名贯千古的风流人物,有特立独行的民风民俗,也有得天独厚的山川奇观。它们从不同侧面显现着一个国家的精神,或情感、或智慧、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它又是我们认识一个国家具体的凭藉。应该强调,符号不是人为刻意制造的。它是历史积淀和选择出来的。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是最深刻的内容最鲜明地外化。愈是博大和深厚的文明古国,它的符号就一定愈多、愈丰富和灿烂。符号的灿烂是文明的灿烂之使然。①

1681 年南京天主教徒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

① 冯骥才:《符号中国·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年。

1657—1692)陪同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赴罗马教廷述职。1684 年 9 月 15 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在巴黎接见他们时,沈福宗向国王呈献了孔子和康熙画像,以及《大学》、《中庸》和《论语》等儒家典籍的拉丁文译本。9 月 26 日在路易十四宴请沈福宗宴会上,沈福宗向在座的主宾展示了筷子的用法。他还身着青丝蓝缎纹龙织锦与柏应理参加了另一次王宫宴会,在参观圣路易王宫时展示了中国的丝画艺术。1687 年 3 月柏应理和沈福宗顺访了英国。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Ⅱ,1633—1701)派画家戈弗雷·克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特别为沈福宗画了一幅全身肖像画,并请他为牛津大学的中文藏书编目。沈福宗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会见了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向他介绍了中国的辞书《海篇》和《字汇》以及中国象棋和围棋,还做了中国游戏"升官图"和汉字书法表演,并共同探讨了中国历史、哲学和语言等问题。当时欧洲大陆正流行"中国风",沈福宗向英法君臣展示的孔子和康熙画像、中国辞书、汉字、织锦、丝画、筷子、象棋、围棋和升官图,都是帮助法国和英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华文化的符号。

1795 年 5 月,荷兰来华朝贺团副使范罢览(Houckgeest Andre Everard van Braam,1739—1801)因为荷兰局势动荡决定移居美国。临行前他在广州为美国总统夫人马萨·华盛顿(Martha Washington)订购了一套中国瓷器,为自己计划在美国建造的新家购置了一套中国家具,还专门聘请了两位广州画匠以他往返北京途中所做的大量速写为蓝本绘制了 1800 余幅中国画,并装裱成册。1796 年他抵达费城后,从中挑选了 350 幅在自己寓所举办画展,引起了当地新闻界的关注,对他的中国之行做了大量报道。后来他在特拉华河畔建造的公馆用了许多中国工艺品进行室内外装修。2000 年美国埃塞克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副主任麦志明博士(Dr. Bruce Maclaren)在该馆地下室发现了范罢览当年遗留的《中国画册》中的 249 幅水墨画,引起了极大轰动。观看过那些中国画的美国汉学家和艺术家都认为画中的主题涵盖了中国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和工艺学,以及艺术、文学、考古和神话领域的诸多元素,表现了清代为欧美市场创作的中国画风格的多样性,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感受当时中国社会的真情实景,同时也证实了早期美国民众从美学上对中国艺术的认可。那些中国画就是一个价值连城的中国文化符号数据库。

人们认识事物有时从文本介绍开始,有时从具体人物和事情开始,在

进入记忆储存之前都必需经过梳理、归纳、比较、概括和抽象化,最后形成"知识"。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为了加速或者深化对某一新事物的认识时,需要从自己记忆中调取所积累的知识,通过类比和对照对新经验进行归类。如果不对已知信息进行再现这一学习或习得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符号学(semiotics,或 semiology)的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和解读中国文化符号。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符号学有两大学派,一是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为首的欧洲语言符号学派;二是以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为首的美国逻辑符号学派,20 世纪 60 年代两者以"现代符号学"之名扩展到文化和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皮尔斯原来在哈佛大学学习化学专业,后来从事形式逻辑研究,创立了实用主义符号学。索绪尔建立了包括"意指"(signified)和"所指"(signifié)的二元体系,皮尔斯则以"符号"(所代表的语音和拼写,即"能指",signifier)、"阐述者"(中介)和"事物"(所指)为一体的三元体系区别于前者。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表意的科学,其核心元素是符号与象征。符号学与语言学直接相关部分包括:语义学(考察符号和"所指"的含义)、句法学(考察符号间的关系)和语用学(考察符号的使用问题)。索绪尔创建的语言符号学派,以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为现代符号学的重要人物。巴特对符号学理论的贡献主要是他对索绪尔语言学的超越并与文化研究挂钩,使语言学的"所指"变成文化研究的"能指",从而构成一个有更深层意义的"所指"。他不仅将语言符号学引入到象征符号学,还赋予了符号学社会和政治意义。从广义而言汉学也是符号学的分析和研究领域,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很重要。

符号学思维方式就是对事物意义及其表达进行思考的方式。对"表达形式"关注的优先性与对具体内容关注的优先性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就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而言,因为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都直接通过纯文本或者图像化文本方式进行思考,也不可能都直接通过具象或者数字化具象方式加以接受,但是最好的方式是两者结合。

在汉学研究和教学中,符号学知识的运用十分重要和广泛,可以实现话语政治和话语历史的转向。正确的符号学应用有助于学习者通过具体内容吸收历史正能量,形成一种愉快的心结。反之,则可能接受历史负能量,产生抵制情绪的积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文化在影响亚洲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

亚洲文化的影响，范围所及不仅仅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包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通常都是双向的，因此在日常社会交际中文化冲突现象时有发生。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中心教授包华石（Martin Joseph Powers）在北京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说：冷战时期美国的汉学研究学者提出了“文化本质论”、“欧洲文化优越论”、“文化冲突与竞争的必然论”以及“文化目的论”四个方面的观点。包华石认为文化本身不具备本质性，流变性才是其主要属性；欧洲文化并非总是先进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化之间除了竞争，也应包括相互学习和交流，既有激烈的排挤与抵触，也可以共享共赢。至于文化发展的终端，“西方终将胜利”之说失诸片面，因为历史并没有具体的终点。① 他认为中国文化是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核心内容。

三、意识形态与美国汉学

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历史学家、宗教领袖、外交家、政治家和富商，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的特殊性帮助自己建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自由世界”，并以不同方式向世界传播其“20 世纪必定为美国人世纪”的价值观，但是这个“自由”国家的舆论和宣传机器却不允许来自本国公民或者外部世界的“非美”和“反美”的思想享有自由空间，因此引起了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对这一美国模式普世价值的质疑。

美国人使用的英语是当代世界的主流语言之一，这一现实使许多美国人相信自己的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地位可以经久不衰。美国大学的历史系、东亚系、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需要很多中国人文学科专家，但是那里却是“欧美中心主义”（Euro-American Centralism）偏见最强烈的科系，容不得“中国中心论”与其平起平坐。② 美国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普遍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 Centralism）。在东西方文化处于不平等对话

① 方麟：《美国汉学家包华石做客清华解读文化冲突》，清华大学国学院海外学者短期讲学课程“文化冲突的新解读”之二，清华新闻网 2012 年 5 月 15 日。

② “中国中心论”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中国封建统治者视华夏为世界中心，中国的皇朝是“天朝”，而其他民族是“化外之民”或者“蛮夷”，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是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在汉学研究中与“西方中心论”对立的观点，以柯文为代表的美国汉学家认为西方入侵中国引发的巨大结构性变动是中国革命和人民斗争反抗的结果，汉学研究中应该提倡“中国中心观”（Sino-Centralism）。

的年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虽然这种偏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潮流中也在缓慢地改变着,但是要美国舆论真正理解、认识并接受东方现实无疑尚需时日。

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在外交事务中坚持意识形态(Ideology)对其政策实施、文化传播和经援对象进行严格控制的。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当代所谓的"民主外交"和"人权外交",从"布拉格之春"到"阿拉伯之春",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切入口大做文章的,广泛涉及自由、平等、民主和三权分立等诸多目标与理念。

意识形态是表达人们政治思想的一种价值体系,包含对社会和现象本质的正面和负面的认知。它是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依据,源于特定的经济和政治背景的理念和观点的总和,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通常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意识形态不是个别人偶发或者零乱的思想判断,而是形成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就赋予了它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等特性。一般来说,意识形态对于考察对象负面成分过多地关注或者故意曲解和夸张,必然会对人们观察世界和分析问题的过程和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对问题作出错误分析和推导。由于时代局限或者考察者个人的认知方式存在偏差,也可能在研究中留下隐患。就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而言,多数人追求的是真知实情。不管愿意与否,社会人都生活在一张无形的意识形态大网之中,受到吸引、限制或迷惑,不能不做出自己的选择。

意识形态存在于人们的政治、社会、艺术、审美、宗教、哲学和伦理的观念之中。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社会人们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历史证明:意识形态的发展动向和诠释活动无一不是在特定的权力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占统治地位的观念都是执政集团思想的具体表现。追求权力的个人或组织往往会通过自己的言行和表现方式去影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设法使它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社会,一些人会通过手中的权杖突出自己的意志,排斥不同的见解,使自己或者自己所属的阶层获得全部历史和学术诠释活动的合法性。掌握一定范围权力的人还可以通过信息封锁、制造假新闻或者垄断宣传,使周边的人生活在被意识形态所左右的虚拟世界,放弃纠正错误和为实现美好人生目标所做的努力。

冷战时期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外交官、学人和记者,通过各种渠道和

方式参与了对外事务。他们不仅是那个时代学术界的重要角色，也是现代美国思想史中的学术精英和领衔人物。相对而言，那些受到打击、排挤、审查和批判的对象却成了历史大潮中的牺牲品。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汉学研究所经历的麦卡锡主义清洗运动、1958 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后的汉学大发展和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低谷的停滞状态对汉学研究的负面影响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若干年后的美国已经完全建立了所谓的三权分立、两党制大选、军队国家化、舆论监督、新闻、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司法公正等体系，然而这些建制并没能防止 1950 年“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政界的党派矛盾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阻碍美国汉学发展的因素。

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反共和排外运动。1945 年 3 月，美国众议院以 207 票赞成 186 票反对，将备受抨击的“非美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改建为常设机构。同年 3 月 11 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借口当年 1 月 26 日的《美亚》杂志（Amerasia）刊发的一篇文章与他们所掌握的一份密件内容相同，便联合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一起突击搜查了该杂志编辑部，事后声称从办公室搜出了 1700 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6 月 6 日联邦调查局再次查抄了该杂志编辑部，对外宣传已经从中搜查出 1069 页政府文件，其中有 504 页属于保密级的公文。同日，美国司法部以“窃取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任职于原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 6 人。据统计，后来大约有 2000 万美国公民先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至少有 800 万美国人需要宣誓效忠自己的国家。连一个为街区商店做广告模特名为帕萨迪纳的 3 岁女孩也不能幸免，她的母亲被告知女孩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后才能领取报酬。

20 世纪 50 年代初，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9—1957）因怀疑罗斯福新政中任要职的阿利格尔·希斯（Aliger Hiss）是共产党人而大肆鼓动“十字军运动”的共和党人。他原在威斯康星州担任律师，1942 年任巡回法院法官，1946 年才正式被选为参议员。1950 年 2 月，麦卡锡公开揭露有 205 名共产党人进入了美国国务院雇员编制，但是他并不掌握具体人员的名单。同年 6 月，一个组织在所发表的《赤色频道：共产党在广播电视中影响的报告》（Red Channels：The Report of Communist Influence in Radio And Television）中列出了 150 多位广播电视雇员的名单，指责他们并

非效忠美国的公民。联邦调查局还出于同一目的责令纽约市摄影联盟解散。为了安全起见美国各地公民纷纷掀起了效忠宣誓之风。《时代》、《生活》和《芝加哥论坛报》等报刊也耸人听闻地散布所谓“被赤化”的言论。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指责民主党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共”并“出卖了蒋介石”,把曾经担任驻华特使的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将军(George Catlett Marshal,1880—1959)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叛徒”。

1953 年 4 月,麦卡锡在两名助手的协助下对美国驻外使馆的藏书目录进行了审查,把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1881—1957)、左翼作家白劳德(Earl Russell Browder,1891—1973)和史沫特莱等 75 位作家的著作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1917—2007)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的作品也被列入了“危险书籍”。据估计,被列入黑名单的书目多达 200 万册。随后在美国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开始查禁或者焚毁的可疑书籍和杂志中,竟包括有关雕塑、医疗、幼教和建筑类的专著,以及侦探小说和爱情小说。1953 年 11 月 6 日,美国司法部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公开指控杜鲁门总统本人曾经庇护一名苏联间谍,因此对他是否忠诚国家表示怀疑。

美国国会自 1950 年起先后成立了泰汀斯委员会和麦卡伦委员会对欧文·拉铁摩尔进行了审讯,美国忠诚审查委员会和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对费正清进行了多次传讯,案卷长达 1000 多页,使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从事研究。因为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而受到审查的谢伟思、柯乐布和艾奇逊(Dean Acheson,1893—1971)名誉扫地。埃德加·斯诺因受到审查不得不偕同夫人移居瑞士,后来客死日内瓦。太平洋学会、美国学术理事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教育委员会、洛克菲勒和里斯基金会先后被列入了调查名单之中。物理学家钱学森因被指责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传讯,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他所持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1955 年他离开美国以前一直受到各种限制、盯梢和监视。

戴维斯 1908 年出生在四川一个传教士家庭,在中国接受过小学和中学教育,后来返回美国上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外交官行列。1942 年他被先后任命为美军驻中缅印战区部队司令官史迪威的顾问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二秘。1943 年 6 月,戴维斯在写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建议美国与共

产党人建立直接的联系,并向延安派驻观察员。1944 年 1 月 15 日,戴维斯致函史迪威,再次呼吁尽早向中共控制地区派遣军事和政治观察小组。在他和其他美国有识之士的努力下,1944 年 7 月美国派出了一个军事观察小组对延安进行了 16 天的访问。

两年后戴维斯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司。但是在美国国内掀起"谁对失去中国负责"的大辩论中戴维斯、范宣德和谢伟思被认为难辞其咎。戴维斯一次次接受审查,一次次被宣布无罪。1954 年他第九次接受了审查,虽然不再是"不忠诚",但却被指认为"缺乏判断力、不审慎和不可靠"。戴维斯被辞退后移居秘鲁,为了养活家人,做起了家具生意。因为他并不善于经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1964 年,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前途,戴维斯返回了美国,开始了为恢复名誉而奋力抗争的漫长历程。他的代理律师要求国务院重新审查他的案件,但国务卿腊斯克对此毫无作为。1966 年腊斯克拒绝了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延聘戴维斯参加亚洲问题专家顾问委员会的建议。直到 1969 年美国国务院才批准他参与一项涉及接触保密资料的研究项目,间接地为他平了反,此时他已进入了花甲之年。1971 年年底他举家移居西班牙,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回到美国。

令人不解的是,那些与"民主"和"自由"含义不相称的现代迫害手段竟被视为一种遗产长期在世界各地兜售和复制。40 多年后华裔科学家李文和(Wen Ho Lee,1939—　)因莫须有的"核武器机密案"遭拘禁,被认为是一桩典型的教科书式案例,反映了特工部门和媒体为集团私利联合起来对付一个无辜学者所能造成的巨大心身伤害。

由于许多汉学家和机构都不同程度遭受了审查,美国现代汉学研究在很长世间内成了危险的雷区,几乎无人敢问津。一些心力交瘁的学者开始把自己的学术兴趣转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或者从事汉学经典著作翻译。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几位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专家,如顾立雅、魏鲁男和卡利斯(Helmut G. Callis)。美国中国思想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on Chinese Thought)先后召开了以"中国思想的历史特征"、"中国思想与制度"、"行动中的儒家"、"儒家的说服术"和"历史上的儒家人物"为主题的中国儒家思想研讨会。

1954 年 12 月美国参议院以 67 票对 22 票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满目苍夷的美国学术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

束,美国和苏联相互挥舞橄榄枝,东西方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麦卡锡主义对美国汉学研究的负面影响却远未终止。20 世纪 50 年代前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中有 22 篇的作者被列入了黑名单,几年后他们的名字在这两家报纸上消失了。①

1958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国防教育法》,任何大学设立的汉学专业要纳入国防人才培养体制就要通过审查。因为当时中美两国处于政治上对峙状态,他们只能往台湾地区或者香港地区派遣留学生学。攻读汉学专业的学生申请奖学金也要通过政审,对于有"左"倾思想或者共产主义信仰者受到了严格限制。

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的几年中,美国国会每年都提出 80 多个涉华议案,内容主要是指责中国或者批评白宫的对华政策。在国会对华贸易问题进行表决时,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无不成为考虑的主导因素。在媒体炒作和利益集团制造的氛围中,中美之间的外交,经济和文化等问题都被涂上了政治色彩,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不失时机地扮演了摇旗呐喊的角色。

2001 年 10 月 26 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声称"反恐"需要,促使国会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国会法案"(Act of Congress,正式名称为 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orrorism Act of 2001,据词头字母合称为"爱国者法案"USA Ptriot Act)。美国法院根据该法案第 215 条规定允许国家安全局实施"棱镜与时代互联网监控计划"(Prism and Tempora Internet Surveillance Programs),警察机关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信、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记录,减少对于美国本土外国情报单位的限制,扩大美国财政部长的权限以控制金融流通活动,加强对于居留、驱逐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外籍人士的权力。对"嫌疑者"的邮件、电话、照片、存储数据、文件传输、即时消息、视频会议和社交网络资料进行监控后来范围进一步扩大。《爱国者法案》撰稿人之一的共和党议员森布伦纳(Frank James Sensenbrenner,1943—)被引述称"这一行动完全超出了《爱国者法案》允许的范围,是过度的,非美国式的"。

据媒体报道:2013 年 6 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国防项

①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 年第 6 期,第 42 页。

目技术签约方雇员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 1983—　)在香港爆料美国黑客四年前就已入侵中国网络系统上百个,持续攻击清华大学主干网络以及拥有庞大海底光缆的香港佩克网(Pacnet)总部计算机。斯诺顿说:"他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滥用职权的社会中,也不希望生活在一个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这一爆炸性新闻引发了全球性政治风波。美联社的一篇时评分析称,在美国有将近50万像斯诺登这样的雇员,能接触到大多数敏感文件。据信谷歌(Google)、苹果(Apple)、微软、雅虎(Yahoo)、美国在线(AOL)、聊天室(PalTalk)、夜话(Skyle)、视频分享(You Tube)、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信息技术巨头都以不同方式与美国官方监控部门结盟。决策者认识到,当今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中可以通过互联网达到政治目的,使美国稳坐"全球领导者"之尊位。这是美国意识形态对于人文社会领域施加影响的典型案例,使人联想起当年的"麦卡锡法案",在此美国语境中其汉学研究难免不受干扰。

美国意识形态对于汉学研究的负面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学术生态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学术思维方式和对于中国经典文献的解读与评价方面。麦卡锡主义肆虐期间美国的汉学研究基本上无法开展正常的学术活动,对鲁迅、茅盾和巴金等中国作家的研究极少。许多美国图书馆连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没有收藏。虽然美国学人很早就译介了左联作家丁玲等人的作品,但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也只出版了丁玲的《生活与创作》,到了80年代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善。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也是薄弱环节,只有罗·弗兰德对艾青的研究,西里尔·贝契和杰克·贝尔登对赵树理的研究。

汉学研究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离不开翻译活动的保障,一般认为,翻译过程中策略与原文同等重要。译文质量的高下取决于译者对原文及其风格的理解是否正确,译词选择是否贴近,技巧和表达手段的使用是否得体,以及读者或受众对象的定位是否符合实际,而这一切最终又由话语权所体现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所定夺。

葛浩文在翻译旅英作家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时碰到了书名的翻译问题。作者曾经考虑以"Hunger"为书名,但是未能获得出版社的首肯,个中缘由是从市场营销角度看对于读者缺乏吸引力。作者对书名中"饥饿"二字曾做过"生理饥饿、灵魂饥饿和性饥饿"的解读,但是英语中很难找到同类的多义词,于是译者退而求之,以符合译事规范的"改写"办法将

书名译为“Daughter of the River”。显然,这里也有一个由话语权所体现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操控的问题。

具体到文本的翻译,由意识形态引起译词选择、语义表达和技巧运用的难度比起书名的翻译要大无数倍。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几乎可以信手拈来。

四、美国汉学研究中的学术代沟与话语权

在美国200多年汉学发展历史中,先后涌现了以卫三畏、克陛存和柔克义为代表的第一代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群,以德效骞、费正清和拉铁摩尔为代表的第二代汉学家班子,以白鲁恂和牟复礼为代表的第三代汉学家团队,和以宇文所安和夏含夷为首的第四代汉学家阵容。他们从翻译和解读华夏经典文献开始,由微观个案研究逐渐扩大选题范围,覆盖了越来越广泛的汉学人文学科领域。学者们致力于对儒家学说核心价值观的揭秘,对抢救史料的口述史访谈方式的倡导,把美国行动主义精神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在第三世界政治现代化中对文化差异的关注,以中国中心观取代种族优越感的呼吁,在汉语方言分析中层次语音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在历史研判中用结构主义理论模式进行的解读,以及在科技评析中对中国妇女性别规则的考察。总之,选题和分析手段一直保持着更新和变化。

美国学者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因为视角、观点和方法差异而得出反差悬殊甚至绝然相反的结论,形成了代沟和话语权的纷争。由于学术生态的变化,人们认知事物方式的多样化,加上所获得的信息量差别而导致了代沟周期的缩短。除了上述情况之外,学者们所处时代学政部门的导向,读者因潮流变化而对某些信息的接受和抵制,都可能对学术分析、表述和结论产生干预。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学术研究中“所有的东西都被解释成话语,话语成为本质。一谈到文本,只是与话语有关,这个文本与那个文本就是一样好。”①现在全球一体化正为我们建构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在学术研究中每一位学者都可以成为不同群体的代言人,虽然中西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别,但是日益增加的交流使学术互通和借鉴

① 魏斐德:《代沟是怎样形成的》,2004年6月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主编叶檀博士访谈,载《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

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频繁和容易。

应该说明的是,汉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更新是人文学科发展史中正常的新陈代谢现象,不过其中一些只有新旧之分,而另外一些则有优劣之别,不能一概论之。例如:微观个案与宏观全方位研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务实性研究、单科独进与多元并立理念、个人研究与团队化国际化攻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主客观条件和学科水平的限制以及学科项目复杂性的制约。汉学研究也可能因为标准不明确而导致自由定位和随意解释的情况发生,例如"中国中心观"与"西方中心观"、"中国奇迹论"与"中国崩溃论"、"技术理论评测"与"学术问题政治化"之间的观点立场差异,后者明显为带偏见的意识形态化所左右。

费正清是一位有影响的理论家,作为"学术企业带头人",他所培养的弟子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权威。他毕生独著、合著和编辑的著述达60余部之多,还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书评,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来阐述问题。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中,他就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变化的关系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一观点在他的《美国与中国》和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都做了较全面的论述,认为其影响已经深入到各个学术领域以及相关的研究进程之中。在他看来,长期居正统思想地位的儒家学说确保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但是中国也因此变得封闭、保守、排外、缺乏发展活力。于是西方对中国的挑战就成为一种打破平衡的刺激,为我们这个古老大国提供了机遇。这就是他所谓的"冲击—回应"模式的作用机制,在美国汉学界相当一段时间内主导了学者们对中国问题的探讨,甚至成了一种套路。

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次次激进学生运动席卷了欧美,在随之而来的郁闷日子里西方青年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了从信仰、制度、语言到学术权威的"解构"(deconstruction)对抗。可能受到对越南战争反思和批判的学潮的启发,一些学者开始对费正清模式提出了质疑。以柯文为首的一代后起之秀主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能沿袭西方传教士撰写来华传教史的模式,必须摆脱西方中心论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多学科研究揭示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动力,确认中国现代化进程反映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社会后引发的巨大结构性变动,经过中国人民多次改革和革命后才形成了现代中国的面貌。1984年,柯文在《中国历

史揭秘:有关近代中国的美国史学著述》中对其业师费正清的史学模式提出了批判观点,指出其弊端是只注意中国所受到西方影响的一面,却低估了中国传统社会能动抵制外来入侵的另一面。柯文倡导以"中国中心观"来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反对以西方列强对中国冲击和中国的被动回应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这不仅是对中国史学研究固有路线的反思,也是对西方研究中国文化模式的勇敢挑战。

费正清的高明之处表现在他诚恳地接受了年青学者对他的批评,承认了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且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过去的中国史观作出了修正,郑重地指出中国的近代化动力主要源于中国社会内在的生命力,而来自西方的外部影响只是有限的因素。

美国汉学家何伟亚(James L.Hevia,1947—)是1986年芝加哥大学博士,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发展史,以及18世纪后的中国、欧洲和北美关系史,曾任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后任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专著《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1995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1997年美国亚洲协会颁发的列文森优秀著作奖,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的研究经典而饮誉国际学术界。有关该专著的主要思想架构以及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的应用,何伟亚在《怀柔远人·序言》中有这样的一段陈述:

> 关于马嘎尔尼使团所受之接待,从前的学术界持有三种看法,本书正是对这些看法的回应。第一种是结构—功能学派的看法,这一学派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它的批判性的分析促进了对古典模式如"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朝贡体系"的再思考。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摒弃"朝贡体系",那么,18世纪晚期以来的中西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
>
> 第二个问题部分也是由人类学的分析所激发,而与社会学的礼仪观有关。我确信,正是欧美世俗(非宗教的)学者对礼仪的特别的看法,才使中西冲突被构建为一种文化误解。我考虑的问题包括两部分:一、形成这种阐释的文化观是什么?二、倘若抛开文化因素,冲突会是什么样的?

第三个争议与我自己的态度有关。我不赞成中国中心主义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样的观念,尤其考虑到清朝的建立者是满人而非汉人。由此引向第三个问题: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看做生机勃勃的扩张性的西方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东方,而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和大英多民族帝国的相遇,那么,自马嘎尔尼使团之后的清英互动又该是什么样呢?这本书和我正在写的第二本书试图阐释这些问题。①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 1942—)在1997年香港发行的《二十一世纪》12月号上刊登了《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一文,对何伟亚的专著提出了批评。该刊同期还发表了艾尔曼和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合撰的《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1998年周锡瑞又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刊发了长篇评论,指责何伟亚在解读文献中存在着严重失实的问题,并由此质疑其后现代研究方法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有效性。海外汉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旷日持久争辩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1999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发表了罗志田的书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对书中两大核心观念——"多主制"和"迎宾礼仪"提出了申论。2002年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了由邓常春翻译的该书中文版《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译文中的中文参考文献均按照原著的英文回译,但是在脚注中提供了中文文献原名,供读者研判。至此,《怀柔远人》以及史学中的后现代研究方向成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话题,其中许多观点值得深思。

周锡瑞是196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毕业生,曾师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很重视经济研究对历史理解的作用。他认为没有绝对的"中国中心观"和"欧洲中心观","冲击—反应"模式和"中国中心观"是两个极端。他对学术现代性持批评态度,认为从研究角度看分析立场只有两个:一个是从革命的视角进行研究,一个是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中国的历史悠久复杂,个人研究应该重视调查分析而不应从先入为主的概念

①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出发。他是一位坦诚的学者,对待不同的观点总是喜欢据理争辩。他主持的讨论课也因注重培养学生的交流意识和视野扩展而享誉海内外学术界。

由艾尔曼、莱恩(Ellen Laing)和魏斐德等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对于何伟亚通过后现代主义观点与档案材料相结合赋予了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旧事一种全新的诠释,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此事在美国汉学界虽然不算开新风气之先,但是确属一种有益的尝试。"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什么概念?有人说它不是一个"主义",而是一种"社会生活状态"。有关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出现的时间说法不一,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是20世纪70—90年代,但是在法学、建筑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艺批评和心理分析等领域学者们均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既定的理念。最早出现后现代主义概念的领域是哲学和建筑学。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常被理解为女性主义、多元文化、解构主义、时间元素、媒体应用或者物质主义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严肃的哲学家因为该概念含糊而不喜欢使用这一术语。回顾西方近代发展史,年轻一代学者发现工业革命之类的声势浩大社会发展运动,无不融合了美国清教徒的开拓精神和二元对立的政治模式,因此从后现代主义衍生出来的文化信念都是反对主流方案、理性中心或者二元对立思想,更反对以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导的美国文化生活方式,然而对现代主义以前的社会生活方式却充满着怀旧之情。

宾礼研究是何伟亚在《怀柔远人》中重点论证的一章,也是他展示史学研究中后现代主义理论功能的关键一章。马嘎尔尼来华受挫是中西交流史上引人观注的事件,由于清廷视西夷为化外之人,建立在"多主制"思维观念之上的礼仪制度因其不确定性导致了贡使的冒犯,结果乾隆皇帝拒绝了马嘎尔尼代表英国所提出的通商要求。这里,马嘎尔尼事件的价值似乎只被何伟亚用于证明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史学研究中有效性的外事案例。

周锡瑞对于史学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持批评态度,认为把列文森奖授予何伟亚等于不恰当地提倡学术研究中的后现代写作方式。他还从史料和翻译角度批判了何伟亚的治史方式想象的东西太多,在征引原始档案时以猜想代替了忠实的翻译,对中文文献解读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其结论的可信度。何伟亚引以为自豪的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研究新方式正是造成文献解读错误的根源。在史料运用方面没有任何突破的情况下,仅凭后现代主义理论未必就能确保分析正确。

虽然周锡瑞只比何伟亚年长五岁,但是彼此的学术观点和思维方式却

有所不同。他对何伟亚的批评反映了美国两代汉学家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异,也是周锡瑞无法接受后现代主义方式研究的理由。周锡瑞是在西方左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汉学家,长期坚持批判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入侵。他热爱中国文化,同情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的不幸遭遇,理解中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而何伟亚及其时代的学者却有较多机会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专业上往往偏向于中立价值观,在理解中文经典文献时难免有不到位之处。这就毫不失真地反映了周锡瑞与何伟亚各自所代表的汉学家的代沟立场和价值观。

由代沟引发的话语权纷争有时也从美国学术界延伸到与其关系密切的华人学者圈中。1977 年,由杜维明倡议的"18 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召开,74 岁的徐复观和 37 岁的余英时均应邀赴会。与会者的发言主要围绕清代思想家戴震(1724—1777)的学术思想主题展开讨论。由于胡适和梁启超(1873—1929)的推崇,戴震在美国有很高的知名度。徐复观当时提交的与会论文为《清代汉学衡论》,对乾嘉学派进行了综合性评析,基调是清代汉学逃避了现实社会的责任,以汉学之名行攻击宋明理学之实无异于断送儒学生命。1965 年他曾表示要发愤撰写一部专著,重塑汉代学术的精神面貌。1972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汉思想史》第一卷,1975 年出版了第二卷,1979 年又出版了第三卷,以此向学术界表明他已经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余英时是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曾师从国学大师钱穆。他对于儒家学说的基本观点是:清代汉学代表了儒学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新发展,力图在儒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寻找一条联系通道。在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方面,钱穆著有《朱子新学案》,余英时也著有《朱熹的历史世界》,师生二人的学术指向与治学之道一脉相承,都想通过重构朱熹所经历的世界向学术界展示理学的光彩一面。余英时此次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是他的最新得意之作,要为清代汉学的发展进献新解。年高德昭的徐复观与血气方刚的余英时年辈不同,虽然在研讨会上彼此都相互尊重,没有出现激烈的争论,但是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歧见却由来已久,学术界早有耳闻。

1976 年,余英时出版了《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认为宋明理学代表的只是传统的"尊德性",而清儒的"道问学"却标志着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如果在两者

之间找到一条通道，也许后者的意义会超越前者。面对西方列强近代对中国军事和文化入侵留下的负面影响，儒家学者的使命就是要树立一面科学认知精神的大旗，大力提倡新的价值观，减轻或者消除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消极后遗症，以获得与外部世界对话的主动权。徐复观对于余英时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之间寻找平衡通道的努力似乎并无异议，因为他本人在提倡儒学自律演进的既定目标也是寻求现代的发展，但是对于余英时的结论却不完全认可。

徐复观与余英时在学术观点上的代沟和分歧有他们自己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也与余英时的业师钱穆的影响有关。钱穆年长于徐复观，声望也高于徐复观。钱穆曾经就治学之道与徐复观有过语重心长的交谈。徐复观经办《学原》和《民主评论》期间曾得益于钱穆的赐稿。但是徐复观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从政多年，曾任国民党军队团长、参谋长和师管区司令，1943 年受命任驻延安高级联络和参谋，20 世纪 50 年代才与唐君毅和牟宗三一起推动儒家现代化研究，因此被指认涉世较深，过于重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而且谈经论道时常意气用事缺乏坦荡之气，使人觉得他并非清纯学界君子。而在徐复观看来，钱穆从内地到港台后部分改变了自己的原先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式，认为儒学的出路需要借助科学。1958 年元旦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和唐君毅联合在香港《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敦请钱穆签名助阵，但是却遭到婉拒，成了学术史上一桩无法了断的难案。后来余英时曾撰专文《钱穆与现代新儒家》，郑重声明钱穆和他本人无缘与现代新儒家认宗结派的前因后果。

徐复观重视两汉经学，兼治宋明理学，强调人文现实精神。他批判清代汉学脱离现实，逃避时代的责任，缺乏使命意识——这样的评判也许不算耸人听闻。而余英时立足于清代汉学研究，坚持儒学智识主义，力图打开经学与汉学之间的联系通道，加固承前启后的纽带，可谓用心良苦。虽然他们各自代表了对中国传统研读与现代思想阐发的不同路数，但是目标显然都是为了儒学的现阶段提升。最为可贵的是他们彼此都表现出中国文人的一种自律和自觉，展示出新时代儒学发展生生不息的内在机制，从人文精神和认知原理的不同起跑线上奔向多科发展的目标。学人意向之深厚浅薄都可在对现实的关怀中得到验证。代沟倾向的张扬，大而言之是政治叫板，小而言之纯属一种感情发泄。但是就徐复观和余英时的情况而

言，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对方话语权造成很大程度的伤害。

美国汉学界的学术代沟比任何国家都突出，皆因学术生态与传统使然。但是代沟是思想进步的表现，是先进理念的扩张和积累，也是由沙龙清谈雅教过度到唇枪舌剑革命的演习。美国汉学的阶段性变化幅度之所以大，可以从这一特点分析中得到揭示。

五、美国汉学与中国形象的构建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国情在另一个国家公众舆论中的镜像，也是一国读者或受众根据对另一国的总体印象所做出的评价和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中国形象（image of China）就是美国中国观的一种表现。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当今世界，传媒由于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权威性一直发挥着国家形象最快捷最广泛传播工具的作用。

根据不同的涉科手段，可以从新闻与传媒、文学与影视、历史与文化、科学与技术等方面构建一个研究对象国的国家形象。如果构建的目的是为了妖魔化对象国，就属于负面国家形象，如果构建的资源来自对象国的真实社会现实，就是正面的国家形象。中国形象的构建是一项历史性的复杂工程。从美国早期的文本化中国形象，到近代视觉艺术的中国形象，再到当代全球一体化中的科际解读中国形象，历史在变化中发展，中国形象也在发展中不断进一步细化。

美国主流社会的中国观是构建美国中国形象的核心资源。在19世纪中叶之前，由于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的爆发，中美两国之间几乎没有机会开展经济和文化的直接交往。美国人早期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欧洲有关中国的知识：一个实行开明专制的国家，对各类宗教持宽容态度，社会繁荣建立在重农轻商的思想基础之上。当年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的少数富商和显贵家庭中都或多或少收藏着中国的瓷器和漆器，中国茶叶、丝绸、家具、墙纸在当时美国上流社会也风行一时，娱乐场所上演中国杂耍和功夫以及化妆舞会的中国穿戴成为一种时尚，为的是表达他们对于早期美国文化中古典主义的零容忍。

1896年，美国缪托斯柯甫公司发行了《李鸿章在纽约》和《李鸿章驾临第四街区和百老汇》。这是美国最早公映的中国新闻纪录片，穿着朝服的李鸿章也是最早出现在美国银幕上的中国官员。此后还有1898年的《香

港政府建筑》和《上海警察局》,以及1902年的《北京前门》和《天津街景》等,给没有机会来华的美国观众留下了奇特、神秘但又模糊的中国印象。至于1937年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改编的电影,尽管故事中的那些不苟言笑的人物显得多么呆傻和古板,但是他们言谈之中体现出来的孔孟之道文化层次却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美国观众。

19世纪40年代的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古典哲学情有独钟,艾默生为了寻求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理论支持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不仅在《日晷》(The Dial)上刊登了孔子语录,还在自己的日记、演讲和随笔中经常引用中国诸子百家理论。超验主义行为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亲近中国文化。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eman,1819—1892)与艾默生的超验主义俱乐部关系密切。1855年他的诗集《草叶集》出版后遭到冷遇,艾默生向他表示了同情与声援。惠特曼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向往也与艾默生的影响分不开。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与印度都是并列的东方文化大国。在惠特曼的诗歌中,中国的山川、城镇、古庙、宫殿、平民和儒家学说时常被提及,他还从中国的审美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此外,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和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都是美国早期系统译介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著作。

但是后来移民美国的华工给美国人的印象却是诚实勤劳与愚昧迷信兼有,因为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带来冲击,美国公众舆论对华人的态度开始改变。于是,异教徒、堂会的恶棍、洗衣店的穷人、唐人街的鸦片馆开始出现在通俗文学作品之中。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军人、海员、学者和观光客的来华观感、报告和回忆录都有许多挖苦和嘲弄中国人的文字,令人难以卒读。甚至在作家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1870—1902)、罗伯特·威廉·钱伯斯(Robert William Chambers,1865—1933)、杰克·格里菲斯·伦敦(Jack Griffith London,1876—1916)的作品中都有负面的华人形象出现。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也有一些不真实的描述,1890年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媒体述评中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因此1892年再版时,批评中国人的"裙带关系"、"好吃"、"好名利"、"不会保存古迹"和"缺乏利他主义"等共约10万字符的内容都被删除了。

鸦片战争后美国学者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对中国进行考察和研究,无法掩饰他们对于中国的贫穷落后状况评测的悲观,以致在他们笔下的文盲、盗匪、流民、灾荒、瘟疫和战乱的阴暗面频频出现,扭曲的中国形象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成为导向性基调的依据。19 世纪的美国商人视中国为潜在的国际市场,新教牧师也把中国看作传教的重要对象国。美国的外交官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为的是在不具备军事力量与西欧列强抗衡的情况下确保美国人能自由进入中国,利益均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加入了同盟国,美国政府和民众为帮助中国击败日本侵略者曾给予慷慨援助。七七事变之后,美国媒体开始报道在日军铁蹄下被蹂躏的中国人的消息。飞虎队队长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1958)、执行迪克西使命①的谢伟思、远征军司令史迪威和防长马歇尔,通过书信、访谈和述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的中国观。斯诺、史沫特莱和斯特朗等媒体人有关中国的报道对美国人中国形象的构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0 年以后,美国与新中国之间的尖锐对峙却持续了 22 年,中国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直到 1966 年,一些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才公开呼吁对华政策应该从“遏制与孤立”转变为“遏制而不孤立”。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除了少数具有良知的美国汉学家外,很少人敢于展示具有积极意义的中国形象,美国人的中国观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由此可见一斑。

地区或国家形象的构建无不体现着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相关的时代印象,国家形象与国际媒介的每日新闻和言论报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可是当今国际新闻是如何采集的呢?媒体专家认为一些美国人的性格中总有一种传教士的冲动,希望看到别国人民变得更像自己,以此来证实美国的各种价值,这就成了他们的新闻采集标准。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一些美国媒体经常通过动态性的歧视报道影响外部世界对我国的整体评价。1989 年的“六四”风波又一次改变了美国的中国形象,所谓的“人权问题”被提升为决定两国关系的首要条件,一些报刊和电视新闻随后掀起的导向性宣传竟长达一年之久。美国主流媒体每年转发美国国防部送交国会的《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炒作我国的军费开支、装备现代化和武器进出口情况,为“中国威胁论”煽风点火。有关死刑、藏独、疆独、贪腐、对台军售、人民币汇率和南海主权伸索等问题几

① Dixie Mission,是“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的代称。“Dixie”原指美国内战时期的叛乱南方各州,被借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根据地。

乎成了一些政客的命题作文。他们还把西方近年的经济停滞与产品营销不畅归咎于中国产品的全球销售,把有关我国环境污染的情况夸大为影响地区低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和平崛起逐渐成了美国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和媒体的无休止话题,他们注意到中国不仅经常对世界形势作出反应,也对本地区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于是担心中国的发展是否谋求世界霸权,会不会打破现有政经格局。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这一罕见现象的出现不排除有些人为了角逐白宫的宝座或者话语权而打"中国牌"来取悦选民的可能,毕竟美国对中国有着一种特殊的关切。

世事沧桑,历史在波涛汹涌的世界大潮中发展。几年前金融危机袭击了东南亚,中国信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向一些地区和国家提供了援助和贷款,表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非典"和汶川大地震等突发事件中,中国各族人民按照政府果断决策冷静应对,赢得了海内外媒体的好评。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缩短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近期有关美国汽车和再生能源等高科技企业和人才为中国所吸纳的报道,以及载人"神州九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都成了传播频率极高的新闻,正构建着新的中国形象。

2012 年 9 月 18 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6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中关系总体良好,9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工作努力,8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具有竞争力,7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具有创新精神。就总体而言,美国公众对中美关系持乐观看法。在受访者中,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持积极态度的比例较高。虽然其中不少人对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就业机会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倾斜以及对华贸易逆差等问题表示关切,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中国只是拥有经济优势而不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①

美国人中国形像的构建,除了美国汉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外,还有贸易、新闻、影视、参访与人员交流等渠道的积极因素,其成果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汉学的发展。

---

① 温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人民日报》2012 年 9 月 20 日。此次美国民调由皮尤研究中心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于 2012 年 3~5 月合作完成,也是上述三个机构与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和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项目。

六、美国汉学研究方法论

早期的人文科学概念强调以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科学，是对14—15世纪神权至上的蒙昧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否定。人文学科的研究范畴包括文学、哲学、法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等具有内在性、主体性和系统性的学科。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是：前者从人性而非“神性”角度进行考察，而后者却着眼于相关学科的社会性。但是与中世纪相比较，现代学科分工中的人性与“神性”的观念对立已经淡化，两者之间的界线有时模糊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

单纯的方法论是存在于所有学科之中的方法系统，或者说是所有的学科都必须运用的方法体系。它并不用于描述具体的方法，而是用于表示对特定程序或步骤的性质和类别的关注。一般过程框架的方法论用于深入研究同构的微过程（sub-process）或者程序的变化。人文学科的内在价值在于寻找生命存在意义与精神领域的联系和平衡，学者们所追求的是对人类心灵与精神世界的理解、分析和诠释。人文学科的外在价值则在于通过其承载的价值观承担起指导并规范人的行为责任，因而有助于社会成员提高个人的审美情趣和人文修养。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论就是人文知识在形成、积累和运用过程中通过理解和诠释人文现象并作出相关表达的系统方法。

虽然汉学的涉科范围很广，但是本质上都是以中国的知识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许多美国汉学家不把汉学作为历史文物来研究，而是把它视为仍充满活力的哲学思想和方法体系，小而言之就为某一研究领域寻找治学路径，广而言之则将它置于哲学语境中与本国的思想系统加以比对和考察。一种有趣的现象是：美国学术界对汉学研究的感悟都或多或少反映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看法。美国建国初期的几位总统和同时代的一些先知先觉的学者都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推崇者，曾经试图将中华文明的积极元素引介到北美的政治生活中，用于解决他们在建国初期所遇到问题的参照依据。

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汉学研究在方法上受到当时学术生态和选题语境的制约。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不能进入中国考察，只能从香港和台湾省等地进行远距离研究，于是就套用苏联东欧研究的理论模式运用

演绎法和归纳法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事情。

芝加哥大学教授苏源熙(Caled Powell Haun Saussy,1960—)的专著《话语长城以及文化中国的其他探索》(The 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1)深入讨论了有关西方的中国观问题,涉及知识顿悟和对中国的理解以及历史与现代的差异,强调要用多种方法来叙述历史,明确指出该书把中国视为以互惠的外围与中介为特征的知识客体。这是一种对传统模式反思的互动研究思想。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强调方法培训,量化分析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科研解读手段,大学教职对于这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美国大学在研究生培养项目中把学习研究方法与外语能力作为替换选项,在这样的语境中很多美国非语言专业研究生不再重视中文研修以及对于原始文献的深入研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复杂性的直接感受和理解。

如果了解汉学史研究的复杂性,那么,对于"研究无成法"或"史无定法"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汉学家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读者定位、研究授权和选题需要,在撰写有一定篇幅的论文或容量较大的专著时一般都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在这些方法中有些具有可操作性(包括数字化、文本化和图像化),有些理论意义大于实用价值,而有些则具有鲜明的时代或者地区特征。不能根据统一的学术标准来评价哪种方法"不好"或哪种方法"过时",须知任何方法的使用都是发展变化的,不能简单地"对号入座"。只要项目研究立论明确并且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方法科学,有理论依据又能自成体系,结论具有可信度,便都会有自己的读者群。19 世纪的美国汉学研究模式有别于同期欧洲的汉学研究,当代的美国汉学研究方法与英国的汉学研究方法也不完全相同,因为学术生态差异,考察角度不同,读者对象有别,具体选题对讨论方式的要求就可能不一致。

适用于跨学科跨文化跨领域的汉学研究方法很多,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微观与宏观研究、对比史学与对比社会学研究、重古非今与厚今薄古研究、区域视野与综合语境研究、精英文化与实用性文化研究、回顾式总结与前瞻性预警研究等等。现择要综述如下:

（一）微观汉学与宏观汉学研究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通常把从个别或者局部方面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科学叫作“微观科学”，用于这类学术研究的方法就叫“微观方法”。相对而言，从全局或者整体方面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科学叫作“宏观科学”，用于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就叫“宏观方法”。

以经济学为例，研究社会单一经济体的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的经济学说就是“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亦称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1899—1967）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 Violet Robinson，1903—1983）的垄断竞争等相关理论建立起来的学派。而以整个经济及其运行方式与规律为研究对象，并从总量上分析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说通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

汉学研究也有“微观汉学”与“宏观汉学”之分。前者偏重于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的个案考察、对比和分析，其视角特点是因小见大，由点到面，把握全局，例如劳费尔的《落花生传入中国考》、卜德的《中国物品西传考》和卫理的《清代中国国教》。而后者则注重对中国国情和文化的总体评测，在宏观语境中深入细部，总量涵盖个量，大而化之，例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和德效骞的《希腊和中国哲学比较》。微观汉学与宏观汉学只是研究切入点不同，两者的观察和分析目的与实质则基本一致。在理论体系上，微观和宏观各有千秋，可以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优秀的汉学著作常常微观与宏观手段并用。

随着汉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汉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程度日渐加深，大量其他领域的研究理论被吸收容纳其中，并因此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但是多数汉学家只把微观和宏观手段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治学方法论。

(二)比较史学与比较社会学研究

中外史学研究模式有多种,比如编年史学(annual history)、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事件史学(eventual history)、分析史学(analytical history)、结构史学(structural history)、问题史学(history through problems)和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历史学家可以根据任务目标、研究授权和读者定位对古今中外特定领域或者选题,如宗教、教育、外贸、节日、手工业、文员选拔、女权主义、丧葬习俗等进行比较,以便学习、扩大或验证相关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历史学家还把不同的民族和制度加以横向和纵向对比,以展示各自独特的思想体系,揭示差异,发现共性,说明问题。比较研究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派是20世纪初的事情,美国历史学家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 1913—2005)和赫伯特·博尔顿(Herbert Bolton 1870—1953)就是这种研究模式的倡导者。研究方法的选择首先要考虑适用性的问题,与其他史学研究方法相比较并没有孰好孰坏之分。年轻学者倾向于趋时求新,表现出对于新的研究模式和观点甚至时髦术语的特殊关注,这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也因此常常引起务实性学者的诟病。

比较史学研究可以使我们看到单一文本中隐含的问题,用于比较的样例可以为被比较的事实提供考察模式和评判标准,进行正面或者反面的剖析,证明某一论点的正确性,同时也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说比较史学是史学研究中的一大进步。很难想象,如果不使用比较手段一部美国汉学史将如何着笔?

比较社会学是一个很大的学科板块,涉及中美两国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地理学、人类学、伦理学、考古学、民俗学、心理学、管理学和传播学。同类学科的比较具有针对性和导向性,构成了汉学研究的主流学科。

汉学研究是在外国语境中用外国人所熟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因此汉学家无论自觉与否,都会采用对比史学的思路,并可能由此衍生出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比较社会学、比较政治学、比较宗教学和对比语言学等学科。如:狄百瑞的《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传统》、施坚雅的《华人同化与泰国政治》、墨子刻的《中国历史语境中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等。

（三）重古非今与厚今薄古研究

欧美传教士来华后都十分重视汉语和汉语方言的学习，翻译并研究儒学经典、中国历史、宗教和文学，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因为他们的使命是传教，必须在短期内了解中国情况，深入中国社会，掌握中国人的语言，以便为在中国各地开堂礼拜创造条件。19 世纪下半叶，一些西方外交官、商人、军人、学者和观光客纷纷加入了中国国情和文化研究者的行列。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涉足中国人文和社会学科中的不同领域，推动了跨学科和跨文化汉学专业的建立，不断扩大涉科范围，在此背景下出版了一部又一部专著和论文集。

美国是一个开放移民国家，在 200 多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并非根深蒂固，因此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可变性。普通美国人的历史观念不会为恋旧情结所纠缠，或者被美好往昔的记忆所伤感，自由价值取向成为他们追捧的一种时尚，多数人随遇而安。在美国打倒一个“主义”与创建一个“主义”一样容易，或者一样不容易。美国汉学家的人数比其他任何汉学大国都多，理论模式和方法论也更丰富，与此同时，美国汉学研究中的商业化色彩、实用主义追求和物质主义刺激都非常突出。麦卡锡主义终结之后美国逐渐进入了意识形态自信时期，许多安于现状的美国知识分子倾向于与官方指令和主流社会保持一致，除了竞选或者舆论需要极少人撰文对本国的核心价值提出挑战。中美建交之后美国汉学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新的专业，新的领域，新的选题和新的学术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学者们没有因为不熟悉新事物而大伤脑筋。

就选题范围而言，当代美国汉学的总趋势是厚今薄古。梅维恒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杜博尼（Bonnie S. McDougall）和雷金庆（Kam Louie）的《20 世纪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olun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金介甫对沈从文等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葛浩文在过去 40 多年中翻译的 20 多位中国现代作家的 40 多部作品，都是众多美国学者现代汉学研究的成果。

美国当代汉学发展的新趋向不仅表现在题材范围和年代方面，也体现在汉学家的研究思想方面：主题紧扣人类的命运和中国的未来，对后殖民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反思，以问题意识对传统观念做出开创性的诠释。

史华慈是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950年他和自己的导师冒着风险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把思想史与中国革命史的思维贯穿于分析和论证之中。20世纪50年代初他和费正清等学者联合编撰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64年他撰写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他的另一部重要专著,通过比较分析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1968年他出版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变革中的意识形态》,融入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化和毛泽东思想等重大主题,体现了他对于有关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关切。

这是美国汉学的优势,但也是社会现实使然,评论家大可不必拿这一点与欧洲汉学家进行攀比。

(四)区域视野与综合语境研究

1946—1949年费正清倡议为美国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设计"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授课计划,其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界呼吁加强对外军事和经济扩张,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外来威胁。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纽约卡内基法人社团(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商量对策,并就如何立项和投资以及建立大型智库达成了广泛共识。

1950年福特基金会创建了外国区域研究学者计划(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1953—1966年共为34所大学的区域和语言研究投入资金2.7亿美元,又为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美国学术总会下属委员会投资数百万美元,以期接管外国区域研究学者计划。根据1957年美国的国防教育法令(1965年更名为"高等教育法令")在125所大学建立了全美大学资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s Center),以及大学生外语与区域研究中心(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Fellowships for Graduate Students)。

美国的区域研究重点是东亚研究、东欧研究、西亚和中东研究。该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一些有良知的汉学家意识到此计划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其他情报和军事部门的冷战计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与这样的计划无异于行使国家部门的职能。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联邦战略服务机构就组织了一批学者在战争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和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开展过“区域研究”。

学者们根据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对区域研究提出了质疑。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个人行为是否理性的预设。有关人的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二分法的质疑范围包括: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还是唯意志主义?人对于社会的正确态度是作为纯粹工具还是服从规范和道德?人是否根据预测的效果决定行动步骤还是为感情和欲望所支配?

苏联解体后西方科技机构和慈善基金会减少了对区域研究的支持,不再鼓励学者开发所谓“发展与民主”研究项目。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和美国学术总会也先后关闭了区域委员会。2010年美国之音决定停止对外华语广播,也是大势所趋。

区域研究被认定为在本国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历史等综合语境中开展汉学研究的一种有效方式。费正清所提倡的区域研究是为了充分利用社会科学中的相关知识,突破早期汉学研究选题狭窄和学科之间缺乏联系的弊端。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实现汉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完美结合,然后进一步扩展到汉学与更多其他学科的连接。因为汉学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学问,仅凭单一学科的资源、理论和方法无法胜任汉学研究中的各类选题,更别说国际化和团队化的大型研究攻关项目了。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区域研究的实质就是科际整合,离不开与其适应的综合语境。这一学术领域的新方向预示着学科重组时代的到来。

美国汉学家经常把新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用于自己的选题或者学科领域研究之中。顾立雅注重通过历史语境还原孔子及其教育、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真实,费正清倡导汉学与社会学联姻,用区域研究代替国别研究,狄百瑞关注儒家思想与西方价值理念的对话,列文森主张汉学家把情感上忠实于历史与理念上信守价值尽可能完美的结合,为的是让每一位汉学家都能在竞争中创新。白鲁恂强调第三世界政治现代化中的文化差异作用,倪德卫为职业伦理哲学家与中国历史专家对话寻找共同语言,韩南致力于用叙事学和喜剧理论指导中国小说研究,孟旦对中国人性观念中的自然平等与价值平等的思考——他们都没有满足于学术继承,而是在钻研中不断寻求务实目标。至于孔飞力对于“叫魂”件事所反映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宗教、政治和法律的反思,柯文关于在中国史学研究中以中国中心观取代西方种族优越感的呼吁,魏斐德为叙事史学与理论分析结合所做的努力,倪

豪士以西方女权主义批评观研究唐代传奇的示范,艾兰运用结构主义理论来考察分析历史问题的尝试,以及浦安迪把西方叙事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尝试,更显示了美国汉学史中了不起的观念突破和品格提升。

2005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古拉·麦肯林(Nicolas Maclean)就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经济研究中的一些有普世意义的问题撰写了《汉学方法论的构建》一文。① 他写道:

> 这里,我想就汉学研究方法论的构建提出几点意见:
>
> **1.关于屈光度分析:**外国人从局外人背景中分析中国情况时难免对一些问题产生曲解,就像光线照射空气或者水等具有不同透明度的物质一样会发生折射,如果我们带着傲慢或杂念面对"他者"时理解上就可能不准确。已故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illiam Said,1935—2003)提出的"东方主义"破解了屈光度分析的诸多案例中的一个。分析中国情况时我们应该持自我批评的态度,如果运用德国物理学家海森贝格(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的"不确定原则"(Principle of Uncertainty),我们永远都无法消除屈光度的因素。
>
> **2.关于谦恭的态度:**自我批评的方法引导我们探讨问题。不管自己多么聪明,结论的依据看起来多么过硬,都不应该趾高气扬。只要以"欠身"的谦恭姿态思考就可以得到全部答案。须知中国的反论(paradox)和矛盾说法多得很。
>
> **3.关于透明度:**中国比起实施对外改革开放新政策的30年前透明度显然增加了很多,但是比起自由民主国家来有些情况和意见仍被视为机密。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有时传递数据可能违法。各级政府都关注此事,但是现在也出现了某种不对称的情况:中国政府允许原来在学术研究或辩论中受到限制的透明度。

---

① Nicolas Maclean: *Construction of the Methodology of Sinology*, Symposium Handbook, pp. 51-54, Aichi University press, Japan, 2006.作者尼古拉·麦肯林的父亲于1910年来华,侨居中国18年之久,曾任天津国际商会会长。麦肯林于197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曾任撒切尔夫人的私人助理,20世纪80—90年代多次来华,对于中国各地情况非常熟悉。《汉学方法论的构建》是2005年他在南开大学与日本爱知大学联合举办的汉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上的一次发言。

许多自由民主国家已经或者正要就数据保护立法，以保护个人隐私，中国也在考虑是否这样做。立法带来的好处将减少透明度。

4.关于零散数据：把中国的一些统计数字用于某些宏观经济学分析自然是常有的事，但是通过其他语境审视平均值就可能发现其误导性，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是互有差别的广大地区的例子。中国作为一个多元经济国家，情况的界定不可避免地比小国经济复杂得多。

5.关于等级划分：这个问题与前面所说的情况有关，可能影响对统计数据和零散数据的分析，也会再次引出界定的问题，就中国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的某些利益和责任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6.关于推断法：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倾向和在法律框架内的改革进步往往容易使人忘记中国历史阶段特征的存在。用某种模式来分析中国情况很有诱惑力，根据近期情况就可以推断未来。在有蒙蔽性水域航行时唯一可靠的指南就是凭因果关系的精确分析和对于一切假想质疑的判断来掌舵。另外，无论怎样，推断有时还是可以用于对有效手段的检验。例如根据“中国通”马塞尔·沃尔弗斯(Marcel Wolfers)提出的沃尔弗斯浪潮理论，对于197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预言——第一浪潮发生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大城市，第二浪潮和类似浪潮发生在长江和珠江流域，第三浪潮发生在西部和东北部——至今仍然是正确的。

7.关于再优化：当中国或者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有效的汉学研究不会再显示其已有的优势。环境对于经济增长和能源诸方面的制约越来越暴露就是一个及时的相关实例。对于这一有时呈现负面的关键领域需要进行更多的学术研究，因为这一领域在工业化进程中对于中国的农业、人口、邻国和合作的影响都很大。

8.关于促和：汉学研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对中国舞台上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人群中部分人动机的正确判断。比如：中国将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行使其不断增长的巨大权力？因为“文革”结束后它是世界稳定的一个因素，但是中国个别发言人在非正式场合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

外扩张实属非法”,人们就经常对未来的事情表示怀疑。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如何在绵延的边界之内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传统。但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却引出了这样的话题:“中国何时才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中国现在的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已经相当可观,军事和政治领袖之间的频繁国际对话已经证明是有益的。中国当前为打破北朝鲜在六方会谈中的僵局所发挥的协调作用,就是中国所扮演的促进关系发展外交角色的好例子。

9.关于伙伴合作:有效汉学研究的实质就是与中国学术界以及海外华人学者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开展成功的合作研究和讲座交换,屈光度分析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还希望看到在外语学习和研究(尽早从小学开始)中的国际化和更多的相互了解议程的启动,还希望看到中学和更活跃的网络面对面交流。媒体无拘无束的交流有助于创建一个健康的环境。

以上是西方学者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经验之谈,是他们汉学研究方法论的归纳,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1]蒋彝:《旧金山华人纪事》,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第232—249页),中外关系史学会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5年。

[2]迈克尔·谢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徐泽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5年。

[3]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9年。

[4]龙夫威:《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载《徐继畬与东西方社会文化交流》,第22—34页,任复兴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

[5]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6]程钢:《二十世纪英美汉学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变化趋向》,载《国际汉学著作提要》,第390—394页,李学勤主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

[7]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第497—49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8]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匡雁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98年。

[9]孟德卫:《莱布尼茨与儒学》,张学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

[10]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1]刘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2]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9年。

[13]熊文华:《美国的汉学研究》,载《汉学研究》第四集,第7—45页,阎纯

德主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0 年。
[14]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0 年。
[15]余英时:《红楼梦都两个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2 年。
[16]山极晃:《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1941—1979)》,鹿锡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
[17]裴宜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50 年》,黄育馥译,载《国外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
[18]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年。
[19]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0]李爱丽:《晚清美籍税务司》,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
[21]仇华飞:《早期中美关系研究(1784—1844)》,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 年。
[22]夏含夷:《古史异观》,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5 年。
[23]魏思齐:《美国汉学研究的概况》。载《汉学研究通讯》26:2(总 102 期),2007 年 5 月。
[24]熊文华:《卫三畏及其〈中国总论〉》,载《汉学研究》第十集,第 208—222 页,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 年。
[25]丁韪良:《汉学菁华》,沈弘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2008 年。
[26]沈大伟:《美国的中国研究 60 年》,张小溪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第 2 期。
[27]熊文华:《试论美国早期汉学》,载《汉学研究》第十二集,第 217—242 页,阎纯德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2010 年。
[28]熊文华:《哈佛大学见证美国汉学的发展》,载《汉学研究》第十三集,第 37—66 页,阎纯德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2011 年。
[29]浦安迪:《浦安迪自选集》,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
[30]艾兰:《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

[31]熊文华:《通过科际万花筒透视美国汉学》,载《汉学研究》第十四集,第98—154页,阎纯德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2012年。

[32]熊文华:《活跃于美国汉学界和政界的专家群体》载《汉学研究》第十五集,第155—189页,阎纯德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2012年。

英文部分

[1]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Wiley & Putnam. 1848.

[2]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ir Religions. Governmental, Educational, and Business and Opions*. Harpers, New York. 1867.

[3]Mathew Tyson Yatos: *First Lessons in Chinese*. Reprinted in 1904 by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in Shanghai. 1871.

[4]Hampden C. DuBose: *The Dragon, Image, and Demon, or,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giving an account of the mythology, idolatry and demonolatry of the Chinese*. The 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in Richmond, Va. 1889.

[5]John Watson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3.

[6]Berthold Laufer: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Brill, the Netherlands. 1909.

[7]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17.

[8]Samuel Isett Woodbridge: *Fifty Years in China*. Presbyterian Committee of Publication in Richmond. 1919.

[9]Charles Keyser Edmunds: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1919.

[10]James Whitford Bbashford: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Kessinger Publishing House, U.S.A. 1919.

[11]Westel Woodbury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 and Interests in China*.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20.

[12]Sidney David Gamble: *Peking: A Social Survey* Conduc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 in China. 1921.

[13] Carroll Brown Malone: *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 Publication, Series B. 1924.

[14]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China's New Nationalism and Other Essays*.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5.

[15] Charles Frederick 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6.

[16] John Earl Baker: *Explaining China*, A.M.Philpot Itd, London. 1927.

[17] Edward William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1928.

[18]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London. 1929.

[19] Lewis Charles Arlington: *Through the Dragon's Eyes — Fifty Years' Experiences of a Foreigner in the Government Service*. Constable & Co. Itd, London. 1931.

[20] Charles Henry Riggs: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in Chinese Agriculture*. Ithaca, N.Y.. 1932.

[21] Esson McDowell Gale: *Basic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Shanghai: Kkelly & Walsh. 1934.

[22] William Reginald Morse: *Chinese Medicine*. AMS Press Inc. 1938.

[23] John Lossing Buck: *An Agricultural Survey of Szechwan Provinve, China*. The Farmer's Bank of China. 1943.

[24] Hallett Edward Abend: *My Life in China* 1926~1941.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1943.

[25] Charles S. Gardner: *The Future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brary Chronicle, Vol. 12 No. 1. 1944.

[26] Arthur Frederick Wright: *Buddehism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7]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External Research Division of State Department: *Area Study Program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1959.

[28] Clarence Martin Wilbur: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Reprinted in 1966 by Octagon Books. New York. 1960.

[29] Herrlee Glessner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 A Survey of Formam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61.

[30] Laurence G. Thompson: *American Sinology*, 1830-1920—*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see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Vol. II, issue 2, pp. 244-290. 1961.

[31]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1368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32] Oliver Edmund Clubb: *20th Century China*. Ci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33] Liu Kwang-Ching (editor):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 1966.

[34] Shee Sung: *Sinological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1967.

[35] John King Fairbank: *AHA Presidential Addresses*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4, No. 3, Feb. 1969, pp. 861-879. 1968.

[36] Arthur Doak Barnett: *A New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Brookings Institution, U.S.A. 1971.

[37] Owen Lattimore: *History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Curzon Press Ltd. 1974.

[38] John King Fairbank (editor):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Mass. 1974.

[39] Paula Cronin: *East Asian Studies at Harvard—a scholarly bridge between two worlds*, *Harvard Today*. 1974.

[40]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41] Rodney Yonkers Gilbert: *The Unequal Trteaties: China and the Foregner*.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42]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78.

[43]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4]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pp. 14 - 40. M. E.

Sharpe Incorperation, U.S.A.. 1993.

[45] David Shamba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93.

[46]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A New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7] Harriet Thelma Zurndorfer: *China Bibliography: A Rersearch Guide to Reference Works about China Past and Present*. Brill Publishers, Leiden. 1995.

[48] Kurt M. Campbell: *China Watchers Fighting A Turf War of Their Own*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0, 2000.

[49] Benji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50]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2.

[51] 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52] Ronald Egan: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53] Ronald Egan: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and China*. Forum on Multicultural -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Institue for Multicultural-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August 19, 2006.

[54] Ronald Egan: *The State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SA today*, *Studies of Chinese Thought and Society* No. 1.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7. pp. 21-25.

[55] David E. 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orporated. 2009.

[56] Ronald Egan: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SA*.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eptember 24, 2009.

[57] John Calvin Ferguson: *Outline of Chinese Art*. Nabu Press. 2010.

附录一:

汉英人名索引

A

阿礼国/Rutheford Alcock,1809—1897

阿灵顿/Lewis Charles Arlington,1859—1942

阿罗,肯尼斯·约瑟夫/Kenneth Joseph Arrow,1921—

阿诺德/Henry Harley 'Hap' Arnold,1886—1950

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11—2002

阿尔蒙德,加布里埃尔/Gabriel Almond,1911—2002

埃德曼,查尔斯/Charles R.Erdman

埃杰顿/Franklin Edgerton

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1902—1994

埃利奥特,查尔斯/Charles W.Eliot

埃默里奥,默里·巴恩松/Murray Barnson Emeriau,1904—2005

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1909—

艾忭敏/Benjamin Parke Avery,1828—1875

艾尔曼/Benjamin A.Elman

艾尔斯伯格,丹尼尔/Daniel Elsberg,1931—

艾恺/Guy Salvatore Allito

艾克斯坦,亚历山大/Alexander Eckstein,1915—1976

艾兰/Sarah Allan,1945—

艾朗诺/Ronald Egan,1948—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

艾秀慈/Charlotte Ikels

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

安格联/Francis Atthur Aglen,1869—1932

安乐哲/Roger Thomas Ames,1947—

安守廉/Alford,William P.1948—

奥德里古/André Georges Haudricourt,1911—1996

奥立芬/David Washington Cincinnatus Olyphant,1789—1851

爱利莎/Elizah Bridgman

爱因斯坦,阿尔伯特/Albert Eistein,1879—1955

爱泼斯坦,伊斯雷尔/Israel Epstein,1915—2005

奥本海默,罗伯特/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

奥古斯丁,奥里利厄/Aureliu Augustinus,354—430

奥葛特,亨利·斯蒂尔/Henry Steel Olcott,1832—1907

奥克森伯格/Michel Charles Oksenberg,1938—2001

B

巴雷特/Timothy Hugh Barrett
巴斯韦尔,罗伯特/Robert Buswell
巴特,罗兰/Roland Barthes,1915—1980
巴特拉姆,约翰/John Bartram,1699—1777
白蓓莉/Barbara Pillsbury
白馥兰/Francesca Bray
白汉理/Henry Blodget,1825—1903
白洁明/Geremie R.Barmé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
白劳德/Earl Russell Browder,1891—1973
白鲁恂/Lucian Witmot Pye,1921—2008
白克礼/Robert Bagley
白诗朗,约翰/John H.Berthrong,1946—
白修德/Theodore White,1915—1986
白之/Cyril Birch,1925—
包尔滕/John Shaw Burdon,1826—1907
包瑞德/David Dave Barrett,1892—1977
包华德/Howard L.Boorman
包华石/Martin Joseph Powers
鲍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e,1921—1999
鲍恩,塞缪尔/Samuel Bowen
鲍乃德/Eugene Barnett
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1937—
伯格森/Abram Bergson,1914—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9
伯恩斯坦,托马斯/Thomas Bernstein
柏尔根/Paul D.Bergen,1860—1915
柏拉图/Plato,427B.C.~347B.C.
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2
邦就烈/Julia Brown Mateer
北村,约瑟夫/Joseph Kitagawa,1915—1992
贝德,杰弗里/Jeffery A.Bader,1945—
贝拉,罗伯特/Robert Beira
贝纳多特,康特·福尔克/Count Folke Bernadotte
贝乐得/William L.Ballard
贝特兰/James Bertram,1910—1993
彼得鲁奇,拉斐尔/Raphael Petrucci,1872—1917
本尼迪克特,鲁思/Ruth Benedict
毕恩来/Thoms Arthur Bisson,1900—?
毕德格/William N.Pethick,? —1902
毕格/Cyrus Henderson Peake,1900—1979
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1906—2001
毕士璧/Aelius Marcellus Bisbee,1841—1901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
别尔津,亚历山大/Alexander Berzin
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1901—1986
宾厄姆,海勒姆/Hiram Bingham,1875—1956
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1952—
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0
博尔,彼得/Peter Bol
博尔顿,赫伯特/Herbert Bolton,1870—1953
博恒理/Henry D.Porter,1845—1916
勃兰特,洛伦/Loren Brandt
勃朗/Samuel Robins Brown,1810—1880
勃劳克/Bernard Bloch,1907—1965
波普金,塞缪尔/Samuel L.Popkin
布尔努夫/Eugene Burnouf,1801—1852
布莱克,西里尔/Cyril Black,1920—1991
布莱克,威廉/William Blake
布莱克默,弗兰克·威尔逊/Frank Wilson

Blackmar,1854—1931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布什,赫伯特/Bush, George Herbert Walker,1924—
布什,乔治·沃克/ Bush, George Walker,1946—
卜弼德/Peter Alexis Boodberg,1903—1972
卜德,西奥多/Theodore Bodde
卜德/Derk Bodde,1909—2003
卜凯/John Lossing Buck,1890—1975
C
晁时杰/Robert L.Chard
撒克斯通,拉尔夫/Ralf Thaxton
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1958
陈启云/Chi-yun Chen,1933—
陈荣捷/Chan Wingtsit,1901—1994
陈省身/Shiing-Shen Chern,1911—2004
陈毓贤/Susan Chan Egan
成中英/Chung-Ying Cheng,1935—
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
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25—,又译杜希德
D
达德斯/John Wolfe Dardess
戴德华/George Edward Taylor,1905—2000
戴维斯,约翰·佩顿/ John Paton Davies,1908—1999
戴闻达/Jan J.L.Duyvendak,1889—1954
丹尼斯,詹姆斯/James S.Dennis
德比,伊莱亚斯·哈斯克特 Elias Hasket Derby,1739—1799
德璀琳/Gustav von Derting,1842—1913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
德慕登/Charles Newton Dubs,1862—1936
德效蹇/Homer Hasenplug Dubs,1892—1969
邓尔麟/Jerry P.Dennerline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1919—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
狄理/Frank Thilly,1889—1935
狄乐播/Robert M.Mateer,1853—1921
迪金森,埃玛·简/ Emma Jane Dickinson
迪金森/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1830—1886
迪隆,迈克尔/Michael Dillon
迪特默,洛厄尔/Lowell Dittmer
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1857—1930
丁龙/Dean Lung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杜博尼/Bonnie S.McDougall
杜步西/Hampden Gait Du Bose,1845—1910
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1843—1924
杜鲁门,哈里/Harry S.Truman,1884—1972
杜赫德/Jean -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
杜维明/Tu Weiming,1940—
杜威/John Dewey
F
范罢览/Houckgeest Andre Everard van Braam,1739—1801
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1900—1972
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1830—1917
方法敛/Frank Herring Chalfant,1862—1914
方伟廉/William P.Chalfant,1860—1917

方志彤/Achilles Fang,1910—1995
费侠莉/Charlotte Furth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2
冯姝娣/Judith Farquhar
菲尔,莱昂/Léon Feer
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lbright
富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富兰克林,本杰明/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
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
福布斯,马斯·腾诺/ Thomas Tunno Forbes
福布斯,约翰·默里/ John Murray Forbes
福布斯,约翰/John Forbes
福兰格/Otto Franke,1862—1946
福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
福斯特,海伦/Helen Foster,1907—1997
福斯特,威廉/William Foster,1881—1957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
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
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
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

G

盖茨,比尔/William Henry Bill Gates,1955—
盖特纳/Timothy Franz Geithner,1961—
甘琳/George T.Candlin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nnes,1889—1978
高利克,马立安/Marian Galik
高鲁甫/George Weidmen Groff,1884—1954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46—1506
高斯/Clarence E.Gauss
格茨/Michael Gotz
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
格里恩,埃德蒙/Edmund Asbury Gullion,1913—1998
格雷厄姆/Aelred Graham
格林,约翰/John Green,1736—1796
戈德曼,默尔/Merle Goldman
戈捷,朱迪思/Judith Gautier
葛浩文/Howard Goldlatt,1939—
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1888—?
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
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1813—1860
顾彬/Wolfgang Kubin,1945—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
顾路柏/Wilhelm Grube,1855—1908
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
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1769—1879

H

哈巴德安/Andrew Patton Happer,1818—1894
哈勒尔/Stevan Harrell
哈斯金斯,托马斯/Thomas Haskins
海德,托马斯/Thomas Hyde,1636—1703
海登,乔治/G.A.Hayden
海格思/John Reside Hykes,1852—1921
海森贝格/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
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
韩丁/William Hoard Hinton,1919—2004
韩禄伯/Robert G.Henricks,1943—

韩森/V.Hansen
韩书瑞/Susan Naquin
何炳棣/Ho Ping-ti,1917—2012
何汉理/Harry Harding,1946—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
何伟亚/James L.Hevia,1947—
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
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1883—1963
赫德,奥古斯丁/Augustine Heard
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1857—1944
赫特/Christian Herter
赫维茨,列昂尼德/Leonid Hurwicz,1917—2008
恒安石/Arthur Millbourne Hummel,1920—2001
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
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Jr,1960—
洪业/William Hung,1893—1980
侯斯孟/Donald Holzman,1926—
胡籁明/Lyman Hoover
胡斯/Jan Hus,1731—1415
胡志德/Theodore Huters
花莲治/John Booth French
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
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
华莱士,亨利·阿加德/Henry Agard Wallace,1888—1965
华如璧/Rubie Watson
华盛顿,乔治/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
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
滑达尔/Emeric de Vattel
怀特/Moses Clark White,1819—1900
怀特,海登/Hayden White,1928—
怀特尔,詹姆士/James Whitall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
黄仁宇/Ray Huang,1918—2000
惠特曼/Walt Whiteman,1819—1892
惠廷,艾伦/Allen S.Whiting
霍普金斯,杰夫瑞/Jeffrey Hopkins,1940—
霍普金斯/Dwight Hopkins
J
基尔,理查/Richard Gere
基辛格,亨利/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
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y,1862—1927
加拉格尔,玛丽/Mary Gallagher
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
加尼/Commodore Lawrence Kearny,1789—1868
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
贾柏莲/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
贾飞,菲利浦/Philip Jaffe
姜士彬/David Johnson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
杰勒德,斯蒂芬/Stephen Girard,1750—1831
杰夫,菲力普/Philip J.Jaffe
杰森,艾达·美伊/ Ida Mae Jesson
杰伊,约翰/John Jay,1745—1829
金登干/J.D.Campbell,1833—1907
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
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1839—1914
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1823—1889
金斯堡,艾伦/Allen Ginsberg,1926—1997
金斯伯里/Abby King sbury
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1854—1952

居里/Lauchlin Bernard Currie,1902—1993
K
卡利斯/Helmut G.Callis
卡利诺夫斯基,马克/Marc Kalinowski
卡里尔,克里斯琴/Christian Caryl
卡罗斯,保罗/Paul Carus
卡鲁斯/Paul Carus,1852—1919
卡内基,安德鲁/Andrew Carnegie,1835—1919
卡普洛/Philip Kapleau
卡特/Edward C.Carter
卡西尔/Suzanne Cahill
喀喇生/Samuel Harrison
凯利/David E.Kelley
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1942—
康罗伊,希拉里/Hilary Conroy
康伦/Richard Conlon
柯岚安/Callahan,William A.
柯尔文,伊恩/Ian Colvin
柯恩/Jerome Cohen
柯克,格雷森/Grayson Kirk
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1901—
柯罗尔/Paul W.Kroll,1923—2011
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1962—
柯文/Paul Alvin Cohen,1934—
柯伟林/William C.Kirby
科尔曼,锡德/Cid Corman,1924—2004
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1819—1862
克拉克洪/Clyde Kluchholn,1905—1960
克莱因,安妮/Anne C.Klein
克利夫兰,格罗夫/Grove Cleveland,1837—1908
克莱博,玛丽/Mary Clabaugh,1918—1970
克劳弗德/Hanford Crawford,1839—1860
克罗伯,艾尔弗雷德·路易斯/Alfred Louis Kroeber,1876—1960
克罗尔/Paul W.Kroll
克罗恩,艾里诺/E.H.Grown
克内勒,戈弗雷/Godfrey Kneller
克罗伯/Alfred Louis Krober,1876—1960
客纳格/Charles Cecil Clarke
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
肯尼迪,约翰/John F.Kennedy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库利奇,约瑟夫/Joseph Coolidge
库寿龄/Samuel Couling,1859—1922
库兹涅茨,西蒙/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
昆西,乔赛亚/Josiah Quincy
L
拉铁摩尔,戴维/David Lattimore
拉铁摩尔,欧文/Owen Lattimore,1900—1989
拉斯维尔,哈罗德/Herold Lasswell,1902—1978
拉什,本杰明/Benjiamin Rush,1745—1813
莱伊尔,威廉/William A.Lyell,1930—2005
莱恩/Ellen Laing
莱文沃斯/Leavenworth
莱维斯·威廉斯,大卫/David Lewis-Williams
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9
兰德尔,托马斯/Thomas Randall,? —1811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
蓝普顿,戴维/David M.Lampton,1946—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

劳里,罗伯特·哈里/Robert Harry Lowie,1883—1957
劳思光/Sze-Kwang Lao,1927—
雷金庆/Kam Louie
雷麦/Charles Frederick Remer,1889—1972
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雷雅德,约翰/John ledyard,1751—1789
利奥塔/Jean - Francois Lyotard,1924—1998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利普塞特,西摩·马丁/Seymour Martin Lipset
利斯,西蒙/Simon Leys
利维,多尔/Dore J.Levy
李度/Lester Knox Little,1892—
李方桂/fang-Kuei Li,1902—1987
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
李侃如/Kenneth Guy Lieberthal,1943—
李欧梵/Leo Ou-fan Lee,1939—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李普曼/Jonathan Lipman
李绍昌/Shao-chang Lee,1891—1977
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845
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1832—1898
李文和/Wen Ho Lee,1939—
李钟石/Chong-Sik Lee
黎安友/Andrew J.Nathan,1943—
梁凯/Prof.George Lange
勒诺多,奥伊泽比乌斯/Eusebius Renaudot
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1920—1969
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1806—1876
林德贝克,约翰/John.M.Lindbeck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
林肯,亚伯拉罕/Abraham Lincoln,1809—1865
刘殿爵/Din Cheuk Lau,1921—2010
刘海澜/Hiram Harrison Lowry,1843—1924
刘若愚/James J.Y.Liu,1926—1986
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
刘子健/James T.C.Liu,1919—1993
柳光南/Shirley Liu Clayton
柳无忌/Liu Wu-chi,1907—2002
洛厄尔/Robert Lowell,1917—1977
洛克菲勒,约翰/John D. Rockefeller,1839—1937
陆克文/Kevin Rudd
罗宾逊/Joan Violet Robinson,1903—1983
罗德,艾琳/Aline Rodd
罗德里克/John Prescott Roderick,1914—2008
罗杰瑞/Jerry L.Norman,1936—2012
罗林斯,汤玛斯/Thomas M.Rollins
罗萨比/Morris Rossabi
罗斯,罗伯特/Robert S.Ross
罗斯,莱斯特/Lester Ross
罗斯柴尔德,内森/Nathan Rothschild
罗斯福,西奥多/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
罗斯基/Thomas G.Rawski
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
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1802—1871
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
罗樾/Max Loehr,1903—1988
吕埃格/David Seyfort Ruegg,1931—
鲁宾逊,托马斯/Thomas.W.Robinson

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
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1483—1546
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1866—1941
雒魏林/Lockhart William,1811—1896
伦敦,杰克·格里菲斯/Jack Griffith London,1876—1916

M

马地臣/James William Matheson,1769—1878
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1850—1888
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
马京利/William Mckinley,1843—1901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马瑞志/Rechard B.Mattter
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1930—
马若孟/Ramon H.Myers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85—1934
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
马歇尔,乔治/George Catlett Marshal,1880—1959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
麦嘉温/John Macgowan,? —1922
麦克阿瑟,道格拉斯/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
麦肯林,尼古拉/Nicolas Maclean
麦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1824—1907
麦志明/Bruce Maclaren
迈克尔/Franz Henry Michael
梅谷/Franz Henry Michael,1907—
梅乐和/Frederick William Maze,1871—1959
梅里尔,斯图尔特/Stuart Merrill
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1829—1895
梅耐德/Annetta Thompson Mills,1853—1929
梅琴,格雷沙姆/J.Gresham Machen
梅维恒/Victor Henry Mair,1943—
梅祖麟/Mei,Tsu-lin,1933—
门德尔松,摩西/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
孟旦/Donald J.Munro,1931—
孟德卫/David E.Mungello,1943—
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1639—1712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
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
牟宗三/Mou Tsung-san,1909—1995
摩尔/Charles Moore
摩尔,巴灵顿/Barrington Moore, Jr.,1913—2005
摩根索,汉斯/Hans Morgenthau
摩嘉立/Caleb Cook Baldwin,又译"摩怜",1820—1911
莫顿,罗伯特/Robert Merton,1910—2003
莫尔斯,杰迪代亚/Jedidiah Morse,1761—1826
莫里斯,罗伯特/Robert Morris,1734—1806
莫维斯,哈勒姆·伦纳德/Hallam Leonard Movius,1907—1987
墨贤理/Henry Ferdinand Merrill,1853—1935
墨子刻/Thomas Arnold Metzger,1933—
穆德/John Raleigh Mott,1865—1955
穆磐石/Peter R.Moody
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

N
南乐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1939—
纳托尔,多萝西/Dorothy Nuttall
肃德/Francis P.Knight
倪德卫/David Shepherd Nivison,1923—
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1943—
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
诺顿,巴里/Barry Naughton
诺里斯,弗兰克/Frank Norris,1870—1902
O
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1835—
P
庞德/Ezra Pound,1885—1972
庞迪我/Jacques de Pantoja,1571—1618
帕金斯/Dwight H.Perkins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
佩恩,托马斯/Thomas Pain,1737—1809
佩利/Elizabeth J.Perry
裴来/Methew Calbraith Perry
裴义理/Joseph Bailie,1860—1935
皮尔斯,杰拉斯米尔/Jerathmiel Peirce
皮尔斯,大卫/David Pearce
皮尔斯,查尔斯·桑德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
浦安迪/Andrew H.Plaks,1945—
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
普实克,雅罗斯拉夫/Jaroslav Prusek,1906—1980
Q
祁泰履/Terry F.Kleeman
齐文/Raymond P.Ludden,1909—1979
瞿同祖/Chu T'ung-tsu,1910—2008
钱伯斯,罗伯特·威廉/Robert William Chambers,1865—1933
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1909—
钱端升/Ch'ien Tuan-sheng
乔布斯,斯蒂夫/Jobs,Steve,1955—2011
乔丹/David K.Jordan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
桥本万太郎/Hashimoto Mantaro,1932—1987
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
R
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1905—1985
荣赫鹏/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1863—1942
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e Rockhill,1854—1914
芮玛丽/Mary C.Wright,1917—1970
芮斯纳/John Henry Reisner
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
瑞思义/William Hopkyn Rees,1859—1924
S
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
萨拜因/George H.Sabine,1880—1961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
萨姆纳,威廉·格雷厄姆/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
赛义德,爱德华/Edward William Said
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
森布·伦纳/Frank James Sensenbrenner,1943—
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瑟曼,罗伯特/Robert A.F.Thurman,1941—
山茂召/Samuel Shaw,又译"萧三畏",1754—1794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1657—1692
石秀娜/Anna Seidel,1938—1991
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2—1946
史华慈/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1916—1999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1936年
史嘉柏/David Copley Schaberg,1964—
史赖德/John Slade
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1887—1939
史密斯,托马斯/Thomas Smith
史沫特莱,阿格尼丝/Agnes Smedley,1892—1950
史泰丽/Terry Sicular
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1925—2008
施乐伯/Robert Anthony Scalapino,1919—2011
施耐德,盖瑞/Gary Snyder,1930—
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1831—1906
斯福尔扎,卡瓦利/Luigi Luca Cavalli-Sforza,1922—
斯科瑟斯,马丁/Martin Scorsese
斯科特,罗伯特/Robert E.Scott
斯莫尔,阿尔比恩·伍德伯里/Albion Woodbury Small,1854—1926
斯诺,埃德加/Edgar Snow,1905—1972
斯诺登,爱德华·约瑟夫/Edward Joseph Snowden,1983—
斯帕尔丁/W.R.Spaulding
斯潘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
斯彭内尔/Philip Jakob Spener,1635—1705
斯普劳尔,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 Sproul
斯塔尔,弗雷德里克/S.Frederick Starr
斯坦伯格/James Braidy Steinberg,1953—
斯特劳斯,列维/Claude Lévi-Strauss
斯特朗,安娜·刘易斯/Anna Louis Strong,1885—1970
斯恰佛/Edward Schafer
司必立/William Franklin Spinney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司徒修/Hugh McBirney Stimson,1932—2011
舒尔曼,弗朗兹/Franz Shurmann
苏源熙/Caled Powell Haun Saussy,1960—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
所罗门/Richard Solimon,1937—
T
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
太史文/Stephen F.Teiser
泰勒,乔治/George Edward Tayler,Jr,1905—2000
泰勒,查尔斯/Charles Taylor
谭顺/Theos Sampsom
谭维理/Laurence G.Thompson
汤姆森/James Thomson
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
唐德刚/Tong Tekong,1920—2009
唐纳金/Donald Keene,1922—
廷得尔/Edward Coe Taintor,1842—1878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

W

瓦尔德,安德鲁/Andrew Walder
瓦特尔/Emeric de Vattel
万斯/Cyrus Vance
威尔伯,马丁/C.Martin Wilbur
威尔奇,霍姆斯/Holmes Welch,1924—1981
威克里夫,约翰/John Wycliff,1329—1393
威利,戈登·伦道夫/Gordon Randolph Willey,1913—2002
威特,阿伦/Aaron Waite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
韦伯,马克斯/Max Weber,1864—1920
韦克曼,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Wakeman
韦勒/Robert P.Weller
韦琳/Susan Mary Waring,1837—1909
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1908—1997
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
卫理/Edward Thomas Williams,1854—1944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
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1952—
沃德,莱斯特·弗兰克/Lester Frank Ward,1841—1913
魏鲁男/James Roland Ware,1901—1990
魏特摩,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ard Wetmore,1801—1862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
魏克曼,弗里德里克/Frederic Wakeman,Sr.
魏克曼,伊万斯/Evans Wakeman
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
沃尔夫/Arthur P.Wolf
沃尔弗斯,马塞尔/ Marcel Wolfers
沃尔什,理查德/Richard Walsh
沃尔沃思,萨拉/ Sarah Walworth
沃伦,亨利·克拉克/Henry Clarke Warren,1854—1899
沃森,詹姆斯/ James Watson
文恒理/ Henry William Boone,1839—1925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
小文惠廉(文慧廉次子)/William Jones Boone,Jr.1846—1891
吴得禄/ F.E.Woodruff
吴伟士/ Charles W. Woodworth,1865—1940

X

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7—1988
西蒙/Ernest Julius Walter Simon,1893—1981
西蒙,赫伯特·亚历山大/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
希尔/E.B.Hill
希尔维斯特,约翰/John Sylvester
希夫/Jacob H.Schiff,1847—1920
希斯,阿利格尔/Aliger Hiss
奚如谷/Stephen H.West,1944—
席文/Natham Sivin,1931—
萧公权/Hsiao Kung-ch'uan,1897—1981
萧,本杰明/Benjamin Shaw
夏志清/Hsia Chi-tsing,1921—2013
夏德/Friedriich Hirth,1845—1927
夏德安/Donald John Harper
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
谢淑丽/Susan Shirk,1945—

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1909—1999
休斯敦,玛丽/Mary Houston
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1883—1956
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2005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

Y

雅裨理/David Abeel,1804—1846
雅洪托夫/Sergei Yakhontov,1926—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
亚米斯/Van Meter Amies
晏玛太/Mathew Tyson Yates,1819—1999
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sacs,1911—1986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
杨联陞/Yang Lien-sheng,1914—1990
叶理绥/Serge Elisséef,1889—1975
叶山/Robin D.S.Yates
伊利亚德,米尔恰/Mircea Eliade,1907—1986
英克尔斯,亚历克斯/Alex Inkeles,1920—2010
英克尔,弗兰克/frank Inkle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
约翰逊,戴尔/D.R.Johnson
约翰逊/Obed Simon Johnson
约翰逊/Lyndon Baines Hohnson,1908—1973
于子乔/George T.Yu
余霭芹/Anne O.Yue Hashimoto
余英时/Xu Ying-shih,1930—

Z

詹森,马里于斯/Marius Berthus Jansen,1922—2000
张伯仑/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1899—1967
张光直/Chang Kwang-chi,1931—
赵元任/Yuen Ren Chao,1892—1982
知味墨/Samuel Marinus Zwemer,1867—1952
周策纵/Tse-tsung Chow,1916—2007
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1942—
卓别林,查理/Charlie Chaplin Jr.,1889—1977
佐利克/Robert Zoellick,1953—

附录二:

汉英术语索引

A

安立甘宗/Anglican Communion(又称"圣公会"Anglican Churches)

B

霸权文化/cultural hegemony

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

版本记录/colophons

北京学/Pekingology

本体诠释学/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本土化/inculturation

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

编年史学/annual history

表层/superstratum

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

波士顿茶叶党/Boston Tea Party

不确定原则/Principle of Uncertainty

C

层次地域空间/Hierarchical Reginal Space

茶税/Tea Tax

茶条例/Tea Act

常春藤联合会/Ivy League

超自然化/supernaturalization

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

超专门化/overspecialization

朝贡体制/Tributary System

传统—现代模式/ Tradition - Modernity Model

冲击—回应模式/ Impact - Response Model

楚简/Chu Bamboo slip

D

大历史观/ macro-history

大觉醒运动/ The Great Awakening

单纯学科/ monodiscipline

单桅小帆船/ sloop

道统文化/ orthodoxy culture

第二轨道外交/ Track Two Diplomacy, Track Ⅱ (Citizen) Diplomacy

第二次大觉醒/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迪克西使命/ Dixie Mission

地形学宏观区/ 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s

地形学宏观区视图/ delineation of the 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s

电子计算机学/ computer sciences

断代/ dating

东印度群岛的货船/ East Indiamen

东正教/ Orthodox Eastern Church

多元化学科研究/ multi-disciplines

对话派儒学/ Confucianism in Dialogue

E

二分法/ dichotomy

F

反论/ paradox

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泛亚佛教/ Pan-Asian Buddhism

飞剪快船/clippers

非西方跨学科研究/Nonwester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分层/substratum

分离核心-边缘结构模式/separat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分析史学/analytical history

分支领域/subfield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y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

G

高潮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

格式化/formalization

格雷柯-拉丁造词法/Graeco-Latin neologisms

公共领域交流/change of public sphere

公共外交/public deplomacy

公班土/Bengal opium

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 Churches

管货人/Supercargo

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

龟甲阵(鱼鳞阵)/testudo

归正宗/Reformed Churches(又译"长老会")

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

国会法案/Act of Congress(即"爱国者法案")

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

贵格派/The Quakers

H

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

海獭皮/sea otter pelt

海上贸易扩张时期/Era of maritime Trade Expansion

汉学/Sinology

汉学地图/sinological map

航海条例/Nevigation Act

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宏观对比史/comparative macro-history

宏大叙事/Grand statements

话语/discourse

胡格诺派/The Huguenots

J

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

基因/gene

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

基督教文化/Christian Culture

基督教神学/Christian Theology

基督教儒学/Christian Confucianism

基要派/The Fundamentalists

基于偏见的分析框架/biased-based frameworks

极权主义/totalism

甲骨文/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教育传教/Educational Missions

价值标准/oecumenical value, universal value

建制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

结构形像/structural image

结构史学/structural history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解构/deconstruction
金花土/Turkish opium
浸信传道会/The Baptist Mission
精神文化/spiritual culture
精英和宗派政治/elite and faction politics
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
爵士制度/a hereditary aristocracy
决定论/determinism
K
科际整合手段/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科际协同区域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ynergistic area approach
课目规划/course proposal
克里姆林学/Kremlinology
口传历史/oral history
口述中国历史计划/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苦力贸易"/"Coolie Trade"
L
历史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历史主义/historicism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灵恩运动/Charismatic Movement
路德宗/Lutheran Churches(又译"信义会")
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
麦卡锡法案/McCarthy's Act
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
美亚事件/The Amerasia Case
美国和平队/U.S.Peace Corps
门户开放政策/Open-Door Policy with China
民族之国/nation-state
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
明代传记历史研究计划/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
N
南京布/nankeens
内窥文化/inward-looking cultures
年鉴学派/Annals School
能指/signifier
农业传教/Agricultural Missions
女性技术/gynotechnics
O
欧美中心主义/Euro-American Centralism
P
乒乓外交/Ping Pang Diplomacy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普林斯顿假说/Princeton Hypothesis
普世价值/ecumenical/universal value
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
Q
奇彭代尔中国式家具/Chippendale furniture
倾茶事件/Tea-Dumping Incident
虔敬运动/Pietism
前儒学/Early Confucianism
清教主义/Puritanism(又译"清教徒运动")
青铜器铭文/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情报搜集站/Intelligence Dragnet
侨居国/adopted land
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权威危机/Authority Crisis
诠释派儒学/Hermeneutic Confucianism
R
儒学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认识论/epistemology

S

萨满教/Shamanism

神道/Shintoism

社会福音论/Social Gospel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

社会变量区域分布/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variables

圣公会/Anglican Churches

圣洁运动/Holiness Movement

诗话/remarks on poetry

十三行/Chinese hong; Thirteen Guilds

实用主义/pragmatism

实证主义史学/Positivist Historiography

实证派/Positivists

事件史学/eventual history

适应策略/accommodation

视频化/visualization

士人文化/literati culture

宋词/Song lyric

数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

数字化/digitalization

数字化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

双轨外交/Two-Track Diplomacy

思想库(智库)/think tank

私茶/smuggled tea

私掠船/privateer

所指/signifié

速均主义年代/age of galloping egalitarianism

T

淘金热/Gold Rush

饕餮纹/Taotiemotif

特殊性/exceptionism

特殊话语论述/exceptionalist discourse

天主教/Catholic Church

天人合一/harmony in human and natural spheres

田野调查/fieldwork

W

湾区学者/Bay Area Scholars

微过程/sub-process

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微观汉学史/Sinological micro-history

微历史观/micro-history

伪证/perjury

文本化/textualization

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

文明之国/civilization-state

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文学关系/literary relation

问题史学/history through problems

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 Movement

无衔军官/noncommissioned officer

物质主义/materialism

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

X

锡克教/Sikhism

西方中心观/Western-centric Perspective

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 Centralism

细节明快/luminous details

系统科学/systems science

先锋派/the Avant-garde

现象学/Science of Phenomenology

现代性/modernity

效忠宣誓/loyalty oath

新汉学/New Sinology

新教/Protestantism

新儒学/Neo-Confucianism

性别研究/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行动主义精神/Activism

行为主义革命/Behaviorist Revolution
形而上学/metaphysics
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
叙事文学革命/Narrative Literature Revolution
宣誓效忠纷争/loyalty oath controversy
循道派/Methodist Church
Y
洋泾浜/pidgine
医药传教/Medical Missions
以物换物/barter
亿万富翁/multi-millionaire
意象并置/juxtaposition of images
意识形态/Ideology
意指/signified
译事艰难/the moil of translation
异体组合/unity-in-variety
印花税/Stamp Duty
应试学子/candidate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犹太教/Judaism
院外活动家/lobbist
Z
战局共存/combative co-existence
占卦学/Divination Science
针刻纹三角援戈/triangualar bladed ge-halberd with incised decoration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
"中国崩溃论"/"China Collapse"
"中国威胁论"/"China Threat"
中国中心观/Sino-centralism
中国中心模式/China-centered/Sino-centric model
中国中心方式/China Centered Approach
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
中国形象/image of China
中国话语/Sino-speak
中国通/old China hand
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
中心区域扩展理论/extension of central place theory
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
种族优越感/ethnocentric bias
竹书纪年/bamboo annals
自由派/the Liberals
自主性/autonomy
宗教进化论/Religious Evolution
宗派/denomination
总体史/histoire totale
组合异体/variety-in-unity

附录三：

美国汉学史大事记

1738 年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宾西法尼亚报》上发表《孔子的伦理》。
1784 年	“中国皇后”号到达广州。
1786 年	山茂召任美国驻华无给职领事。
1827 年	吴特在广州创办《广州纪事报》。
1830 年	裨治文奉派前往广州。
1832 年	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
1842 年	美国东方学会创立。
1843 年	《美国东方学会季刊》第一卷出版。
1862 年	蒲安臣首任驻华公使。
1868 年	保灵在福州创办《教务杂志》(后改名为《中国纪事和教务杂志》);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
1869 年	美国赠送中国一批西文图书和种子,中国回赠明清 10 种 900 余卷古籍刻本。
1872—1875 年	中国先后派遣四批 120 名幼童赴美学习。
1878 年	陈兰彬首任中国驻美公使;卫三畏在耶鲁大学开设中国语言文化讲座。
1879 年	戈鲲化应聘在哈佛大学开设汉学课程。
1882 年	英美学者在北京创立北京东方学会。
1883 年	热心推动汉语教学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成立。
1895 年	英美传教士合办《亚洲文会会刊》。
1896 年	傅兰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开设东方语言文学课程。
1901 年	卡朋蒂埃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 10 万美元汉学发展基金。
1902 年	夏德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第一任汉学教授。

1913 年　耶鲁海外传教会成立(1975 年该会改名为“雅礼协会”)。

1919 年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成立,下设以芮沃寿为主席的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

1920 年　夏威夷大学开设汉语、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课程。

1921 年　赵元任在哈佛大学担任中国语言和哲学教席。

1925 年　美国太平洋学会和哈佛—燕京学社成立。

1926 年　美华协进会创建。

1928 年　陈绶颐在芝加哥大学开设汉语口语课。

1929 年　促进中国委员会成立。

1930 年　康奈尔大学开设亚洲人类学课程;费正清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历史。

1936 年　芝加哥大学建立东方语言系。

1938 年　陈永寿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任教。

1941 年　《远东季刊》出版(1956 年改名为《亚洲研究学刊》)。

1945 年　赵元任在斯坦福大学主持美军汉语培训班。

1946 年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成立。

1948 年　以费正清为主持的美国远东协会成立。

1950 年　美国第 81 届国会通过麦卡锡法案。

1955 年　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

1956 年　亚利桑那大学设立东方研究委员会,开设中国历史和法律课程;亚洲研究协会成立;芮沃寿、费正清、雷德菲尔德发起成立美国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

1958 年　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强调通过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加强语言培训。

1959 年　美国民间学术团体康伦协会应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邀请提交了一份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报告。史乐伯起草了该报告亚洲政策部分,提出了放宽对华贸易禁运、中国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的建议。同年,美国社会科学协会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联合召开了古尔德会所会议,就美国的汉学研究领域、结构和范围展开了讨论,确定了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中国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和政治学研究方向,并成立了当代汉学联合会和

相应的分会。

1959 年　全美学术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联合组建中国研究协会;27 所美国高校专家和联邦政府代表举办汉语教学研讨会。

1960 年　美国中国语言文化教师协会成立。

1963 年　美国中国语文教师学会成立,并创办《中国语文教师学会学报》。

1966 年　3 月,富布赖特主持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历时三周的听证会,就对华政策进行辩论。鲍大可提出了"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建议。同年,《麒麟》杂志创刊;费正清联手 100 多位学者编写《剑桥中国史》;普林斯顿大学福特基金会开展中国语言学研究。

1968 年　一份汇集了费正清、鲍大可、赖肖尔和傅高义等中国问题专家智慧的秘密备忘录由基辛格博士交给总统尼克松,提出了派人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建议。同年亚利桑那大学创建东方学系,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了东亚系,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创立。

1972 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1973 年　《中国语言学报》创刊。

1975 年　美国中国宗教研究会和孔子文教基金会成立。

1978 年　美国汉代研究访问团来华。

197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交;中国教育部与美国教育、卫生、福利部交换教师互访和学术交流备忘录。

1980 年　第一届中美汉语教学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

1982 年　中国汉语教师学会访问美国并进行考察。

1983 年　第三届中美汉语教学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中美双方就 13 个项目达成了协议。

1987 年　山东邹平县建立起美国学者直接考察研究基地。

1989 年　第一届北美汉语语言学大会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召开。

1994 年　美国大学理事会(Ammerican College Board)在高中生专

	科考试中增加了 SATII(Scholarstic Assessment Test in Chinese with Listening)中文听力测试项目。
1995 年	隶属于美国亚洲学会的明史学会在华盛顿成立。
2000 年	由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贝鲁科学院现代语言和比较文学系与中国华中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法研讨会。
2003 年	南美地区八州 30 所中文学校校长会议在美国休斯敦召开;美国大学理事会决定设立大学汉语和中国文化预修课程及考试项目(AP 汉语项目),选修学生人数达 100 多万。
2005 年	华美协进会和马里兰大学分别成立孔子学院;美国政府为外语赞助计划拨款,把中文列为国家安全与美国竞争力语言计划的重点外语之一。
2006 年	全美中学开始设置 AP(Advanced Placement)中文课程;第六届全美中文学协会代表大会在旧金山召开。
2007 年	全美各地开始 AP 中文综合测试(AP Chinese & Culture Simulated Tests)。

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美国汉学史（下册）

ISBN 978-7-5077-4699-0

责任编辑：杨　雷

印章篆刻：郑怀宝

封面设计：徐道会

定价：120.00元

（全两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美国汉学史　下
作者=熊文华著
页数=627
SS号=13854858
DX号=
出版日期=2015.03
出版社=北京学苑出版社

封面
书名
四、美国具有现代性特色的汉学研究时期（1972年至今）
第六章　华人学者对美国汉学发展的持久贡献
一、考据学、文本研究和中古音韵学专家赵元任
二、以中国史学和文献研究蜚声海内外的洪业
三、长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林语堂
四、学贯中西的政治思想史专家萧公权
五、西方朱熹思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陈荣捷
六、对非汉语语言学研究有杰出学术贡献的李方桂
七、明清史和文献学知名专家房兆楹和杜联结夫妇
八、美国著名国际华裔历史学家邓嗣禹
九、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培养人才的柳无忌
十、毕生致力于图书馆学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钱存训
十一、以中国经济史和制度史研究闻名于学界的杨联陞
十二、在经济史和社会思想史研究中贡献卓著的何炳棣
十三、提倡以大历史观解读中国历史的黄仁宇
十四、享誉美国学术界的口传历史学家唐德刚
十五、以中国现代小说史奠定文学评论家地位的夏志清
十六、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徐中约
十七、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精神的余英时
十八、基于语言与文学的中国人文研究开拓者周策纵
十九、对中国考古学和台湾史前史研究贡献杰出的张光直
二十、从比较视野中探索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陈启云
二十一、汉藏语言比较、汉语语法史和方言史专家梅祖麟
二十二、中西哲学比较和儒家哲学与本体诠释学专家成中英
二十三、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李欧梵
二十四、以多元化发展的目光审视传统儒学的杜维明
第七章　中国通：美国汉学史中的华丽一族
一、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充满热情的罗德里克
二、具有务实前瞻精神的东亚政治学家施乐伯
三、中美关系的重要推动和维护者鲍大可
四、中美首脑峰会的铺路者和见证人基辛格
五、中国政治和亚洲事务研究资深专家何汉理

六、聚焦于中国政治体系和政策制定程序的奥克森伯格
七、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跨国投资的专家李侃如
八、重视著述中的经验价值和前瞻功能的蓝普顿
九、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台湾海峡和平前景的包瑞嘉
十、对中国政治有与众不同见解的谢淑丽
十一、精通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和亚太关系的柯庆生
十二、美国制定对中国政策的核心人物杰弗里·贝德
十三、研究美中关系、国际政治和亚太安全的权威沈大伟
十四、研究军控、软实力以及军事与环境的专家季北慈
第八章　美国汉学的文化基因与普世意义
一、关于“美国特殊论”与“中国特殊论”
二、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诠释
三、意识形态与美国汉学
四、美国汉学研究中的学术代沟与话语权
五、美国汉学与中国形象的构建
六、美国汉学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汉英人名索引
附录二　汉英术语索引
附录三　美国汉学史大事记
封底